

岭南幕客诗人汪瑔研究



王进驹　王永青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岭南幕客诗人汪瑔研究

王进驹 王永青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南幕客诗人汪瑔研究 / 王进驹，王永青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161－1066－9

Ⅰ.①岭… Ⅱ.①王… Ⅲ.①汪瑔(1828～1891) －人物研究Ⅳ.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650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何又光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序

魏中林

在近代岭南文坛上，汪瑔主要以词著名，他与叶衍兰、沈世良的词被合编成《粤东三家词》，影响颇大，成为当时岭南词坛的代表之一，后人谈及汪瑔大都着重于他的词作。其实汪瑔也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他一生不废吟哦，诗的数量多于词十余倍，年轻时便曾得到著名诗人和学者张维屏、陈澧、林昌彝等的赞许，晚辈的文廷式也给予汪瑔不俗评价。钱仲联先生在讲论清诗时，谈到汪瑔就称赞他“集子中的爱国诗很多”，并具体分析一些诗篇说：“见识不凡”、“是别开生面的爱国诗”、“写得极是好”，还指出“汪瑔诗极有见解，识力是其诗的一大特色”，流露出对汪瑔诗的喜欢。汪瑔确有其特色，一是他身为一名幕客，人品端正，位卑而不失“布衣报国心”；二是在近代派别林立，宗尚各异的诗坛上，汪瑔不属于哪一派，没有“圈子”，却有自己独立的艺术追求；三是作为浙籍人粤者，由衷热爱岭南，自觉融入岭南文化中，同时又能在客省保持和发扬乡邦传统，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家族文化，为近代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培养了人才。目前对汪瑔及其家族文化还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进驹教授和他的弟子共同完成了《岭南幕客诗人汪瑔研究》一书，这对于岭南文化和清代诗歌研究是一项有益的工作，进驹请我为书作序，我曾对这一课题谈过一些意见，就把它写在这里，也借此对清诗和岭南文化研究的更大拓展寄以希望。

2011 年 8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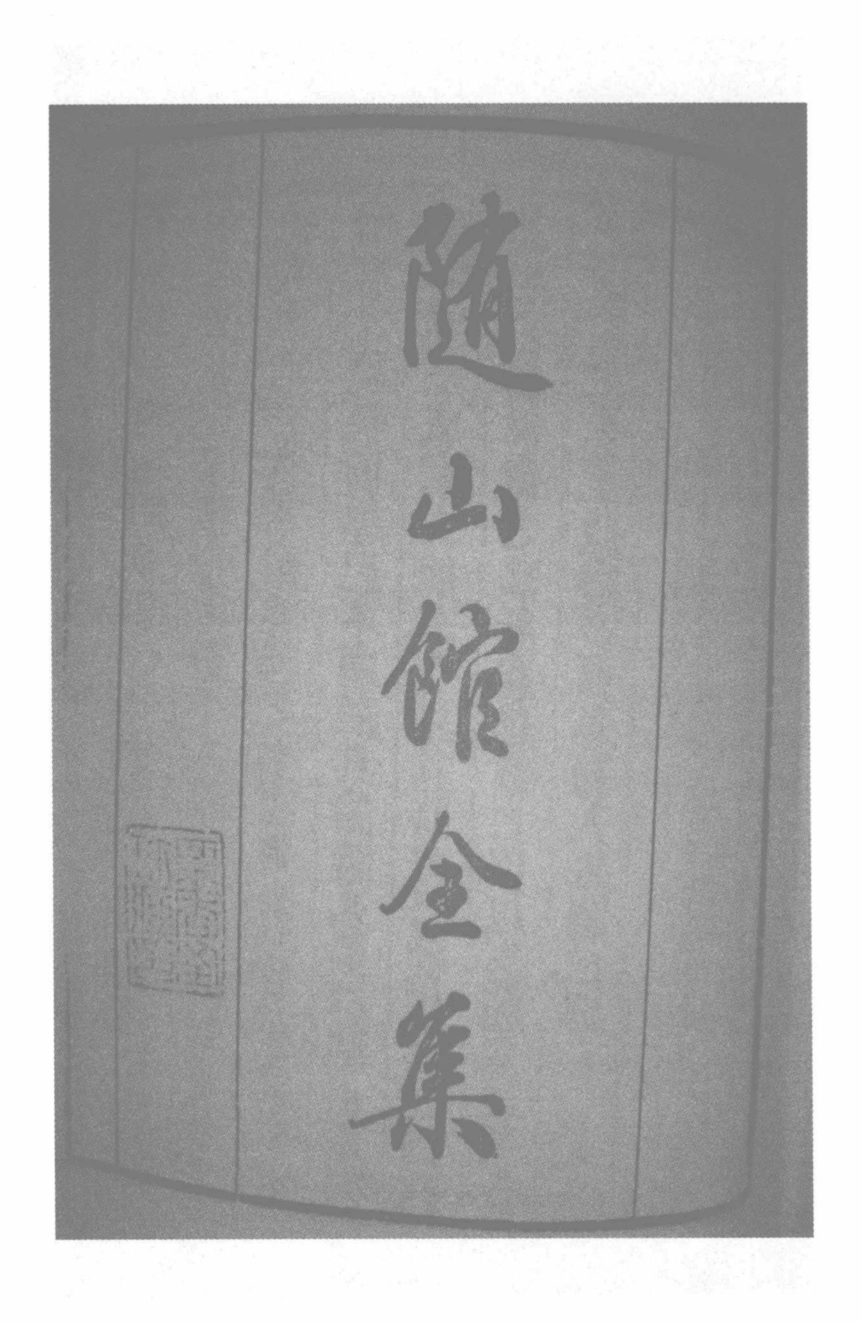
汪瑔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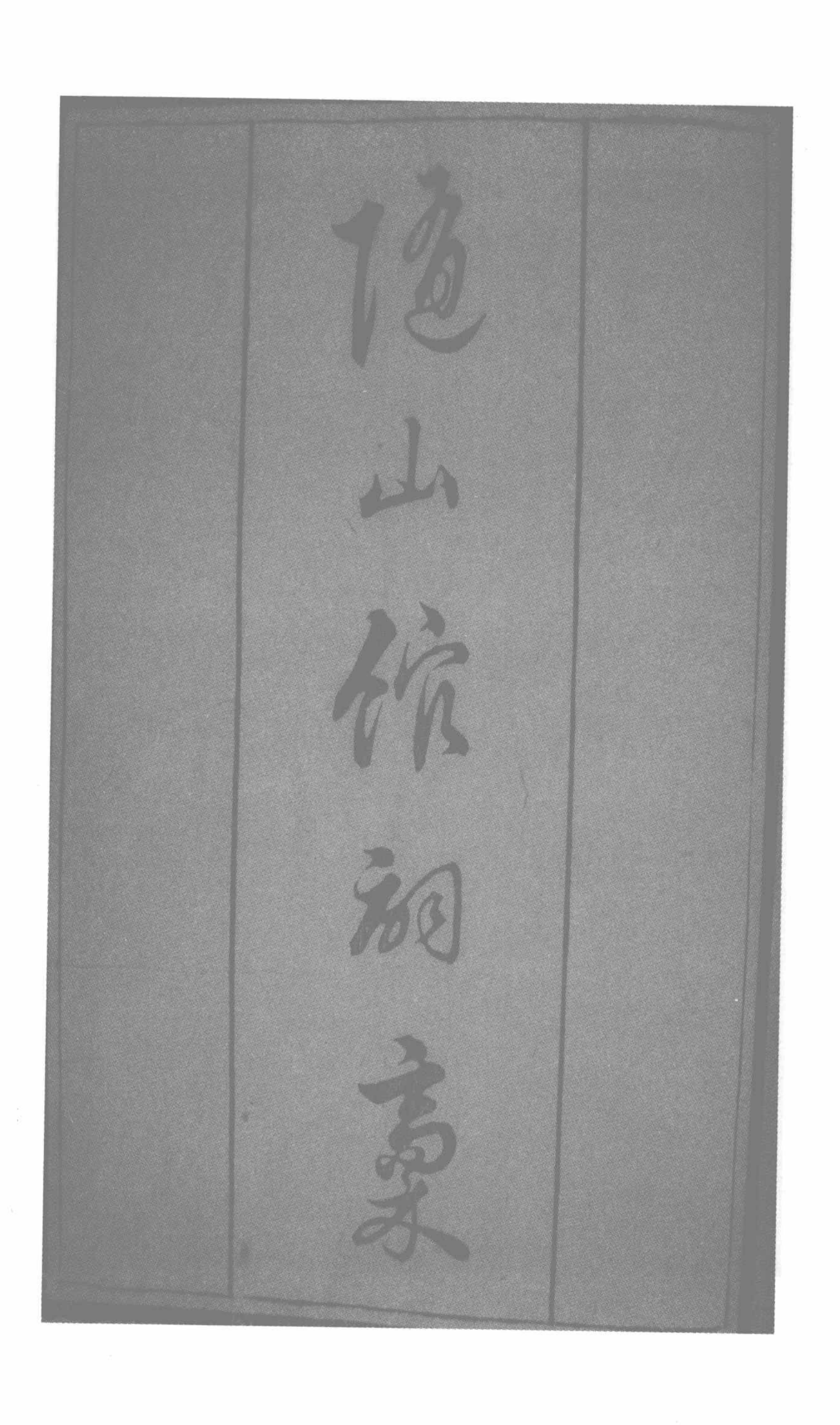
（图像来源：叶衍兰、叶恭绰编《清代学者象传》，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0 页）

汪瑔手迹

（图像来源：《清代名人翰墨续集》沈云龙主编，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9 版，第 14 页）


隨山館全集


隨山館詞稾

引　言

近代岭南风云激荡，诗潮澎湃，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杰出和优秀的诗人。这些诗人多为累世居于粤地，生长于本土的广东人，但也有部分原籍外省，因父祖辈在嘉道咸年间入粤而长于岭南的新广东人，其中以浙籍入粤者为多，如徐灏、汪瑔、叶衍兰、沈世良、朱启连、汪兆铨、汪兆镛、汪兆铭、叶恭绰等，这些浙籍入粤诗人多有家族文化传承的背景，或为父子兄弟的家学授受，或由两姓互姻而文风播延。在多个文化家族中由山阴入粤的番禺汪氏家族可谓名声颇大的一支，而汪氏一族在近代广东的文化影响主要是由汪瑔开始的。

汪瑔（1828—1891），字玉泉，号芙生，又号谷庵。祖籍浙江山阴，自幼随父游幕，长于粤东，将近晚年入籍番禺。咸丰初为州县幕客，光绪间先后入两广总督刘坤一、裕宽、张树声、曾国荃幕，才干卓异，尤擅洋务，为幕主所倚重。汪瑔性情贞简，澹于荣仕。晚年养疴，耽情坟史，名贤钜公礼聘踵至，终不复出。学识博洽，勤于著述。为粤东诗词名家，文章书法亦佳。汪瑔诗品人品俱优，深得名流张维屏、林昌彝、陈澧、陈宝箴、金武祥、文廷式等人赞赏。

汪瑔的著作辑于《随山馆全书》，包括诗、词、文、笔记杂著共三十余卷。其作品向世人展现了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描绘了岭南地区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映现出那一时代思想文化的风貌，也呈示着自身的心路历程，这对于深入认识近代历史特别是岭南地区的社会文化富于参考价值，对于岭南文学史的研究，也可提供有用的资料。中国近代史上两位重要人物朱执信和汪兆铭（即汪精卫）均与汪瑔有着亲属关系，汪瑔是朱执信的外祖父，汪兆铭的叔父，故亦可通过研究汪瑔进而考察浙籍入粤的文士家族对清末两位政治人物的文化和文学影响，有助于近代史人物研究的深化。

学术界对汪瑔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目前所见限于一些有关岭南文学研究的通史通论性著作及个别谈“粤东三家”词的论文之概略性介绍[①]，专题研究的著作尚未见到，对于这样一位有特色也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及其家族文化来说，是不够相称的。有鉴于此，本书对汪瑔进行比较系统完整的研究，以翔实的文献资料为基础，考述汪瑔的家世、生平及其交游，分析其思想性格；结合时代环境与作者生平，力求完整和准确地把握汪瑔的作品，对其文学思想、诗、词和散文创作分别进行探讨，阐释其中的社会文化蕴涵、岭南地方特色，触探作家的情感心态，细致分析其艺术风格和形式特征；把汪瑔与浙籍入粤的诗人群体联系起来，探讨这一群体的面貌和汪瑔在其中的作用；将汪瑔置于晚清岭南文坛上评价其地位，并具体分析了他对汪氏家族及门人后学的影响。另外还编著了汪瑔年谱简编，辑录了汪瑔集外诗文数十首，这些都可为汪瑔以及汪氏家族研究提供有利的条件。

---

① 参见钟贤培、汪松涛主编《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管林、陈永标等著《岭南晚清文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魏中林《钱仲联讲论清诗》，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陈永正《岭南诗歌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目　　录

第一章

汪瑔的家世、生平、思想和交游

汪瑔一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因而无从获得正式的功名，晚年以捐纳得监生，授同知衔，封奉政大夫，以子封文林郎。终其世没有做过官，身份只是一名幕客，这与其生为浙人而长于粤地的身世以及家族的游幕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他的幕客生涯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汪瑔的家世

浙江山阴汪氏一族，有文献可稽的世系是从元末开始的。汪氏定居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第一代是纯一公，他将家族从安徽婺源迁移至浙江绍兴山阴火珠巷。汪纯一逝世后被送回故土婺源安葬，而后此支汪氏人则葬于山阴。从元末至明末近三百年间，山阴汪氏也曾出现过一些有名位的人物，如四世的汪徽，赠兵部郎中；五世的汪镃，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成化年间官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后升郎中，进阶朝列大夫。汪氏家族中才学、官位、声名最显而被载于官修史书的是七世的汪应轸，应轸字子宿，号青湖，正德十二年（1517）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抗言疏谏武宗南巡而“受杖几毙”。出官泗州知州，多为善政。世宗践祚，召为户科给事中，在职一年多，上三十余疏，均能切中时弊。嘉靖三年（1524），出为江西佥事。居二年，具疏引疾归。后起复原官，视江西学政。入祀泗州名宦、绍兴乡宦祠，《明史》（卷二百八《列传第九十六》）有传。著有《青湖文集》十四卷，清乾隆时录入《四库全书》。明末以后，汪氏家族罕见闻达之人。至乾隆年间才有为官者，这就是十五世的汪伦秩，即汪瑔的曾祖父。

汪伦秩（1709—1769），字攸五，号幼湖。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选授海宁县学教谕；乾隆二十五年（1760）升江西新喻县知县，“在

任五年，民间有汪青天之称"[①]。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任广东长宁县知县，但到任才五十天就因病去世，年六十一。当时他还欠着官银数百两，家属不能偿还，也就无法返乡。时任知府慨然曰，"汪吏清官也"，于是为汪伦秩代还了公款，并资助汪家属扶柩归葬。汪伦秩著有《幼湖文集》二卷，钱塘陈兆崙为之序，称其"觇立朝风度，振清白家声"。汪伦秩是山阴汪氏家族中最早入粤者，汪兆镛说："乾隆三十四年，幼湖公为长宁知县，是为吾家来粤之始。"[②] 汪伦秩三子汪炌（1756—1832），即汪瑔的祖父则是最早在粤游幕的汪氏族人。汪炌，字明之。他原随父伦秩入粤，其父卒于任，汪炌扶柩归里。嘉道间他曾在安徽、湖南、江西、广东游幕，先后入湖南按察使傅鼐、湖南巡抚阿林保、两淮盐运使曾燠幕。"公有经世才，不见用于世，家贫佐有司幕，凡数十年。与傅公鼐、曾公燠尤相得。傅公平苗疆时，公在幕中，其善后事宜，有凿天生砦、开文科二条，即用公之议也。后屡佐督抚臬司，治刑名，事廉介不苟，而戚族婚丧，皆出脩脯资助。生平喜读史，尤习于顾氏《读史方舆纪要》及温公通鉴。"[③] 道光初，入广东按察使司幕，直至去世。汪炌为幕数十年，能审时度势，屡献良策，其人品亦正直磊落，为后世入幕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汪炌的儿子中，只有长子汪云取得功名。汪云（1786—1844），道光二年（1822）举人，选授浙江遂昌县训导兼掌教妙高书院，著有《周易述义》、《枕上草诗集》，诗与和书法均有名。他是汪瑔的伯父、汪琡之父。

汪炌之后，其弟金鉴、子鼎先后在粤为幕客。这既有父兄的直接影响，也跟清代中叶后广东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吸引大批外省人士入粤谋职的风气有关。汪瑔的叔祖汪金鉴（1762—1829），县学生，"晚年佐广东南韶道幕，以修脯之余周恤宗族"。

在汪瑔的父祖辈中对汪瑔的性格和人品有重要影响的是其父汪鼎。

汪鼎（1791—1854），字禹九，清道光、咸丰年间，曾在广东顺德、清远、信宜、南澳等地为幕，著有《雨韭庵笔记》二卷。汪鼎是一个关

---

① 汪兆镛：《山阴汪氏谱》，汪敬德堂民国36年印本。

② 同上。

③ 同上。

心民情国事的幕客。著名学者陈澧看了汪瑔给他的关于汪鼎所著笔记和蕴璘所做行状之后，发出感叹："是可谓贤也。"在为汪鼎撰写墓表中说"凡君所治事不可胜纪"[1]。在此墓表中特别记载汪鼎的三项事迹。第一事：在顺德县时，有举人罗某，被仇人诬告藏盗于家，此案在前任县令那里已经定案，但汪鼎在查阅案卷时有所质疑，及时向知县反映案情。原来，案发之时，罗某正在广西宾州，根本不在顺德，后来汪鼎出主意说只需查明案发之时广西宾州的旅舍即可，后查证罗某所言属实，因而使罗某得以昭雪。事后，罗某登门道谢，汪君坚决推辞不见。第二事：在清远做幕之时，有两家百姓因为争田地而闹官司，但两家皆有地契，因此数十年该案都没能断清。汪鼎在看了税契之后，对其中一家在税契末书写有"顺治元年"的印契哂笑，并且说："顺治元年，王师未至粤，安得有印契?"并且找出了《御批通鉴辑览》，此人方信服。第三事：在南澳厅为幕客时，有人写信状告总兵的部下聚众饮酒以图谋反，总督因此派同知查问此事。汪鼎知道此事后对同知解释说："札言聚饮以五月十三日，其地则关帝庙也。是日俗传关帝生辰，军民多设祀醵饮，何谓反耶?"因此总兵才得以免除谋反的罪名。总兵为感谢汪鼎的救命之恩，在汪鼎生日之际，用千金为他祝寿，汪鼎却严词拒绝。后来同知任满，汪鼎也要返回省城，总兵又以千金相赠，汪鼎再次拒绝。总兵坚持要他接受，他声色严厉地说："吾所治者公事，岂为受金耶！必强我者，当投金海中。"由此三事可见，汪鼎是一个一心为民，富于正义感，有气节又有才能的人，他的行为和品德为日后的汪瑔做幕树立了表率和榜样。

汪鼎妻卢氏，生有二子一女，汪瑔是次子，其兄汪玮幼殇，故实际上汪瑔成为单传。汪瑔姊玉篑，字鞠生，适卢洲，洲字秋枰。汪瑔少时长姊以诗教之，故对其感情很深，与姊夫秋枰也很密切，集中有不少唱和之作。

到汪瑔这一辈，除了汪瑔本人从咸丰初开始入幕外，其从兄即汪云子汪琡（1824—1897）于同治、光绪年间，先后在广东东莞、三水、曲江、陆丰、英德等十多个县当幕客。《番禺县续志》有传，称其"客游四十余年"。[2] 金武祥在《粟香四笔》中记载"芙生之从兄竺生司马，名琡，憬

---

[1] 陈澧：《东塾集》卷六《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0 页。

[2] 梁鼎芬修：《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一，成文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14 页。

吾孝廉之尊人也。老于幕府，屡佐军事，建奇猷多阴德”[①]，说明汪琡有着入幕的经历，而且也是一位比较有贡献的幕客。汪云另一子汪璘（1819—1860）也曾做幕，咸丰十年，在武进县出任幕客，四月初六日，太平军攻陷常州府，他英勇殉难，卒在幕上。汪士琅，“少孤，客粤从叔父贤甫公治刑名学，游幕数十年，在南韶连道铅山华公祝三幕中尤久”[②]。自从汪玠之后，汪氏家族有着数代为幕的历史，而且形成了讲求道德节操、爱国为民的良幕传统。

即便是没有做幕客的汪士林，即汪云子、汪瑔的从兄，也是正直无畏的耿介之士。咸丰十年（1860），“粤匪犯绍兴，城陷，贼入里，公骂贼，贼举刃斫公额，流血沾被衣履，仆地骂不绝口。贼诧曰此秀才未见过，径去。公自投于河，乡人援之苏，因间关逾岭而南。”[③] 汪兆镛在为伯父汪士林所作的《世父读山先生行述》中写道，“吾汪氏元末由婺源迁山阴以来，子姓虽不繁衍，而世为士，安于贫”[④]，指出汪氏家族历来有着刚直不阿、安贫乐道的家风。

第二节　汪瑔的生平

汪瑔生于道光八年（1828），卒于光绪十六年（1891），经历了清后期的四代王朝，亲历目睹了近代社会的急遽变动，尝够了生活的苦辣酸辛，而这些丰富的经历成为他创作的源泉。

一、少年和青年时期

道光初年社会还算稳定，其时汪瑔父亲在广东为幕，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家庭还较安适。他在晚年所作《述怀十二韵并序》中回忆道：“鄙人生于道光之初，于时岭表无事，先君子挈家客游，瑔以童稚侍左右，岁时

---

① 金武祥：《粟香四笔》卷七，《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② 汪兆镛：《山阴汪氏谱》，汪敬德堂民国36年印本。

③ 汪兆镛：《微尚斋杂文》卷五，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④ 同上。

宴熙，初不知饥寒兵戈为何事也。”①

这样的家庭环境，也使汪瑔得到较好的教育。少年时的汪瑔聪慧过人，“七岁能为诗”②，跟随着父亲汪鼎游历粤中各地，得以参加各种诗文之会。在这些诗文之会上，他崭露头角，所作诗文得到远近耆秀的称赏，一时之间愿与汪瑔结交者众多。如黎近夫就是先见汪瑔的诗歌，因而诗文往来，二人才有缘订交（《黎近夫来广州，相见于张松谷寓斋，纵饮极醉，赋此赠之，并示松谷、浦臣四首》自注：“近夫曩客乐昌，见余诗遂以书来订交”）。

但是好景不长，社会风云突变，道光二十年（1840）汪瑔十三岁时，英舰封锁广州江面与海口，主力北上，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随着战乱汪瑔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他突然面对着颠沛流离的青年生活。他从十三岁开始跟着父亲为生计奔波，开始体验到生活的艰辛。“瑔年十三，禁烟之事起，未几而烽尘澒洞，世事益以敝，生计日以艰，辞家远游，衣食奔走，其间居围城，历军垒、涉风涛、犯瘴疠，如此者二十余年。”③这一时期内，汪瑔虽然是跟着父亲一起到处游历，但并未真正入幕，生计的重担依然是由父汪鼎担当。

随着年岁的增长，汪瑔开始与友人相互酬唱，赋诗论文。其《随山馆猥稿》的前两卷诗歌皆是汪瑔出任幕客前所作，是他青年时代生活历程的缩影。青年时期的汪瑔喜欢读书，但又反对一味苦读，他在十九岁时写《读书》诗，诗中有“求之文字间，未必得其真”句。少年青年时期的汪瑔好学多才，但因其浙籍的身份，不能在粤参加科举考试（见本章第三节之二）。因此，他常与友人流连诗酒，对弈观景。1846 年秋，十九岁的汪瑔与卢秋坪在雨夜中对弈，“冷玉一枰人不语，客窗凉雨剔灯时”④。在这一年，他还与卢秋坪一起观赏白菊花开，并且相互赋诗唱和。秋天，又游览珠江夜景，写下《珠江秋夜曲》。1847 年 7 月 15 日，汪瑔参观盂兰盆

① 汪瑔：《述怀十二韵并序》，《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42 页。

② 朱启连：《山阴汪先生行状》，汪兆镛辑《碑传集三编》卷三九，文海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078 页。

③ 汪瑔：《述怀十二韵并序》，《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42 页。

④ 《与卢秋坪夜弈》，同上书，第 562 页。

会，作诗记其盛况。[①] 1848 年重九日与李成业、李成勋、马文镫、孙长恩等同去越秀山登高。登高归来，又相携同去余溥臣的衡华阁相聚。[②] 类似这样的观赏游览活动在汪瑔未出幕之前是比较频繁的，其诗集中每年都有不少这方面的纪游诗。离明观、黄木湾、唐荔园、越秀山、花埭等，这些都是汪瑔与朋友们流连忘返之所，每次游览大家都会作诗遣兴。

汪瑔青年时期，除了游赏风景名胜之外，还时常与友人聚会畅谈。1849 年，二十二岁的汪瑔在杜仲容的尺五斋与杜仲容、杜季英兄弟夜话[③]。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他又与友人在眠鸥馆相聚。[④] 1851 年的 9 月 11 日夜，他与余溥臣一起造访张楠的六息轩，三人畅谈，彻夜未眠。[⑤] 是年，黎汝恕来广州，汪瑔与之相见于张权的寓斋，三人纵饮极醉，并作有诗。[⑥] 小除夕时，汪瑔又与张权纵饮极醉并赋诗。[⑦]

汪瑔随父亲游历粤东各地时，客居在外，虽常有友人相伴共度凄冷的雨夜，但仍不时感到思家的惆怅。在这样旅途漂泊的生活中，汪瑔很早就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和对前途的担忧，发出“江湖多素波，稻粱未堪食”[⑧]的喟叹。

二、入五福幕时期

1853 年，二十六岁的汪瑔，因家境所迫，不得不入幕谋求生计，跟随五福为幕，这就是诗人一生幕客生涯的开始。在汪瑔出任幕客的第一年，他就因为身体不适，一病十几天。身体上的不适休养之后就可以恢复，但紧接着就是更大的打击。在汪瑔出任幕客的第二年（1854），他的父亲汪鼎死于广州，当时正值兵荒马乱，父亲亡后无法归葬山阴老家，只好暂时埋葬在广州小北门外狮毬冈。亲人亡故，生计的重担，全都压在了

---

① 《观盂兰盆会》，《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3 页。

② 同上书，第 565 页。

③ 同上书，第 569 页。

④ 同上。

⑤ 《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82 页。

⑥ 同上书，第 583 页。

⑦ 同上书，第 584 页。

⑧ 同上书，第 562 页。

他的肩上。“对影他乡酒，生凉客子衣。结璘如识我，应笑远游非”[①] 便反映出此时汪瑔内心的痛苦。

他厌烦离家远游的生活，但又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四处漂泊。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入曲江令五福幕，在其诗集中有《发广州》[②]、《三峡》、《舟中望峡山寺》、《弹子矶》、《抵韶州》[③]，记录他的旅途所见所感。在《抵韶州》中他抒写了自己离开广州之后的感受：“舟行阅旬日，心厌帆与樯。北风吹游子，忽在庾岭阳。”这是汪瑔第一次出任幕客的心情，仅仅是从广州到达韶州，他就已经厌烦了旅途的颠簸。

汪瑔追随五福历任阳山、东莞、番禺三县及廉、琼、潮、高、肇庆五府，共计十六年。在这十六年中，汪瑔尽心辅佐五福，为民造福。咸丰四年（1854），陈开何六党数万人，占据城北的帽子峰，因帽子峰与曲江是相互隔绝的，只有水路才能通过。贼党抢掠民船，渡水攻城。汪瑔鉴于形势，策划以火箭射焚贼舟，由此曲江城得以保全。

咸丰七年（1857），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汪瑔最好的朋友杜季英被突然飞来的炮弹所射中，二十五岁即折首而殒，战争无情地夺走了汪瑔的好友。杜季英去世之后，汪瑔曾数次作诗缅怀，感慨万千。[④] 这一系列的变故，对汪瑔来说是锥心刺骨的痛，面对战火纷飞的时局，他只能无奈地感慨：“天多风雨惊归梦，地有兵戈助客愁。”[⑤]

1868 年，五福卒于官任，汪瑔不得不另择他幕。这一年，汪瑔的母亲卢宜人亡故，他为母亲守孝。

三、后期为幕

在为母亲服阙之后，同治八年（1869），汪瑔再次客游潮州，入在盐运使冒澄的幕下。同治十一年（1872）又入为藩使俊达的幕僚。光绪元年（1875）刘坤一督粤，延请汪瑔主理夷务，处理中外交涉；继任裕宽、张树声、曾国荃都非常器重他，前后又十几年。在这频繁更换幕主的十七

---

① 《六月十五夜月四首》，《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93 页。

② 同上书，第 590 页。

③ 同上书，第 591 页。

④ 同上书，第 600 页。

⑤ 同上书，第 594 页。

年中，他始终怀着一颗爱国为民之心，佐助幕主，多为善政，造福于民众。在陈宝箴为他做的墓志铭中就记载了汪瑔在不同时期做幕客时之重要行事。

同治十年（1871）六月，潮州发大水，当时，汪瑔在冒澄幕下，亲眼目睹水灾将潮州城几乎淹没，汪瑔作有《六月杪潮州大水感事有作》[①]，对此次水灾作了形象的描绘：“郡城俯韩江，萦绕东南隅。巨浸初见逼，不没三版余。安危在咫尺，性命争须臾。幸见霁色开，甫使惊魂苏。城中十万户，仅免嗟沦胥。城外数百村，已见成污潴。余粮失鸡鹜，微命逃鱼龙。嗷嗷遍哀雁，处处号饥乌。”面对着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惨状，汪瑔劝当事者赈抚灾民，立散赈之法，当时的文告多出自汪瑔之手，他在潮州人民危难的关头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同治十一年（1872），在俊达幕下，潮州因水旱之灾，官吏私自动用库银赈灾，而后不敢向上级交代。因为清代律法规定，国家库藏出入，有经钱粮银五百两以上，没有向上级禀奏不得擅自挪用，而潮州水旱之灾，官吏发放藩库中库银却共计两千两赈灾。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俊达公不知该如何解决，后来汪瑔想出了一个用税契来补充库银的办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仅解决了潮州的难题，造福了一方百姓，而且为其他各县相继效仿，此功可谓不小。

光绪元年（1875），汪瑔入籍番禺捕属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番禺人。之后，他依次在刘坤一、裕宽、张树声、曾国荃幕中，主持夷务，处理中外交涉事宜。“广州通蕃最久，民与夷习，互市为天下重，夷之习中国者，恒因贪衰之民，恢诡其所为以机阱相陷伏，外挟恫疑，内隐私利，事发于此，而意寓于彼。文书往复，刚柔万端，而总督实专其政，片文残意，一委先生。凡四公六任，居幕府者十年，威不下亵，辞不失旧，身柄潜折，民气不欢不挠，其效在冥冥之中。”[②] 凭着多年做幕客的经验，汪瑔应付自如，得到了幕主的称赞。曾国荃曾叹息恨相见晚，且曰：“惜吾兄（曾国藩）未识君”，对汪瑔极为赏识。

---

① 《六月杪潮州大水感事有作》，《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7页。

② 朱启连：《山阴汪先生行状》，汪兆镛辑《碑传集三编》卷三九，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0页。

四、晚年家居养疾

晚年的汪瑔因病不能治愈，体力不支，不再出任幕客。自此后潜心学问，以学问来治病。生活上先是得到女婿外甥和门人的接济，后其子兆铨获选学官，乃得赖以维持家计。他在《述怀六首》中自注云："闭户养疴已数年矣，赖门人姚生文骏，洎朱婿启连，陶甥尔锟辈，岁时问遗给朝夕之需。今秋儿子得海阳学官，诸子所贻遂以谢却。虽儒官俸薄，不周于用，亦惟随时尽消息之理而已。"

在汪瑔晚年养病期间，他还创作了不少诗歌，收录在《随山馆猥稿》续稿中。自汪瑔不做幕客之后，他定居在寓斋中，静观世事万象，物候变迁。他作了大量与气候自然相关的诗歌，如《残暑》、《感秋》、《冬暖》等，在这些作品中一方面表现了生命走向垂暮过程中对自然的真切感受，另一方面仍表现出他关心民生疾苦的一贯思想。汪瑔晚年的诗歌中还有部分与朋友唱和的作品。如1887年，徐昶应汪瑔之邀造访榖庵，见汪瑔近来所作之诗，因此作诗奉呈汪瑔，汪瑔作诗与之相和。1889年，六十二岁的汪瑔与羽士陆鹤修夜谈琴事①，与贾虚谷诗歌相酬唱。

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汪瑔感春温，初七日出现症状，病渐沉重，二十多天后，于二月初三日去世。②

第三节　汪瑔的思想性情

古代文人作幕虽多由生计所迫，但亦有通过此一途径而发挥才干，部分地实现人生价值的因素。特别是那些濡染传统儒学思想较深，抱有为国为民之志，坚持正直品德的良幕，给世人留下了正面的形象。

一、根基于儒学的正统思想

文廷式为汪瑔《随山馆猥稿》所作序中说："汪丈榖庵，今之隐君子

---

① 《与陆鹤修夜谈琴事漫成四首》，《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页。

② 朱启连《山阴汪先生行状》："感春温，七日证耳，绵惙二十余日，二月三日卒。"汪兆镛辑《碑传集三编》卷三九，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1页。

也。其立身行志，皦然不欺，出于儒家，而其退然自居，不欲为天下先，则又得于道家。故其为诗也，称物芳而志弥洁，出辞婉而情弥深，渊乎有忧世之心，而在言欲逊，泊乎有高世之概，而与物无争。”对汪瑔的人格和诗品给予很高的评价。

“立身行志，皦然不欺，出于儒家”，这是从关怀社会的士人责任感和道德操守而言，而“退然自居，不欲为天下先，则又得于道家”，是就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风格而言，两者各有侧重，但又统一于汪瑔身上。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把它分开来谈。

汪瑔自幼得到为人正直的父亲教育，饱读经籍，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染，在他的思想中形成了正统的忠孝节义观念。

第一是“忠”，表现为坚定的爱国情怀。和以往文人的忠君爱国有所不同的是，以往的文人忠君与爱国往往混合在一起，而汪瑔则是爱国重于忠君，在他的思想中主要体现为关注国家的安危、政局的治乱和人民的疾苦，而忠君的因素不是很明显。

汪瑔的一生虽然与仕途无缘，但他却心怀报国之志。汪瑔在为辛中仁送行写的诗中说“布衣报国心，期汝终不变”①，这不仅是他对友人的期望，也是他爱国情怀的自我表达，前人对此已有准确的认识，如为其诗集题词的孙福清就说：“穀翁贻辛中仁诗云‘布衣报国心，期汝终不变’观穀翁诗当以此求之。”

汪瑔的爱国心，在他青年时期一开始的人生选择上就表现出来。当时，父亲年老，需要汪瑔谋生养家，有人介绍他为英军首领掌理文书，可得重金，而汪瑔断然拒绝了，并表明自己甘守贫贱也不为此有损于国有辱于己的职事。②

在外国殖民主义势力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近代，爱国思想突出地体现为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愤慨和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及民族尊严的歌呼。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汪瑔十三岁，尚为少年，未见其关于战争情况的诗篇，而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汪瑔二十一岁，有感于1841年在定海

---

① 汪瑔：《送辛大中仁航海之天津》，《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8页。

② 朱启连：《山阴汪先生行状》，汪兆镛辑《碑传集三编》卷三九，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0页。

与英军激战五役死的将领葛云飞及其妾的壮烈事迹，写下了《葛将军妾歌》，描叙葛将军妾在将军牺牲后，忠愤激发，率骑冲进敌阵，夺回将军尸首安葬的英勇举动，热烈歌颂了这位巾帼英雄的爱国精神。钱仲联先生评价此诗说："这是别开生面的爱国诗。"

在中法战争之后，汪瑔特别写了《书事四首并序》对清政府赔款议和之事进行讽刺和斥责，表达出强烈的爱国情怀。

由于正统观的影响，汪瑔的"忠"也带有阶级色彩，如对农民起义抱着敌视的态度，把农民起义视为"乱"，称起义军为"贼""寇"，对与农民军作战而死的官军看成"忠烈"，跟反抗外国侵略的英雄相提并论。如在《松烟小录》卷二汪瑔谈到葛将军战死事后，特别评述了葛将军次子以敦"官湖北都司，咸丰乙卯，亦以击贼死，再世忠烈，足以垂光虹霓矣！"全文载录蒋叔起臬使描叙和赞颂葛以敦的《银枪小葛行》诗并序，让人们记住葛家一门忠烈的事迹。

又如对因太平天国攻破南京而死难被赐"忠愍"的汤贻汾作了评述："公名贻汾，字若仪，一字雨生。祖父奎，知凤台县，死林爽文之难，父荀业，同日死。公以难荫起家，官至浙江乐清协副将，引疾归，侨居金陵。咸丰癸丑，城破，死难"，"累世忠孝，近古所罕有也"[①]。

汪瑔对历史上能够忠心为国的贤臣名将也非常钦敬。他在《松烟小录》中说"前明于忠肃、杨忠愍二公，勋名气节，照耀宙合"，认为二人诗品如其人品，"若于公'冰霜摧剥倍精神'（咏梅花），杨公'万古丹心向日开'（咏朱葵）之句，则于无意中自见品格矣。"于公，即于谦，是明代的名臣，也是著名的民族英雄。当京师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之时，他挺身而出，英勇抗敌。他还曾平定景泰年间少数民族的叛乱，这样一个忠心为国的人，却被诬陷为谋逆罪。汪瑔引用的"冰霜摧剥倍精神"是对于公高洁人格的肯定。杨忠愍，即杨继盛，明代著名谏臣，以《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被严嵩反以"诈称亲王令旨"[②]的罪名下锦衣卫狱，廷杖一百。后来严嵩将杨公处决，弃尸于市。"万古丹心向日开"是杨公对自己一片赤诚忠心的表达，汪瑔引此来说明杨公的品格，也表现出他对杨公宁死不屈、尽忠国家的精神的由衷赞叹。

---

① 《松烟小录》卷四，光绪刻本。

② 清高宗：《御选明臣奏议》卷二五，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第18—32页。

与爱国情怀相伴随的另一个方面，是对百姓疾苦的关切。咸丰四年，汪瑔在五福幕下，当时五福在江南，只留下汪瑔一个人负责守卫曲江城，他独自坚守城池达十个多月，一片丹心，为百姓的安危不顾及自己的生命（见前生平部分）。

汪瑔时常在作品中针对时弊进行指摘，表达出深切的愤慨和对国家时势的担忧。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造成了百姓的流离失所，汪瑔在《有感四首》和《重有感四首》等诗歌中，记述当时的凄惨景象，表达出他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和对时局的隐忧。对那些不考虑民生疾苦的官员，汪瑔作了强烈谴责。他在《松烟小录》中以自己亲见之事批评某总督骄奢淫逸的行为，指出为官不应贪图个人享乐，忘却为官真正的职责所在。倘若不为民生疾苦考虑，必然受到民众的斥责和当政者的惩罚。对于为官，汪瑔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曾有议论云："朱子语录，大抵今时做事在州郡已难，监司尤难。以地阔远，动成文具，惟州县与民亲，行之为易。此郑可学所记朱子语也。余佐人幕事，自督抚至郡邑，凡数十年，所见惟牧令善政，易以及民，自郡以上，官愈尊，及民愈难，读朱子此语，不觉慨息。近世谨饬者多不愿作州县，不知欲为循吏，下须作州县也。特州县实不易作尔。"汪瑔由朱子语录中的一段话，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要想真正做一个为百姓办实事的好官，就应该做默默无闻的州县小官，而不是名扬京师的大官。这是因为汪瑔考虑的出发点不同而形成的观念，他是从做官要为百姓造福的角度来思考的。

关于如何治理国家，汪瑔是主张以仁政平天下的，即他所说的先王之道。他在对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论事之言进行评价时说："南宋初，正平人张戒撰《岁寒堂诗话》，持论无甚异人，惟尝上言：'今日之事，当以和为表，以备为里，以战为不得已。'乃深切当时事势，其论事之识，较论诗为胜矣。"① 汪瑔赞同和，反对战。在该论断下有汪瑔的自注："立国有表里，有本末，戒所言表里，一时之说也。以德为本，以财为末，以农为里，以工商为表，万世之说也。重表轻里，以末为本，泰西各国之所以富强。然与先王之道背而驰矣。""以德为本"，"以农为里"，正是几千年来中国儒家传统所弘扬的宗旨。

汪瑔是一个关心国事，以德爱民的人，虽然他终生未曾做官，但他在

① 汪瑔：《松烟小录》卷三，光绪刻本。

做幕客之时所为百姓做的实事，却体现出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的爱国为民思想，显示出中国传统文人身上可贵的精神。

第二是孝。汪瑔是一个极其重视孝道的人。他在《松烟小录》中写到对《孔雀东南飞》中庐江小吏以身殉情之事的态度时说："余幼时读《孔雀东南飞》，诗意以庐江小吏死殉兰英，自是千秋情种。然其母尚在，责以大义，当复何词。欲为一诗，书其后，未能也。后见吴巢松学使《小吏港谣》一篇，乃得我心。诗云：'金花惨淡孔雀死，燕下寒塘啄连理。府君白马纵连云，贱妾丹心视如水。丈夫死情女死贞，可怜阿母谁寒温。小姑岂能守风烛，君倘不死妾瞑目。'"汪瑔赞同吴巢松的看法，对庐江小吏的殉情进行指责，批评他不顾大义。在吴的诗中还以兰英的口吻来写，揣度兰英的想法，说倘若二人都死去，母亲无人能养老送终。如果庐江小吏不死的话，母亲有人照顾她才能瞑目。汪瑔认可这种完全以孝道来评价思想内容的诗歌，反映出他强烈的孝道观念。

汪瑔对能以孝道来侍养父母的人，更是赞叹不已。他在给儿子汪兆铨之妻廖氏所作的碑铭中，特别写到廖氏在父亲病重之时，不顾自己身体的柔弱，服侍病榻前，"不寐者十余夕"。当她的父亲去世之后，她又悲戚过度，以致茶饭不进，造成自己的疾病加剧。对这个"柔顺有礼"的儿媳妇，汪瑔夫妇都极为喜欢，这和她能以孝道侍养双亲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外，汪瑔还在《松烟小录》卷五中，记述孝子寻亲的事迹。他先以历代孝子寻亲为缘起，"南齐庾道愍，北宋朱寿昌，皆以所生母，流漂异地，寻求得之。国初黄孝子向坚，寻亲云南，备极艰苦，卒迎归吴中，归庄为之记。又有人为作《万里缘传奇》，窜演之，故其事尤著。同时尚有刘孝子龙光，寻亲石潦，钱孝子煜，寻亲于武昌，赵孝子万全，寻亲于马邑，其后又有乌程费荣春，父刘宏甲，余姚翁运标翁槐，毕节刘琪，皆寻亲万里之外。"对那些不辞辛劳，万里寻亲的孝子，汪瑔认为不管他们最终是否寻到亲人，"要之至性所发，不避险阨，以视古人，无弗及也"。接着汪瑔就写到与自己交往的友人中，也有两个这样的孝子：宋子容和费礼山，并且详细记载了他们寻亲的缘由和经过。宋子容的生母在云南，但因为嫡母不允许他去寻亲，他只好等到嫡母去世后才能去寻找生母的下落。但偏偏他又大病一场，等病稍微缓解之后，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孑然一身，踏上了寻母的艰难道路。汪瑔还曾写诗给他，诗中有"不暇论妻子，何心计死生。卅年双泪尽，万里一身行"。这说明汪瑔对宋子容寻亲

的行为是非常赞赏的。至于费礼山的寻亲过程，更是曲折惊险。费礼山自幼跟随父亲客游岭南，而他的母亲则留在湖州老家。咸丰年间，贼寇攻陷湖州，礼山为寻母亲，“亟航海至吴淞，易服为丐”，不顾个人生死，深入贼穴之中。赶到乡里却发现，家乡已被贼人焚烧，后来他寻遍杭、嘉、湖三郡，都没有找到母亲的去处，而他自己却大病。等找到嘉兴时，他病倒在路旁，生命垂危。恰好有贼寇经过，礼山考虑到自己危在旦夕，就把实情告诉了贼人。贼人被他的孝心所打动，不仅为礼山治好了病，而且赠送他白金五十两和一支箭。礼山又返回湖州，遇到邻居，得知母亲在贼寇未来之时，已经和族弟一起前往绍兴避乱。他又急忙渡江去绍兴，但是贼人防守严密，无奈之下，他只得又绕道吴淞，由海路前往绍兴。几经周折，最终寻到母亲，并接回广州。汪瑔之所以如此详细地记录二人的寻亲以历，是为二人的孝行所感动，认为他们的事迹不应该被人们遗忘，希望后人能够铭记。这反映出汪瑔是非常赞同这些人的孝亲行为的。

汪瑔的好友陶文鼎也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在朱启连写的《陶孝子传》中，对陶文鼎的孝行有详细的描述。“陶文鼎，字卿田……君少孤，母吴病，呕血垂殆，召医皆弗至。乃刲股和药疗之，果大瘥。然病不时发，左右足又废。始君客四方，至是不敢远游。体羸意气伟然。居母侧，充婉若婴。孺母中夜疾作，甫一呻，必应声起。虽遣之退，退复返也。寝安席者终岁，无数夕，坐是壮年衰茶如七八十老人，而母怡然自忘沉痼者，十年如一日。同治五年，湘乡蒋果敏公巡抚广东，重君才，宾礼之，微知平日奉母状，及刲股事，将以笃行茂材荐，不欲违母出仕，敬谢而已。蒋亦不忍劝也。母叹曰：吾未亡人，而旦暮少安，徒以汝在，安得世世为母子乎？君未及言，左右皆涕出。其天性惇至，发于自然，而感人于不可知。孔子曰：色难。孟子曰：终身慕父母。君乃近是矣。光绪二年卒，年四十二。卒三月，母亦卒。”汪瑔和陶文鼎的关系很好，他曾经为陶文鼎的诗集进行点评。朋友割肉为母亲治病的孝行对汪瑔的孝道观念必然有着深刻的影响。1868 年，汪瑔的母亲卢宜人去世，他为母亲服阙守孝。

其实，汪瑔不仅仅重视孝道，而且对朋友也是非常真诚的。少年时期的汪瑔，凭着父亲入幕的报酬得以无忧无虑地度过青年时期，经常与友人诗酒唱和。而当他出任幕客之后，离开亲人在外，朋友自然就是他心灵的慰藉。通过汪瑔大量的交游诗和他写给朋友的书信就能清楚地看到，他是

一个非常注重情谊的人。《松烟小录》卷一第二十四—二十五页记蒋叔起为广州知府时曾再三请汪瑔为幕，因当时的幕主五福正被当权者弹劾，汪瑔顾重与五福之情谊而不忍离开。

第三，汪瑔有鲜明的节烈观，对能以身死节的女子，盛赞不已。他在《松烟小录》中写到国初大学士嵇留山的侍妾苏瑶青，当耿藩叛乱时，她和嵇留山一起在范忠贞的幕府中，都被叛贼抓获。当时嵇看着身边的苏瑶青，不禁“掩面流涕”，而苏却对他说：“君无以妾为念也。”后来苏解下身上的佩带，自己吊死在房屋北面的冬青树下，年仅十七岁。苏死后，番禺的陈棠谿对此女子小小年纪却能以身死节之事非常震惊，特意为她赋《冬青树曲》来纪念她。与苏同时死难的还有马忠毅公的侍姬顾氏，汪瑔认为这两位女子的事迹，“三心五噣，节烈交映，亦异事也”，将二位女子比作天上的星宿，评价非常高。

在汪瑔的文集中，他还曾为一位钟姓的女子写有《钟烈女传》，对她自刎以保全名节的行为进行详细的描写。汪瑔热烈赞叹这些以生命来捍卫自己贞节的女子，反映出他恪守封建礼教，以传统的贞节观念来衡量女子，这既是其思想的局限性，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二、救世之心、经世之才与淡泊本性、谦退自守的人生态度

一生怀抱“布衣忧国心”“布衣报国心”，这是汪瑔作为诗人在思想上最为可贵之处。而作为从事几十年幕宾职业的汪瑔又并非空吟高调、不识世务的迂阔书生。当他去世之时，众多好友均作挽联怀念，其中有曾任赤溪厅同知的金武祥所撰联曰：“有经世才，但将名士称君测君犹浅；抱知己痛，曾以循吏目我问我何堪。”上联极赞其有经世之才干，这在朱启连的《汪先生行状》中也有概括评述：“性警敏，事至立断，仓卒肆应，循其意行，皆必无失。博极群籍，辨治忽忽机析于毫芒，洞然百变之后，其利害如睹也，其所言未尝不可行者，其蕴蓄不抒多矣。”

像他这样颇具才干，先后在州县和督抚为幕三十多年的名幕，却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这在近代幕客中殊为特别。晚清剧变的社会环境中，各级官府特别是封疆大吏的幕府里，人才荟萃，多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不少督抚的幕僚，日后成为权势声名威赫的高官，如李鸿章、左宗棠、周馥等。而汪瑔却没有像这些人那样，由幕入仕。难道汪瑔没有遇上机会吗？

事实上并非如此，汪瑔也是有过机会的，但他都放弃了。如他在五福幕中时，正当耆英任广东督抚，于下属州县官员中，耆英最看重五福，他曾经问五福：你上呈的公文书信，不像现在世俗之辈所写的，是你自己所作，还是出于宾客之手？五福回答说是汪瑔所写，耆英由是对汪瑔极为欣赏。后来耆英将赴浙江任职，想要汪瑔同他一道前往，许诺奏请朝廷任命汪瑔为官，并给汪瑔每年三千酬金养家，而汪瑔以母老婉辞[①]。虽然汪瑔的辞聘也可说有客观的原因，但如果汪瑔真正有出仕之心，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如他在韶州客五福时，就把母亲从广州接到韶州居住，若随耆英到浙江，也不是不可将家庭接到浙江去，主要是他本身没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

光绪间，他在两广总督曾国荃幕中，深受倚重。其时，中越之间关系开始紧张，曾国藩沉着应对，而表面看不出一点苗头，不到一月时间，已完全做好了战争的准备，这当中只有汪瑔参与了谋划，吏民均不知道。曾国荃对汪慨叹，恨相见之晚，且说“可惜我哥哥（按：指曾国藩）没见到您”，意即如遇上曾国藩当会受到重用。

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两位官员因事到总督府拜见曾国荃，国荃想让两位官员也认识汪瑔，而汪瑔推辞说“我只是一介书生而已”，不肯见面。曾国荃让汪瑔参与决策谋划，汪只是在幕外应对，而不愿置身内层，曾国荃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时曾参与幕中机密，意思说你可像左一样，没有什么不合宜的，但汪说“左侯具有非凡的经纬之才，如果不是他那样的人就不能那样做，我比不了左，不能学他那样做”。国荃叹道“这真可作为师表啊”，调离广东临别时，将此话说了三次[②]。

曾国荃倚重汪瑔，有意让他与两司长官认识，以便日后交往荐用，但汪不愿意；国荃又让汪参与机密大事的谋划，并以左宗棠为例说明此举无

---

① 汪瑔：《松烟小录》卷一：“觉罗耆九峰尚书抚广东时，于属吏最重五响亭。尝问君：‘所上书牍，不类今世俗所为，其自作耶，抑出宾客手耶?’（太守）以余对。公心识之，未几，奉授浙之命，欲招余偕往，许奏官于朝，并岁以三千金赡其家，余以母老辞，然不可谓非知己也。”光绪刻本。

② 同上：“曾公知先生特深，其总粤也，越南之事始棘，公故宿将，沈几虑应而示无倪，旬月战备毕，独先生与其谋，吏民无知者，公堂叹息恨相见晚，且曰惜吾兄未识君。两司以事衙谒，公欲见先生，辞曰‘事取进止于公，某一介士耳’。公不以为不肖。使参计画，而周旋于幕外，虽无物论不宜，公言左继皋居骆文忠幕时尝如此，先生曰‘左侯经纬非常，非其人则不可，某以不可学侯之可也’。公叹曰‘斯可为师表矣’，临别三诵此言。”

不妥，但汪瑔还是以自己不具备左宗棠之才而推辞。这一方面表现出汪瑔之为人行事非常之谦让循礼，故曾国荃再三称其“可为师表”；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汪瑔在面临幕主有意创造机会让他“出头”之时，总是退避推辞，不肯“进取”。正是这样，汪瑔一生未官，以幕客终世。不像道咸以来许多原来为人做幕而后由幕为官的士人，也不像乾隆年间的名幕，汪的前辈汪辉祖那样，最后还是通过科举做上了官。汪瑔只做幕而不出仕的思想态度，既与其天生淡泊之性情有关，但更主要是跟他以浙人入粤的幕客家世和个人无由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的特殊经历密不可分。

汪瑔的天性中本有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倾向，在其早年作品中已有体现；而在无缘科举，为生计而不得不入幕后，这种倾向更趋增加，四十多岁后，他以“无闻子”自号，在个人的生活态度上，其道家的隐逸退避思想就更加浓厚了。

在与少年、青年好友的交游中，我们看到汪瑔也像大多数才士一样富有朝气和豪情，如：“敢说元龙楼百尺，只应豪气未阑珊。”（《尺五斋与杜仲容友韦季英隽昆季夜话》）“丈夫既许国，不复论死生。按剑出门去，万里如家庭。登高望山川，长啸天为青。安知百世下，史册书姓名。”（《拟出塞行》）“愿为黄鹄举，奋翅乘风翔。”（《杂诗四首》其四）“同学少年盛意气，云龙上下相追翔。……但知端复共名誉，岂识苏李悲河梁。天风吹我征衣裳，书生作计犹能狂。不能请缨系南越，要须把酒偕东阳。”（《冬日高州寄兰台秋丞，芍舲仲容季英广州》）

但汪瑔与好友们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虽然勤力于读书作文，却没有条件参加科场之试。这源于他由浙人入粤的幕客家世：“余生长岭外，少时治举业，未尝无进取之志，顾以生长岭表，家贫亲老，不能远离膝下归里应试，又侨居未久，令甲不许占籍，遂藉此藏拙，不蹋举场。”（《松烟小录》卷六）

由于汪瑔父亲在粤游幕，汪瑔生长读书于广东，籍属却是浙江，尽管他“未尝无进取之志”，但要应科举就必须回浙江去，而因家贫亲老，不能远离父母回乡考试，在广东定居时间又不够长，地方官和保甲不允许占籍考试，于是便造成了汪瑔浙江、广东两地都无法应考的无奈。他读书不应试，只求学问以自足，却不为俗人所理解，视之为咄咄怪事：“古人诵诗书，初不为科第。各有千秋怀，岂为一得计。吾党二三子，颇复解此意。穷年经籍中，不就有司试。学人固当尔，亦复不足异。奈何流俗人，

咄咄呼怪事。”（《放言二首》之一）

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越来越清楚自己不得应试，连最基本的功名“生员”都无法获得，对于希望进入仕途的人来说无异于断了去路。当自己的好友仲容北上游京师时，他既由衷地为朋友高兴：“男儿三十当封侯，快意且作长安游。桑弧蓬矢自有志，驽马伏枥非吾俦”，“此际才人应得志，好在看遍帝城春”，又为自己的留滞南方而惆怅：“春风吹子陵悬圃，有客羁棲守环堵。冀北文章定易传，周南留滞终无补。少年踪迹各西东，榄茝搴兰有始终。黄鹄飞骞白鸥逸，出处不同性情同。”

他把好友比作高飞远去的黄鹄，而自己是隐逸的白鸥，正透露出他意识到在出处的人生道路上自己与友人已判然有别。在另一首送别诗中更是明确表达了对自己与好友未来前途的不同预测和期许，“自分江湖老此生，惟将廊庙期知己。”（《送朗山北上》）这些诗都写于汪瑔二十四、二十五岁时，果然不久，二十六岁时他就正式走上了四方游幕的旅途。“夙昔志弧矢，颇谓别离轻。家贫亲复老，安负伤中情，吁嗟远游士，舟楫为生平。”（《发广州》）

经历了几年的幕客生活之后，汪瑔已感到在尘土风烟中奔走的劳苦与蹉跎岁月的怅惘，“都无快事聊酣睡，未敢狂言且放歌。一笑封侯输骨相，男儿三十已蹉跎。”“未妨生事日萧条，豪气如云已渐销。”（《偶书四首》）“少日疏狂减，中年感慨多。”（卷四《韶州杂诗》）其感慨最深者，还是自己不得用于世，不得志之苦闷。他慨叹不畏严寒生长于蒙山阴的孤松与九柏，“此材乏世用，匠石不见寻。根干徒夭矫，枝叶多萧森。”“栋梁事已矣，托志宜山林。”

对董仲舒、陶渊明等古哲人都曾悲士不遇而托于辞赋产生同感，“遇与不遇间，兹理静可悟”。还描写了失志之士生活和精神的困境及其对人生去向的选择，“士有不得志，萧然处邱樊。糟糠已足饱，裋褐常不完。亦思骋长驾，慷慨游中原。畸人非世用，且复归田园。丈夫各有志，何必冕与轩。轩冕且不顾，衣食将何言”（卷四《杂诗四首》）。

作诗时他三十四岁，正为壮年，于世尚有可为，但他已认为“栋梁事已矣，托志宜山林。”“畸人非世用，且复归田园。”选择了退隐之路。故当耆英聘其为幕，许为奏官时，他的思维定式已成，以母老辞去这一重要的机会。四十八岁后相继为多位两广总督幕，受到倚重，但他对功名已看得很淡，又因病后体弱，故常在忆事怀旧中叹慨少年意气之销磨：“当年

意气剧正腾，华发重来感不胜。……此日依阑如梦寐，卅年湖海老陈登。”（卷八《市楼题壁》）“萧然忘蚁梦，老矣负鸡声。笑谢床头剑，年来意气平。”（卷八《寒夜不寐戏成》）

至曾国荃督粤，对汪瑔犹为赞赏，有意让他参与机谋，发挥才干，但此时汪瑔年岁已大，加上他“少不事科举，不向场屋趋”（卷八《读书》）因而无缘功名的特殊经历，以及羁旅谋食之士的幕客心态，使他只是以恪尽职分和“布衣报国之忠”来从事这一工作，对于个人的事业前程已经不再考虑。

文廷式说汪瑔“其退然自居，不欲为天下先，则又得于道家”。但汪瑔“退”而不能真退，像山林隐逸那样完全避弃世俗生活，到与世隔绝的地方去耕钓为生，又不能像做官以后有了一定财力作基础，退出官场过有经济保障的致仕生活，他必须靠做幕来取得自身和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虽然他常常表达了对隐士们的耕钓生活、诗酒乐趣的向往，但这只是一种梦想，难以实现，故他只能以幕为隐，在奔波和劳碌中挤出一点暇隙作诗会友，保持一个诗人的性情和爱好。

三、才学观的旧与新

汪瑔生活在社会文化发生剧变的近代，他的政治观、道德观、人生观基本还是保持着传统的儒道兼容的状态，在才学观上也以传统为主，但又注意到吸取西学和新学的思想知识，讲求实效。

汪瑔在《与贾虚谷》中说：“以足下之才使当乾隆嘉庆间遇毕秋帆阮云台诸公必能发其声名有闻于世，今非其时矣。十数年来，当世所急者，曰军务，曰洋务，文章之士无所用之。当途要人视文士如古物，不适时用，足下之无所遇又奚怪焉。”[①] 在对友人不遇于时表示同情之外，也隐约含有不满于当道者只重时用之才而轻视文章之士的习尚。虽然如此，汪瑔也并非一味泥古、不知时务的腐儒，作为抱忧民爱国之心的幕客，除了传统的律礼之学，刑名、钱粮之才，他还广涉用兵防务、洋务及至西方政治等思想学术，在接受新知运用于实际方面，也可谓明达之士。

汪瑔于光绪元年之后十余年相继在四位两广督抚幕中主理洋务，在当

---

① 汪瑔：《随山馆尺牍》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时中外关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能协助督抚大吏奉上使外，交涉应对，没有相当的处理洋务的学识和才干是不可能胜任这种事关重大的工作的。

在其文集中，我们可看到他对有关西方器物兵备的知识十分重视且加以研探。如他在曾国荃幕中时，一次国荃把英国新任工师公会会长阿摩士庄所著、总税务司赫德译的《卫国策》一书出示汪瑔，汪瑔看了认为其中论及建炮台、造战船、铸大炮、制火药的方法都很详尽清楚，又论防守海口陆路的炮台，用土修筑的比起用铁修建的更少弊害，海面上则以船作炮台才不会受固定一处的牵制。汪瑔就拿以前自己所读过的美国人著作来进行互证："曩见美国人所著《防海新论》亦云：'凡筑炮台用沙土用砖石。'"然后又联系几年前英俄关系紧张时，英人备战的实例云："数年前俄罗斯与英吉利不协传言将攻英之香港埔头埔字不见字书，疑即步字之俗体，英酋守香港者于海滨筑炮台皆以布囊沙土积累为之，是固由仓猝图成，殆亦有取于《防海新论》之说欤？《卫国策》则成于香港筑台之后。"他认为英人的做法是采用于美国人的《防海新论》，因为当时《卫国策》还未成书。他还进一步由《防海新论》关于水雷的使用论及火器与战守之关系："《防海新论》又云：'守海口者，必置水雷于港口，然敌人可钩而去也，当于岸傍筑炮台以护之，又恐敌兵自下游登岸以袭炮台则必又设陆兵于台后以护之，三者相因以为用，阙一不可。'又云：'水雷置于水中敌舟之来，必适当水雷之上乃可发机以碎之，若敌舟相距，五六尺以外，即无大伤。'又云：'水雷入水不可过深，深则药力为水力所压，不能碎敌舟矣。'夫当今日而战守，固不能不用火器，然亦视用之者何如尔。火器以西洋为巧，水雷又火器之精者，而西人之言顾如此，然则所谓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者，殆别有其道而来未可专恃火器欤。"① 表现出既重视西方器物，提倡学习研究，又不迷信的较为通达的态度。

汪瑔对历史上有关中外关系的著作也能留心，像对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时有引用；对汤显祖谪岭南所作有关西人的诗特以摘出："汤若士《南海诗》：'时时番鬼笑，色色海人眠。'今广州人尚称诸夷曰'番鬼'也。"对近代以来中外交流予以关注，如《松烟小录》中摘录了一些出使外国官员的海外游历诗："同治癸酉高州陈荔秋副宪兰彬以主事奉使泰西各国由上海登轮船历日本及旧金山诸岛至四北岭，途中赋截句六十余首，

① 汪瑔：《松烟小录》卷四，光绪刻本。

副宪之侄仁端太守嵩梅钞以示余，摘录二十二首于左。”

汪瑔对有关中国与西方在器物制造方面的先进与落后的现象与原因亦注意探讨。《随山馆尺牍》中云：“比年以来海内争言机器之学，中国精于此者实不乏人。曩客潮州，见海阳令杨君石松元华闽人也，通西国机轮之法，其所制三光仪，泰西人亦称之。尝语仆曰：‘中国人制器不能胜泰西者，其故有二，一则泰西制器所用铜铁之类，皆通其术者自为炼冶，故火候之久暂，质性之刚柔，不失毫杪，中国人不能也。一则刱制一器，其初造时不能无病，泰西人必毁而更造，造成尚有他病，则又毁之，而又造之，往往一器之微不惮三四改作，故其器日以精，然费则多矣，中国人亦不能也。中国之器不精，此二者为之也。’……”①

在采用西方教育体制和方法改造中国旧有教育方面，汪瑔也有自己的认识。于两广总督刘坤一幕中时，刘拟设西学馆，令官员拟《西学馆章程》，又让汪瑔复议，汪瑔写了《拟设西学馆课士议》一文，除了对原《章程》表赞同外，还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意见和建议，从馆舍之设立，中西教习之延聘，招生前之中英文考试，到录取后学生之生活补助，分班教学的原则，用西文西语课试的优劣，兼习测量制造之学的课程内容以及由官府购置仪器机器供学生观摩实习的建议等，考虑十分周详。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汪瑔对于吸收西方的思想知识和制度方法有比较清醒而切实的态度和认识。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汪瑔在他的《旅谭》卷三中，首次全文抄录了蔡毅若翻译的《美国合邦盟约》。《美国合邦盟约》即后来称之《联邦宪法》者，此法的首次译本为蔡锡勇所作，蔡字毅若，福建龙溪人，京师同文馆生，同治十二年（1873）作为译员随陈兰彬出使美国，在美期间他翻译了这一美国宪法。而汪瑔得见后，即将其全文抄录于自己的书中，此文共约 8700 余言。汪瑔在录前有按语云：“厦门蔡毅若太守锡勇尝随陈荔秋副宪兰彬出使米利坚国居米都三年，得华盛顿立国之初与各部所立合邦盟约，译以汉文，余尝取观之，其立国规模约略已具，因录于此，为志岛夷者考订焉。”《盟约》体现出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思想迥异的性质和内涵，汪瑔看到却不以为非，认为可为有志于洋务的人士参考借鉴。汪瑔

---

① 汪瑔：《随山馆尺牍》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 页。

的《旅谭》刻印于其六十岁时即光绪十一年（1885），比后来刊登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务报》上的《合邦盟约》早了整十二年。此一信息，目前尚无人道及。可以说《旅谭》所录之《美国合邦盟约》是在中国发表的最早译本。

四、通达明辨的处世态度

汪瑔终生为人做幕，直到晚年才退居养病，不再出入官府。做幕客的经历使汪瑔深谙为人处世之道，也养成了他通达明辨的思想性格。

汪瑔对做幕客所应尽之职责和当守之名分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幕客治事，当如身居此官，善则归于主者，不当居其名也。"[①] 要当自己就是幕主一样设身处地为其着想，尽心任事，取得了好的结果则应归功于幕主，而不应自居其名。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免招致幕主的疑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形成一种互相尊重，信任和谐的氛围，于私于公均为有利。

他在《与友人》的信中劝诫友人要"自敛锋芒，不争名誉"；在《松烟小录》中记载友人陶卿田在评价王慎之（字荆川）曾为严嵩的《钤山堂诗集》作序一事时说："士有文名，良非美事，万一压于权势，役以文字，拒之则贾祸，与之则败名。固不若素不工文者，为征索之不及也。"[②] 陶卿田此处说"士"不能名气太盛，否则极容易招来祸患。汪瑔是赞同陶的这种说法的，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世人爱才者少，忌才者亦少，悠悠之辈，大抵谓人纵有才，于我何与耳。得遇爱才之人，固是幸事。然有爱之者，必有忌之者，此是阴阳对待自然之数，惟能自敛锋芒，不争名誉，庶娼嫉者差少耳，足下既见知于某公，将有忌者，睨其侧矣，幸自韬晦，以永吉绥。"[③] 汪瑔劝诫友人身居幕府之中，不能锋芒毕露，需要小心翼翼。

汪瑔在不同的官员幕府中做幕客，从未与幕主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这不仅说明汪瑔具备很强的处理幕府事务的能力，也说明他性格之宽容和

---

① 汪兆镛：《碑传集三编》，《汪先生行状》，第 2085 页。

② 汪瑔：《松烟小录》卷四，光绪刻本。

③ 汪瑔：《随山馆尺牍》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5 页。

善。比较同为幕客的友人，汪瑔的性格更显突出。朱启连所作《陶君承之墓志铭》中，写到陶承之做幕客时的情形，“母卒，丧还，君乃客有司治幕事。……性介恒，与主不欢，久之抑郁愈困”，可见幕客与幕主相处不融洽的现象常有。这并不是完全跟个人的能力相关，而是跟性格有极大的关系。

汪瑔不仅与幕主相处很好，而且与幕主有关联的人也相处很融洽。他与五福的儿子玉仲的关系就是例子。他在五福幕中时，为玉仲辅导学业，教给他为人处世的道理，亲密无间。这不只因为他是五福的幕僚，而是发自内心的关切。在五福去世之后，他们仍然保持着极好的关系。另外，跟汪瑔的交游者地位、身份、阅历复杂多样，年龄也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的交往都能如鱼得水，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为人的和善与宽容。

汪瑔在写给贾虚谷的书信中说“知人论世，与其失之刻，不若失之宽耳”①，这不仅是他劝诫友人评价人事不应太过于苛刻，也反映出他自己的为人处世观念。他在《与湘士》中，为一个被流言中伤的友人辩解，他知道这个友人日常确实存在着“恃才而傲容”的过失，但是人品却没有大问题，是别人有意放大他的过失。汪瑔认为友人“别无大过失”，请求湘士不要听信流言，要宽容地原谅友人的过失。

汪瑔通达的思想心态不仅表现在宽容地对待具体的人和事上，也体现在谈诗论文上。汪瑔在与友人讨论诗文的时候，主张不要过于苛刻。他在《旅谭》卷二中记载他和王少香讨论袁枚的诗歌，少香痛诋袁枚，而汪瑔认为应该宽容地评价袁枚的作品，就是不赞同他的诗歌，不去学习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去痛加诋毁。汪瑔对毛际可讥讽袁于令误用典故也不是很赞同。毛际可讥讽袁于令在《西楼传奇》用三生石的典故来解释艳情，认为袁是误用典故。汪瑔对毛际可这种吹毛求疵的态度反驳说：“然词曲家用典，往往不拘来历。汤若士《牡丹亭劝农曲》云：如酥嫩雨，绕塍春色藞苴。按类篇藞苴，泥不熟貌。若士曲中用此二字，下复云趁江南土疎田脉佳，是亦误用矣。”

但是，汪瑔的通达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宽容，而是明辨和审慎的。汪瑔的是非观念鲜明，敢于直言。他为澄清乾嘉之际的名吏傅鼐（字重庵）

---

① 汪瑔：《随山馆尺牍》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被人诬谤的事实，专门写信给徐道如。因为徐和傅有亲缘关系，徐在与汪瑔吃饭时曾说“傅公亦有不满人意处”。汪瑔听到他的话，就知道徐有可能是被流言所惑，才发出这样的感叹，因此特意给徐写信来解释此事。在这封信中，汪瑔用自己大父在傅公幕府中所见的事实，又根据常理分析来证明傅公是被人诬谤的。他自己又说对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现象，是“不可以不辩”[1] 的，这表现了他是非分明，守持公道的品性。

汪瑔在《读樊榭山房诗集四首》中对当时诗坛的现状进行评价时说：“流辈轻将浙派嗤，香清味酽几人知”，他不赞同苛刻地对浙派进行全盘否定，而是理性地作出思考。这说明汪瑔的通达宽容并不是没有尺度，而是根据事实来说话的，他是通达又不失明辨。他在论及明初的几位文人宋濂、唐顺之和王世贞时，不仅能中肯地发现他们散文的优点，也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缺陷。[2]

总之，从汪瑔的为人和论文，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比较通达，以宽容之心知人论世，但又决不丧失原则。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为人正直，处事理性，具有学士的风范。

第四节　汪瑔的交游

汪瑔一生做幕，漂泊异乡，因此与朋友的交游显得更为重要，而长期在官府之中，官员的往来难免赋诗酬唱，结识不同类型的人物，与这些人物的相互交往也会对其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从汪瑔和不同友人的交游之中，通过他们相互间交往的关系疏密和文学观念的对比也可窥探出汪瑔的创作思想。

从汪瑔作品中出现的有关友人的信息统计出他一生交往的友人达一百多人，这些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地方，可谓“足迹不逾五岭，交游遍布天下”。在与汪瑔有交往的一百多人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宦海为官者，诸如五福、陈朗山、金武祥等；二是志同道合的友人，如杜季英、杜仲容、郑献甫、贾虚谷、沈世良等；三是与尊长及晚辈的相互交游。

① 汪瑔：《与徐道如》，《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8 册，上海古等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3 页。

② 《旅谭》卷一，光绪刻本。

一、与汪瑔交游最为密切，也是交往最为频繁的是宦海为官者。这类人在汪瑔的交游中所占的比重也最大，主要是因为汪瑔所担任的幕客身份决定了他必然要经常接触到不同的官员。汪瑔一生曾持续在七个官员府中担任幕客，这七个官员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担任着不同的官职，而相对汪瑔来说，他就必须在每个官员府中去接触众多各方面的官员。

首先就是这七个作为他幕主的官员，他们分别是五福、冒澄、俊达、刘坤一、裕宽、张树声和曾国荃。在辅佐这七个幕主的过程中，汪瑔和五福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融洽。他在五福幕中总共待了十六年，一直到五福去世才另择幕主。之所以能这么长时间一直在五福幕中，这跟五福的为人行事使汪瑔心悦诚服分不开。陈澧为五福作的《护理广东肇罗道署肇庆府事琼州府知府王君墓碑铭》[①] 写道："其性也刚，其气也强。为世所忌，而名益扬。非由科目，文史能读。非出行间，搏战无前。良政孔多，胡可殚述。大书丰碑，循吏第一。"对五福的评价颇高，并且突出地赞扬了五福刚正不阿的气节。该碑铭中着重介绍了五福在任时的政绩：

咸丰三年（1853），五福代理曲江县县丞，当时有土寇甘先、练四虎、陈金刚、何禄等围攻省城，攻破了清远县，又聚众十余万环攻韶州府。在城北的帽子峰上俯瞰城北门外，枪炮雨集，贼寇众多，形势万分危急。提督、总兵、兵备道、知府分别防守东、南、西诸门，无人敢守北门，因此命五福死守北门。五福独当一面，固守北门，想方设法要击败贼寇。在他未到曲江之前，他曾被无端冤枉。他原在内务府补造办处做笔帖式，升职为六品库掌，京察一等记名，以员外郎升用。内务府奉旨要赴盛京铸炮，当时有人索取贿赂，五福不与。炮铸成之后，燃炮的人故意不按照正确的方法燃炮，致使炮筒炸裂。五福因办理不善被连坐，降为七品笔帖式。虽然官场上不正之风泛滥，但五福仍尽忠职守，不计个人私利。在贼众我寡，其他官员胆怯推诿的形势下，五福独自固守城池。当时贼人派出间谍进入城中，让城内的人做内应，五福得知此事后，立刻捕获此类人十多个，皆斩首示众。贼人的阴谋被识破之后，又想出穿地道进城，在地道中充满火药的诡计。五福在城中听到地下有声音，命属下凿壕沟横向截断敌人。壕沟未挖成，贼人的火药已经引爆，城墙崩塌。当此危急之时，五福率领士兵出城拒战，命令部下用油桶装上土作为短墙，抵挡住敌人入

① 陈澧：《东塾集》卷六，《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城。这时，守卫其他城门的士兵赶到，才得以解围。五福又令士兵乘胜追击占据帽子峰处的贼人，贼败走水中，溺死者千人。五福收兵回城，岂料下游的贼寇又聚拢过来，重振声势。此时湖南兵来援，与贼人展开激战，五福要求出城助战，上官不许。结果，湖南兵却败给贼寇，贼寇又乘胜攻到城外。这次，五福没有奏请上官，就率兵击退了贼寇。起初，贼寇来犯韶州，众官员商议要按兵不动，固守城池，五福说："城中兵少，死守无益，贼众乌合，迎击可破也。"但是上官却畏惧，不听从五福的建议。在守城的过程中，全靠五福屡次出战，才取得大捷。而在贼人已将城池攻破的形势下，五福能急中生智，利用废弃的油桶可谓过人之谋。这些废弃的油桶最初有人建议劈为木柴烧火用，而五福没有准许，孰知它们竟能派上大用场。

咸丰七年（1857），五福因守韶州有功，奉旨升为知县，加同知衔，赏戴蓝翎，补官东莞县令，调署番禺县。其时，总督的舆夫与县里的衙役发生争斗，二人被带到县衙，五福皆杖打二人，毫不徇私。有人就问五福不担心因此事而得罪总督，他说："我去官如敝屣耳。"此种宁可丢官也不愿徇私的刚正之气凛然让人敬畏。

同治元年（1862），五福升任廉州府知府。粤中正值多事之秋，而五福向来又有较高的声望，督抚大吏想要让五福留在两广省府帮他处理政务，但却被某些嫉妒者所排挤。因此，五福便要求去廉州上任。当时的抽釐任务非常紧急，潮州、雷州、廉州、琼州的百姓都驱逐到任的官员，大吏命令五君到任之后要重惩这些人。五君则说："始至，恩信未孚，宜不问，以安反侧。一年后，当有以报命。"① 等到任一年之时，五福就按照律法查明此事，诛杀为首的人，以儆效尤，自此之后，再没出现百姓逐官的现象。

粤中自用兵之后，官事繁多，廉州尤其严重。当地的土人设公局让本地绅士来处置，久之绅士之权反重于官。公局设公案如官署，擅自决断讼狱，置官府于不顾。自五福上任后，土人皆惧怕他的威严，不敢专横跋扈。当时，有一个叫刘朱濬的富人，横行乡里，五福杖杀之，一郡百姓众口称快，皆叹服其公正无私。

同治三年（1864），五福又被调到琼州，在临走之际，廉州百姓遮道

① 陈澧：《东塾集外文》卷四，《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页。

相送，曰："自太守来此，郡无寇盗，民安其生，奈何去耶！"百姓对他的称赞证明了他一心为民的廉洁作风。在琼州任上时，他力除琼州府试贿赂之风。原来，琼州府试，诸州县童生不至者十之四，俟学使按临，乃贿府吏送州，谓之补名，官分其赀殆万计。五福到任时，正值放试，他严禁此种不正之风，众人皆叹服曰："此清官，数十年未有也。"因此，后来有大吏奏报朝廷说五福为官"刚正不阿，循声卓著"，朝廷因此保举五福为循吏中第一。

关于五福其人其事，汪瑔在《松烟小录》中也有详细的记载①，其中除了写五福在咸丰三年勇战沙场、守卫曲江之外，还写其在贼寇退去之后，在处理于危难之中投靠贼人的百姓时所采取的宽容态度，以及他在战乱之后所实施的惠政。当时，曲江城危在旦夕，乡民有人献金于贼，乞求能保全家人。事后，有人对五福说："此皆富人，按治之可获钜赀。"五福则叹曰："守令于尔时困围城中不能护百姓，百姓自以金乞活，事后乃加之罪，忍乎？莠民通贼者，罪不可恕，若此等，皆迫于事势，无可奈何者，悉置不问。"对投贼之民，五福仍能宽容地体谅他们的难处，更不用说对一般的民众，自是关爱有加。围解后，五福抚慰流亡的百姓，重振文学。每逢灾旱之天，五福为民祈雨，天往往能降下甘霖。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五公求雨雨便来，五公求晴云便开。"百姓对五福的钦敬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汪瑔还说到五福的清廉，"公所至有惠政，自廉俸外，不妄取一钱"等。他之所以从一开始入五福幕之后，一直做到五福去世，也是和五福刚正不阿的为官之道分不开的，并且他和五福一样秉持着一颗爱民的赤诚之心。

汪瑔在五福之后的另几位幕主府上，也都尽心尽力，深得幕主的称赞。他不仅从为幕主出谋划策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且更能站在为国为民的立场之上，因此与各位幕主都相处甚好。藩使俊达就是闻听汪瑔在五福幕上的名声才特意延聘他，而汪瑔在俊达幕下时，也帮他解决了一些事关重大的难题，诸如出谋解决税契之事。光绪元年（1875），刘坤一为两广总督，特聘请汪瑔来主理夷务。两广位于沿海，洋务夷务肇兴于此，处理洋务夷务乃工作之重点。刘坤一之政治能力姑且不论，但他能

① 《松烟小录》卷二，光绪刻本，第6页。

把如此重要的职责托付于汪瑔，说明他对汪瑔能力的肯定。几位总督中，曾国荃对汪瑔尤为赏识，前论其思想时已述及。

除了这几位幕主之外，汪瑔还与其他官员有交往，其中与陈良玉的关系最为密切。陈良玉，字朗山，汉军旗人，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举人，官广西知县，曾任学海堂学长。有《梅窝诗抄》。张维屏在《艺谈录》中称："朗山襟怀潇洒，博闻强识，而专力于诗。古体颇能抑扬顿挫，推波助澜。"① 1852 年，陈朗山将至长安，汪瑔曾作诗送之，此时汪瑔二十五岁②，尚未出任幕客。1858 年，陈朗山又给汪瑔寄诗讲述他在江南的经历，在战火中幸免逃身，并在该诗中还提及杜季英的亡故，表达了沉痛的心情。可见，陈朗山即便是在战火之中，自己有性命之忧的危险境况下，仍惦念着汪瑔，不忘写诗告诉他自己的近况，并且对汪瑔的境遇也比较关注。③ 1859 年春，陈朗山将赴军旅，汪瑔又作诗送之。④ 1868 年秋，陈朗山以丁内艰，还岭南，当时汪瑔正在肇庆，陈朗山特意赶往肇庆，故友久别重逢，汪瑔欣喜不已。⑤ 根据汪瑔在《喜朗山至并序》中的序文所言："朗山为通州学官，凡五年。通州距京师及天津皆不远，朗山数岁往来，以海运事议叙得知县。今年丁内艰，还岭南，遂来肇庆，久别相见，不可无诗。"他和陈朗山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二人却因为在诗歌创作上相互欣赏，并且不断有诗文往来。汪瑔在《致陈朗山》中写道："人才有纵有横，有数十年之才，有数百年数千年之才，此才之纵者也。有数百里之才，又数千里数万里之才，此才之横者也。深厚者宜于纵，博大者宜于横，其量可及数百里者，或不能及数十年，则横者较易得也。"⑥ 在书信里，二人在讨论关于人才的问题，他和陈朗山的关系不仅仅是一般的有诗歌酬唱，而且在思想上也相互交流。陈朗山在给汪瑔的诗集题词时写道："岭海亦诗国，清才谁绝群。芙蓉三万朵，一一总思君。江净真愁

---

① 钱仲联：《清诗纪事》道光朝卷，凤凰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079 页。

② 《送朗山北上》，《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87 页。

③ 《畬朗山》，《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00 页。

④ 《送朗山从军》，同上书，第 604 页。

⑤ 《喜朗山至并序》，同上书，第 616 页。

⑥ 《随山馆尺牍》卷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8 页。

唾，香多只益熏。如闻阆风顶，招手谢尘氛。"[①] 陈朗山认为汪瑔的诗歌"清才绝群"，评价颇高。而陈朗山的诗歌实际上也和汪瑔的诗歌有着共同之处，邱炜萲在《五百石洞天挥麈》中认为朗山的诗歌古体"坚以苍"，近体"感切"。[②]"感切"这点就和汪瑔的诗主性情有着相通之处。另外，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诗话》中指出："朗山及徐铁孙并以诗名，久为学海堂长。……论诗服膺竹垞，所作体格相近，词亦瓣香朱厉。"[③] 汪瑔在为陈朗山的《荔香词钞》作序中写到他与陈朗山"……相与纵论及国初诸家诗。君又心折竹垞，与余意合"，还说陈朗山的词"情真婉约，足以上追朱厉，欣赏不置，而君击节，余所为词亦不啻余之于君也"，相知相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可见二人论诗论词的主张相一致。

汪瑔与金武祥的交往也相当密切。金武祥在任赤溪厅同知时，曾延聘汪瑔的侄子汪兆镛入他的幕府中。金武祥（1841—1924），字溎生，号粟香，江阴人。早年游幕，后以捐班至广东候补，光绪十六年（1890）署赤溪直隶厅同知。次年因丁忧归，不再复出。工诗文。著有《芙蓉江上草堂诗稿》十二卷，《木兰书屋词》一卷，《粟香室文稿》四卷，《粟香随笔》四十卷，《陶庐杂忆》七卷等。金武祥在《粟香随笔》中说："山阴汪君芙生，学问淹雅，尤工诗词，余屡于友人处，与之晤谈。"[④] 汪瑔的侄子汪兆镛在《椶窗杂记》中记载，金与"从父谷盦先生交契"[⑤]。1888 年金武祥在梧州，没能按约定时间来广州，汪瑔特意作《满江红·江楼秋眺，寄金溎生于役梧州，约以杪秋东下逾期不至，而又无书赋此讯之》词给金，以表达思念之情。对此事，金武祥在《粟香四笔》中也有记载："戊子九月，余在梧州，汪芙生有江楼秋眺寄怀词，用满江红平韵。"[⑥] 另外，金在他的《粟香三笔》中还为汪瑔收录了不

---

① 《随山馆猥稿》陈良玉题词，《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59 页。

② 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大抵古樵古体俊而健，朗山坚以苍。古樵近体和而稳，朗山感切。"《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诗文评类，第 170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徐世昌编：《清诗汇》卷一三九，北京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35 页。

④ 金武祥：《粟香随笔》卷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 118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 页。

⑤ 汪兆镛：《椶窗杂记》卷三，1943 年刻本，第 15 页。

⑥ 金武祥：《粟香四笔》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 118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 页。

少诗篇。1883 年，汪瑔为金武祥的姑母的贞孝事迹作诗五首。[①] 1890 年，金武祥的父亲八十大寿，汪瑔作五律十首为他祝寿。[②] 汪瑔还曾为金武祥的《粟香四笔》作序，在序中说："君之与瑔，虽升潜殊迹，而真奇夙契，辱征鄙制，谊不可辞。"

金武祥在《粟香四笔》中集录汪瑔去世后友人为他所写的挽联，金武祥自己也为汪瑔写有挽联："有经世才，但将名士称君测君犹浅；抱知己痛，曾以循吏目我问我何堪。"对汪瑔评价极高。

金武祥论文主张"文如其人"，他曾认为何镜海观察"文词卓荦，才气纵横，遇盘错事，皆立办无所依阿，各督抚皆严惮而倚任之……有《守默斋集》，诗一卷，文三卷……皆雄健精悍，诗如其人。"[③] 又评价积甫的《留别都门诸君子诗》第二首"跌宕自喜，诗如其人"[④]。他还主张要以自然之性情作诗，反对矫揉造作。在论及玉溪生、赵瓯北、洪稚存诗歌中的对仗之句时，金武祥认为："皆有意贯注其间，不徒以对仗为工"[⑤]。他在对父亲所作的诗歌进行评价时说："家君初作诗时有句云，春烟多翠色，大为先祖所赏，盖天机所触，不必惨淡经营也。"[⑥] 他还认为何景明的诗歌"不见平仄之迹，尤觉其妙"[⑦]。金武祥的这些诗学主张和汪瑔相似，二人可谓相互影响。

金武祥还创作了四卷诗歌《芙蓉江上草堂诗稿》，陈晋熙说金的诗歌"清华名隽，独抒性情。至感念时事则悲歌讽谕，尤有老杜、白傅之风"，周星誉则评价金诗"神味渊永，吐属风流，如公瑾醇醪，令人自醉"。汪瑔在《旅谭》卷四中评价金武祥的诗句"风寒潞河水，秋老蓟门烟"是"大抵矜炼出之，不愧清词丽句之目"。可见，他对金的诗歌是十分欣赏的。

二、与汪瑔交往的同辈友人中，还有一些和汪瑔一样不是官员身份的，在这类人中，他与杜季英兄弟的感情最为深厚，杜氏二人对他的影响也较大，其他还有郑献甫、贾虚谷、沈世良等。

---

① 金武祥：《粟香随笔》卷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 118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 页。

② 金武祥：《粟香三笔》卷一，同上书，第 22 页："家君……及庚寅年八十，汪君芙生亦赠五律十首。"

③ 金武祥：《粟香随笔》卷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 118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

④ 金武祥：《粟香随笔》卷三，同上书，第 19 页。

⑤ 金武祥：《粟香随笔》卷七，同上书，第 18 页。

⑥ 金武祥：《粟香二笔》卷二，同上书，第 22 页。

⑦ 金武祥：《粟香二笔》卷七，同上书，第 2 页。

汪瑔在其诗集中曾数次写到他与杜季英、杜仲容兄弟二人的交游。杜季英，名隽，江苏金匮人。监生，有《小樊川诗稿》二卷。侯学愈在《续果溪诗钞》中记载："隽……少即侨寓广州。咸丰丁巳海上事起，隽卧闻炮声，起户出视，猝为飞弹所中，折首而殒，年二十五。隽幼即颖异，诗学玉溪生，词藻工丽，为时所称。与山阴汪瑔交最善，时相唱和。卒后汪为刊《小樊川诗稿》以传世焉。"[1] 金武祥在《粟香二笔》中写有"无锡杜季英隽，侨寓广州，咸丰丁巳海上事起。季英卧闻炮声，启户出视，猝与炮，遭，飞其首，而仆，年二十有五。有小樊川诗稿二卷。其友山阴汪芙生刊之。"[2] 汪瑔自己在《旅谭》中说："季英性高简，罕交游，而独与余善，言行文字间，彼此磨厉骨丹无异，或所见不合，争辩累日夕，亦不以为忤也。"这说明汪瑔和杜季英可谓至交，也是诤友。根据汪瑔诗歌中记载，从他二十二岁时开始，就和杜季英兄弟二人相互交游，来往密切。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他们三人共同在杜仲容的尺五斋夜话谈天[3]，同年的秋天，他又和杜季英一起作诗相互唱和[4]。在《随山馆词稿》的《红情》序云："己酉冬颐园席次，见女伶寿香婉秀可念，询其姓，梅氏也。时槛外红梅盛开，因属杜叔莼绘横幅赠之，用白石老仙韵赋此书帧端，并邀朗山、季英同作。"道光三十年（1850），他又与杜季英在春天的夜晚相邀饮酒[5]，该年汪瑔还为杜季英诗卷作长歌并赠之[6]。咸丰元年（1851），他又与杜季英相互讨论文章[7]，一起作同题诗《古意》[8]，二人时有唱和。咸丰二年（1852）夏，汪瑔作《喜晴》诗，杜季英和之。后汪瑔得季英所和之诗，有所感怀，复作诗，用前韵为答。[9] 杜季英还曾为汪瑔

---

① 转引自钱仲联《清诗纪事》，咸丰朝卷，凤凰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657 页。

② 金武祥：《粟香二笔》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 118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 页。

③ 《尺五斋与杜仲容友韦季英隽昆季夜话》，《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9 页。

④ 《尺五斋与杜仲容友韦季英隽昆季夜话》，《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9 页。

⑤ 《春夜偕季英小饮》，《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71 页。

⑥ 《春夜偕季英小饮》，同上书，第 571 页。

⑦ 《论文一章赠季英》，同上书，第 578 页。

⑧ 《古意同杜季英作》，同上书，第 579 页。

⑨ 《季英和余〈喜晴〉诗，慰藉良厚，时夏雨复作，浃旬不止，意甚苦之，得季英诗，乃然而笑，更用前韵奉酓》，同上书，第 585 页。

骈体文作跋[1]，对汪瑔所作四六文进行评价。杜季英去世后，汪瑔多次写诗怀念他。咸丰八年（1858）秋，汪瑔同松谷饮酒，感怀友朋各自奔走天涯，聚散无常，同时也对杜季英的去世表示悲痛之情[2]，在这年，汪瑔又读杜季英及其师丁采的遗诗，昔日挚友，今日天人永隔，无限感慨[3]。汪瑔在《旅谭》中说："季英才气英发，集中五七古最工。"[4] 咸丰九年（1859）寒食前三日，汪瑔作《春日怀人诗十八首并序》[5]，怀念旧日师友，感慨友朋天涯飘零，其中一首就是专门为杜季英写的。

汪瑔和杜仲容的关系也很要好。杜仲容（1829—1860），名友韦，咸丰元年（1851）举人。官广东阳江知县，有惠政。工诗，学玉溪生（李义山）。道光三十年（1850），汪瑔经过杜仲容的尺五斋，与其相约游黄木湾[6]。咸丰元年二月，杜仲容北游京师，五月三日，杜仲容于江西道中作《见怀诗》并有书信给汪瑔，汪瑔有感怀作诗寄杜仲容[7]。同年的九月九日，汪瑔登越秀山，又作诗寄杜仲容。[8] 叶衍兰的《小三吾亭词序》中记载："咸丰初，余与沈子伯眉、杜子仲容、季英、冒子哲齐、文川、汪子芙生举文会于粤中。"[9] 即便是汪瑔在生病之中，仍然惦念着杜季英兄弟[10]，可见汪瑔与杜氏兄弟的感情甚笃。汪瑔在《旅谭》中记载了关于杜仲容和杜季英作诗的情况，"无锡杜仲容大令，季英之兄也。十六岁时，取广州古迹作诗二十余首。……琅然可诵。仲容才不及乃弟，而言论风采过之，乃试令，甫

---

① 《随山馆丛稿》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② 《感旧行同松谷饮酒作》，《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9页。

③ 《读亡友杜季英及其师丁采之遗诗，慨然有作三首》，同上书，第600页。

④ 汪瑔：《旅谭》卷一，光绪刻本。

⑤ 《春日怀人诗十八首并序》，《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3页。

⑥ 《过仲容尺五斋时方约游黄木湾》，同上书，第571页。

⑦ 《寄仲容京师有序》，《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9页。

⑧ 《九日越秀山登高寄仲容》，《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第582页。

⑨ 施蛰存主编：《词集序跋萃编》，叶衍兰《小三吾亭词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5页。

⑩ 《夏日病中杂诗五首》，《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页。

数月，旋以尤去，不久遽卒，惜哉！”[①]

另外，和汪瑔关系较为密切的同辈友人还有郑献甫、贾虚谷、沈世良等。

郑献甫，字小谷，象州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游幕前曾官至刑部主事。后丁忧归，不再为官，开始游幕。郑献甫不仅是一位少数民族的官员，而且是卓著的诗人。张维屏曾这样品评他的诗歌：“因时以寓名，缘情以言志，其韵清越，其格老苍，要皆出于自然，不事规仿，故能卓然成家，如其人之潇洒出尘，不可以世网羁也。”[②] 蕴璘则称其诗“学之既不能，模之亦不似，但求抒我意，何必令公喜”[③]。郑献甫论诗主张“诗言志”，作诗应才情、学问、阅历兼备，他指出：“夫诗不特当有才情，当有学问，并当有阅历。”汪瑔三十二岁时（1859），曾与郑献甫同游金绳寺，二人分别作诗相娱乐。[④] 此时，二人同在五福幕下。同年，汪瑔还为他的《补学轩集》题诗赠之[⑤]，在诗中对郑献甫的诗文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先生诚通儒，用笔如用笴。每发辄中的，何有右与左？秋月固皎洁，春花亦婀娜。惟其金心中，所以玉色瑳。学术既湛深，格律自帖妥”。汪瑔在《旅谭》中称“象州郑小谷比部，经学湛深，而诗极清矫。……其诗无经生家肤庸阨塞之病，集中五七言嵚奇历落者多”[⑥]。另外，汪瑔在1860年又为郑小谷的识字耕田图题诗[⑦]，对郑献甫所作之画也很欣赏。而郑献甫也曾为汪瑔的诗集题词：“淡云凉雨供清愁，一卷初开万象秋。牙慧艳如梅下鹤，心几闲狎海旁鸥。骚人荷芰归长吉，怨女蔷薇误少游。渌水红莲同泛处，元卿翻欲拜羊求。”虽然其题词只述及汪瑔诗歌的一部分特色，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人的关系。

贾虚谷，比汪瑔大八岁，他不仅是汪瑔的友人，还是同乡，二人的交往

---

① 汪瑔：《旅谭》卷一，光绪刻本。

② 张维屏：《续刊补学轩诗集》序，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③ 蕴璘：《补学轩诗集》前集较刊前记，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④ 《五月二十六日，偕同人游金绳寺》，《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4页。

⑤ 同上。

⑥ 《旅谭》卷一，光绪刻本。

⑦ 《题小谷比部识字耕田图四首》，《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页。

从汪瑔年轻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汪瑔的晚年。汪瑔曾作《赠贾虚谷》[①] 有序，序云："虚谷，吾乡人，寄家京师，南北往来几三十年。"这首诗创作于1876年，汪瑔四十九岁，三十年前正是十九岁，在这几十年间，他们相见甚少，全靠诗文往来传情达意。从1876年开始，汪瑔共作了十三首与贾虚谷相和的诗歌、两首赠别诗，还有一首特别仿照贾虚谷诗的风格，题在其《虚谷诗集》后面。这十三首相和诗分别是：《次韵虚谷感事之作》、《虚谷效元遗山杂著，和之四首》、《次韵虚谷归里留别之作》、《和虚谷杂诗六首》和《次韵虚谷咏怀之作》。在这些相和诗中，他们互相抒发对现实生活的感触，或六言，或七言，或五言，诗风自然淳朴，如贾虚谷作的《咏怀》[②]：

> 托家久京国，近始归越州。南北四十年，晚卧乡山秋。发箧陈我书，丹黄躬校雠。此邦多粳稻，朝夕亦易谋。无书上北阙，有事从西畴。茫茫身后名，韦布其可求。

贾虚谷在该诗中写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南来北往四十年，晚年归卧故乡山中，作为一介寒素之士，他不苛求身后之名。"韦布"，韦带布衣，古指未仕者或平民的寒素服装，在这里借指寒素之士。该诗无论从表达的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和汪瑔晚年创作的诗歌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贾虚谷曾为汪瑔的诗集题词："景方于三十年前，见芙生诗，即知其工。然止于诗之工而已。今年赴游岭南，乃悉见其三十年之诗，巧者出以朴，浓者出以淡，纵横者出以和缓，其用意深厚，得古人之微指，盖不止于诗之工而已。"[③] 对汪瑔的诗歌，他给予极高的评价和认同，而汪瑔在给贾虚谷的诗集题诗的时候，对他也是充满赞叹之情，其题诗云："书生不封侯，自谓非英雄。万古肮脏气，并入尺卷中。惟持一寸心，径欲窥鸿蒙。苦语掣鬼泪，奇葩夺神工。良璞光不耀，亦与瓦砾同。世人顾而笑，天地生秋风。"[④] 这也表明他们在论诗和创作方面是互为欣赏的。

另外，汪瑔与沈世良也相互有诗词唱和。沈世良，字伯眉，以词得名，

---

① 汪瑔：《随山馆猥稿》，同上书，第632页

② 汪瑔：《随山馆猥稿》，同上书，第663页附。

③ 《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60页。

④ 《题虚谷诗集后即效其体》，同上书，第636页。

尝与谭莹、许玉彬等人结山堂吟社、花田词社、诃林词社，为诸生十余年。咸丰八年（1858），举为学海堂学长，选授韶州府学训导，未到官即卒，年仅三十八。著有《屈介子事略》、《小祇庵诗》、《楞华室词》。生平敬慕倪瓒，辑录逸事并撰年谱一卷。在叶衍兰的《小三吾亭词序》[①] 中记载，咸丰初年汪瑔曾与沈世良、叶衍兰等人在粤举行文会。在《正月十三日得沈伯眉学博世良书，却寄四首》[②] 中，汪瑔写到他和沈世良的相遇到相识，"十年耳熟沈休文，乱后归来始遇君"，还对沈世良的诗品和人品作出独到的体悟："诗品真如寒水玉，闲身犹是在山云。好从艺苑争千古，别向骚坛张一军。"1860 年汪瑔得知沈世良的亡讯，作诗为其悼亡，并且为沈的《祗陀盦诗集》题诗四首。[③] 在这四首诗中，汪瑔对沈世良的亡故表示极大的哀痛，同时又对沈世良的诗歌作了切中肯綮的评述，诗中写道："几卷遗诗在，悲凉语最工。何人呼岛佛，此事逼涪翁。身世干戈际，文章涕泪中。伤心无限感，应不为途穷。"而沈世良也曾为汪瑔的诗集题词，对其三十岁之前所作诗歌进行评价，认为"芙生三十以前诗，如万柳楼台，百花阑楯，气之春也；三十以后诗，如松风送籁，涧壑飞泉，时之夏也。以视二十岁前朗秀研润之作，已再变矣"。同时，他又对汪瑔以后的诗歌作预言，"为之不已，变而愈工，必将有淡远如秋天云，静穆如东岭雪者。诗非变不能工，而其所以变，则人巧所至，天机应之，盖不期变而自不能不变也。輒书数语，为他日之验。"他的这段话，同汪瑔以后诗风的转变确实有吻合之处。

三、汪瑔性格比较疏达，不仅与同辈的交往融洽，而且也深得长辈的赞赏，如张维屏、林昌彝、陈澧等。

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号南山，又号松心子，晚年自号珠海老渔。广东番禺花地人。张维屏的诗歌在嘉道诗坛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他生前诗名很高，颇受诗坛名流器重，"屹然为嘉、道称诗者一大宗"'，且"一时附其门下者甚众"，与谭敬昭、黄培芳三人合称"粤东三子"，是当时岭南诗坛领袖。汪瑔在《旅谭》中记载张南山欲纳其为弟子之事，"张南山郡丞平生著述颇夥。……平日最赏余诗。尝嘱人致意将罗致门

---

① 叶衍兰《小三吾亭词序》："咸丰初，余与沈子伯眉、杜子仲容、季英、冒子哲斋、文川、汪子芙生举文会于粤中。"

② 《正月十三日得沈伯眉学博世良书，却寄四首》，《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01 页。

③ 《哭伯眉，即书其〈祗陀盦诗集〉后四首》，同上书，第 607 页。

下，余谢之曰：‘吾于南翁，正如吴山尊之于随园，自有知己之感，然不愿在弟子之列也。’郡丞闻之，亦不以为忤。晚年作《谈艺录》，于余颇极称许，前辈宏奖之雅，良可感也。”[①] 张维屏对汪瑔的诗歌评价的确颇高，他在《艺谈录》中写道：“芙生绮岁清才，其诗或清圆如春莺啭树，矫健似秋隼盘空。言情写景，妙出性灵，慨乱伤离，时露风骨。当此盛年进而不已，他日必将于风骚坛坫中高置一席也。”

林昌彝（1803—1876），字惠常，号芗溪，又号五虎山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经学家、诗论家和诗人。有《衣隐山房诗集》八卷、《诗外集》一卷、《敦旧集》八十卷、《射鹰楼诗话》二十四卷。因宅近乌石山，山为英人所占据，意愤怒而欲杀之，故名其楼为“射鹰”。他将“诗教”中的某些意旨，转化为民族民众利益服务，诗应“为时”、“为事”而作，更多地摆脱了所谓“敦人伦”、“厚风俗”的羁缚。这与汪瑔主张诗歌创作应该以性情为主不同。汪瑔与林昌彝为忘年交，《旅谭》卷四云：“侯官林薌谿学录昌彝为陈恭甫编修寿祺弟子，喜说经，亦喜论诗，所著《三礼通释》尝进于朝。游岭南时年近七十，与余为忘年之交，彼此浪游踪迹，虽不常聚，而每一相见，论文谈艺，往往移晷忘疲。光绪初，还闽未久遽尔即世。其自定古今体诗《衣隐山房诗集》者久已刻行。”并录有昌彝诗佳句。汪瑔《随山馆猥稿》有多首与昌彝唱和之作。而林昌彝亦深喜汪瑔，他在《海天琴思录》中写道：“山阴汪芙生山人瑔胸次高旷，诗才清越”，对汪瑔的为人和为诗都极为赞赏。他还为汪瑔的诗集题词：“烟波绮丽，风月清新，逸兴湍飞，感均顽艳，上迫长吉、义山，下瞰君采、四溟，近压仲则、兰雪，而独成一子矣。三复赞叹，卓然可传”，充满着溢美之词，可见，他对汪瑔的诗歌是很为欣赏的。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广东番禺人，号东塾。“九岁能为诗文。十七，补博士弟子，入粤秀书院肄业。二十三举于乡。六应会试未第，拣选知县到班，不欲出仕，请加国子监学录衔。同治乙丑，诏沿海各省绘地图，督府属任其事，成《广东图》以进。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至老，为菊坡书院山长。以经史及汉魏六朝唐宋诗文教士，与诸生讲论文艺，勉以笃行立品。光绪七年，用耆年硕德，赏五品卿衔。”[②] 有《忆江南馆词》一卷。他

---

① 汪瑔：《旅谭》卷五，光绪刻本。

②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153 页。

还精研文字音韵，所著《切韵考》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界久负盛名。另著有《汉儒通义》、《东塾读书记》、《声律通考》、《汉书水道图说》、《说文声统》等。谭献《箧中词》评云："填词有陈兰甫先生，文儒蔚起，导扬正声。"钱仲联先生在《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云："取为水军头领之首，为近百年词坛张目。"陈澧的词粹雅清高，表达了一位学者的胸襟素养，卓然为清词大家。陈澧在为汪瑔的父亲汪鼎作墓表中曾说"子瑔与澧交好"[①]，他还为汪瑔的《随山馆猥稿》题词："岭南风雅衰颓日，拔戟词坛大有人。幕府文章归典硕，山堂诗笔迥清新。兵戈已见满天地，杯酒何须问主宾。正忆秋城闻夜，霜风残月最伤神。"他认为汪瑔的诗词在晚清岭南文坛日渐衰退的形势下，是独树一帜的，对其尤为推崇。

另外，汪瑔与比他年龄较小的晚辈也互有往来，如蕴璘，文廷式等。

蕴璘，字玉仲，号小泉，五福之子。姓王氏，汉军旗人，官广东同知。有《多古意斋诗稿》、《采菽堂词》。汪瑔自从在五福幕中做幕客之后，就不断有诗歌写他和玉仲相处之情。咸丰四年（1854），玉仲兄弟招集汪瑔去秋圃相聚[②]，汪瑔曾数次作诗表达对玉仲的思念之情，如作于咸丰十年的《池亭夜坐柬玉仲》。1858年十一月，五福病卒，玉仲北归，葬其先人于西山，别后久无音书，汪瑔又作诗寄之[③]。在五福去世之后，汪瑔和玉仲仍维持着深厚的情谊。光绪元年（1875）秋，汪瑔作诗寄玉仲[④]。光绪七年辛巳（1881）早秋，玉仲在琼管，汪瑔一个多月未尝得闻他的音讯，又作诗怀玉仲[⑤]。同年的九月九日，他又与玉仲、介香登越秀山[⑥]。光绪八年壬午（1882），玉仲去陵水赴任，汪瑔作诗赠之[⑦]。玉仲由陵水寄书来，汪瑔得之后作诗寄之[⑧]。光绪九年（1883）暮秋，汪瑔再次作诗寄玉仲[⑨]。金武祥为玉仲的诗集作序云："其先德响亭先生，宦粤久，君承家学，师友如郑小

---

① 陈澧：《山阴汪君墓表》，《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② 《蕴兰谷蕴玢玉仲蕴璘昆季招集秋圃》，《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2页。

③ 《玉仲于今秋北归，葬其先人副使公于西山，别后久不得书，赋此寄之二首》，《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5页。

④ 《秋江曲戏简玉仲》，同上书，第629页。

⑤ 《怀玉仲于役琼管月余不得书》，同上书，第655页。

⑥ 《重九日偕玉仲、介香晚登越秀山并序》，同上书，第656页。

⑦ 《送玉仲宰陵水》，同上书，第658页。

⑧ 《得玉仲陵水书却寄》，同上书，第660页。

⑨ 《暮秋寄玉仲陵水》，同上书，第663页。

谷、陈兰甫，多所取资。诗风华典雅，多抑塞磊落之概。”汪瑔在《旅谭》中记载：“汉军蕴玉仲郡丞，为响亭太守次子。余客太守所凡十五年。初见玉仲时，年甫十三，即从余问诗法，嗣后朝夕相见，每有所作，辄以相示，指斥疵累，虽剧语，不以为忤。三十以后诗已裒然成集。惜中年遽卒，未竟其才也。集中七言最工。”① 录其诗多首。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一字芸阁（或作云阁），江西萍乡县（今萍乡市）人。出生于广东潮州，少长于岭南，为陈澧入室弟子。光绪十六年（1890），成进士，授编修。二十年大考，光绪帝亲拔为一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志在救世，遇事敢言，与汪鸣銮、张謇等被称为“翁（同龢）门六子”，是帝党重要人物。一生著述颇丰，诗词集有《文道希先生遗诗》、《云起轩词》。他比汪瑔小二十九岁，和汪瑔的儿子汪兆铨关系较好。《广东文徵》中在汪兆铨的生平中记载有他“与杨锐文廷式陈三立诸名士往来酬唱”②。光绪十年（1884），文廷式将泛海入都，汪瑔曾作诗为他送别③。光绪十四年（1888）冬，文廷式在杭州，汪瑔又作诗寄之④。文廷式为汪瑔的《随山馆猥稿》作序对汪瑔的人格和诗品给予极高的评价。

此外，跟随汪瑔学诗的晚辈也不乏其人，如胡衔、陶邵学、朱启连等，这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有介绍，这里不一一赘述。

---

① 《旅谭》卷四，光绪刻本。

② 《广东文徵》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 1976 年版，第六册卷二十五至卷三十，第 284 页。

③ 《送文芸阁廷式泛海入都》，《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67 页。

④ 《冬夜寄怀芸阁杭州》，同上书，第 679 页。

第二章

汪琭的诗学主张

汪琭自幼学诗，后在几十年的幕客生涯中不废吟咏，直至晚岁仍坚持写作，这种对诗的热爱之情可谓终其一生而未有减退。他虽没有专门的诗论著作和文章，但在他给友人诗集所作之序、论诗之诗，以及《旅谭》、《松烟小录》等笔记中都有不少诗歌批评的文字，从各种角度表现出汪琭对诗歌创作的认识和主张。

第一节　诗重性情　忌在无我

一、诗重性情

汪琭在为叶衍兰《海云阁诗钞》作序时说："诗之所以为诗，性情、风格、才力、词藻也。古人于此四者，或有偏胜，必无偏废，而后世颇不尽然，此所以多所流失也。"① 汪琭对"性情、风格、才力、词藻"四者认为可以有偏胜而不可有偏废，这自然是比较全面、辩证的眼光。而因为可以有"偏胜"，那么就会有所偏重、有优先考虑的因素。事实上汪琭把性情放在最前，也就是强调了它的首要性，这与汪琭其他地方的主张相一致。如在《杂诗十首》之九说"为诗道性情，初不假题署……我诗固不工，名氏亦不著。要为自怡悦，非以博声誉"。作诗的目的在于"道性情"、"自怡悦"，这与乾嘉之间以袁枚代表的"性灵"派有某种相近之处。在汪琭的《随山馆丛稿》和《旅谭》及《松烟小录》中时有谈及袁枚的文字，他还对友人王少香痛诋袁枚的言论作了善意的批评（见前）。在《旅谭》卷五抄录别人的话表示对"真性情"的肯定："贵仕无真勋业

---

① 叶衍兰：《海云阁诗钞》卷首，光绪刻本。

窟礌也，文章无真性情优倡也。”给别人的诗集作序时也提到“性灵”，如《周篠绿诗集序代》中说“乏性灵之真，则会意不远；尠山川之助，则负声无力”。这与袁枚之性灵说特别强调抒发个人的真实性情有着一致性。汪瑔也常将是否具有真挚的情感作为评诗的标准，他本人在生活中就是以“真面目”对待相交的人，如其友人贾虚谷有赠诗云“相识遍南北，惟君面目真”。

不过汪瑔的主张诗道性情，与袁枚“性灵”说还是有较大的差异。袁枚的“性灵”说提出的背景是清中叶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说”与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说”笼罩诗坛之际，袁枚的诗论一方面针对“格调派”以“温柔敦厚”诗教为格套泯灭诗人个性的情形，而倡导诗要表现个人本之于内心的真实情感；一方面针对“肌理”说的以经学为诗，以考据为诗的现象，提出要靠“天分”“灵犀”为诗，写出风趣与滋味。而汪瑔的“性情”，主要是在前一方面与袁枚“性灵”说有相通之处，而对于后一方面则无明显主张，他在谈到黄宗羲的文章时还赞叹“古人以性情学问为文章”。学问与性情相并列，而不像袁枚那样反对学问为诗。

而在关于“性情”的内涵方面，袁枚更强调个体的情感，其中又突出男女之情以及源于个人生活之情趣。而汪瑔所说之“性情”基本不涉及男女爱情，对个人生活之情也更多的是身世之感和与亲人朋友的感情，并且还包括对百姓、国家的关怀之情。如在《有真意斋诗集序》中说：“在母为令子，在弟为哲昆，甘露下庭，德星曜垣。此伦纪之悦豫也，故其诗温然而挚，肫然而敦。若夫烽燧江海，兵戈岁年，子美之歌同谷，嗣通之赋陕原，感时抚事，舒愤畅言，仰观宇宙，原本山川，有风云之泱漭，非月露之流连。自憙，陵厉无前，此怀抱之慨慷也，故其诗若霜笳之激越，如雷鼓之填鞱。”这是汪瑔对友人陶卿田诗歌创作的评论，他以作者的身世、生平经历为依据，述说了陶卿田为孝子贤兄的真挚之情发为诗歌而表现出“温然而挚，肫然而敦”的风格；而当社会动乱，战争连年之时，诗人则像杜甫那样感时抚事、忧国忧民，写出激越慷慨的诗篇。后面又结合作者的幕府经历，评论他在各种环境下所作诗歌表现出的不同情感风格。而这正可作为汪瑔自己诗歌创作的写照，他孝亲爱友，关怀家国，忧念百姓，这些都是源于他所亲身生活的现实中，发自于内心的挚切之情，与其个人遭际所产生的身世之感是相互交融统一的。因此，他关于诗歌主性情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吸取了晚明公安派的“性灵”说到清中

叶袁枚的“性灵”说基础上，融进了中国诗歌“言志”说的内容，既避免了像沈德潜的“格调说”那样从“温柔敦厚”的诗教教条出发，离开社会现实的实际，写那些内容空虚、感情虚假的歌功颂德之诗的弊端，又弥补了“性灵”派偏重于个人生活情感而关注社会现实不够，导致“情”的范围较狭窄的缺失。

二、忌在无我

汪瑔在《赠郑小谷比部即题其补学轩集后》四首中写道：

> 作诗摹古人，其弊在无我。作诗无古法，其理又不可。先生诚通儒，用笔如用笴。每发辄中的，何有右与左？秋月固皎洁，春花亦婀娜。惟其金心中，所以玉色瑳。学术既湛深，格律自帖妥。彼哉主客图，持论诚琐琐。

在这首诗里，汪瑔借对友人郑献甫（字小谷）诗歌的评价，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作诗之法的态度，“作诗摹古人，其弊在无我”，直接指出一味摹拟古人的弊端在于没有自己的性情面目，为诗之道，忌在无我。钱仲联先生说此二句意思“与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大有关系”[①]。在此同时汪瑔又指出古人之法也不是尽无可取的，“作诗无古法，其理又不可”，他认为古人创作诗歌的方法也有值得借鉴的价值。这种对待古人作诗之法的态度，是辩证的，既指擿诗尚摹拟的普遍性流弊，又矫正全盘否定诗歌传统方法的偏颇。当然其主要意义还在于反对摹拟，提倡独创。

在汪瑔生活的晚清时期，诗坛上流派纷纭，对如何作诗各自持有不同的观念。宋诗派不满于清中叶诗坛上出现的貌袭唐人、摹古无创新的衰颓诗风，力求开辟诗歌创作的新途径，转而学习韩愈、黄庭坚。事实上他们并未走出清中叶拟古的泥淖，而陷入了另一种摹拟。其实，所谓的“宋诗运动”，“并不是专以宋诗为摹仿对象，而是作为摹仿汉魏、六朝盛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一种流派。他们把摹仿对象改为杜韩苏黄等唐宋名家，实际上也还是在形式上复古、摹拟”[②]。与宋诗派同时存在的还有以王闿运

---

① 魏中林：《钱仲联讲论清诗》，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4 页。
② 张建业：《中国诗歌史》，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3 页。

为代表的模拟汉魏六朝派，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在当时的诗坛上都颇有影响。概括言之，在汪瑔所生活的时期，诗坛上正处于诗界革命尚未展开的前期，诗坛上拟古风气很浓，汪瑔对此有着很深的感触。他的《杂诗十首》之九说："为诗道性情，初不假题署。奈何事标榜，骚坛竟攀附。西江自为宗，北地固多助。当时蚍蜉辈，相率作羶慕。惬心嗟未然，借面苦无具。未得夷光矉，已失寿陵步。……"对诗歌史上标榜门户，攀附宗派，效颦学步，失去自己面目的现象作了嘲讽，其实这也是对晚清诗坛现实的针砭。林庚白在其《孑楼诗词话》中指出拟古对诗歌创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认为，"同、光以来诗人词客，间亦不乏卓绝者，顾什七失之膠柱刻鹄。彼将求古人之残骸于墟墓中，而不顾其远于现实之生活，抑亦非善学古人者"，这和汪瑔的看法相一致。

在对古人之法的学习上，汪瑔认为学习古人旨在学习其内在的风神，而不单是学其形式。他在《病起杂诗三首》中言"更读古人书，神遇不以形"。这是说对古人的一切书籍，不仅仅局限于诗歌，要领会其内在的旨趣，要"神遇"，以自我之性情去融会贯通。为人所称道的好诗都不是单一的摹拟古人，而是学到了古人诗歌的内在气格的作品。关于这点，汪瑔虽然是故调重弹，但也是他在诗学主张上识力的一种明证。

从上可见汪瑔在诗歌创作上，既主张取法古人，但又不拘泥于古人，在取法古人之时，他主张力求学得古人作诗的内在风神，而不止于外在的形式。作诗之法，忌在无我，这对当时摹拟成风的晚清诗坛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也应该看到，汪瑔对当时诗坛的宋诗派的认识也不够全面，实际上他所提出的这些主张，在某些宋诗派成员中也曾有人提及。如道咸之际的宋诗派代表人物程恩泽认为"明诗扫地钟谭出，谁挽颓风说建安？却爱闭门陈正字（师道），清如郊岛创如韩"（《程侍郎遗集初编·题陈硒锡先生手稿》），表达出他既坚持学古观念，但并不拘泥于只学习某一家。

陈衍在《密堂诗钞序》中云："顾道咸以来，程春海、何子贞、曾涤生、郑子尹诸先生之为诗，欲取道元和、北宋，进规开天，以得其精神结构之所在，不屑貌为盛唐以称雄。"[①] 陈衍在这里明确表示宋诗派在师法古人的时候，是要"得其精神结构之所在"的，这和汪瑔主张的"神似

① 陈衍：《石遗室诗话》，钱仲联：《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2 页。

非形似”也有吻合之处。

第二节　诗格贵变　不拘定法

一、诗格贵变

风格指的是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独特面貌，而诗歌风格是指某个诗人或流派在其诗歌创作中所形成的代表其整体创作风貌的特征。具体到每一个诗人说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其诗歌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色。汪琭提倡诗格贵变，主张一个诗人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应该在创作风格上因时而变，不应该固定地以一种狭隘的风格来创作。倘若一个诗人的诗风终生不发生变化，这样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也不可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来。

汪琭在读其亡友杜季英及其老师丁采之的遗诗后写了三首诗，里面对杜季英和他的老师的逝去表示遗憾，同时也表达出他对二人诗歌的一些看法。如在《读亡友杜季英及其师丁采之遗诗概然有作三首》其三中写道：

> 采之于为诗，意欲踞泰华。风格非不高，惜未穷变化。季英视其师，精锐不相下。狐白成冬裘，骊黄肃秋驾。近世派别繁，女娇或儿嘎。二子出其间，一战可以霸。奈何遘奇阨，青霞入修夜。吾思小樊川，铅泪为一泻。

在这首读诗诗中，汪琭首先对杜季英的老师丁采之的诗进行了一番赞赏，说其诗歌“意欲踞泰华”，这是对其诗歌题材内容的称赞，说其志趣高远，有踞泰华之巅的想望。接下来的一句，则前扬后抑，直接表明汪琭对丁采之的诗歌的评价：“风格非不高”，是对丁的诗歌风格的肯定，“惜未穷变化”，是说丁的诗歌存在的缺憾之处，即不会变化。诗歌应该风格多样，随时而变，是汪琭评价诗歌的标准和创作诗歌时所遵循的原则。诗歌理论史上，对风格这一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以《体性》为核心构建了精深完备的文学风格理论。刘勰认为作品的风格是由创作主体的性情决定的，他结合文学创作的实际将文学风格归纳为八种基本类型，开后世风格类型学之先河。但实际上，优秀诗人的风格往

往多种多样，只是某种风格占主导地位而已。比如李白的诗以雄奇飘逸、真率自然为主，但实际上他的诗风是富于多样性的，而不是单调乏味的。大诗人杜甫亦是如此，既有现实性很强烈的“三吏”、“三别”，亦有清新细腻的表达个人情怀之作。真正伟大的诗人总能不拘一格，这也是汪瑔诗歌创作的主张。

汪瑔在《旅谭》卷四中有对当时其朋友所作诗歌的一些赏析，“曩时朋辈以诗见质，辄摘其佳句，以片纸录置箧中，数十年来所存不少。近以匡居多暇，方拟粗加排比，汇入此编，则丛残蠹损之余，存不逮半矣。今所存者，如山阴卢秋坪洲之‘松声专一壑，云气失千峰’，‘秋来乡梦鲈鱼脍，夜半寒声蟋蟀盆’。李子骏之‘客来三弄笛，人坐一阑花’，‘秋阴时节青苔巷，客子年华白袷衣’。仁和徐伯熙昶之‘雨声深巷屐，人语小楼灯’，‘澒洞风烟河北贼，模糊月旦汝南评’《汝州道中闻警》。余姚辛仲人中仁之‘风软花无恙，人闻月有情’，‘风雪故园寒可耐，烽尘客路梦犹惊’。钱塘陆次山郡倅有壬之‘云起青山活，潮生赤岸低，到此难为水，茫然别有天’《泛海》，‘东坡海外黄鸡粥，西蜀山中白木镵。侯官林子隅太守直之‘美人多晚嫁，才子例无官’，‘轻寒迟客梦，残雨逗乡心’，‘湿云破月忽成雨，老树出墙多受风’，‘枫叶空江秋送客，菊花疏雨晚逢人’。江阴金溎生运同武祥之‘风寒潞河水，秋老蓟门烟’。歙县潘伯时大令贞敏之‘生计嗟牛后，才名愧骆前’，‘辛苦十年吟古镜，艰难二月卖新丝’。……此类数十联，大抵矜炼出之，不愧清词丽句之目。”汪瑔不吝笔墨收集了这么多时人的诗句，无非是因为这些诗句清新脱俗，符合他的审美标准。从上面所引诗句可以看出这些诗句都属语言浅易，风格淡然之作。而在另一则诗论中，汪瑔则认为，“孟东野诗高卓坚苦，在唐贤中实能自成一家。后人学之者不少，概见伯时《捣衣吟》云：‘乌啼月皎皎，蛩语风凄凄。离乡几千里，游子嗟无衣。捣衣夜苦短，砧杵那得缓。杵声不在砧，却在游子心。’步武溧阳，几于具体。其五七言近体，如‘病肺妨名酒，饥肠出好诗’，‘轻鸥浮水远，修竹绕村圆’，‘相马但能分牝牡，听蛙何必问官私’，‘千时颇悔书三上，遣兴惟凭酒一中’，此类数十联，皆能精心结撰，又‘曳履定虫声，山向酒人青’，‘秋风先冷异乡人，能耐饥寒即豪杰’，诸断句亦隽永可味。”在这里汪瑔对孟东野的高卓坚苦之作大为推崇，并且列举出时人潘伯时学孟东野的佳句，认为其“隽永可味”。

不难看出，汪瑔主张诗人创作的风格应该多样化，而且要富于变化。其实，诗人风格的形成是个发展变化的不断积累和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运动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变化，诗人的阅历、思想、性格等因素与诗歌的风格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①] 汪瑔主张以动态的观念创作诗歌，也是诗歌能保持活力和新鲜感的途径所在。

二、不拘定法

汪瑔不仅主张诗歌的风格要多样化，而且认为作诗应不拘定法，只要是能够创作出优秀诗歌的方法都可以借鉴。同时，他讲究诗歌应是浑然天成的艺术作品，对不同文体之间的艺术技巧，也是可以学习的。

首先，汪瑔对“酝酿出诗”与诗歌是“天然造化”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诗歌创作方法，持着双重认同的标准。他既赞同诗歌应该是酝酿而出的，又支持诗歌应是自然天成，无须雕琢的。如在《旅谭》卷一中说：“伯眉清癯多病，卒时年仅三十余，其遗诗号小祇陀盦集者……诗学山谷而益以绵丽。”认为沈世良的诗歌学习黄庭坚，而又有他自己的特色。在卷二中，他先从元人戴石屏诗“春水渡傍渡，夕阳山外山”谈起，认为其“句法清峭”[②]，进而引出近人东乡吴季醇对此句法的学习和改进，吴季醇将此五言衍作七言“乱云堆作石边石，流水响成琴外琴”，既有戴石屏原诗句法的风神，又有新的意境，自有其风致。这就是前人关于诗法的学习，继承中有新创，不是照搬。紧接着，汪瑔又对吴季醇的《喜晴》诗歌也作了引用和分析，《喜晴》云：“雨余初日出，鹊喜在人先。蝶力扶花健，莺声出树圆。”汪瑔认为该诗“写初晴景物如画”，并且引用了华樵云兵备为吴的诗集作的跋：“先生之遗诗，不倚他人门户，亦不倚香苏山馆门户，子孙之面目不能尽同祖父，五岳之烟云变态不能尽同昆仑也，亦各视其性情而已。”汪瑔之所以引用此跋，说明他对华樵云兵备在跋里的评价是赞同的，这反映出汪瑔认为诗歌创作不应拘泥于某种既定的方法，而应各有其面目的诗学主张。在对倪云臞诗评价时，认为云臞“为诗学袁赵两家，有简松草堂之意”[③]。在汪瑔看来，倪云臞诗歌的特

---

① 张瑞君：《试析李白诗歌风格的演变过程》，《河北大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

② 汪瑔：《旅谭》卷二，光绪刻本。

③ 同上。

点就在于他不是师法某一家的，而是对袁枚、赵翼的诗歌之法都有所借鉴的。而另外一则对倪云臞的评价是“云臞少作，清丽居多，而余尤爱其‘人无哀乐头难白，坐有婵娟眼易青’，多少名场旧宾客，新诗题遍水西亭。数语为有凄慨缠绵之意，不徒以涂泽为工”。他对倪云臞“不徒以涂泽为工”的诗作颇为赞赏，这说明汪瑔主张作诗要不徒以涂泽为要务。

另外，对于咏史诗的写法，汪瑔也有精辟的论述：“咏史诗或就本事运用，或以比喻见意，要须以议论驱驾之，否则二十一史弹词矣。吴星侪孝廉《滇中怀古》云：‘事去包胥方痛哭，时清英布又纵横。’马云雏茂才《读宋史有感》云：‘诸君果抵黄龙饮，后世宁容白雁来。’该皆精警。”汪瑔认为虽然咏史诗的主题是议论，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是可以而且应当采用不同的手法的。

而在《旅谭》卷四中一则对岳坟诗的论断则也是从诗歌创作的手法上直接进行分析的，“岳坟诗自赵松雪七律一首外，杰构殊稀，烬余稿中，《谒岳忠武王庙诗》云：感愤骑驴客，猖狂立马图，但从旁面、对面着笔，颇觉壁垒一新。”在这里，他对岳坟诗中《谒岳忠武王庙诗》的赞同，则是认为它能“从旁面、对面著笔”，这就是有别于正面描写的手法。诸如此类对诗歌创作的方法问题进行评论的还有很多，如“同治戊午黄寿臣尚书督两广，朱嵋君中书与之偕来，作《南征赋》，凡数千言，词甚奇丽。中叙广州所见，有二语云：抱八尺之长枪，遵九衢而雅布。写欧罗巴人，情态如画，读之令人失笑”[①]，“陆鲁望诗有全篇平声者，皆五言也。友人叶天船衍为七言，亦殊清峭可喜”[②] 等，汪瑔分别从近人对古人的作诗之法的借鉴着眼，对不同诗人作诗的方式不同而诗境皆有新意，说明作诗并没有固定的准则可遵循。

其次，汪瑔认为诗歌与文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但二者又是有所不同。

在《旅谭》卷二中汪瑔对诗文间的关系有一精彩的论述：“诗文一理，而亦微有不同。郑小谷言：文如树，诗如花。杜季英言：作文须得山意，作诗须得水意。余则谓，树不必著花，花须求成树。山无云则气象近，水无风则波澜平。”在这个论断中，汪瑔首先肯定诗文一理，作诗之

① 汪瑔：《旅谭》卷二，光绪刻本。
② 汪瑔：《旅谭》卷五，光绪刻本。

法与作文之法有相似之处。接下来由郑小谷和杜季英二人对诗文不同之处的看法引出汪瑔自己的观点："树不必著花，花须求成树"，据郑小谷所言"文如树，诗如花"，即知汪瑔之意为"文不必著诗，诗须求成文"，诗文二者之间的关系即现。而"山无云则气象近，水无风则波澜平"，据杜季英所言"作文须得山意，作诗须得水意"，可知汪瑔意为"文无云则气象近，诗无风则波澜平"，这里说的又是诗文各自内部必须有一定的技巧和方法。这些技巧和方法又是因文体不同而有所区别的，但却是必不可缺的，否则"气象近"、"波澜平"，则平淡乏味矣。汪瑔的这两句结论分别从诗文之间同理而又微不同的角度出发，是对诗文相互间及其各自内在结构的理性思考，这也值得其他诗人在创作诗歌时借鉴。

汪瑔此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诗与文之间的关系，在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就曾对此有过争论。从陶渊明的"通文于诗"[①] 到韩愈、苏轼等中唐乃至宋人的"以文为诗"，诗与文之间相互关系该如何处理一直不断地有着新的认识和看法，而汪瑔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并且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也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节 清新为诗 隽永可味

一、诗主清新

在诗歌创作的语言风格上，汪瑔主张以清新自然为优秀诗歌的评判标准。从根源上来说，汪瑔的这种主张，其实和杨万里的诚斋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从汪瑔当时所处的诗坛现状来看，他的这种主张直接是对乾嘉诗坛上后期浙派诗的流弊而提出的。

在汪瑔的《旅谭》中，多次评价其所赞赏的诗歌为清新之作，如：

> 余所见研卿诗，皆其少作，然如幽潭鉴古心，空山龠人语。星辰历乱参朱鸟，江汉苍茫对白鸥（《黄鹤楼》）。春色醉人花是酒，留华

---

① 钱锺书："唐之前惟陶渊明通文于诗，稍引厥绪，朴茂流转，别开风格。"《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3页。

留客水如年（《扬州》）。皆词意清矫，亦足觇其才思也。①

元人戴石屏诗“春水渡傍渡，夕阳山外山”，句法清峭。②

岳坟诗自赵松雪七律一首外，杰构殊稀，烬馀稿中，《谒岳忠武王庙诗》云：感愤骑驴客，猖狂立马图，但从旁面、对面著笔，颇觉壁垒一新。③

陆鲁望诗有全篇平声者，皆五言也。友人叶天船衍为七言，亦殊清峭可喜。④

钱塘吴仲畇督部赴官黔中，道出相见坡，遇周雨亭观察，时由滇南入京师也，观察下舆，口占一诗云：“人间日月似飞梭，十七年来一梦过。相思岁岁不相见，相见今朝相见坡。”督部谓其词调清婉，以之入阳关小秦王调殊可歌也。⑤

汪瑔用“清矫”、“清峭”、“壁垒一新”、“清峭可喜”、“清婉”等来对其所赞赏的诗作进行评价，这些评价之词总起来说就是写诗要句法清新的意思。这样的评价标准，从根源上来说，是和杨万里的诚斋体的风格极其相似的。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歌清新活泼、风趣自然，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浅”，即语言浅俗、浅白，“用浅近自然的语言把他的所见所感表现出来”，“不用奇奥生僻的字句或矢矫奇崛的结构”，“却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直致和章法，近于口语”⑥。而汪瑔论诗的标准亦是如此。并且汪瑔在其实际创作中也是以此为标准来作诗的。

汪瑔在另一则记录他和王少香对袁枚诗歌的不同看法的条目里写道：“国朝七古诗最不以随园为然，一日，复及之，余举费宫人刺虎歌，少香曰：篇中一刀两刀虎犹纵，三刀四刀虎不动，是何等语？余曰：太白东海有勇妇诗，十步两躩跃，三呼一交兵，正随园诗所本也。少香曰：此姑以李诗藉口，下文城可倾，山可平，总是区区一点诚，区区七字，尚可谓之

---

① 汪瑔：《旅谭》卷一，光绪刻本。
② 汪瑔：《旅谭》卷二，光绪刻本。
③ 汪瑔：《旅谭》卷四，光绪刻本。
④ 汪瑔：《旅谭》卷五，光绪刻本。
⑤ 同上。
⑥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8 页。

不稚不俗耶？余笑曰：如此，则勿学之可也，痛诋胡为者？少香亦一笑而罢。"① 二人对待袁枚这种以平常语入诗的做法，持相互对立的态度，王少香认为袁枚的诗过于通俗，不类诗语，而汪瑔则对此解释说李太白也曾有过这样的通俗之诗，并且觉得即便是不赞同这种诗歌的语言风格，也没必要去痛加诋毁。在这里，汪瑔对袁枚诗歌语言的通俗是持肯定的态度的。虽然他不是特别明确地表示赞同，但是可以体会到他是认可袁枚这种做法的。袁枚深受杨万里清新活泼的"诚斋体"的影响，他说："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② 他反复强调诗人要"自出新意"，要"心精独运，自出新裁"。他推崇的自出新意，不仅是诗歌在构思立意上要新，而且在语言上也要清新。但袁枚对诗歌语言的要求是"活"："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③ 为避免语言的呆板乏味，甚至"辣语、荒唐语，亦复可爱"。汪瑔对诗歌语言的要求则与袁枚有所不同，他不是为了刻意求新而可采用一切语言入诗，而是要求清新自然之语。相对来说，汪瑔更注重诗歌作为特殊文体的审美性，而不赞同一切俗语都可入诗。

汪瑔主张诗歌应力求清新之语，也是对后期浙派诗以学问为诗，以考据为诗，多用典，用僻典，而致使诗歌语言生涩，沦为文字饾饤的弊端而提出的。"浙派诗自清初黄宗羲创始，历经康、雍、乾三朝，前后百有余年，涉及诗人数以百计，大小名家数十人，下开清中叶之桐城诗派、晚清之同光体或宋诗派，影响甚为深远。无论在清代诗坛上还是在中国诗史上，它都可以说是最大的诗歌流派之一。"④ 晚清宋诗派的创作手法与风格未超出浙派诗的范畴，而汪瑔则反对宋诗派的主张。浙派诗人领袖厉鹗临终前对其弟子汪沆说："予生平不谐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 而陈衍《石遗室诗话》中评宋诗派代表人物陈三立诗云："散原为诗，不肯作一习见语。于当代能诗巨公，尝云：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盖其恶俗恶熟者至矣。" 宋诗派与浙派诗相比，境界更为狭窄，汪瑔主张作诗应

---

① 汪瑔：《旅谭》卷五，光绪刻本。

②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 袁枚：《随园诗话》卷五。

④ 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 页。

以清新为主，而不囿于“纱帽气”、“馆阁气”。

在《旅谭》卷二中，汪瑔在表达对乾嘉诗弊的看法时，他很赞成蒋攸铦在《秋药庵诗集序》中的观点：“近世诗人，以归愚为祖钵者，往往拘于步骤，若骐骥困于盐车；服膺随园者，又往往流荡恣肆，无所底止”，认为“乾隆嘉庆间诗弊，此数语尽之”。可见汪瑔对于乾嘉间诗弊的认识是很清醒的，针对此两种截然相反的诗歌创作观念的弊端，汪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诗歌创作应以清新为主。

二、隽永可味

汪瑔认为诗歌作为抒情性文体，在抒情达意时要讲究韵味无穷，呈现出诗意的空间，这在他对别的诗人评价之中可以看到，如：

> 绝句以情致神韵为工，其以气魄胜者，绝句之变体。古人偶一为之耳。[①]
>
> 孟东野诗高卓坚苦，在唐贤中实能自成一家。后人学之者不少，概见伯时《捣衣吟》云：“乌啼月皎皎，蛩语风凄凄。离乡几千里，游子嗟无衣。捣衣夜苦短，砧杵那得缓。杵声不在砧，却在游子心。”步武溧阳，几于具体。其五七言近体，如“病肺妨名酒，饥肠出好诗”，“轻鸥浮水远，修竹绕村圆”，“相马但能分牝牡，听蛙何必问官私”，“千时颇悔书三上，遣兴惟凭酒一中”，此类数十联，皆能精心结撰，又“曳履定虫声，山向酒人青”，“秋风先冷异乡人，能耐饥寒即豪杰”，诸断句亦隽永可味。[②]
>
> 山阴朱越亭，道光中客游岭南，其诗词颇为人所称……越亭有七古短篇一首，失其原题，语颇超隽。[③]
>
> 玉仲有书林文忠公家传后诗，末四语云：“壮怀颇似景延广，雄略何如段纪明。功罪纷纷无限事，侧身天地未休兵。”不轻著议论，而微意故有在。[④]

---

① 汪瑔：《旅谭》卷一，光绪刻本。

② 同上书，卷四。

③ 同上。

④ 汪瑔：《旅谭》卷五，光绪刻本。

仲甫有《广州杂诗》十首，其第四首云："自昔金汤固，厓门复虎门。鱼龙随战舰，鸟雀避军屯。畴使藩篱彻，从教瘴雾昏。明时方重德，地险敢轻论。"起四语最为溥臣所赏，余谓不如明时十字有余味也。①

吾乡陈珊士比部寿祺所书横幅，即录其《庚申中闰春六日，同友人集慈仁寺看花分韵，得生字诗》……喜其词致疏隽，辄手录之。今见吴县潘文勤公所刻比部遗集中载此诗，乃分作四首，当是比部自定，然鄙意不若合为一首，篇中似更有波折也。②

妙语谁如樊榭生（先生自称樊榭山民，又自号樊榭生），梨花燕子句天成；偶然神似非形似，我爱江南杜季英。（"梨花欲暝初疑雪，燕子如人亦病寒。"季英句也。）③

由以上几则汪瑔对诗歌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汪瑔用"情致神韵"、"隽永可味"、"语颇超隽"、"微意"、"余味"、"波折"、"神似"等来论诗，这些词语其实都意味着诗歌创作应该隽永可味。

如在以上所列第二条中，汪瑔首先对孟郊的诗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诗歌"高卓坚苦，在唐贤中实能自成一家"，作为韩孟诗派的开山人物，孟郊以其独特的经历和思维写出了他对苦寒的独特感受，在他的诗歌中弥漫着浓郁的凄冷寒寂、幽僻萧索的氛围，与此相应的是在诗歌的艺术追求上，孟郊崇尚怪奇独造的风格，在作诗技巧上，他提倡苦吟，但其诗歌从整体上来说，新奇有余而隽永不足。但汪瑔在接下来对于时人学习孟郊的潘伯时诗歌进行评价，引用了潘伯时的一些学孟郊的诗句，认为这些诗句"隽永可味"。隽永即意味深长，引人入胜。暂且不论潘伯时的这些诗句是否能称得上隽永，但可看出汪瑔论诗的标准和主张。

在对陶仲甫的《广州杂诗》第四首进行评论时，汪瑔和俞溥臣的观点就大不相同。俞溥臣最赏识该诗的起四语，而汪瑔则认为不如"明时方重德，地险敢轻论"十字有余味也。这首诗的起四语颇有气势，溥臣论诗

① 汪瑔：《旅谭》卷五，光绪刻本。

② 同上。

③ 汪瑔：《读樊榭山房诗集四首》其四，《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2页。

以气势为胜，而汪瑔则对有余味的诗句更为欣赏。同样，在读厉鹗的《樊榭山房诗集》后，汪瑔所作的四首诗歌其四中，在对厉鹗诗歌的妙语连篇进行赞叹之后，表明了他对神似之作的由衷欣赏。一句“我爱江南杜季英”，貌似随意，其实却证明了汪瑔对诗歌创作中必须有神韵的诗学要求。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浙江杭州人，著有《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其诗多游览名山大川之作，以取法宋人为主，是清代雍乾时期“宋诗派”的代表作家。其诗多写山水，尤长于五言诗，清淡娴雅，孤情秀句，幽新隽妙，刻琢研炼，在神韵、格调二派外，别树一帜。“意境幽僻、词汇生僻，是其主要缺陷”[①]。汪瑔对厉鹗的作品很为推崇，但在具体评价他的诗歌时，他更认同杜季英的神似之作。这也是和他认为诗歌创作必须隽永可味的诗学主张相互吻合的。

① 赵杏根：《论浙派诗人厉鹗》，《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第三章

汪瑔的诗歌创作

汪瑔以布衣之士终其一生，无荣显之名，但却是一位有成就的诗词作家和学者。在他的创作中，诗歌占据着首要的地位，其婿朱启连说他“于文学无所不通，尤长于诗”其诗作数量约有1100首。他青年时期的诗就得到过著名诗人张维屏的赞许，并预言“他日必将于风骚坛坫中高置一席也”。其他前辈如陈澧、林昌彝等都推重之。而同辈的沈仲良、贾景芳、金武祥均对汪瑔诗多予称道。晚辈的文廷式论汪瑔云：“其为诗也，称物芳而志弥洁，出辞婉而情弥深，渊乎有忧世之心而在言逾孙，泊乎有高世之概，而与物无争。”① 可谓对汪瑔其人与其诗风关系的恰切评价。

第一节 汪瑔诗歌的题材内容

汪瑔的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他怀抱忧世之心，注目动荡变幻的局势，关心国家安危与民生疾苦；幕客诗人的独特身份，使他将难以消释的身世情怀以诗去倾诉；汪瑔待人真诚，顾重情义，与友人的交往酬唱成为汪瑔诗歌中的重要构成；岭南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滋养着汪瑔，他把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浸透到诗歌的岭南风情描写之中。

一、近代风云中爱国忧民的歌哭

汪瑔生活的晚清时期，灾祸深重，苦难无穷。首先是鸦片战争的外患，紧接着就是太平天国内乱，之后各国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阴谋和行动日甚一日。汪瑔的诗集中对当时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和广大百姓的苦难多有

---

① 文廷式：《随山馆猥稿》序，《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8页。

反映。汪瑔不仅仅是名幕客，更是一位爱国的诗人。他用真挚的诗人之心，谱写出一曲在近代风云变幻之下爱国忧民的篇章，表达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首先，在汪瑔的诗歌中有不少的爱国诗，表达出他对清政府面对列强入侵时所采取的妥协政策的不满，对抗击侵略者的爱国精神和英勇行为的歌颂。如汪瑔早年的《不战》：

> 不战远人服，时清万里同。怀柔明主意，镇静大臣风。细柳方坚壁，扶桑早挂弓。从来疆场事，有备即奇功。

这首诗作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时年诗人二十二岁，正当青壮年，这时，清政府刚刚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处于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阴暗之中。诗人写这首诗，不仅仅是对于之前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惨败的反省，也是对以后面对列强入侵时该采取何种措施的个人见解。第一次鸦片战争自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这次战争，英国先后出动军舰二十八艘，各种船只约八十艘，兵员总数约一万五千余人。以这样规模的一支军队，竟把拥有四亿人口和近九十万常备军的中国打败了。清王朝虽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可能动用的各种武器装备，却未打过一次大的胜仗，也未守住或克复过一个重要城镇，最后不得不与英方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政治、军事落后的国家，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的。因此，诗人发出“从来疆场事，有备即奇功”的感叹，这既是对前车之鉴的深刻反省，也是对当时腐败堕落的清政府的微弱呼声。在这次战争中，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当局昏庸无能，平时既不讲求治兵之道，也不深研战守之策。道光帝颟顸无能，主观随意，不了解战争的形势，时而言战，时而乞和，时而增兵，时而裁撤，弄得下面无所适从，严重地束缚了前方将帅的手脚。在诗人所生活的广州战场，英军侵入广州地区后，清军节节败退，而广州城郊的人民群众，却自动武装起来，用简陋的武器和农具等不断打击侵略者。广州北郊三元里一带人民的抗英斗争，更成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武装抗击外国侵略军的先声。但让人义愤填膺的是，当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正轰轰烈烈地进行之时，奕山等竟编造一套谎言，诡称英军乞和，并与义律签订了屈辱

的《广州和约》，欺骗清廷。昏聩自大的道光帝，也明知打了败仗，却于6月18日下谕，以“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证商”为词，默认了《广州和约》。“不战远人服，时清万里同。怀柔明主意，镇静大臣风。”这四句既表达了诗人对于“时清万里同”的升平的期望，又隐约流露出对所谓“明主”怀柔政策的不敢苟同。在同一年里，诗人还以同样的忧国之心，写下了《富国》：“富国需奇策，谈兵忆古风。忧劳烦圣主，爵禄在诸公。九府论圜法，三军望战功。储胥终有恃，未敢赞和戎。”一句“未敢赞和戎”再次申明了诗人对于清朝政府面对列强入侵、外患弥坚的局势所采取的政策的否定态度。

汪瑔晚年所作的《书事四首并序》也反映了他对于朝廷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的愤慨。这组诗主要是针对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在战胜的情况下，仍委曲求全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造成了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虽胜仍败，法国“不胜而胜”，败而反胜的结局所发出的感叹。此时的汪瑔已是垂暮之年，但他仍非常关心战争的进行状况。在谅山大捷之时，他曾写下《喜闻官军二月十三日谅山之捷》，表达他对战争取得胜利的喜悦之情。但在得知清政府在取得胜利后，仍然采取妥协的政策时，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既有对朝廷无能的痛恨，又有无能为力的悲叹，因此发出“怀柔今日事，不与汉唐同”的悲吟。

相反，汪瑔极力讴歌捍卫国家利益而奋勇杀敌的人，如他在《葛将军妾歌》中塑造了葛将军妾英勇杀贼的巾帼英雄形象，对这一女子视死如归的精神高度赞扬。该诗“末以沈云英、秦良玉比葛将军妾，这是别开生面的爱国诗”[①]。该诗的内容有不同的版本，其在结尾处有所不同。李春光编纂的《清代名人轶事辑览》中是：“归来肠断军门柳，犀铠龙旗亦何有？不作孤城李侃妻，尚留遗恨韩家妇。还乡著取旧时裳，粉黛弓刀尽可伤。风雨曹娥江上住，夜深还梦旧沙场。”[②] 而汪瑔的《随山馆猥稿》中结尾处则是：“归来恸哭军门柳，心与孤臣同不朽。只恨凝之海上军，不如李侃闺中妇。一样桃花马上身，蛾眉今古几传人。君不见同乡旧有萧山沈，异代犹夸石宝秦。”杨钟羲撰著的《雪桥诗话三集》卷十二第二十九页中，写到汪瑔的《葛将军妾歌》与《随山馆猥稿》中所收录的一致，

---

① 魏中林：《钱仲联讲论清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② 李春光：《清代名人轶事辑览（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0页。

可见李春光编纂的《清代名人轶事辑览》中所收录的当为后人篡改。由篡改前后的结尾，能看出汪瑔的原诗作中所表达的感情更为强烈。“只恨凝之海上军，不如李侃闺中妇。一样桃花马上身，蛾眉今古几传人。”对葛将军妾的英勇壮举进行歌颂，而对连女子都不如的官军表达了谴责和痛恨，体现出汪瑔爱憎分明的爱国情怀。

在《广州杂感八首客使院作》之七中汪瑔对当年奋勇抗击英军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表达怀念和歌颂：“蜃雾茫茫画不开，登临愁上越王台。故居闲访虞翻宅，新语无烦陆贾才。荒戍红旗寒自卷，高城画角暮尤哀。白头退卒斜阳下，闲话戈船破敌来使院有老人司洒扫者，邓姓，年七十余，自言尝隶尺籍，林文忠公擒义律时邓方在督标也。”

其次，是对战争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苦难的描写和深切感慨。中国文学史上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十分繁富，许多大诗人都曾创作出感人的作品。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既是由诗人所处的社会时代所造就的，也是长久以来文学传统滋养之结果。就文学传统而言，这类诗歌的渊源久远，早在《诗经》、汉乐府民歌、建安文学中就多有体现。其后在社会动荡的时代，富于良知的诗人们落笔于疮痍满目的现实，描写民生之艰辛以及战乱所造成的惨状，其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等。汪瑔对这一优秀传统自觉地继承。

如作于咸丰四年（1854）的《晚登九成台》：“向晚旌旗卷，深秋鼓角哀。西风吹客子，落日一登台。山势排云出，江流抱郭来。干戈方满地，愁绝菊花材。”在这首诗中，诗人概括地叙述了在其生活的时代，“干戈方满地”的社会现实，“向晚旌旗卷，深秋鼓角哀”，一个“哀”字，更是将诗人在面对着战乱不断的局势的心情展现无疑。按照常理来说，听到战鼓之声，该是充满振奋之情的，而汪瑔却觉得凄凉，可见他对战争，不管是何种方式和目的的战争，都持着不赞成的态度。但在这里，他还未对对战争所造成的景象作详尽的描述。类似这样的诗句在其诗集中随处可见。

在作于同年的《有感四首》中诗人写道：

九成台榭至今存，五岭山川此北门。险辟先秦传古郡，道通大庾接中原。高城俯水双江合，上将防秋万马屯。独客烦忧成左计，只宜风雨倒深尊。（其一）

浈阳南望忽烟尘，山县凋残寇垒新。中宿峡深烽照夜，浛洭江暗雾迷津。卖刀买犊非今日，发冢椎牛大有人。太息长公民事策，安民先在去奸民。（其二）

赤羽旗开待指挥，严城已报合重围。登陴慷慨孤军起，闻道艰难急檄飞。岂有吹笛堪退敌，可能闻笛不霑衣。援师旦夕来天上，消息传闻半是非。（其三）

秋色高楼意自惊，烽烟不见越王城（自注：余家在广州）。梦回南海云千里，心折西风雁一声。人为鼓鼙思将帅，天教戎马著书生。忧来未暇悲身世，斫地中宵古剑鸣。（其四）

咸丰五年（1855）诗人作《重有感四首》：

粉堞悲笳落日间，曲中杨柳不曾看。殊方兵气何时息，战地春风只自寒。帐拥貔貅诸将在，城空雀鼠小民餐。援军日久来吴楚，肯信群公破贼难。（其一）

井邑逃亡杼柚空，依然旗鼓耀元戎。诈降不解诛皇甫，剽略谁能禁石崇。义勇新军山右卒，储胥奇计晋阳铜。朝廷诏令多宽大，异日犹应策战功。（其二）

城郭萧条寒食烟，断无春气入戈鋋。棘门师老连营日，藤峡人思破贼年。天意终诛徐道覆，将才安得马文渊。官军珠海方乘胜，早晚南中吉语传。（其三）

琴剑频年悔远游，春来还上仲宣楼。天多风雨惊归梦，地有兵戈助客愁。盛宪留吴非得已，鲁连居赵本无求。田园寥落音书断，弹铗歌成感不休。（其四）

在这两组诗中，诗人以沉痛的笔触写出了战争所造成的萧条景象，诗人写这些诗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整个社会笼罩在浓重的战争烟云中。这个时候的诗人，感叹着“殊方兵气何时息”的担忧，面对“城空雀鼠小民餐”、“井邑逃亡杼柚空”，他无可奈何，只能懊悔当初的远游，但是凭着自己一介文士，又能如何呢？诗人心灵的惊悸和深沉悲哀，都融注在这些诗句中，让人深切地感触到诗人哀时忧民的精神脉息。

而在咸丰七年（1857）的《江行感怀英德道中作》中，诗人则以其

自身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诗中首先从诗人将乘扁舟之韶州写起，迎着朔风，忧从中来。接着“广州夙繁盛，民物夸昌丰”两句对广州城的往日繁盛作概写，然后就从与外来夷船的互市展开写广州的往日繁盛，这也为接下来写海上的生事作了铺垫。但是，很明显，诗人并不是把对广州夙昔繁华的描写作为重点，而是着力下面对近年风云突变的描写：“自从辛丑来，海气侵提封。大官老于事，长策资和戎”，“甲寅乙卯间，郡县纷寇攻。岂知丙寅秋，海舶来汹汹。帆樯逼庐井，炮矢飞艨艟”，“今年十一月，又见海上烽。孤军化猿鹤，战士成沙虫。重城十万家，奔窜一旦空”。这里通过往昔到今日的变化来写时事，既有反观历史的意味，又表现出诗人注目现实、惊忧时局的沉痛心情。接下来，诗人又写了自己当时以及亲人的处境，这个时候他“忽闻消息来，心如秋飞蓬”。“飞蓬”是蓬草的俗称，蓬草是一种枝叶似杨柳的植物，其根短浅易断，秋季枯干后，由于体轻，遇风根断，随风而走，因此中国历代文人常用“飞蓬”来表达身世飘零，无所依靠之象征意义，蕴涵着无奈、哀愁与悲叹。而汪瑔在这里也直接用“秋飞蓬”来表达他在面对战争之时的心情，可以看出他的切身之感，充满着凄凉的慨叹。

在汪瑔的诗歌中对晚清战乱的描写，满含着凄惨的感触，这是与其亲身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影像。从整体上来看，汪瑔创作的这类诗歌具有“史”的价值，可谓史中又不乏情，写得凄怆感人。

再次，在汪瑔的诗集中，也表达出诗人对于和平的渴望以及对前朝升平的怀恋。

在《初春杂诗》其六中，汪瑔写道：“中原戎马尚纷然，此地春风自管弦。休说江城灯事少，风光犹是太平年。”

该诗作于咸丰四年（1854），当时汪瑔二十七岁，是汪瑔出任五福幕客的第二年。从诗的题目可以看出是初春时节，此时汪瑔居于韶州，诗的首句从中原的战乱纷仍写起，接着写所在的韶州城却是一片春风荡漾的歌舞升平之状，在诗的最后一句，他写道“风光犹是太平年”，值得人去深思。韶州城万物复苏的春天，在诗人看来也不过是表面的太平罢了，“犹是”表达了诗人对太平年景的期盼，但是现实却未必尽如诗人所愿。该年的六月十一日，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在佛山镇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世称红巾军。二十六日，天地会起义军十余万人，围攻广州。汪瑔的父亲汪鼎死于广州，但当时正值兵荒马乱，归葬无期，只好埋葬在广州

小北门外的狮毬冈。战乱让汪瑔的父亲尸骨无法安葬，这也更让他感受到战乱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是无所不在的，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于和平的热切渴盼。

在写于咸丰十一年（1861）的《初春偶书二首》其二中诗人又从不同的视角，表达了他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依然吴剧喧车马，可有千家沸管弦。台省诸公无一事，今年应是太平年。"在1854—1861年这几年中，汪瑔亲身感受到了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1855年他的朋友徐荣统兵与太平军作战，阵亡于安徽祁门。同年，英舰进犯广州，相继占据沿江炮台，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汪瑔最好的朋友杜隽在战争中为飞弹所中，二十五岁即折首而殒。直到次年，即1858年，陈朗山寄诗来讲述其在江南经历战火，幸免逃身的惊险历程，并在该诗中提到杜季英的亡故，而在1860年八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九月，恭亲王奕䜣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这七年当中没有一年是太平的日子，而汪瑔自己也饱受了战乱造成的苦难，亲友的亡故，国土的沦陷，他明知道是不可能有"千家沸管弦"的场面的，但是心里仍然祈求"今年应是太平年"。

在汪瑔的一生中，对于和平的渴望都不曾改变过，在他晚年时期仍有诗歌表达他这种对和平期望的感情。如："升平知不远，衰老更何求。"（《旅愁十六韵》）该诗作于光绪四年（1878），时年汪瑔五十一岁，面对着鬓发已苍的自己，诗人只盼望着和平能够早日到来，其他别无所求，可见对于和平的期盼在诗人的心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

另外还有几首作于晚年时期的诗歌，则是表达了汪瑔对于前朝繁盛时光的怀恋之情，这实际上也表达的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战乱的厌恶之情。如：

> 阮公祠下路萦纡，讲舍人稀老树疏。忽记荔枝诗百首，广州全盛道光初。（《夏日杂诗六首》）
>
> 愿得年年腊半见，春色长似道光全盛时。（《日来晴暖已有春意》）
>
> 风暖三元日，云低百越天。野夫无事饮，海国太平年。玉烛非难睹，金旛亦自妍。会看民气乐，还似道光前。（《元日用辛巳韵》）

在这三首诗中，诗人都表达出对道光年间的太平生活的怀念之情。事实上，道光初年正值汪瑔的童年时期，他是出生于道光八年（1828），因此，对于道光初年的升平繁盛也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获得，并非切身感受。但是，道光初年的确战乱不多，汪瑔在这里也只是借对道光初年的太平生活的怀念，表达他对于和平的向往。实际上，汪瑔在对战争的看法上，也是希望官军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继续维持着相对和平的局势，在1885年2月13日，官军有谅山之捷。汪瑔特别作诗《喜闻官军二月十三日谅山之捷》[①] 以纪之，可见他还是对朝廷寄寓着极大的希望的。

二、幕客诗人身世情怀的抒咏

汪瑔因其自幼随父入粤和终生为幕的特殊经历，在其诗集中除了关注国运民生的重大题材作品之外，还有很多表现他面临现实中的种种遭际之时个人内心世界的诗篇，这也是深入研究汪瑔思想性格最好的依据。作为一名幕客诗人，对自我身世情怀的抒咏是其诗歌题材内容的一大特色。其诗集中对于自我内在情怀的抒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久客天涯，漂泊不定的故乡情结。

汪瑔为幕的一生，必然要随其幕主到处漫游，这不仅限定了他的行踪，更对其内心有着深深的影响。有家不能归，有乡无处觅的愁怀难以排遣，使他羁旅异地的客绪乡愁贯穿其诗集的始终。这类抒写诗人客居异乡的诗作，是其真情的流露，使人很容易体会到所表达的意旨。

中国的诗歌，从《诗经》以来便有着一个重要的主题："客愁"。随着朝代变迁，诗人由对客愁的表达继而深化为对生命存在状态的追问。对常年漂泊在外的诗人来说，故乡就是诗人真正的精神归属，也是诗人毫无着落的人生所向往的精神家园。汪瑔在其未出为幕僚的青年时期就有作客他乡的这种愁绪的诗作。如《三十六江楼》："萧然野色下黄叶，邈矣客怀随白鸥。他乡有酒不能饮，摇落山川何处秋。"是年，诗人才十八岁，就已经有作客他乡的愁绪，但在这个时候，诗人的所谓的客愁是因登楼而引起，有着少年人故作老成的成分。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也写下了一些相

---

① 汪瑔：《喜闻官军二月十三日谅山之捷》，《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8页。

似的诗句，如“年光随落叶，奈此客愁何”，“又是黄昏近，西风助客愁”[①]，“时序有变易，身世方浮沉。一叶飞梧桐，可怜如客心”[②] 等。

在汪瑔二十几岁所作的这些反映客愁的诗中，《夜宿电白旅邸》写诗人夜宿电白旅馆，“乱山”、“深树”之间，诗人只能望着一痕残月，聊以慰藉其思乡之苦的孤寂和无奈情绪。由写所见之景，融情入景，颇能动人心。其他几首，他对客愁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自我感悟为一羁留异地的客子，往往用“客愁”、“客心”、“羁旅”等词语直接表明他的愁绪，没能真正地融情入景。这样使诗歌显得浅显易懂，但是意境却不够深厚，诗中所营造出诗人的思乡愁绪表现得也不够细腻。

汪瑔对乡愁的感悟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越来越强烈，感触也越来越深刻。汪瑔从二十六岁出任幕客之后，随着幕主奔波往返于不同的地方，对背井离乡的清苦之愁体会日益深刻。从他在三十多岁所作的几首诗作中可以见出这种变化来，如 1853 年所作的《病起》：“旅客秋心黄叶似，江乡霜信绿橙知。新寒可是相欺得，渐觉清愁泥酒卮。”诗题为“病起”，内容则写的是诗人的乡愁，首句以秋天的黄叶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结合现实季节中的事物，更贴切真实。整首诗只写诗人的感觉，思乡之愁却婉转而有余味。而在《宜章道中四首》他又感慨“入春才几日，行役又殊乡”，这既是汪瑔实际行程的实写，又包含着他心底的情绪，不愿四处奔波，却又无可奈何的困境。至于《送仇敦父树本之扬州二首》则写得更为凄苦，“频年兵革惊蛮徼，此去江山近故乡”，“客中送客愁还绝，落叶西风雁几行”，在秋风渐凉大雁成行的时节，诗人送别友人返回故乡，而自己却仍是客居在外，那种凄凉感可以想见。

汪瑔转徙异乡的清愁，贯穿着他生命的始终，虽然他在诗集中也有写到“我居广州久，视之如故乡。年来客琼管，时复怀珠江”[③] 的诗句，但实际上客愁是伴随他终生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还写下“危垛试登临，西风惊客心”[④] 的诗句，因此，“客愁”对他来说，更是一种象征

① 汪瑔：《早秋杂兴二首》，《随山馆猥稿》，第 563 页。

② 汪瑔：《秋夜作二首》，同上。

③ 汪瑔：《还广州月余复有潮州之行，舟中感怀得二百字》，《随山馆续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3 页。

④ 汪瑔：《秋晚登北城》。同上书，第 688 页。

意义上的精神无处可依的体现。

第二，对自我生存境遇的矛盾心态，看淡名利，实而无奈的双重困境。汪瑔一生为人幕客，可谓沉沦下僚而终，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没能参加科举考试，在他的诗歌中，他多次以“诗人”来自我宽慰。

在《古榕屋杂诗二首》中他写到“能为寒士原奇福，便作诗人已不才”，谦虚地说自己能够做个诗人已经是不胜其才，而“百钱学得东坡法，日日斋头响画义”，点明了他想要沉醉诗书的原因——做诗人是最容易的事情。

在他二十五岁所作的《夏日病中杂诗五首》之一中写道：“新来瘦减苦吟身，习静耽闲总未真。失笑一斋如斗大，药烟影里著诗人。”诗人苦笑自己居住的空间“如斗大”，况且又是个“多愁多病”之身，更是凄凉，他只能自我安慰说自己只是一个诗人罢了。“习静耽闲总未真”则暗示着他的身不由己，自己所做之事也并不是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从这时起，已经流露出他真实的矛盾心态，看淡名利，清闲地做与世无争的诗人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在《杂诗二首》中汪瑔表明了他对名的看法：“人患不好名，虚名亦何好。标榜招愆尤，声华不须早。”这首诗作于汪瑔二十四岁，也是汪瑔对“名”的最早的看法，他所看淡的是“虚名”，并不是完全厌弃功名的。同时，对于那种标榜式的名利，他是反对的。因此在二十八岁所作的《偶书四首》中他感叹“年华历历余诗卷，世事茫茫付酒瓢”，年华匆匆逝去，仅留下一卷卷诗集别无他物，已经含着不满的情绪，而“平生尽著诗穷号，多事昌黎送鬼文”则是对诗人所作诗歌的价值和存在意义的质疑。

对于科举功名，汪瑔是十分矛盾的，在《放言二首》中他认为自己的不事科举乃明智之做法，诗曰：“古人诵诗书，初不为科第。各有千秋怀，岂为一得计。吾党二三子，颇复解此意。穷年经籍中，不就有司试。学人固当尔，亦复不足异。奈何流俗人，咄咄呼怪事。”他斥责那些一心贪恋功名之辈为“流俗人”，他们不理解汪瑔之所以“穷年经籍中”的做法而大惊小怪。汪瑔拿出古人诵读诗书的目的来证明自己现在不与流俗为伍的可取之处。同样在《戏成二首》中他又写道：“富贵辞吾辈，清寒足此生。万花诗骨艳，一月慧心明。常语皆文字，贫居有性情。故人太多事，为我讳狂名。”即便是清寒的日子，诗人也安贫乐道，只因“贫居有

性情”，可叹世人的冥顽不化，不予理解。他晚年所作的《漫成四首》中说“纵得千载名，不如一杯酒”[1]，对名利看得极淡。

但另外一方面，汪瑔对科举又不是完全反对的。1885 年，汪瑔之子汪兆铨以番禺县附学生员援例入籍应试中举人，1889 年其从子兆镛亦中举，汪瑔时年六十二岁，还特别作诗以表欣喜之情，并且说这是“儒门之喜气，先世之余庆也”。这反映出汪瑔对科举功名在内心深处还是认同的，只是囿于某些客观原因无缘科举。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规定：“童生入学，乃进身之始。督学文到，先期晓谕报名，取邻里甘结。身家无刑丧替冒各项违碍，方准收试。每府各州县，关会一日同考，府试亦汇齐一日，以防重冒。”[2] 冒籍是为避免外地生源挤占本地学额，对考生的报名资格进行审查，应考的童生必须先到本州县的礼房报名，填写姓名、年龄、籍贯及三代履历。除此之外，还要核对口音，以判断是否为本州县人，或是否已入籍达二十年。汪氏族人来粤而未入粤籍，不能在广东参加科举，他们若要应考，只能返回山阴。汪瑔自幼随父来广东，约在清光绪元年（1875）入籍番禺捕属司，是汪氏家族中第一位加入粤籍的。汪瑔平生未曾离开岭南，因此早年的汪瑔就是想应考科名，也因为律令的规定没有资格考取。直到他晚年时，才捐纳得到监生的功名。但他在《述怀十二韵》中写到“心事千秋冷，功名一叶轻”，“心事”指的就是他的志向，如今已是知天命的年岁，对功名就看得比较淡了，这也反映出汪瑔也曾有过争取功名的想法。因此汪瑔才终生没能踏入仕途。

对为宦还是为诗人，汪瑔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又不是不可调和的。在诗歌中他更倾向于自己为诗人的身份，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汪瑔首先是要做一个有性情的诗人，功名只不过是内心深处的一个向往。纵然无法实现，也没有特别大的失落。

第三，对年华易逝的感慨。生老病死是人无法抗拒的历程，但每个人对此所持的观念却会有极大的不同。有洒脱旷达的人，有忧愁满腹的人，汪瑔则是旷达不足，忧愁未盈。在其诗歌中，虽然有表现欲有所作为、报

---

① 汪瑔：《漫成四首》，《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80 页。

② 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八十六《礼部·学校·童试事宜》，文海出版社 1991 年版。

国忠君的志向，但仍有大量抒写对年华匆匆逝去而自己却无所作为的喟叹。

咸丰元年杜仲容在京师，汪瑔特别作诗给他，在诗中表达了对友人的希望和激赏之意，“男儿三十当封侯，快意且作长安游。桑弧蓬矢自有志，驽马伏枥非吾俦”。这不仅是对友人行为的赞赏，也是他自己内心渴望实现的愿望。在汪瑔四十七岁时，辛中仁将通过海路去往天津，汪瑔在为他送别的诗中又寄托了厚望，“布衣报国心，期汝终不变”[1]，将自己满腔的报国之志，寄寓在友人身上。光绪十年，汪瑔已年届五十七，他在为晚辈文廷式送别时还劝勉他“报国非徒在文字”[2]，希望他能够在京都有一番作为。

虽然汪瑔胸怀着报国的壮志，但在现实中，他却长期为人幕客，充当着无关轻重的角色，因此，在诗歌中他不断吟叹青春流逝，壮志难酬。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在行至清远的舟中回忆少年时期和卢秋坪夜雨联句的情景，不免感慨“旧句重吟感不支，天涯容易鬓成丝”[3]。按照实际年龄来计算，此时的汪瑔正值人生的蓬勃时期，但是因为漂泊不定的羁旅和身不由己的事务，他却感慨生命的转瞬即逝，生出凄凉的感觉。而在他三十岁所作的《偶书四首》其一“一笑封侯输骨相，男儿三十一蹉跎”，对自己无缘为官报效国家的命运自我解嘲，感叹自己三十年来一事无成的无奈。而在该诗的其三中他又写“未妨生事日萧条，豪气如云已渐销”，青年时期的壮志凌云已经随着阅历和年龄的渐增而日渐消沉，“也识清时无弃物，不才只合老渔樵”，表明了他今后的人生追求，甘心老于深山幽林之中，不再过问世事。在汪瑔生命的后期，他创作了大量诗歌表明他与世无争的心态，这在后面汪瑔诗歌艺术特色的转变中有具体论述。

在表达对时光易逝的诗歌中，汪瑔在很多地方以头发的变白来作为感慨的缘起。在《旅愁十六韵》中，他用“朋旧多黄土，年华易白头”，而在《沈吟》中他又写道：“青衫知己泪，白发旅人心”，在他六十二岁所作的《漫与四首》中则写得更为凄楚，“鬓有垂丝纷黑白，身如槁木谢青

---

① 汪瑔：《送辛大中仁航海之天津》，《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8页。

② 汪瑔：《送文芸阁孝廉廷式泛海入都》，同上书，第667页。

③ 《春夜雨中秋坪述壬寅春清远舟次夜雨联句事忽忽十载矣》，同上书，第585页。

黄”，将人到老年的身体变化描写无遗。1888 年，六十一岁的汪瑔在写给舒棠陔的诗中感慨“但愧年衰才力退，不堪泚笔序三都”[①]，年老力衰，连为友人的诗集作序也无能为力了，这尤令其痛心。汪瑔不厌其烦地在诗歌中写到身体的衰老，这是他的心理状态的反映。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入幕就感慨人生的短暂，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对无法抗拒的生命衰老饱含着无尽的悲戚之情。

时光的流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每个人又不希望生命就此匆匆蹉跎而过，因此对韶华易逝的感慨是千古诗人常吟不变的主题。汪瑔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在诗歌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由此也能更清晰地理解其心态的变化。

三、赠怀友朋的深情吟唱

在汪瑔的诗集中，直接以赠、寄、送等为诗题的作品，共计 216 首，占其诗歌创作的五分之一多。这些与友朋相互赠答之作，充满着深切的真情实感，既表达了汪瑔与朋友相聚时的欢欣，离别后的思念，又反映出在晚清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时局下，诗人对朋友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担忧。同时，诗人对朋友临别时的祝愿和期望，对朋友人格的赞赏，也是诗人内在品格的折射。通过对汪瑔交游诗的研究，不仅可以展示晚清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中诗人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在乱世中漂泊游幕的诗人的人生历程，而且进一步揭示出汪瑔交游诗中蕴涵的自我形象和情感特质，以及对他的整体诗风的影响。

（1）表达朋友相聚时的欢欣与感慨的诗歌

汪瑔一生为人幕僚，追随其幕主四处游历，常年漂泊在外，自然更无法与朋友有长期的相处，因此，他与朋友的交往总是聚少散多。相聚时的欢愉就显得弥足珍贵，在他的诗歌中不乏表现这种朋友相聚情形和心情的诗作。

在汪瑔没有出去为人做幕客之前，他的生活圈子主要是与朋友诗酒交游唱和，这个时期与朋友的相聚主要是纯粹的诗文之会，并无太多人生的感慨在其中。因此，在他出任幕僚之前，他的诗歌中没有赠别的诗歌，只

---

① 《秋日雨中得舒棠陔韶州书并见怀诗赋酓四首》，《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78 页。

有一些与朋友唱和赠答之作。

在汪瑔早年创作的其他与朋友相逢的诗歌中，也能看出诗人早期与朋友相聚时的概貌，如《早春多寒喜溥臣季英见过》："何处吹箫唤卖饧，东风犹欠一分晴。春寒深巷稀花事，客到闲门喜屐声。麈尾互操才语隽，蝇头亲写小诗成。墨巢亦是流连物，茗椀薰炉总有情。"在这首诗中，诗人表达了友人到访的喜悦之情，虽然还是春寒未尽，花事稀少的初春，但听到屐声便知友人到访开怀的那种欣喜，跃然纸上。"麈尾互操才语隽，蝇头亲写小诗成。墨巢亦是流连物，茗椀薰炉总有情"，则十分明确地交代了诗人和朋友相逢吟诗品茶的乐趣所在。

类似这样的诗歌，在汪瑔早期的诗歌中，还有不少，如《十二月望夜溥臣见过》、《尺五斋与杜仲容友韦季英隽昆季夜话》、《秋夜同季英》、《正月五日偕卢竹楼、秋丞、葵生、承检昆季游郭北离明观》等。

在汪瑔入幕以后创作的诗歌中，与朋友相聚的诗歌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表达朋友久别后重逢的喜悦之情的，如《喜竹邻归自南海》、《喜朗山至》；另一类是写朋友相邀饮酒或登山之作，如《感旧行同松谷饮酒》、《玉仲招饮酒半作两生行赋畲》、《自来肇庆，李恢垣吏部光廷、林子鱼太守直、邱拱庭大令鸿星、卞石卿别驾心培、鲁小庭经历肇乾、孙福田公子明庆排日置酒见招，率成长歌，呈同诸公集》、《咏帆自肇庆归偕至酒家小饮》等。

前一类诗歌，着重突出汪瑔随幕主客游异地时，朋友到访的欣喜之情，其中也有对于当时朋友因时局或个人原因天各一方，难得相见的实际情形的描写。如《喜朗山至》在前面的小序里就交代了陈朗山的一些情况，"朗山为通州学官，凡五年。通州距京师及天津皆不远，朗山数岁往来，以海运事议叙得知县。今年丁内艰，还岭南，遂来肇庆。"说明了陈朗山来肇庆的原因是因"丁内艰"，若不是因此，可能朋友还难得相见。在诗歌中，诗人首先对陈朗山的经历表示感叹，对于这次相见，汪瑔则认为"相逢賸觉秋光好，绕郭晴岚且共看"，这么一句平淡的诗句，朋友的到来连秋色都觉得更好，那种不可言传的欢喜，无法形之言表，只能借说秋光更好来表达。而对此时的相逢，汪瑔并未用朋友相聚，共饮美酒狂歌来形容，只是希望能够一起欣赏这新晴过后的流岚也是种别样的情怀。这与年少时友朋相聚狂饮高歌，共听夜雨，闲愁满怀自然是不同的境界。

后一类诗歌，虽是写与友人相聚饮酒，但其中的感情与诗人未出幕之

前相比，感慨更深沉。如《自来肇庆，李恢垣吏部光廷、林子鱼太守直、邱拱庭大令鸿星、卞石卿别驾心培、鲁小庭经历肇乾、孙福田公子明庆排日置酒见招，率成长歌，呈同诸公集》中，汪瑔先从友人自千里之外来相聚写起，接着道“友朋文字致足乐，一旦增我狂奴狂”，汪瑔自己，因朋友的相聚才使自己倍加清狂。紧接着，汪瑔以魏收和杜甫的两个典故融入诗歌中，“魏收未害轻蛱蝶，杜甫安知翳凤凰”感慨“年来我向穷荒走，往往持尊苦无友”的孤独感。原本是朋友的相聚饮酒，汪瑔却因自身的经历，顿生感慨，年岁渐增，而朋友却飘零天涯，自己始终是孑然一身、作客他乡的孤寂落寞之感油然而生。

汪瑔自二十六岁出任幕僚之后，长期经历羁旅漂泊的无奈和孤独，在他后期诗歌创作中对朋友相聚时的感触愈发深刻，并且在相聚的欢愉之时往往伴随着同病相怜的悲戚感。如《舟中同溥臣作》：

> 江上寒如此，吾曹方远行。青天开峡色，白雨走滩声。岁宴尤为客，时危未息兵。同君一尊酒，聊用慰劳生。

这首诗作于咸丰七年（1857），时年汪瑔三十岁，在这一年里，他辗转往复，而时局也颇不太平，他在去往韶州的旅途中写下了《江行感怀英德道中作》，对当时的外患来侵的局势，作了详尽的描述。诗中还写到自己的母亲，迫于战乱，不得不迁居到江边的茅屋居住，诗人感慨“骨肉离乱间，何意能相逢”，期望着圣朝“终当灭鬼方，更见会时隆”。咸丰六年（1856）年英军再度进犯广州，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开炮轰击广州，次日广州沦陷。二十一日，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军所俘。二十五日，巴夏礼等开始统治广州。这个时候的汪瑔正在去往韶州的船上，他与俞溥臣同舟，作了上面的诗歌，感慨岁末仍然作客他乡，只能“同君一尊酒，聊用慰劳生”，朋友的相聚充满了辛酸的相互慰藉。在这年的除夕，汪瑔是在平石和蔡光斗、冒澄一起度过的，《平石度岁同蔡光斗荣奎冒哲斋澄》中抒发了诗人有家不能归，只能以“且喜山村酒易赊”来聊以慰藉，期望着“今宵有梦各还家”的幻梦。正因为有朋友一起，才使汪瑔能够在颠沛不定的为幕生涯中得以宽慰。

（2）送别诗

古往今来，在诗歌史上送别都是创作的一个常见主题，从初唐王勃的

《送骆宾王之蜀中》“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旷达，到盛唐大诗人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壮怀，在友人即将远行之时，用诗歌来为朋友饯行于文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汪瑔也不例外，因其特殊的职业和所交往朋友的身份，使他对离别的感触尤为深刻。在汪瑔一生创作的送别诗中，既有对朋友即将远行天涯的担忧，也有对友人人格的赞赏和对朋友未来前途的美好祝愿。

首先，汪瑔送别诗中不可避免地有离别时的伤感情绪。如《送十三兄之信宜二首》其一：

风吹紫荆树，花叶多参差。兄弟寄异乡，乃复逢别离。去年秋七月，见君圭山陲。今年冬十月，别君珠江湄。骨肉幼暌隔，相闻不相知。长大一识面，又复当临歧。风高绝岸动，天阔空江迟。与君此为别，明日长相思。

此诗作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诗歌先从广东特有的景物“紫荆树”写起，花叶参差相间，在秋风的吹动下，更能引发离别之人的愁绪，继而写了他和十三兄异地相逢，匆匆又别离，只能相互感喟“明日长相思”的无奈。

而在《送溥臣之肇庆》中，汪瑔则把这种离别时的愁绪淡化为简短的绝句，“三十六江流，西风一夜秋。秋潮三百里，送客到端州。”该诗先从三水的三十六江写起，三十六江即西、北、绥三江的支流之和，三十六江奔流而下的形势可谓声势豪壮，但紧接着却是一夜西风吹来了秋的愁意，偏偏这个时候又逢着“送客到端州”，似乎是秋潮将朋友远送，在这里没有悲戚的伤感，而是将离别看得很淡然，这虽然是汪瑔早期的送别诗，但是也和其后期以及其整个诗歌创作的特点有着相似性。

汪瑔在这些送别诗中，主要表达的是与朋友分别时难舍难分的深情和对人生聚散无常的感慨。在《送竹邻之河源》中汪瑔以无奈的笔触感叹：“人生离合如云萍，世事推迁忽风絮。劝君别酒君毋辞，明日相思满江树。”诗人此时此刻因朋友将远行而生出人生离合实如天上的流云，水中的浮萍一样变幻无常，飘摇不定，内心深处对世事变迁的无可奈何油然而生，但还是故作旷达地告慰朋友饮了这杯离别酒，还有明日你我深厚的思念之情盈满这江畔之树。由表达世事无常的惆怅转入对友人的慰藉，其实

也是诗人对自我的安慰。但这种貌似豁达的感情在《送静山还苏州二首》中就暴露出了本来面目。这两首诗写道：

> 远道还乡愿，殊方久客身。天能怜逆旅，君竟作归人。生计田园好，深情骨肉真。频年蓬累感，何似在家贫。
>
> 带甲连乡里，艰辛有岁年。风尘知客苦，兵革幸家全。花发三吴地，山低百越天。他时重回首，南望足蛮烟。

汪瑔其实在感情上并不是一个豁达之人，在这两首送别诗中，可以看出他对朋友将归故里，而自己却仍在天涯漂泊的痛苦挣扎的心态。“远道还乡愿，殊方久客身”，“久”说明了作客他乡时间之长，更显得此刻能回乡的不易，“天能怜逆旅，君竟作归人”，“竟”字更表达了此刻诗人的心情，友人突然将归乡，既有对友人归乡的向往，又有友人若走，只留自己一人的苦闷在其中。这与其在咸丰七年（1857）所作的《送仇敦父树本之扬州二首》中的“客中送客还愁绝，落叶西风雁几行”是同样的感受。

其次，在送别友人的感伤之余，这类诗歌中还寄寓了汪瑔对即将远行之友人的美好期许。如《送十三兄之信宜二首》其二：

> 相思夫何如，落日满江树。山川望迢遥，君当从此去。去去不可留，士节在寒素。虽无陆贾金，勿作王粲赋。古来贤达人，大抵出韦布。努力崇修名，浮荣复何慕。

汪瑔先从一般送别诗的表达相思写起，对十三兄即将离别的事实进行交代，然后就是对十三兄去信宜之后的诫勉之语，“虽无陆贾金，勿作王粲赋。古来贤达人，大抵出韦布。努力崇修名，浮荣复何慕”。“虽无陆贾金”，源于“陆贾分金”的典故，《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孝惠帝时，吕后专权，陆贾“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以好峙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①。后用来指官吏退休后安排家业，平分家产与子孙为生计。在

① 司马迁：《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第37》，中华书局1975年版。

这里汪瑔用此典故，反用其意，安慰十三兄，即便没有陆贾那种财富，但也莫作王粲那种穷途失意状，应该做的是“努力崇修名，浮荣复何慕”。这是对十三兄的期许，希望他该努力树立良好的声誉，而不是汲汲于凡俗的物质欲求。而在咸丰八年（1858）的《东莞遇仲容即送其试官广州》中汪瑔则直接对杜仲容的前途作了预祝：“君今谒东阁，且复歌南陔。娱亲要循吏，为治需通才。愿君树桃李，我久安蒿莱。病骥聊一鸣，躞蹀看龙媒”，他因自身的疾病等原因而安于蒿莱，而杜仲容却有幸能拜谒东阁，汪瑔对他自然寄寓了很大的期望。这与《送十三兄之信宜》中的背景有所不同，虽然表达的期望是相似的，但在表达的时候有所不同。

在这类送别诗中对友人未来表达美好期许和祝愿的，最深刻的就是在他送别陈朗山的两首诗中：

> 佗城杨柳不堪折，庾岭梅花复愁绝。闻君将与计吏偕，请赋长歌一为别。别君还认孝廉船，遥指长路安八千。南海衣冠看此日，西京礼乐盛当年。重游京国休辞远……绩学储材自有真，看君意气已殊伦。文章董贾追前辈，词赋曹刘许替人。分明五凤楼中手，定许才人得天厚。明年三月杏花时，一盏遥飞曲江酒。阿房一赋有人知，四十登科未是迟。但愿词章归实用，好持经术报清时。我生梦不关青紫，少壮百为无一是。自分江湖老此生，惟将廊庙期知己。知己平生无限情，语君珍重送君行。儒林文苑千秋业，水驿山陲万里程。（《送朗山北上》）
>
> 东风吹大旗，画角皆春声。楼船下江浦，有客从军行。男儿好身手，戎马多功名。何能老佔毕，默默充经生。陈侯南国彦，声华动公卿。仲舒不射策，杜牧能知兵。平生有壮志，酒阑益纵横。此行试其端，要使烟尘清。宝剑为君赠，玉壶为君倾。行矣善自爱，努力看升平。（《送朗山从军》）

这两首诗分别作于1852年和1859年，《送朗山北上》是陈朗山将北上京师，“自分江湖老此生，惟将廊庙期知己”，就明确地表达了汪瑔对陈朗山的极大期望。而在《送朗山从军》中则更明显，该诗作于1859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前夕，陈朗山作为一名八旗汉军的将领，为国家安危而战，自然是难免的，这首送别诗对陈朗

山戎马生涯效忠朝廷的肯定和赞誉洋溢在字里行间。1867 年汪瑔四十岁时，为玉仲入京所作的《送玉仲入都》写道：“南风盛夏河流黄，长安近天道路长。故人束书走相别，万里北行趋帝乡。桑弧蓬矢夙有志[1]，奇侅讵肯拘寻常。排风既尔具毛质，掣电自合驰康庄。君生二十有七载，志意与古相颉颃。陆机弱冠擅词赋，杜甫结交多老苍。康成太邱作模楷，林陈朱沈通连墙。平生师友互？切，已富议论能文章。此行况足扩闻见，逾越五岭浮三湘。更从河洛入燕赵，中原形势森开张。……临歧惘然一执手，愿君行己如圭璋。相期著述见金海，更祝姓字贡玉堂。友朋知己不易得，关河异日遥相望。吾诗拙直要有意，君虽行矣君毋忘。”玉仲是汪瑔幕主五福的次子，此次入都应该是应顺天府乡试，这是明清时代科举制省一级的考试，乡试在秋天举行，故又称秋试或秋闱。在这里汪瑔送其入都的时间是在盛夏，广州距京师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路程，时间上来说也相吻合。另根据陈澧《东塾集》卷三中《送蕴玉仲赴顺天乡试序》中记载：“举天下之人重科第，必谓科第不足重，吾不为是言，但谓科第由人重，勿使人由科第重耳。人由科第重，则科第愈重，人材愈衰。人材既衰，科第又乌能重之？蕴君玉仲赴顺天乡试，是将得科第者。玉仲为响亭太守之贤子，小谷先生之高弟。父，良吏也。师，通儒也。玉仲少年英特，探经史之学，能为文辞，以人材论，宜得科第。且玉仲家本旗籍，不由科第，亦可以出仕，然必求科第者，以科第为世所重耳。”陈澧对玉仲的入都应乡试之举也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汪瑔由衷地称赞玉仲有“桑弧蓬矢”之志，而此去京师，只能远隔着万水千山，遥相思念，但是诗人还是希望玉仲能够继续坚持其高洁的人格理想，并且祝愿他能为国家作更多的贡献。

汪瑔一生足迹未逾岭南，因此在送别朋友离开岭南之地，远行他乡时那种离别的情绪就更为浓厚，友人一去不知何时再相见的感伤，知己飘零天涯的痛苦和无奈之情真挚而深刻。同时，他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朋友身上，对朋友的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期望，并且对友人能够背井离乡去建功立业作极高的赞扬。

（3）怀人诗

汪瑔是一个非常注重感情的诗人，尤其是与朋友之间的情谊，他曾有

---

① 古代国君世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期其有志于远大。后因以“弧矢”喻生男孩。亦指男子当从小立大志。陆游《对酒叹》：“男子之生桑弧蓬矢射四方，古人所怀何磊落！”

《结交行》可视为他与朋友交往的一种态度，诗歌写道："白者璧，黄者金，结交结面不结心。青天晦冥白日阴，大海之水犹未深。山可平，石可转，星辰万古光不变。天中有月两心见，结交结心不结面。海水何茫茫，星辰自云高。霜禽夜警求其曹，麟凤虽独处，不与鹰犬交。万物有族类，慎尔漆与膠。君不见，橘化枳，荃为茅，古贤于此多忧劳。"他对朋友交往要求以知心相见，因此在他的诗集中除了表达与朋友相聚和离别的诗作外，还有表达对天各一方的朋友思念之情的怀人诗。

在汪瑔早年的诗歌中就不乏对朋友的怀念之情的作品，如《次韵寄王少香樾》、《七夕寄俞溥臣洵庆》、《次韵畬姚习庵德传》等。在这些怀念友人的诗歌中，汪瑔不止一次地表达对朋友往昔相聚时的情形的忆念，"相思丁卯桥边路，料得吟诗似许浑"，即便是平常的桥边的小路，都值得诗人去回味。而在《七夕寄俞溥臣洵庆》中，汪瑔则用了大量的笔墨回忆以前和朋友共度七夕节的情形，"牵牛花碧沁仙泪，蚕茧如烟记前事。仙城此夕羊灯明，有客铜街共扶醉。新词一幅芙蓉篇，七襄欲夺霞机鲜。衣香扇影相蝉嫣，可惜不遇鸾軿仙"，而如今却是"故人相望隔微波，仿佛银河水清浅"，想念却无法相见的忧伤，只能借助书信，"寄君一尺双锦鲤"，带去对友人的怀念之情。而在《次韵畬姚习庵德传》中，汪瑔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怀，"茶檣酒幔都零落，一夜相思托绿波"，这里的"绿波"和之前的"锦鲤"都是书信的代称，也是诗人用以向友人传递其思念之情的工具。

但随着年岁渐增，汪瑔的怀人诗也随着阅历的增加而与其早期之作在内容和感情基调上都逐渐产生着变化。最为独特的就是汪瑔在三十二岁（1859）所作的《春日怀人诗十八首》，在这组诗的前面有一个小序，交代了汪瑔之所以作这组诗的缘由，小序写道："平生朋旧无多，而风絮云萍，动成间阔，一星客冷，三月春深，偶忆知交，辄深怅惘。雨窗无事，拉杂成诗，意到即书，不复编次，己未寒食前三日。"从这个小序里，可知该组诗作于寒食前三日，正是春末，这个时节本来就容易引发诗人的愁绪，而恰逢"雨窗无事"，则更为诗人作这组怀人诗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该组诗的第一首主要是对今年来友人的近况作了总体上的叙述，诗云："忆远伤春感不休，客中风雨一登楼。故人踪迹粗能说，戎马江湖各自愁。"此诗先从汪瑔自身写起，因春深而伤感朋辈江湖漂泊的无奈。接下来的十六首分别写了汪瑔的师友共计十七人，除第十二首是一首诗中写了

两个人之外，其余则每首专写一位。

在这些怀人诗中，汪瑔对朋友和师长的人格和才能十分欣赏，通过对朋友的赞赏而表达思念之情。如其十七写卢秋坪，“手谭三品君最善，头责一篇吾未能。难忘得秋亭上住，半枰冷玉一窗灯”，先称赞卢秋坪，并自愧不如，接下来就是对往昔同住秋亭，雨夜对弈的追忆和怀念。而其八写对吴星侪的怀念亦是如此，诗云：“吴郎才调偏清妙，好作渔洋嫡派诗。坐对东风忽相忆，落花飞絮送春时”，一二句都是对吴星侪诗歌的评价，后两句才转而表达对其相忆之情。但是，在这组诗中，汪瑔表达的对友人思念之情并不是很直率，而是很含蓄的。如其二写怀念谭力臣，“谭公文笔老弥苍，一别居然七载强。斑竹崇兰无限思，因君诗梦落潇湘”，写其文笔渐老却弥苍，即便是在相别七年有余之后，掩卷而思，让人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他诗篇中的情思飘荡到潇湘之畔。这里写对其怀念，不是直接写，而是从对其文笔和诗情的回味来宕开一笔，其中饱含的感情更有余味。其七和其十二则包含的感情更为含蓄，若不是列在怀人诗这里，几乎可以当作是单纯的记人诗。因为其七“破费蛮州纸百番，诗逋画债太频烦。只应一事强人意，鬓影春风写韵轩”，写俞溥臣只是对他生平所爱之事及其烦忧作了描述，其十二“张家兄弟太奇绝，弟走从军兄授经。等是他乡未归去，愁人春草一袍青”，则是对张楠、张权昆季的赞叹，很难看出汪瑔所要表达的怀人之意。但从汪瑔在这两首诗中所选取的角度和语气，能够看出他对这些朋友的理解和敬佩之情。

最有意思的是在这组怀人诗中，汪瑔还采用了疑问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多年不见的恩师的思念之情。如其四“回首师门一惘然，三吴兵革几经年。不知近日常州住，可有坡公二顷田”，从侧面来表达思念之情，着墨虽淡，却语浅情深。在其十五“与君相去二十里，乘兴有时能一来。客里无端三日雨，屋前添得半弓苔”，写对陈朗山的思念之情，也采取了侧面烘托感情的手法。先从旧日与朗山相处，能够乘兴相见，而后两句则写的是汪瑔此时此境，看似互不关联，实则是大有联系的。后两句写连日的阴雨，使得诗人屋前的苔痕都生出来了，这实际是说因连日阴雨，独居室中，却无人来访的孤独，与前两句与朗山能乘兴而聚形成鲜明的对比，继而更加引发了诗人对旧时友人的思念之情。

晚年的汪瑔因自我性格随着阅历的增加而跟年少时有所变化，在其寄怀友朋的诗歌中，更多的是他自我心迹的表露。他在五十二岁（1879）

年所作的《读书》诗中写道："少不事科举，弗向场屋趋。老不事著述，弗望名山储。聊用适吾意，未尝为所拘。一笑谨谢客，吾殆真书愚。"汪瑔明确地表达了他只希望顺应自己的本性，谢绝宾客，甘心做一个不为世事所牵绊的书愚。当然不排除这里面有他自嘲的成分，但从另外一首他五十四岁时所作的《听雨有感四首并序》中也可见出他晚年性格的变化。这首诗的序中写道："鄙人少壮，旅游三十余年，山陲水驿中，数为风雨所苦，舟行则荒江野岸，黄芦苦竹之与为周旋也。陆行则空郊绝壑，青林密菁之莫知止宿也。忧劳惊悸，殆不可一二数。然尔时意气方壮，不之悔也。至同治戊辰，一病之后，体气顿弱，始渐以跋涉为苦。比年客广州使院，因卜一廛于越秀山之麓，稍息舟舆登顿之劳，而精力则已衰矣。今日雨窗独坐，竹树萧飒，闻听感触，率成小诗。嗟夫！光绪辛巳三月五日。"综观汪瑔的诗集中有序的不多，而如此详细地交代作诗之缘由的更为少数。这个小序其实就是汪瑔个人心迹转变的自我表达，他交代了自己从年少时的"意气方壮"到同治戊辰四十一岁的"一病之后"，因个人体气、精力的不足，渐渐不堪舟车劳顿之苦，因此希望能够在越秀山之麓筑一茅屋安享晚年，其实居于何处对汪瑔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心态，因年岁渐衰而逐渐有退隐之心。现录该诗其中的三首：

几度山程与水程，星餐烟语足生平。白头尝遍江湖味，才向茅斋听雨声。（其一）

浪高曾泊荒江岸，路暗还寻野老家。今日闭门嗟老矣，关心犹有小庭花。（其三）

检点残衫旧酒痕，倦游心绪不堪论。可能老作村夫子，细风斜风不出门。（其四）

在这三首诗中，汪瑔反复地诉说着"白头尝遍江湖味"之苦，以求晚年能"才向茅斋听雨声"、"关心犹有小庭花"、"细风（疑为"雨"之误）斜风不出门"。这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不愿再为生计或世事到处漂泊劳苦，而要归隐山林，与自然同化，关注自我内心，他的思想转向了道家的清静无为。这是种阅尽人间沧桑和体味遍人生疾苦之后的脱俗心境的流露，也是诗人内心深处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因而与他晚年这种心态转变相应的就是在写给友人的诗歌中，也时常流露出此种心态。如其晚年

所作的几首诗云：

卅载江湖两鬓丝，旅人踪迹故人知。竹梢芦叶浈阳峡，记得低篷听雨时。（《雨夜示玉仲二首》其二）

越井冈前蔓草黄，西风天末远相望。故人梦隔沧溟月，旅舍秋深碧树霜。半世奇怀消簿领，百年左计悔词章。傭书沿牒俱无俚，揽镜愁君鬓亦苍。（《暮秋寄玉仲陵水》）

不作登高赋，风光暗越台。人如山意倦，春趁雨声来。茅屋酒初熟，草堂花正开。怜君归未得，虚有道衡才。（《人日坐雨寄伯熙》）

酌美酒，登高台，春风浩浩从天来。不知春风定何物，能使千树万树繁花开。花时一相见，乃在天之涯。人生所贵行胸怀，名高当世亦徒尔。我思古人安在哉，且歌一曲进一杯。为君歌，饮君酒，几日少年成白首。俗人共笑凤麟饥，奇士乃多牛马走。博徒酒徒中有人，试问若曹识之否？风尘物色今则无，慷慨悲歌我何有。我欲登天门沈沈，金钥深九关。我欲求神仙，蓬莱方丈阻绝非人寰。抗尘走俗已无谓，何况斯世多忧患。不如招白云，相与凄碧山。不然一艇一钓竿，溪风涧月亦足供往还。武陵华阳在人世，且将老我白石清泉间。（《放歌示伯熙》）

以上四首诗皆是汪瑔在五十岁以后写给友人的诗歌，诗中一反他早期的寄怀友朋作品中所表达的思念主题，转而成了表达自己晚年心迹的明志诗。此类诗歌中，汪瑔在表达对朋友往日深厚的感情时也很含蓄委婉，如在《雨夜示玉仲二首》其二中，整首诗都没有出现对朋友思念之情的字眼，但是读完整首诗，那种对往昔情谊的怀念和对友人相知的默契之感顿生，看似不露痕迹，实是诗人内心深厚感情的积蓄。

四、五光十色的岭南风情画卷

岭南地区，由于地域上的特殊性，自然环境、气候物产都与中原地区有较大的差异。汪瑔作为祖籍浙江的山阴人，自幼生活在广州，后入籍广州，平生未曾离开过广东。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大量表现岭南地域特色的作品。他对岭南这片土地充满着感情，才会用这么多的心血去倾诉他对这里的真实感受。

首先，在汪瑔诗歌中有很多关于广州变幻无常的气候的描写。这类诗歌约有 90 首，分别创作于诗人不同的年龄阶段，可谓贯穿于诗人一生的创作之中。从这类诗歌的题名可以看出，汪瑔所作诗歌中关于岭南的气候特征主要有三类：阴、雨、热，而以与阴、雨相关的诗歌尤为多。通过汪瑔对岭南气候特征的喜好程度及其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感情进行分析，既可以帮助了解岭南的气候特征，也可从中窥见出他的某些性格特点。

与天气的“阴”相关的诗歌主要集中在春和秋这两个季节中，在他的诗歌中仅题目上直接以“春阴”和“秋阴”为题的诗歌就有很多，诸如《春阴》[①]、《春阴二首》[②]、《秋阴四首》[③]、《秋阴六言》[④] 等。这类诗歌首先反映出岭南气候的特征，在春秋天的时候，较易有阴天。但这不是汪瑔创作这些诗歌的主要意图，他主要是从天阴易生愁的角度出发，将诗人在阴沉的天气中的愁绪融入对天气的描写之中。这种愁绪是淡淡的，似无还有，但确实存在的。如《春阴二首》[⑤] 其二：“濛濛花影隔红楼，窣地湘帘不上钩。几日春阴最无赖，只添人病要人愁。”

整首诗的感情基调和题目一样是阴郁的，从中可以见出诗人淡淡的哀愁。对广州春天这种天气描写最为贴切的要数《立春后阴雨浃旬排闷戏作》，诗写道：“春阴四合春寒生，欲雨不雨晴不晴。楼台漠漠烟十里，舆盖喧喧泥一城。响竹比邻搀笑语，卖花深巷奤歌声。”该诗不仅写出了广州春天阴雨不定的天气，还写了深巷之中的卖花人互相歌吟的现象。而另外一首，名为《春阴》的诗则不仅仅写了岭南春天这种特有的气候，而且将诗人的感情与气候的描写结合起来。诗首联写的是气候“黯黯青山晚，荒荒白日阴”，颈联“一寒欺病骨，万感入羁心”就点明了这样阴晦的天气更容易引发羁旅之客的愁思，由写气候转入写情感，感情的表达与气候的特征相得益彰。

在汪诗中写秋阴，也能很好地融入个人的感情。如《秋阴六言》：“似烟非烟庭院，欲雨不雨池台。夕照乍明黄叶，凉痕微渍青苔。怀人酒

① 《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3 页。

② 同上书，第 588 页。

③ 同上书，第 622 页。

④ 同上书，第 650 页。

⑤ 同上书，第 588 页。

梦初醒，留客炉香未灰。一桁模糊帘影，误教蝙蝠飞来。”该诗既有对岭南天气特征的真切感受——似烟非烟、欲雨不雨，又有写岭南秋天特有的物候特征，黄叶、青苔等，将秋天写得可观可感。“怀人酒梦初醒，留客炉香未灰”表达了诗人在这个如烟似梦的秋日，对不在身边的亲友的思念之情。在这类写秋阴的诗歌中，描写得最为详尽要数《秋阴四首》。在这组诗中，诗人从各个方面来写岭南的秋天，不仅写到乱鸦衰柳、芦花、槲叶、凉烟、归燕、凉蝉、白菊、红兰等，还写出了他自己对秋天的感受“秋心如梦复如烟”、“无端秋思太迷离”，诗人感慨“秋色冥蒙画不成”，但透过该组诗，秋之景、秋之心，宛然若在眼前。

广州地处南亚热带，气候属南亚热带典型的季风海洋性气候，雨量充沛，而且每年都会有一段时期的雨季，因此在汪诗中还有不少与阴雨连绵的天气特征相关的诗歌。

如《三月十五日喜雨》写的是仲春之后，长时间没有降雨，而在三月十五日天降甘霖，表达出久旱而雨的欣喜之情。但在汪诗中，更多的则是抒发对久雨不晴的担忧和烦闷。如在《积雨》中先写雨天的冷清，“积雨柴门掩，都无一客来”，在这样的天气里，诗人“所忧非旅食，心折泽鸿哀”，忧愁的不是自己旅途的困顿不安，而是那些靠耕作为生的百姓的疾苦。《苦雨谣》则是采用歌行体的形式，表达出久雨成灾对农民的严重危害以及诗人内心深处对黎民苍生的担忧。《六月杪潮州大水感事有作》是对 1870 年的潮州大水的记载，该诗详尽地从农民的立场来写这次大水的灾难性后果。诗开篇写“今春苦久旱，田坼禾苗枯。农民乞膏泽，祭祷闻呼雩”，春天天旱，万民祈求天能降雨，而接下来就写“夏末苦多雨，江涨流平芜。奔涛决堤堰，澒洞漂田庐”，与开篇的春旱形成对比，天气的变幻无常，让农民饱受煎熬。“安危在咫尺，性命争须臾”，命悬一线的凄惨，“嗷嗷遍哀雁，处处号饥乌”，大水过后的萧条和荒凉。在诗歌的后半部分，汪瑔又透过发大水的根源，对那些填海为田的豪强进行痛斥，发出“此辈罪可诛”的呼号，他对黎民的体恤之情可以想见。

岭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的炎热也是其一大特征。因此在汪诗中也不乏对这种炎热天气进行描写的诗歌，如《热》写的是十月的岭南，仍然是暑气未消，而《热二首》写的也是由暑将入秋之时的炎热。

综合来看，汪瑔诗歌对岭南气候的描写，不是纯粹的记载气候特征，而是在诗中融入他个人的感情，尤其是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忧念。这是诗人

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思想的体现，表达出一个无力为百姓解除苦难的文人的苦闷和无奈之情。

其次，汪瑔诗歌对富于岭南地方特色的民俗生动的描绘。岭南谓五岭以南，又称岭表或岭外，古为百粤（越）之地，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中原地区，因而形成了与中原地区不甚相同的民风民俗。汪瑔自幼生活在岭南地区，熟知其风俗习惯，在他的诗歌中以热情的态度作了反映。

民俗所涉及的内容很多，在汪诗中有写到与岁时节日相关的风俗，如写春节广州花市繁盛的盛况，《岁除日阅花市》："暖借三冬日，香飞十丈尘。群芳争入市，残腊已如春。异种频年见[①]，名园几处新。鼠姑还聘得，笑我未全贫。"[②] 在该诗的题目下，汪瑔自注："广州地暖，花事盛于杪冬，戏赋小诗为岁华纪丽。"这也是广州的地方特色，在冬末春天尚未到来之际，花市就已经很热闹的盛况。在《正月五日游花埭呈同游诸君子》[③] 中，汪瑔由正月五日同友人游花埭花市写起，继而写到花埭花市之昔衰今盛的发展历程。该诗前的小序，对花埭有简要的交代，"花埭在珠江之西南，距广州十里许，居人以执花为业，士夫园亭亦多在焉。楼台绣错，卉木绮交，青序初临，红芳相暎，搴条采香者，咸萃于是。"花埭是广州花地原称，素以花市闻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过春节，游花市，这是岭南地区，尤其是广州特有的地方风俗，直到今天仍一直沿袭。"这一赏花之风直接催生了三部咏花诗集——《杏林题咏》、《人日花埭看牡丹》及《花埭杂咏百首并序》。前二书系众人咏一花，后一书则是一人咏众花，各尽其妙。"[④] 而汪瑔的这些写花市繁盛的诗歌独具特色。他不单纯写花市中繁花锦簇的现象，将花与看花者结合起来，又写出花市今昔的对比。"朋侪简札互招致，野夫袒褐容追陪"，写花市游人如织的热情，"甲寅以来世多故，曲池渐废高楼颓"，写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广州花市颓败的景象，接下来又写现实中人们游览花市的热闹。这与其他写花埭的诗歌有所不同，一般写花市的诗歌多是直接写花，如梁修撰的《花埭百

---

① 汪瑔自注："诸花多来自海外。"《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58页。

② 汪瑔：《岁除日阅花市》，同上书，第658页。

③ 汪瑔：《正月五日游花埭呈同游诸君子》，同上书，第623页。

④ 闵定庆：《节日狂欢氛围与花埭百花诗坛的共时性呈现——试论〈花埭百花诗〉的"狂欢化"写作》，《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花诗》，就是直接歌咏百花，以每种花来为诗歌的题目，而汪瑔的诗歌既不乏繁花绚烂的描写，又透露出历史变迁的意味。

其他的节日，如《五月三日斋中独坐闻江上竞渡鼓声慨然有作》中所写的五月初举行珠江竞渡活动，《中秋夜张石邻大令招集野水闲鸥馆酒罢登越秀山看月得诗四首》中所写的中秋时节，“广州人家，中秋皆悬竿灯，登高望之，灿若列宿”[①] 等，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节日民俗。

其次，在汪诗中写到很多岭南日常生活中的民俗风物，如在《城南消夏杂咏十首》中，其中有五首就写到富于岭南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

其三：唐园旧址近西郊，想见赪珠缀碧梢。日午市桥红一色，牙签新署玉荷包。[②]

其四：闲街吹过绿槐风，有客承蜩技最工。知了一声天正午，儿童争买荔枝虫。[③]

其五：谁烹翠荚碾琼沙，更鬻黎祁泛玉花。解得文园消渴未，冰盘凉剖绿沉瓜。[④]

其六：城南灯火认闲坊，盲女琵琶夜作场。唱到珠江旧时曲，有人弹泪说招郎。[⑤]

其七：青丝系缆碧筒杯，记向江干逭暑来。一样榕阴风月夜，不堪重问海珠台。[⑥]

在这五首诗中，分别写到以签标名售荔枝，以箬叶裹蝉诱小儿，夏日售绿豆沙和豆腐花，盲女鬻歌，海珠台纳凉等颇具岭南特色的民风民俗。

---

① 汪瑔：《中秋夜张石邻大令招集野水闲鸥馆酒罢登越秀山看月得诗四首》，《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页。

② 诗后附有自注：“市中售荔枝者，以签标名品，玉荷包其一也。”

③ 诗后附有自注：“广州呼蝉为荔枝虫，有捕以售者，箬叶裹之，摇令作声，以诱小儿。”

④ 诗后附有自注：“市中鬻豆粥者，碎碾入釜曰绿豆沙。又菽乳之，甫结者曰豆腐花，二物皆售于夏日。”

⑤ 诗后附有自注：“入夜，巷陌间多盲女鬻歌。道光中，招铭山大令庸撰《粤讴》，一时争歌之。近稍稀矣。有老妪，年八十余，尚能道铭山旧事。”

⑥ 诗后附有自注：“海珠即宋李忠简读书台。台侧多老榕，其下可以纳凉，往遇盛暑时，箫鼓画船多集于是。”

汪瑔在诗歌中附有自注，如《其三》后注的“玉荷包”，是荔枝的一种，《其四》对“荔枝虫”的解释，“广州呼蝉为荔枝虫，有捕以售者，箬叶裹之，摇令作声，以诱小儿”等，这些诗歌也有助于了解一些物品名称的由来。

在《纳凉戏作》中汪瑔又写到广州夏日的晚上纳凉的习惯，“焦本新移竹旧栽，竹南蕉北小轩开。坐中力尽蒲葵扇，不及微风偶一来。”

这都是诗人长期居住和观察得到的感受和认识，从中也可看出，汪瑔对岭南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

汪瑔四十一岁经过黄泥湾时，写下《黄泥湾》：“晴日山行好，群蜂绿渐生。烧畬分野色，赛社聚春声。田父如相识，村醪亦自清。频年兵革后，喜尔见升平。”[1] 诗中写到农人在播种前，焚烧田地里的草木，用草木灰做肥料下种的习俗，还写为祭祀田神而举行的赛社活动。在《韶州至平石舟次杂诗八首》其八中有：“行尽连泷闻腊鼓，村人刚赛伏波祠。”[2] 写的是雷州百姓在腊月的时候祭祀伏波将军的盛事。其四则写出一幅韶州水上人家图，诗云：“曲曲江流浅浅沙，老农多借水为家。临江别盖三间屋，引得霜痕上荻花。”这是韶州沿途江边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描摹，将农家居住之处所和农民谋生的手段结合起来，清淡而有诗意。

与岭南的日常生活风俗息息相关的便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植物，岭南地处南亚热带，温暖多雨、光热充足、温差较小，极利于作物的生长，在汪诗中也写到不少岭南作物。在《广州杂诗四首》中有[3]“客抵自倾椰子酿，家人刚寄木棉裘”句，“椰子酿”和“木棉裘”是广州特有的物产。椰子在我国主要集中分布于海南各地及广东雷州半岛等地，而广州因其地理优势和气候特征，得以饮用椰子酿制的果汁，是一大特色。木棉也是广州极常见的植物，现在被誉为广州市的市花。其果实成熟时内壁有白色长绵毛，此处的“木棉裘”应是以木棉的棉絮充作御寒的衣服。

木棉树形高大，花开之时绚烂如火，极有气势。汪瑔还有一组专门写木棉花开的诗《越秀山看木棉归检故友李竹香王少香集中皆有木棉花诗，

---

① 《黄泥湾》，《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5页。

② 《韶州至平石舟次杂诗八首》，同上书，第597页。

③ 《广州杂诗四首》，同上书，第610页。

戏次其韵三首》：

处处东风处处开，寻芳先到越王台。春于此树无遗力，花亦如人有霸才。北户风光夸烂漫，南方火德入恢台。时清久已消烽燧，一任山城远近栽木棉一名烽火树。（其一）

呼鸾道上艳阳时，海国春光此一奇。瘴雨蛮烟三二月，晓霞晴日万千枝。炎官导从丹蕤盖，火帝军容赤羽旗。姹紫嫣红争赏识，离交正色几人知。（其二）

紫宫云气赤城霞，化作春天得意花。南部歌词徵绛树，东皇乐舞绚朱华。槐檀蕴火无奇色，桃李迎风亦小家。谱就群房应一笑，斑枝吉贝认都差。[①]（其三）

在这组诗中，汪瑔写木棉花开如火如荼的壮观景象，并且对木棉花作了热烈的讴歌和赞美，认为它不同凡花，在它的映衬下“桃李迎风亦小家”，“斑枝吉贝认都差”，表达了他对岭南的木棉花的喜爱之情。钱仲联先生将汪瑔的木棉花诗与岭南著名诗人宋湘的作品相提并论：“宋湘有七律《木棉花二首》，写得真是好。本诗与其意同，但写法不同，也写得极是好，三四两句尤佳，汪瑔写得好在于不即不粘，宋湘那两首写得好，在于句法有力。”[②]

《喜晴》中“一雨二十日，耳熟芭蕉声”[③]，写雨打芭蕉的场景，在《六月十一日同人招集粤秀山道院》中写“红荔此时熟”[④]，《夏日斋居》中写“密竹垂梢阴欲雨，老榕叶落气如秋”[⑤]，都是岭南地域特色的风物描写。

另外，汪瑔在写岭南的民俗风物的同时，还写了不少岭南的山水胜景。《粤秀山观晚霞歌》写其登上粤秀山观看晚霞的情景，由“升高俯视

① 《广州杂诗四首》，《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8页。

② 魏中林：《钱仲联讲论清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③ 《喜晴》，《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5页。

④ 《六月十一日同人招集粤秀山道院》，同上书，第642页。

⑤ 《夏日斋居》，同上书，第649页。

奇景出"[①] 展开对晚霞的绚烂多姿的歌吟，想象奇特，壮丽富有气势。《中秋夜张石邻大令招集野水闲鸥馆酒罢登越秀山看月得诗四首》写中秋之时登临粤秀山赏月，将赏月与登山结合起来，写出"滚滚城市中，得此良不易"[②] 的佳境。

1866 年汪瑔随五福去海南，他作《琼州杂诗四首》[③] 写海南的风光：

> 荒服唐琼管，提封宋镇州。昔人多远谪，吾道此淹留。海阔天无际，山深瘴不收。斯游亦奇绝，未肯薄蛮陬。（其一）
>
> 异俗徵风土，殊方感物华。采香蛮女笑，织罽峒人夸。碧贮宾郎水，红攒吉贝花。只怜大堤曲，不解事桑麻。（其二）
>
> 谁作登高赋，城南杰阁存。地形收绝徼，山色指中原。空阔鱼龙气，平临鸟雀喧。凭栏忽长叹，海雾自昏昏。（其三）
>
> 宝气青峦合，军锋赤羽寒。波斯方凿空，海若尚狂澜。此地凋残甚，由来抚驭难。愿闻开玉帐，勿复议铜官。（其四）

在该组诗中，写到采香的蛮女、织罽的峒人、吉贝花、海雾、狂澜等海南特有的风物。由海南回广州的途中，他又写了渡海的见闻。虽然汪瑔曾数次渡海，但这是其诗歌中唯一一次写到海上的情形，共有两首诗歌《海口阻风戏成长句》和《大风渡海》。在《海口阻风戏成长句》写道："秋潮拍岸云模糊"，"颠风断渡不可往，但闻铃语吹浮屠"，"海天光景正奇绝，云涛起灭争须臾。弄珠如有神女出，弭节或见群灵趋"，用奇特的想象来写海上风云大作之时的惊险之状。而《大风渡海》则是写其航行在海上之时的亲身所见所感，诗云："云气海门开，危樯破浪来。四围接天水，一道走风雷。人拟乘槎客，吾非作赋才。频年犯奇险，太息鬓毛摧。"该诗的前四句反映出海上风涛浪涌的气势，而后四句则是汪瑔对在海上乘风破浪的感受，他感慨生命就是在如此的惊涛骇浪中逝去的，颇含无奈之情。在该诗的最后有其自注："年来凡四泛海矣。"对汪瑔来说，每一次渡海都意味着生死的考验，因此他对每次渡海都是记忆清晰的。在

---

① 《粤秀山观晚霞歌》，《随山馆猥稿》，第 580 页。
② 《中秋夜张石邻大令招集野水闲鸥馆酒罢登越秀山看月得诗四首》，同上书，第 629 页。
③ 《琼州杂诗四首》，同上书，第 612 页。

汪瑔的诗歌中，写水的很少，而这两首写海上的情形就很具代表意义。

第三，对岭南名胜古迹的吟咏。岭南地处我国的南隅，文物古迹虽不及中原之繁盛，但历代亦有不少朝政官员、文人骚客至此，留下可供后人凭吊之处。汪瑔作为幕客，足迹遍布岭南各地，他得以游览许多名胜古迹，也留下了与此相关的诗歌。

汪瑔虽终生为人幕客，却常怀忠君报国之志，关注黎民苍生之苦，因此对曾有所作为的历代名臣十分钦佩。1867 年，四十岁的汪瑔在参观黄老相公祠后写下了《黄老相公祠四首》[①]。在该组诗的前面有小序，特意交代该祠堂的来历，“黄定公，上元诸生，明崇祯末客潮阳，甲申之变，赴县庙井中死。后人于井旁立庙，祀之曰黄老相公祠”，以便后人能够清楚地知道黄老相公的事迹。该组诗其一云：“心断寒泉古甃中，流传片碣表遗忠。九原自殉先皇帝，千载人呼老相公。”不仅写了黄老相公殉节之事，而且还通过后人对他的尊敬来对其行为表示赞颂。对黄老相公殉节之事，汪瑔既对其行为表示赞叹，同时又表惋惜。在该组诗的第二首中写道“青衫白发老诸生，可是寒儒一死轻”，对儒生的生命轻如鸿毛充满着惋惜之情。

四年之后，汪瑔又拜谒潮州的韩文公祠，写下《谒韩文公祠》[②]：

> 炎荒天欲启文明，却遣公为海上行。千载江山留姓氏，一时仙佛借声名。古祠阴合黄蕉熟，断碣铭残碧藓生。试向夜深看北斗，可还流照义安城。

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迁至韩山。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唐代贬谪潮州的朝廷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但他们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唯独韩愈在短短八个月的治潮之后，却为世代潮州

① 《黄老相公祠四首》，《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4 页。

② 《谒韩文公祠》，同上书，第 619 页。

人民所景仰。这不仅仅是因为韩愈在文坛上的名气，更重要的是他真正施惠政于潮州人民。韩愈之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这是真正为百姓谋福利而采取的措施，造福了一方百姓。汪瑔在诗中把韩愈来潮之行，喻为“启文明”，说韩愈的来潮仿佛是给这炎荒之地带来了文明的种子，评价可谓极高。但颈联的“古祠阴合黄蕉熟，断碣铭残碧藓生”，通过对今日韩文公祠的景象进行描述，表达出斯人已逝，徒留遗迹的悲凉。尾联“试向夜深看北斗，可还流照义安城”，汪瑔发出疑问，韩愈当年的英明决策是不是还在普照着广州城呢？这里也是暗指当时的广州城已经没有像韩愈那样致力于百姓疾苦的官员了，既是对昏庸无能的官员的诘问，也是对能有像韩愈那样的官吏出现的呼唤，具有现实意义。

汪瑔还曾作诗对他经过雷州之时未能拜谒寇莱公祠表示遗憾之情，《过雷州拟谒寇莱公祠不果》①：

> 城东何处寇公祠，落叶斜阳去路迟。惭愧剑南老居士，秋风亭上独题诗。

1866年，汪瑔由琼州回广州途中，经过雷州，汪瑔计划去拜谒寇莱公祠，结果因时间紧迫，没能去成，他才作下此诗。寇莱公即寇准，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德才兼备，勤政爱民，治国有方，安邦有道，曾任北宋三朝宰相。寇准流放雷州期间，虽境况悲凉，却贬官不贬志，依旧忧国忧民。他高风亮节，关心雷州民情，在雷州仅十八个月，做了很多有益于雷民的事情，对促进雷州文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千百年来，一直为雷州人民敬仰和缅怀。该诗的前两句交代了欲拜谒寇莱公祠却未能实现，是实写，后两句表达了自己的遗憾之情，也反映出他对寇莱公是仰慕已久的心情。

在汪瑔的览胜怀古之作中，有三首诗是特别为两个女子所立的祠庙而

---

① 《过雷州拟谒寇莱公祠不果》，《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页。

作。其中《冼夫人庙》[①] 是为纪念冼夫人作的，诗云：

锦繖千秋气，灵祠百战场。封留旧谯国，名重古高凉。月陈迷残垒，云旗指故乡。如何陈苑里，学士女儿装。

冼夫人，即谯国夫人，生活于梁、陈、隋三个朝代，是我国闻名的俚族女首领，她曾带兵平定海南黎族动乱，后来又奏请朝廷建置崖州，使海南与中原恢复了直接联系。她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引进种植技术，发展生产，使当地群众过上太平日子。当地老百姓都称她为“圣母”，到隋朝时，隋文帝便册封她为“宋康郡夫人”，后又册封她为“谯国夫人”，赐食汤沐邑一千五百户，死后追封她为“诚敬夫人”。“如何陈苑里，学士女儿装”，冼夫人的有勇有谋，反对叛乱不仅值得后人敬佩，也是榜样和示范。

《虞夫人庙二首》[②] 是为虞夫人所作，在序中汪瑔也特别交代了虞夫人庙的缘起，序中写道：“岭南新语云：虞，英德之虞湾人，唐末黄巢破西衡州，虞夫为寨，将与贼酣战而死。虞躬擐甲胄，率昆弟及乡人迎战，贼败去，虞亦死焉。其后，兵猺为乱，每见虞朱衣白马，率兵而来，贼辄惊溃。嘉定间，敕曰：夫人生能摧黄巢之锋，殁能制峒峦之寇，封正顺夫人，立祠香炉峡中。”从序中可以了解到虞夫人生平的重要事迹，汪瑔对虞夫人以女子之身，戎马酣战的胆略充满赞叹和敬佩之意。在诗歌其一中写“弓刀小队遏烟尘，誓扫欃枪不顾身。英气能摧徐道覆，香名长配冼夫人”，把虞夫人与徐道覆[③]、冼夫人相媲美。在其二中又写道：

---

① 《冼夫人庙》，《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4页。

② 《虞夫人庙二首》，同上书，第595页。

③ 徐道覆（？—411），东晋起义军卢循、孙恩的姐夫。随孙恩、卢循举兵十万起义。义熙元年（405），东晋命卢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现广东韶关）相。义熙六年（410），卢循、徐道覆以十余万北伐东晋，据江州（今江西九江）。二月，兵分两路，卢循率领越五岭、长沙、巴陵（今湖南岳阳），直指江陵，击败荆州刺史刘道规；另一路，徐道覆率军直下庐陵、豫章（今江西南昌），杀江州刺史何无忌。后卢、徐两军合兵东下，大败晋大将刘毅。晋廷震动，立遣刘裕北还。此时卢循和徐道覆发生内讧，撤守寻阳，最后退守广州。义熙七年（411），刘藩、孟怀玉等进军岭南，二月，攻克始兴，徐道覆被斩杀。

当日孤军鼓角哀，美人虹断阵云颓。甘心马革从夫子，屈指蛾眉几将才。烽火近连中峡暗[①]，祠门长向大江开。朱衣白马今犹昔，应有灵风飒飒来。

首联写当年冼夫人驰骋疆场奋不顾身的气势，颔联写冼夫人的事迹，在历代都堪称是奇女子，虽是一介蛾眉，却有着非凡的将才。颈联转向写诗人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的混乱和不安定，盗贼四起，官府却无力平定的局面，结句借对冼夫人朱衣白马的美好传说，实际是诗人内心的期望，希望能有像冼夫人那样胆识过人的将才，勘平动乱，获致太平的日子。

岭南是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的策源地，亦是六祖慧能弘扬禅学之地。地处岭南的广东，濒临南海，自古就是海上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和前沿，也是佛教入华之重要孔道，有“海滨法窟”之称。在岭南地区保留了相当多的寺庙，在汪瑔诗歌中写到的就有净慧寺、光孝寺、南华寺。《冬日过净慧寺》[②]写诗人经过净慧寺（今六榕寺）时的所观所感，他面对着残留的碑文驻足而思，只有寺庙的榕树仍岿然不动，是寺庙千年沧桑的见证。诗的尾联写到老僧夸赞苏东坡为寺庙所题的“六榕”二字是“妙墨”，对今天研究六榕寺的发展变迁也有着一定的资料作用。《光孝寺》[③]亦是如此，面对着光孝寺的汉塔断碑，不禁回想起禅宗六祖惠能当年著名的“风幡论辩”。《游南华寺二首》[④]写昔日繁盛的庙宇，如今只剩下“塔依秋树立，门向水田开。碑版无王草，僧雏少辩才”的冷清，“顿宗今寂寞，何处证非台”是诗人为此作出的解释，但他在第二首中却写道：“金碧凋残后，行人说尚王。空门犹劫火，古殿几斜阳。散佚传灯录，萧条选佛场。我来吊方陆，风雅亦微茫。”用凋残、劫火、斜阳、萧条等词语，凸显出寺庙今日的荒凉冷清。由眼前破败之景引人深思，此等萧条的景象皆因连年的兵燹之乱，使这座千年古刹遭受毁灭性的灾难。庙虽无语，人却有情，使人顿生今昔之感，世事变幻无常之思。

汪瑔还有写游历岭南一些著名古迹的诗篇，如三十六江楼、镇海楼、

---

① 诗后附有自注：“时英德清远诸邑群盗未靖。”

② 《冬日过净慧寺》，《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66页。

③ 《光孝寺》，同上书，第586页。

④ 《游南华寺二首》，同上书，第596页。

韶州的九成台等，也都能从眼前所见生出古今变幻之慨，义旨深远，表达出他在直面历史遗迹之时的真切感受，也反映出他对岭南地区深厚的感情。

第二节　汪瑔诗歌的艺术特色

最早给汪瑔诗以赞许并指出其风格特征的是前辈诗人，张维屏称之“清圆如春莺啭树，矫健似秋隼盘空。言情写景，妙出性灵，慨乱伤离，时露风骨”。林昌彝评曰：“烟波绮丽，风月清新，逸兴遄飞，感均顽艳，上追长吉、义山，下瞰君采、四溟，近压仲则、兰雪，而独成一子矣。”他们主要是就汪瑔青年时期诗歌所发的议论。汪瑔后来创作的时间还很长，诗风也逐渐产生着变化，这在同辈友人的评论中反映了出来。沈世良说：“芙生三十以前诗，如万柳楼台，百花阑楯，气之春也；三十以后诗，如松风送籁，涧壑飞泉，时之夏也。以视二十岁前朗秀研润之作，已再变矣。”沈世良殁于1860年，时年汪瑔三十三岁，正值人生历程发生转变的过渡时期，此时汪瑔诗与少年青年时已有较明显不同。而另一跟汪瑔结交时间很长的友人贾景方，在汪瑔五十岁时给汪瑔诗题词云：“景方于三十年前见芙生诗即知其工，然止于诗之工而已，今年复游岭南，乃悉见其三十年之诗，巧者出以朴，浓者出以澹，纵横者出以和缓，其用意深厚，得古人之微指，盖不止于诗之工而已。”其论更能反映出汪瑔诗风的变化。至汪瑔去世后，其门人和女婿朱启连在《汪先生行状》中说其诗“初拟温、李，晚依范、陆，幽远深旷，造乎自然，后世必有疑为南宋、金元间人者；其高者，乃中晚唐音矣”。从师法之流派去说明诗歌风格，而且涵盖了汪瑔从早年到晚年的创作，这对了解汪瑔诗歌艺术的变化和总体特征很有帮助。综观汪瑔全部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从十八岁（1845）开始创作到二十九岁（1856），为其青年时期诗歌创作时期；中期从三十岁（1857）到四十九岁（1876），为其诗歌转变的过渡期；后期从五十岁（1877）至六十四岁（1891），为晚年创作时期。这三个时期各有其独特的风格特点，但是又跟汪瑔整体诗风互相关联，下面将着重从汪瑔诗歌这三个时期的转变脉络来论述。

一、汪瑔诗歌创作前期的艺术风格

汪瑔诗歌创作的前期，其写诗从摹仿温、李入手，以清幽密丽为宗，但亦不乏壮志慷慨之作。这不仅跟汪瑔的性格有关，也与他学诗的途径有关。他在《松烟小录》中说："唐人七律，至晚唐而衰，杰出者惟义山、牧之两家。此外当推温飞卿，如《奉天西佛寺》云：'忆昔狂童犯顺年，玉虬闻暇出甘泉。宗臣欲舞千钧剑，追骑犹观七宝鞭。星背紫垣终扫地，日归黄道却当天。至今南岭诸耆旧，犹指蓁芜作弄田。'气格不在玉溪生之下，而选唐诗者多遗之。"① 汪瑔认为选家不选温庭筠的诗歌有失偏颇，他认为温诗的"气格不在玉溪生之下"，将温诗与李商隐的诗歌相提并论，对温诗评价极高。

汪瑔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诗歌多为与朋友相聚畅饮或登山观景、赠别之作，感慨时事的激昂之作为数不多，但是颇具特色。从其所写的赠别友朋的诗作中不难看出他这个时期深受温、李诗风的影响。如《七夕寄俞溥臣》：

> 银云蟠蟠凝不流，老乌哑哑飞上楼。天上红墙望不见，人间绿发生清愁。牵牛花碧沁仙泪，蚕茧如烟记前事。仙城此夕羊灯明，有客铜街共扶醉。新词一幅芙蓉篇，七襄欲夺霞机鲜。衣香扇影相蝉嫣，可惜不遇鸾軿仙。鸾軿又碾秋云软，两度星期鹿卢转。故人相望隔微波，仿佛银河水清浅。西簾月落铅露寒，凉痕深沁罗衣单。寄君一尺双锦鲤，楼上星辰江上水。

这首寄怀友人的诗开始选用了一些不常见的意象来引发诗情，用"银云"、"老乌"来写七夕到来的情形，"天上"、"人间"相互呼应，而"仙城"之"羊灯"则更渲染了节日气氛的浓厚，而故人却不得相见，有若天上的银河般被隔开，借助于环境气氛的烘托渲染当时景物的映衬暗示，写得细腻婉曲，而感情深婉。该诗中所使用的一些词汇也是温、李诗歌中经常用到的，诸如"银云"、"衣香扇影"、"铅露寒"、"罗衣单"之类。温、李诗中都有多次中写到"露"，如李商隐的《七月二十九日崇让

① 《松烟小录》卷四，光绪刻本。

宅宴作》中“露如微霰下前池，风过回塘万竹悲”①，《城外》中的“露寒风定不无情，临水当山又隔城”②，《无题二首》中的“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③，温庭筠的《晓仙谣》中“宫花有露如新泪，小苑丛丛入寒翠”④，《七夕歌》中“平明花木有愁意，露湿彩盘蛛网多”⑤等。至于以罗衣、香扇这类恻艳之语入诗，则在温、李二人的诗歌中更为常见，如李商隐的《无题二首》中“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⑥，温庭筠的《雍台歌》中“盘纡阑楯临高台，帐殿临流鸾扇开”⑦ 等。这是从诗歌的语言形式的特征来探究汪瑔深受温、李的诗歌创作的影响，但温、李对汪瑔早年创作影响较大的是在其诗歌的风格上。

温、李二人齐名，并称于晚唐诗坛，温庭筠的诗歌包括抒怀、纪事、赠答、游览、怀古、咏史等多方面的题材。总体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类清新淡远、格调典雅，如《利州南渡》、《商山早行》等；另一类则色调绚丽、刻画尽相，如他的乐府诗。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辞藻，追求形式上的华美，他的后一类作品多描摹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充满着珠光宝气的脂粉香泽，形成了浮艳轻靡的诗风。李商隐的诗歌则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同时他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汪瑔早年创作的诗歌是从学习这两位诗人入门，确实有些作品也颇有温、李二人的味道，诸如《柳花》、《秋夜小集眠鸥馆二首》、《冬日高州寄兰台秋丞芍舲仲容季英广州》等，但实际上他真正学得义山深情绵邈的诗风精髓的，则是其中年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

汪瑔早年创作的诗歌中也有一些比较激昂慷慨的作品，如《葛将军妾歌》、《寄仲容京师》、《有感四首》、《重有感四首》等。在《葛将军妾

① 李商隐著，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67 页。
② 同上书，第 505 页。
③ 同上书，第 397 页。
④ 同上书，第 24 页。
⑤ 同上书，第 215 页。
⑥ 同上书，第 396 页。
⑦ 温庭筠著，刘学锴校注：《温庭筠全集校注》，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68 页。

歌》中塑造了葛将军妾这一奇女子的形象，诗歌写的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再次进犯浙江定海，总兵葛云飞等率将士据守定海土城，血战六昼夜，并冲入敌阵，拼死作战，受伤四十余处，最后中炮牺牲；其妾从敌阵中勇夺将军尸首还而安葬之。汪瑔有感于葛将军之妾的英勇壮举，因此作诗对其赞颂，同时也表现了诗人忧时爱国的豪情。整首诗酣畅淋漓，气势雄健，其中写葛将军妾闻听将军阵亡之后，毅然不顾女子之身，冲锋陷阵抢回将军尸首尤为慷慨激昂，诗云：

凄凉东岳宫前路，消息传来泪如汪。三千铁甲尽苍黄，十二金钗齐缟素。绣旗素钺雪纷纷，报主从来岂顾勋。已誓此身判九死，顿教作气动三军。马蹄湿尽燕脂血，战苦绿沈抢欲折。归元先轸面如生，杀贼庞娥心似铁。一从巾帼战场行，雌霓翻成贯日明。不负将军能报国，居然女子也知兵。归来恸哭军门柳，心与孤臣同不朽。只恨凝之海上军，不如李侃闺中妇。一样桃花马上身，蛾眉今古几传人。君不见同乡旧有萧山沈，异代犹夸石柱秦。

诗中热烈赞颂了葛将军妾英勇杀贼，巾帼英豪的勇气胜于当时的官军，这也是对那些在对敌作战中不力甚至贪生怕死的官兵的深刻嘲讽。整首诗一气呵成，慷慨之情贯穿始终，是汪瑔早年诗歌中为数不多的壮怀佳作之一。

在《寄杜仲容京师》中汪瑔也抒发了年少的壮志豪情，该诗开头几句就很有豪气，“男儿三十当封侯，快意且作长安游。桑弧蓬矢自有志，驽马伏枥非吾俦”，年少的意气风发，壮志筹酬。在《有感四首》和《重有感四首》中，汪瑔主要针对当时的时事发以感慨，两组诗都写得很有气势。在《有感四首》中诗人先从九成台榭写起“九成台榭至今存”，起句就给人有今昔之慨，然后写到从遥远的先秦时代开始，就已经和中原相互交接，“险辟先秦传古郡，道通大庾接中原”，第一首主要写岭南从古至今的存在源头，为接下来写现今岭南的局势作铺垫。在接下来的三首中，诗人浓墨重彩地写岭南的战乱所造成的衰飒景象，“浈阳南望忽烟尘，山县凋残寇垒新”，这是整体的景象，而汪瑔自己感受来更真切，“中宿峡深烽照夜，涵洭江暗雾迷津”，半夜住宿在峡谷深处，诗人对着彻夜未熄的烽火，难以入眠。其中第四首写得最为慷慨悲

凉，诗云：

秋色高楼意自惊，烽烟不见越王城。梦回南海云千里，心折西风雁一声。人为鼓鼙思将帅，天教戎马著书生。尤来未暇悲身世，斫地中宵古剑鸣。

诗人选取的景物都给人以高远旷阔之感，秋色高楼，烽烟弥漫，只叹自己为一介书生，忧愁郁愤却无暇悲慨身世，只觉壮志满怀，书生忧国之心，凄怆感人。

另外，汪瑔在青年时期也创作了一些诗境比较疏朗的诗作，如其在十八岁所写的《三十六江楼》："我家三十六溪上，来登三十六江楼。西风万里送寒意，对此茫茫生远愁。萧然野色下黄叶，邈矣客怀随白鸥。他乡有酒不能饮，摇落山川何处秋。"这样清新旷达的诗风也为汪瑔整个诗歌创作的风格奠定了基础，与其以后诗风的转变也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

二、汪瑔诗歌创作中期的艺术风格

汪瑔诗歌创作的中期，主要是汪瑔在中年创作的诗歌，可视为其诗风发生转变的过渡期。汪瑔在这个时期也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故，再加上他自身因不堪旅途奔波之苦，疾病缠身，但又迫于生计不得不常年在外漂泊，因此在汪瑔中年时期创作的诗歌对时事，对社会的感慨比青年时期更深，其中交织着复杂的情感，多采用组诗的形式，并且创作了一些富于时代色彩的古体诗。该时期的诗歌在艺术风格上渐趋浑厚，诗境也比青年时期较为开阔。

1. 汪瑔在这个时期心态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以致影响到诗歌创作中所寄托的感慨更为深刻。汪瑔自己在《韶州杂诗四首》[①] 中说，"少日疏狂减，中年感慨多"，这是他这个时期心态比较具有概括性的诗句。汪瑔的这种感慨主要在四个方面影响着诗歌的风格：

第一，对自身年华逝去而一事无成的喟叹，如在《偶书四首》中他

---

① 《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页。

感叹自己“未敢狂言且放歌”，“男儿三十已蹉跎”，虽然意识到了这种既定的现实，但又无力扭转，更使得诗人倍觉伤感。这组诗的第三首把汪瑔这种清醒中的迷惘表达得最为细致，诗云：“未妨生事日萧条，豪气如云已渐销。纵使工文徒自苦，谁知作达是无聊。年华历历余诗卷，世事茫茫付酒瓢。也识清时无弃物，不才只合老渔樵。”诗人表面上说着自己只适合隐居为渔樵与世隔绝的生活，但又发出“作达是无聊”的否定之语，可见其心态是极其矛盾的。其实，汪瑔并不乐意只做一个与世事无争的诗人的，他在《赠吴星侪孝廉即题其华溪集后四首》中写道：“壮年犹寂寞，太息作诗人”，可以见出其这个时期对自我价值的期待与现实中希望与迷茫的心迹。

第二，汪瑔在中年的这个阶段正值为人幕客，四处漂泊，但是战乱却一直不曾停息的局势，他自身又在四十岁遭遇了一场大病，作为常怀布衣报国之心的诗人，自然忧愁郁闷。从 1856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在汪瑔三十岁时（1857），英法联军攻陷广州，直到 1860 年恭亲王奕䜣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这次外国列强入侵的战争才算告停。但紧接着就是太平天国起义，整个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战火纷仍。作为一介布衣书生，汪瑔心存着报国之心，却无力扭转任何局势，他多次在诗集中标明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在《寄秋丞二首》中他写道：“布衣未许国，何以达九阍”，在《秋日得友人书感赋》中他再次申明“布衣忧国心，隐然见文字”，而《送辛大航海之天津》中对辛大的期望“布衣报国心，期汝终不变”，其实也是汪瑔自己内心愿望的表达。

第三，汪瑔因为给别人做幕客，与朋友自然是别多见少，再加上这个时期与汪瑔关系要好的朋友的亡故使他原本无助的心情更为沉痛。汪瑔在《感旧行同松谷饮酒作》中写道：“西风簾卷江上楼，故人一醉蛮天秋。几年远别去复去，今日相逢愁更愁。与君别多相见少，对酒应须豁怀抱。酒酣一语欲告君，海内无如故人好。故人往岁居番禺，诗城酒社相嬉娱。知交颇多游兴剧，花田榕寺芝兰湖。今来匆匆无十载，转瞬浮云足深慨。湖山都在烟尘中，岂独飘零感吾辈。即论流辈亦可怜，工文往往囊无钱。俞陈倪李各奔走，意气亦复非从前。聚本如云散如雨，就中已失樊川杜。”汪瑔由同张权饮酒时所作的一首诗，想到天涯飘零的友朋别多见少的痛苦。但更让他觉得悲痛的是本来朋友就已聚散无常，可好友却又无端亡故，诗人岂能不悲从中来？在这里，汪瑔提到了“就中已失樊川杜”，

指的是好友杜季英的逝去。杜季英，名隽，与汪瑔相交最善，并且时常有诗相唱和。侯学愈《续果溪诗钞》中记载“咸丰丁巳海上事起，隽卧闻炮声，起户出视，猝为飞弹所中，折首而殒，年二十五岁”。杜季英去世后，汪瑔为他刊刻《小樊川诗稿》以传世，并且还作诗怀念之。杜季英去世后三年，与汪瑔交好的沈世良因病亡去，年仅三十八岁。汪瑔在沈世良去世后为其诗集题词时，沉痛地写道：“高义论千古，朋交得一人”，足见他对沈世良情谊的深厚。两位友人的英年早逝对汪瑔的心态转变有很大的触动，这也影响到他在中年所创作的诗歌的风格，甚至对其后期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也有影响。

第四，汪瑔由于从事幕客这一职业，时间渐久，所经历既有涉及国家安危者，也经常会接触到下层的百姓，关注他们的疾苦，这就使他能走出青年时期注重朋友宴游的个人圈子，眼界更为开阔。朱启连在《汪先生行状》中记载：“同治十年六月，大水，城几没，决蔡家围，漂人畜田舍，先生劝当事者赈抚，立散赈之法，文告多出其手。”可见，汪瑔为了无辜的黎民百姓，理解他们的疾苦。同时，由于常年往返于各地之间，他也因自己的旅途劳累之苦，时常联想到整日劳作于田间的百姓的痛苦，这也是他由青年的轻狂转向中年的稳重的表现。

2. 汪瑔心态的转变不仅仅使他诗歌中寄托的感情更为深慨，而且影响到诗歌形式的运用上。在这一时期汪瑔多采用组诗来表达他复杂而深沉的感情，并且他在创作组诗时没有采用固定的几组，而是二、三、四、十、十八等组数不同的形式，这样就在形式上比较自由，能更好地利用组诗这种诗歌创作的特殊格式来表达情感。

组诗是指由表现同一主题的若干首诗所组成的系列诗。每首诗相对完整和独立，但是每首诗与其他诗之间又有内在的联系。其作品被誉为“诗史”的杜甫，出于题材内容表达的需要，相应地在形式上，创作了不少联篇体的组诗，把一些貌似分散的单篇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组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汪瑔在中年时期创作的众多组诗把一些貌似分散的单篇，组成一个有机系统的整体，表达了单篇的诗歌所无法言传的内涵。如《正月二十三日得沈伯眉学博书却寄四首》：

正是天涯酒醒时，更烦书札慰相思。怀人梦觉梅花到，作客愁深

燕子知。鱼藻门前春似水，凤凰台畔雨如丝。东风回首应惆怅，昨岁题襟本太迟。（其一）

十年耳熟沈休文，乱后归来始遇君。诗品真如寒水玉，闲身犹是在山云。好从艺苑争千古，别向骚坛张一军。近日南园耆旧少，张谭陈外孰相闻。（其二）

花田春事近如何，好趁归潮打桨过。火凤曲成词客醉，水犀军散画船多。惯酬绮梦珠三斛，自按新声玉一梭。料得中年愁谢传，要他丝竹替销磨。（其三）

琴剑春来惯远游，莺花并解作深愁。故乡戎马今何似，蛮徼烽尘未少休。到处无家同海燕，昨宵有梦到沙鸥。与君一事差相类，潘岳华年已白头。（其四）

这组诗名为寄怀友朋，确实道出了友人间因久不相见的思念，但他不是直白地说出来，而是表达得含蓄而富有深情。这四首诗是层层渐进来抒发感情的，从第一首的作客他乡的孤寂，继而怀念朋友夜梦梅花，接着第二首则转入回忆和沈世良的初识，并对友人的为人为文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第三首则从回忆转向现实中汪瑔对友人近况的询问，同时又忆起往昔共同畅饮和诗的场景；第四首则写到汪瑔自己和友人同病相怜的近况，也饱含着他对友人和自己的这种境况的无奈和对年华匆匆逝去的感叹。汪瑔充分利用组诗的功能优势，精心布置诗歌的章法结构，由现实转入回忆，继而又回到现实中，使得怀念友人的感情更丰富。而《秋阴四首》则是由近及远，由现实转至想象，多角度，分层次地来写“秋心如梦复如烟”的惆然。这一类组诗就是在围绕着一个主题采用不同的章法结构，逐层揭示深化主题，错落有致表达情感，整组诗需要结合在一起才更富于艺术的感染力。

另外，在汪瑔在该时期创作的组诗中还有一些特别的系列，它们除首尾两篇外，其他各首都呈现并列式的结构，各篇所写的均为各自单独的内容，如《春日怀人诗十八首》和《城南消夏杂咏十首》等。两组诗都在诗前有小序，先看《春日怀人诗十八首》的章法结构，该组诗的首章是：

忆远伤春感不休，客中风雨一登楼。故人踪迹粗能说，戎马江湖各自愁。

这首诗所表达的意思和诗前面的小序有重合之处，既是交代作这组诗的缘由，也是诗人对该组诗在总体感情和要表达的主题上的总述。接下来的十六首每首分别表达对不同友人的怀念之情，最后一首是写诗人写罢以上这些怀人诗之后的心情，其实是一个类似总述性质的诗篇：“一篇诗就一沈吟，中有朋交百载心。写遍蛮笺还太息，粉云丝雨又春深。”这样的围绕着一个主题，“总—分—总”式的组诗结构，使得组诗的主题鲜明，中间的表达也很明晰。每一个“分”的诗篇又可以作为单独的一首诗歌来欣赏，也有其价值和特色，而各篇结合起又都围绕同一主旨，可从中窥见出诗人所欲表达的思想倾向。当然，汪瑔并不是生硬地搬用组诗的章法结构来创作组诗的，他在《城南消夏杂咏十首》中所采用的就是“总—分—总”式结构的变形“总—分”结构。

汪瑔在创作组诗的时候，还很注重组诗中所表达的感情基调和风格的一致性。如在《春日怀人诗十八首》中，几乎篇篇都紧扣着怀人的主题，丝毫不偏离，对所怀之人都是充满敬佩和赞赏之情。又如《长乐道中六言四首》：

> 松溪十里五里，茅屋一家两家。钓石半依垂柳，平桥流出残花。
> 草色绿侵细雨，水光碧漾轻云。忽见衔泥小燕，天涯明日春分。
> 曲曲层层沙渚，高高下下山田。人家不知何处，树杪时见炊烟。
> 云气渐销高树，雷声尚在前峰。山城将到未到，塔影斜阳半红。

该组诗四首写的是清新自然的天然山间溪畔风景，则都是采用了清丽的语言，保持了组诗风格的一致性。

3. 汪瑔该时期的创作为其诗歌转变的过渡期，指的是他在诗歌整体风格和取径上的转变属于过渡期。汪瑔在这个时期内仍创作了不少追摹温、李诗风的作品，但已经不是其创作的主要倾向。从其诗歌创作的题目中明确标出的就有效山谷体、诚斋体等，表现出多方师法的特点。由于师法的不同和诗人自身经历和性格变化的影响，汪瑔的诗风在其中年时期呈现出众体兼备，风格多样的特点。

汪瑔在中年时期模拟李商隐的无题诗曾作《无题三首》、《无题四首时客番禺县庙》和《无题四首时客行省》等，颇有义山无题诗的风神，可见汪瑔对义山诗仍是很为欣赏的，而对温庭筠那样的华美辞藻的追求则

有所减弱。与少年时期好尚绵密的词句相反，中年时期的汪瑔在创作诗歌时开始注重诗歌内在的气骨与风神，语言上也向清新、古朴转变。如《嘉应道中》：

昔过梅州道，风光送客船。梯田青叠岭，沙岸白生烟。照影惊双鬓，重经忽五年。沙鸥应笑我，容易见华颠。

整首诗语言无丝毫雕琢之痕迹，写梯田、沙岸风光，细致如画，感慨今昔之别，年华易逝之悲，也都与景物融为一体。而《春日过村肆小饮》："欲试田家老瓦盆，看山闲出郭东外。稻苗三寸水三寸，杨柳一村烟一村。新酿乍开宜薄醉，裌衣初著爱微温。当垆傭保曾相识，笑指襟边有酒痕。"写村肆田园生活，更为清丽之作。

综观汪瑔中年时期的诗歌创作特色，是以组诗为主要形式，兼备众体，诗中所蕴涵的感情比青年时期更深沉丰富，诗境更为开阔。虽然清新质朴并不是汪瑔该时期创作的主要倾向，但也体现了他诗风转变过程的一种特征，也是其晚年诗风转变的先兆。

三、汪瑔诗歌创作后期的艺术风格

汪瑔诗歌创作的后期即其晚年时期的创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受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由中年时期创作的感慨深沉转入对自我人生的观照，发而为写心之诗；第二，诗歌中多写悲秋之词，"秋"的意象充满着人到晚年的萧条之气；第三，学习范、陆，诗风古朴率真，而因作诗的目的不同，在格调和主要侧重点上与范、陆有所不同，并且常把自然界事物以拟人化手法入诗。

1. 明显受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这影响了他诗歌所反映的境界和深度。

古称五十岁的人为"艾"，《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① 所以后代称五十岁为"知命之年"，而汪瑔在该时期的创作为五十岁之后而创作的，可谓"知命"而后所作。他后期的诗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歌中不时地有他对前半生经历的反省和回忆，同时表达了他晚年甘心隐居，与世事隔绝的心态。如在《广州杂感八首》其八中所言："油幕西风拂剑芒，书生豪气久摧藏。才名早愧东头屋，文字差同北面房。此日杜园多贾谊，何人韦曲问宾王。一灯疏雨空斋夜，不读孙吴读老庄。"他感慨青年时期的书生豪气被深藏于心底，可叹如今时政被一群哗众取宠之人所笼罩，纵使有骆宾王般的才气也无人问津。"此日杜园多贾谊"，用"杜园贾谊"[①]典故，指的是孔文仲写文章论政治，本来没有材料却表现出嚣张之态，摆出一副政论家贾谊的架子，貌像却形离，为人所耻笑。后来常用作指取笑奚落人之语，常和"热熟颜回"、"鏖糟叔孙通"连用，取笑那些打肿脸充胖子的有形无实的人。在这里汪瑔用此来讽刺那些身居高位却无能之辈。而结尾处却是其晚年时期生活的写照"一灯疏雨空斋夜，不读孙吴读老庄"，壮志未酬，而年岁已高，只能独守青灯黄卷，研读老庄来聊以慰藉。汪瑔晚年时期的诗歌多次表达了对于巢由的隐居生活的向往，如：

> 升平知不远，衰老更何求……清时箕颍在，踪迹可巢由。[②]
> 颍水箕山在人世，清时还拟做巢由。[③]

巢由是巢父和许由的并称，相传皆为尧时隐士，尧让位于二人，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后人因此用"巢由"来指隐居不仕者，汪瑔在这里也表达了愿意隐居山林的意图。

在汪瑔晚年的五卷多诗歌中，抒发其对早年游幕羁旅之感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旅愁十六韵》、《述怀十二韵并序》、《听雨有感四首并序》中，这些诗歌是汪瑔发自肺腑地对前半生生涯的感慨。《述怀十二韵并序》的序可谓汪瑔自我人生经历的传略："鄙人生于道光之初，于时岭表无事，

---

① （宋）魏泰《东轩笔录》："陈绎晚为敦朴之状，时谓之热熟颜回。熙宁中，台州推官孔文仲，举制科，廷试对策，言时事有可痛哭太息者；执政恶而黜之。绎时为翰林学士，语与众曰：'文仲狂躁，真杜园贾谊也。'"杜园、热熟，皆当时俚语。意为无根据的，假的；犹言"杜田"，和杜撰也相近。

② 汪瑔：《旅愁十六韵》，《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41页。

③ 汪瑔：《有感四首》其四，同上书，第647页。

先君子挈家客游。瑔以童稚侍左右，岁时宴婴，初不知饥寒，兵戈为何事也。瑔年十三，禁烟之事起，未几而烽尘澒洞世事益以敝，生计日以艰，辞家远游，衣食奔走，其间居围城，历军垒、涉风涛、犯瘴疠、如此者二十余年。至同治间，大乱削平，幸中兴之盛，而尤劳摧抑之余，体弱多病，无复功名之志矣。比年以来，颇思闭户读书，口心纂述，顾山资不足家食，未能虚愿之偿，不知何日。寒宵独坐，偶忆数十年来所阅之境，率成长律一章，亦劳者之歌云尔。”在序中汪瑔不仅交代了自己从童稚之年到中年的数次为衣食奔波之苦，也表达了晚年以来期望能够静心闭门读书的愿望。对汪瑔终生所从事的幕宾生涯，他是有种恐惧心理的，他在《有感四首》其二中写道：“戎马江湖老此身，青袍如旧白头新。龙泉少小能知我，狗曲寻常解笑人。文字障深难学佛，性灵诗在或通神。世间并少桓宣武，齿冷当年入幕宾。”对于早年的入幕和常年在外的奔波，在晚年已定居番禺的汪瑔想来，觉得还是心有余悸的。因此，这对其晚年的心理寄托和向往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功名，汪瑔一向都是很淡然的态度，“心事千秋冷，功名一叶轻”[1]，而到了垂暮之年，他只希望“农书如可读，惟愿学躬耕”[2]。将汪瑔晚年的《读书》诗和其早年的同题作品相比较，便可看出其对读书著述的态度转变：

> 古今不相识，我乃思古人。霞想祟在昔，海怀荡无垠。求之文字间，未必得其真。鹤企远相望，鸿冥难与亲。怀哉事云杳，逝者迹已陈。残编一坐对，俯仰悲飙尘。（《读书》）
>
> 性不耐枯坐，有暇即读书。盘桓斗室中，晨夕相依于。客来顾之笑，卷帙盈坐隅。笑谓子老矣，读此何为欤？世人竟佔毕，四库供佃渔。文章耀鸾凤，笺注矜虫鱼。吾意异于此，聊用以自娱。英贤千载上，与之同起居。山川八埏外，摄之入室庐。世间诸乐事，视此当何如。少不事科举，弗向场屋趋。老不事著述，弗望名山储。聊用适吾意，未尝为所拘。一笑谨谢客，吾殆真书愚。（《读书》）

---

① 汪瑔：《述怀十二韵并序》，《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② 同上。

前一首作于汪琭十九岁时，写得掷地有声，诗人坐对残编，缅怀逝去的陈迹，悲叹历史风尘的变幻莫测。读书，对青年时期的汪琭来说，是种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壮怀之举，与古人进行跨时空的对话，令他想象无穷。而后一首作于五十二岁，从整首诗的章法和诗中所反映的情怀也与其青年时期的作品大相径庭。该诗先写自己读书的情景，接下来引入一位不知姓名的“客”，整首诗不像前首诗那样壮怀激荡，而是舒缓的格调。诗中所表达出汪琭晚年读书的意义是“聊用以自娱”，并且在最后笑着对客说：“吾殆真书愚”，这既是一种自我解嘲式的回答，也反映出汪琭晚年甘愿闭门读书，不想过问世事的心态。在《九月二十日复还故居即事成咏是日立冬》中他对自己晚年生活有个图画似的勾勒：“天寒茗碗薰炉畔，人老芦帘纸阁中。尚有区区私愿在，海疆无事岁年丰。”[①] 他期望着能够在天下太平，海内外无事的安定社会，一壶清茶，一卷诗书，安静地在他的一方天地中享受晚年的清净。这是纯粹的诗人的生活，也是汪琭心中向往的境界。

2. 诗歌中多写悲秋之词，“秋”的意象充满着人到晚年的萧条之气。

汪琭在晚年的诗歌中有不少地方感慨其年岁渐高，老而无所用的无奈。在《听雨有感四首并序》其三中他写道：“浪高曾泊荒江岸，路暗还寻野老家。今日闭门嗟老矣，关心犹有小庭花。”诗人自知年事已高，只能闭门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关心着陶冶个人性情的“小庭花”。而在该组诗的第一首和第四首中也表达了汪琭晚年的这种心态，其一云：

几度山程与水程，星餐烟语足生平。白头尝遍江湖味，才向茅斋听雨声。

其四云：

检点残衫旧酒痕，倦游心绪不堪论。可能老作村夫子，细风斜风

① 《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7页。

不出门。[1]

诗人庆幸在经历了半生的江湖颠沛流离之后，能够在晚年闲适地于茅斋之中享受聆听雨声的惬意，而对“老作村夫子”的向往，也是其晚年渴望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的表达。汪瑔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是对其早年长期的游幕生涯的厌倦和苦恼所导致的。同时，在晚年的时候，因个人性格的原因，他时常觉得老来无用，意气消沉，故而转向自我，力求与世事无争。在《有感四首》其一中，汪瑔写其晚年的生活状况：“拂拭吴钩读楚骚，尽教踪迹溷蓬蒿。天多风雨春如病，人倦关河梦亦劳。垂老自宜亲药石，长贫未肯重钱刀。纵教百尺楼头住，已觉元龙气不豪。”[2] 老来疾病缠身，不离药石，而意气却不再的迟暮之叹溢于言表，在《寒夜不成寐戏成》中诗人感慨：“萧然忘蚁梦，老矣负鸡声。笑谢床头剑，年来意气平。”

与汪瑔这种晚年生活状态和心态相副，在其晚年创作的诗歌中有很多是以秋来作为意象入诗的。有直接以秋来为诗题的，如《秋风叹二首》、《初秋二首》、《秋旱》、《秋旱谣有序》、《感秋》等。《初秋二首》是两首简短的绝句，其一云：“残暑逡巡退，新凉取次生。风廊堕枯叶，先自作秋声。”其二云：“云淡不成雨，林疏微有风。幽人感秋气，只在夕阴中。”诗人抓住由暑入秋的转变，先是写气候上，然后写自然界的事物的变化，在第二首中写“幽人感秋气”，实是诗人自己感受到的秋的气氛。在这两首写初秋的诗歌中，诗人并没有表现出十足的衰飒之感，对秋的感触是淡淡的情思。而在《感秋》中，则是把对秋声、秋色的感慨写得十分深沉，诗云：

西风几时来，落叶纷庭阴。日光忽以薄，秋气忽以深。读书斗室中，四壁皆萧森。时若有所感，恍然动余心。所感定何事，其端复难寻。秋声满天地，秋色无古今。此意当语谁，卷书一沉吟。

---

① 此处疑为“细雨斜风”，因在《随山馆猥稿》第671页《积雨二首》其二中有“细雨斜风并作寒，郊原春色好谁看”之句。

② 《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47页。

“西风”、“落叶”使得诗人在斗室之中读书觉得“四壁皆萧森”，而心有所动却无从找到端由，只觉秋声充满天地之间，更别说是诗人小小的书斋了。这也是因诗人暮年由于身体和年岁的变化，继而对自然界的有衰败之感的秋的深切体悟。在《秋风叹二首》其二中诗人沉吟：“旅人掩户三叹息，万籁到此皆秋声，我虽欲眠安可得。”在人生的垂暮之秋，诗人纵是想要安稳地睡个好觉也是无从得来的，只缘万籁俱是秋声，诗人如何还能高枕安眠？

另外，在汪瑔晚年创作的诗歌中也有一些不是直接以秋来为题，但是在诗句中融入了秋的意象的，诸如落叶，秋雨，蝉声等。如《七月十三夜与秋丞庭次看月怃然有作》：

> 庭梧写影石阑东，静觉秋生一叶中。此后定知明月好，今宵喜与故人同。寻思逐队荷衣日，几度追凉竹院风。光景不殊身世老，夜阑相对惜匆匆。

诗题为看月，但却以秋作为背景，首联用“一叶知秋”写秋到来的悄无声息。对秋叶的运用还体现在《沈吟》中有句“落叶寒相警，凉花夕自阴”，《晚过城西二首》其二中写“日落疑有人，风声走枯叶”，《九月十八夜》中的“星摇林影乱，霜逼叶声干”，《夜坐》中的“林风疏叶下，廊月古苔阴”等。

在《夜雨枕上口占》中则是由秋雨继而写到老来更易感秋的现实，“忽忽生秋意，疏疏听雨声。暗窗灯一穗，深巷柝三更。身老凉先觉，心闲梦易成。明朝须早起，山色看新晴。”同样由秋雨来入诗的有《晓起立秋前五日》：“雨声破晓不成梦，秋气无端来感人。一种微凉最先觉，藕花风里岸纱巾。”①

在《漫书》中，则是写由蝉声而知秋意，诗云：“八月南中暑未收，惯抛午睡泥茶瓯。西风不作梧桐雨，只送蝉声一片秋。”还有在《晚过城西二首》中还运用了“衰草”的意象，在《荒园》中用了“败荷衰柳”来写秋。

---

① 《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3页。

综观汪瑔晚年时期在诗歌中之所以如此多地对秋进行歌吟，皆因其与自然界之秋有生命之感应，他在《夜坐》中说："垂老知秋意"，在《晚步》说："老去渐知秋有味"，在《九月十八夜》中由南国的秋写道"衰年易枨触，即事有余叹"，可见他在晚年对秋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在《荒园》中，他更是将秋景与暮色中残败的荒园联系起来，"日薄颓垣不肯红，败荷衰柳各西风。秋心一片寻难见，只在荒园暮色中。"秋意的萧索与晚年的壮怀不在相仿，见出诗人的凄苦之心。

3. 学习范、陆，诗风古朴率真，常把自然界存在事物以拟人化手法入诗。

在《虚谷书来以山居相勖箴言可佩，事力未充，惟有喟叹而已，赋寄二首》其二中汪瑔写道："衰病从知百不宜，汉宾抱瓮足吾师。壮游五岳应无友，老学三农或未迟。闭户尚思成海录，裁书未肯乞山资。暮年果有幽棲分，只作田园杂兴诗。"① 他在晚年因心态和对作诗目的的变化而作了大量的闲适诗，这也是他对范、陆的直接借鉴和学习的结果。

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深刻，被钱锺书誉为"中国田园诗的集大成者"，而陆游也在其晚年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他们创作的这些诗歌语言简练准确，生动形象，亲切自然，清新朴素，平易流畅，并且因为晚年时期的汪瑔在心态上转向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对自然有着更真切的向往。但汪瑔并不是一味对二人的诗歌进行摹仿，而是依据自己的性格和心态来创作，因此与二人在诗歌的选材和格调上有所不同。范成大笔下的田园是世俗的，充满生活气息，既有对农民的辛勤劳作的场景的描写，也有对农村风土人情的描写，主要是力求从真实的角度来写作。而陆游晚年退居山阴后，随着环境的改变，加上年岁衰老，常以老庄的虚静超然的道家思想面对生活，"以随缘自处、静心观照的佛理禅义看待人生，以解脱生活上的枯寂。尤其是仙道思想，旷达的道家胸怀与道家养生术，使陆游的晚年生活充满了诗意与情趣"②，因此他的闲适诗在艺术上，构思巧妙，结构安排合理，形象鲜明生动，风格清新自然。而汪瑔晚年所作的闲适诗，主要是将自然景物和自己的生活结合起

---

① 《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② 宣炳善：《陆游晚年的诗情与意趣》，《华夏文化》1998年第3期。

来，既不脱离现实，又时刻与自我内心相结合，并无虚无缥缈的仙道思想，处处充满着人情味，清新自然中又有着独特的意味。《闲居杂兴四首》（673 页）可谓汪琬晚年闲居诗整体风格和内容的写照：

> 懒着衣冠简送迎，等闲长日掩柴荆。虚廊曲曲通兰气，小雨疏疏杂竹声。自拟残年随李广，未妨举世弃君平。[1] 琴歌酒赋浑抛却，一任人嘲太俗生。（其一）
>
> 不解三乘屏七签，迂拘端合守穷阎。长笺作草晨留墨，暖室藏花午下帘。晚岁光阴资药石，腐儒经济托齑盐。量晴课雨非吾事，桉有灵棋亦懒占。（其二）
>
> 坐拥图书未是贫，忘机聊学葛天民。已除侥冀千秋想，尽负昂藏七尺身。老睹升平良幸事，病耽文史故痴人。年来冷伴梅花住，桃李从教趁冶春。（其三）
>
> 踪迹浑疑退院僧，心情犹恋读书灯。称名艺苑谈何易，逐队欢场病未能。生事尚虚田二顷，平居安得阁三层。成都茅屋差相类，只愧才非杜少陵。（其四）

在这组写闲居生活的组诗里，汪琬从他闲居的生活细节入手，写其居住的环境，"虚廊曲曲通兰气，小雨疏疏杂竹声"，曲折的回廊，兰气氤氲，淅沥的小雨伴着飒飒的翠竹作响，充满着安闲的诗意。他所居住的环境之所以能如此别有雅致，也是跟他晚年不喜和太多外界人事交往分不开的。晚年的汪琬衣食简朴，纵然心有报国为民的壮志，也只能穴居于小小的书斋之中，作诗聊以自慰，乃至自警。"懒着衣冠简送迎，等闲长日掩柴荆"，"长笺作草晨留墨，暖室藏花午下帘"，便是他每日闲居所做的事情，自是一番情味。汪琬的晚年，不像陆游那么耽情于禅道思想，而是在粗茶淡饭的斋居生活中与诗书、药石相伴，"不解三乘屏七签，迂拘端合守穷阎"，"三乘"是佛教里争论的焦点，"七签"则指的是道家典籍《云笈七签》，自谓不懂佛道思想，思想保守地拘守陈规，不知顺应潮流，不知变通，这样的心态也只应该居于穷苦的陋巷之中，似乎是看透了自己的

---

① 君平，汉高士严遵的字，隐居不仕，曾卖卜于成都。君平既弃世，隐居不仕，出世；世亦弃君平，不为世所识，不为时所用。

思想观念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但却不免仍有“李广难封”、“君平被弃”之叹，这使得他的闲居诗中总有着无法掩藏的凄苦情味。在《积雨二首》其一中，他也写到了晚年谢绝宾客独处的生活：“竹屋春来足雨声，柴门地僻少人行。山翁潦倒山童懒，赢得莓苔到处生。”但这种凄苦情味和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中对农民的劳动生活的艰辛和对官方剥削农民的抨击是截然不同的。汪瑔晚年所作的这些闲适诗歌主要侧重个人主观心态的感受，但又不似陆游诗歌有太浓的仙道味，即便是他摹仿陆游的诗歌所作的《春日偶成效剑南体》“渐觉余寒取次消，已过灯夕近花朝。春来别院分先后，人拥残书共寂寥。阴菌无根经雨大，垂杨有态倚风骄。邻家日日闻操缦，何事朱弦总未调”[①]，也是着重从生活中的实际来着眼，写的是细微的生活琐事，但又入情理于诗。整体上来看，汪瑔晚年所创作的诗歌，个人感情的表达比较真实质朴。如在《夏日斋居》中则更是真实地写出了晚年闲居的情态，“自安藤榻试茶瓯，众绿盈庭暑易收。密竹锤梢阴欲雨，老榕落叶气如秋。加餐惯饫双弓米，高卧浑忘百尺楼。未免南柯蝼蚁笑，生平无梦到公侯”[②]，纵无公侯将相的宏愿，但安居藤榻，浅斟淡茶，观老榕落叶飞似秋，丛竹密绿若雨，一幅恬淡适意的斋居图，人到晚年，心态的澄澈，无欲自安，没有任何雕琢和华丽的辞藻，宛若在人眼前。类似这样充满着晚年生活情趣的诗歌在汪瑔的诗集中还有很多，如《闲眺》中“桐帽棕鞋称野夫，意行不假小童扶。舍南倚杖浑无事，饱看浮云万变图”[③]，自然真挚，出语浅淡而情致悠然。

另外，汪瑔在晚年所作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常用拟人化的手法，使得原本无情之自然景物更具人的情态和意味，颇具特色。试看下面的几首诗：

残暑逡巡退，新凉取次生。风廊堕枯叶，先自作秋声。(《初秋二首》其一)

八月南中暑未收，惯抛午睡泥茶瓯。西风不作梧桐雨，只送蝉声

① 《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52页。

② 同上书，第649页。

③ 同上书，第651页。

一片秋。(《漫书》)

数椽老树根，破屋傍荒堞。日落疑有人，风声走枯叶。(《晚过城西二首》其二)

春风定何自，忽到天一涯。今晨气微和，开我窗前花。晴光照庭宇，香影相交加。蜂声仅三两，亦复静不譁。我持一尊酒，尽拓六扇纱。酒波与花影，炫转成流霞。此邦号都会，亭馆纷秾华。一笑谢春风，何缘来我家？(《春风》)

冷看春风亦世情，吹花擘柳太忙生。刚从里巷收灯事，又向园林送雨声。(《早春即事二首》其二)

在这些诗歌中，汪瑔把自然界的物候拟人化，《漫书》中写秋天将到，但是暑气未消，他有点责备秋风只是送来一片秋蝉的鸣叫之声，却不曾送来半点梧桐雨的凉爽。在《春风》中更是把春风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了，说春风吹开了窗前的繁花，而接下来则借酒意而询问春风，“何缘来我家”？感谢春风把春天带到人间，像对一个久违的老友久别相逢，而老友却又以往昔所喜好之物相赠的欣喜和感激之情。《早春即事二首》其二中对春风也是以拟人化的口吻，写春风吹花擘柳，忙完灯事，又送雨声，匆忙地为人间送来融融春意。而在《初秋二首》其一和《晚过城西二首》其二中，则都从秋风吹动落叶之声来写，似乎秋风和落叶共作人语。这种对自然景物拟人化的手法，使得自然之物更具亲切感，让人为之动情。同时，汪瑔又用自然界的景物来和人的心态相类比，如在《人日坐雨寄伯熙》中他写道：“人如山意倦，春趁雨声来”，人意疲倦，却说人意如山意般倦怠，将人在观景之时心与景通的情态写得自然天成。

综观汪瑔一生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概而言之，就是性情与风骨兼备，清新自然而又不失典硕之风。在面对国家安危，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时，他的诗歌风骨显露，感慨遥深。而在表达自我生活的感受时，他的作品是真性情的抒发，或温然而挚，或肫然而敦，或澹远闲静。汪瑔诗歌整体上明显的特色是清新自然，这种特色贯穿其诗歌创作的始终。在此整体特色之上，他的诗歌也间有慷慨刚健和妍润绮丽之作，表现出较为丰富的艺术风貌。

第四章

汪瑔的词作

与诗歌相比，汪瑔的词作数量并不多，共有 86 首，但他在词坛的名声却比诗坛要大。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汪瑔词确富于特色，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为时人所承认，如陈良玉为《随山馆词稿》作序说："细读之，几于篇篇有意，情迂语缓，自极杼柚之工。"[①] 沈世良评汪瑔词："今读穀庵词气体超洁，邀月能语，遏云不流，其黄鹤楼中玉笛乎！"[②] 一方面也跟汪瑔词与叶衍兰、沈世良词被合编成《粤东三家词》行世有关，三人之作汇成一个创作群体，为名流品评揄扬，于是被视为当时岭南词坛的代表人物，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著名学者和词人谭献在给叶衍兰的词集题词时说："献投老以来，同声斯应，领表贤达，天涯素心，东有汪芙生沈伯眉，望风怀思，西有王幼霞况夔笙，抚尘结契，池波共皱。"[③] 把粤东三家与粤西临桂词派相提并论。

第一节 《随山馆词》的内容

作为情感丰富的词人，往往是将个人的身世之叹、飘零之苦与家国之痛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种深沉凄婉的格调。在汪瑔创作的《随山馆词稿》及其续稿（以下简称为随山馆词），将浑浊沉沦的时局之中个人漂泊之苦表达得更为凄清。在汪瑔的观念里，词是一种缠绵婉约的文体，更适合的是表达幽约怨悱之情，因此在他的词中，除少数几首洒脱之词外，其

---

① 汪瑔：《随山馆词稿》卷首，光绪刻本。

② 同上。

③ 叶衍兰：《秋梦庵词钞》卷首，光绪刻本。

余皆为表达个人情感的愁苦之词，正如词人在词中所言“我亦从来伤心者”①。

一、思乡思亲之愁

在汪瑔词集中，思乡和思亲之愁的表现最具特色，就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词人来说，对家乡以及亲友的思念之情的体会是最为真切的。汪瑔祖籍浙江山阴，少小随父亲在岭南生活，未曾回过山阴老家，广州便是他的真正的家乡，而在岭南的生活也是在漂泊之中度过的，因此在他的词中，常常表现他这种思乡之情。如他在《随山馆词稿》卷首的《浣溪沙·晚泊清远》：

> 酒醒微闻打浆声，推篷刚卸片帆轻，一枝塔影认山城。野港桃三尺水，夕阳桑柘一村晴，客愁还共晚潮生。

这首词应该是作于汪瑔出任幕客之后，傍晚时分，词人趁着朦胧的酒意，听着若有若无的船桨划动的声音，看着远处隐约的塔影，看到夕阳天边桑柘掩映之中的村庄，顿生客愁。“客愁还共晚潮生”，汪瑔用比喻的手法，将客游在外的愁绪写得形象可感，如绵绵不断，欲去还生的潮水般汹涌，无法遏制，恰当而贴切。从整体上看，该词从旅途之中即目之景写起，继而由景生情，不事雕琢。而《宴清都》则写得极为含蓄：

> 未觉余寒敛，迷濛处，不分花影浓淡。帘纹似水，烟痕似梦，作去成销黯。斜阳乍露墙匡，又漠漠，微云半掩。问藏春、何处楼台，移春几处阑槛。新来病酒年华，熏炉况味，无限凄感。袷衣换了，香篝灺后，胜情都减。无端凤纸相思，剩襟上，红冰点点。怕等闲、过却烧灯，东风荏苒。

该词的上半阕在写春来却不见踪迹，无处觅其痕迹，满目凄凉之意，奠定了该词的感情基调。下半阕则直接从词人的生活境况写起，“新来病

① 汪瑔：《随山馆词稿》，光绪刻本。凡文中所引用汪瑔词皆出自《随山馆词稿》及其续稿。

酒年华，熏炉况味，无限凄感”，词人写自己病中仍饮酒的仓皇处境，更会无端增加客愁。这首词的小序写道：“春阴竟日，余寒中人，振触客怀，凄然有述。”点明了该词的主旨。汪瑔借春阴而触动在外的客心，无限伤感。春天在词人的眼中弥漫着未消的寒气，天空阴郁着无法分清花影的浓淡盛衰，因此词人只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晦涩不明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汪瑔之所以把春天写得如此落寞无色，皆因其被无法理清的满腹的客愁所萦绕。

在《高阳台》中，他又写道：“问樽前，多少乡愁，越酒能消”，思乡的愁绪无处消遣，只能借酒杯来释怀，但酒能否真正让词人释怀，李白曾有诗曰“举杯浇愁愁更愁”，此时的汪瑔应该也是借酒浇愁，倍增客愁。

与思乡之愁紧相关联的就是对家乡的亲友的思念，但在词中，汪瑔则把这种相思之情表达得极为委婉含蓄。如《摸鱼儿·秋阴》：

> 似将晴、又还将雨，西风愁锁深院。相思非梦翻疑梦，梦倚罗衾都软。窗半掩，袅几缕、炉熏尽把文纱罨。斜阳欠煖。认蝶瘦萤，寒蛩初雁晚，菊影一篱浅。黄昏近，无奈碧云不见。新来离恨何限！怀人只在重山外，山意也如人倦。帘不卷，倩叠叠，波纹留住辞巢燕。楼台晼晚，剩罢酒堂深，添灯阁小，凉意入湘簟。

这首词塑造出深秋阴晴不定的日子里，一个身居庭院之中的女子怀人的形象，这是历代词人惯用的手法，假托女子形象，实写词人自身的境遇。该词读来格调低沉、软绵无力，处处都将因离别而产生的愁苦之情寓于词中。词的上片从写深秋的天气入手，“似将晴、又还将雨”，给人沉闷压抑的感觉。“相思非梦翻疑梦”，直接描述了因相思而令人几于精神恍惚的地步了，竟不知是梦是醒，可见相思之深切。紧接下来的“瘦萤”、“寒蛩”更衬托出深秋的凄凉，甚至连菊花也是若有若无的凋残景象。词的上片将整个词的氛围置于凄凉无生气的深秋，下片则开始抒发感情。“黄昏近，无奈碧云不见”，这里既是景物描写，也有着另外一层含义。在古典诗词中，“碧云”既指碧空中的云，也常常用来比喻遥远的天边，借以表达离情别绪，此处的“碧云不见”，也可理解为思念的亲人在遥远的地方，就像这黄昏临近，天空中的碧云般无法相见，只叹心中近来

的无限离愁别恨，这也正是词人心中的情感。思念家乡的亲人远隔着重重叠叠的山峦，无以为见，只能深深地思念。在这里，汪瑔没有明确表示要思念的为何人，但从该词的整体格调来看，应该是思念独守闺房的妻子。在汪瑔的诗歌中，有一首专门为其妻子生病所作的《春日示内子》[①]，该诗中有注："时内子方小疾"，足以见出其夫妻情深。

另外如《虞美人》：

春愁无计相回避，只是添憔悴，明知翠袖不胜寒。偏到东风多处倚阑干。红笺湿透相思泪，不拟频频寄。从来不省寄书难，纵有珍珠密字几曾看。

该词也是借女子思春来表达相思之情的，词的上阕写春寒料峭之中，一个因相思而憔悴的女子，虽然明知自己娇弱的身躯难以抵挡早春的寒气，但却故意在东风多的地方独自倚阑干而立，给人一种凄清的感觉。词的下半阕则从该女子的愁绪写起，写她在浸透相思之泪的红色信笺上题上诗词，寄给远方的人，纵是万般想念，也不打算频繁地寄去信笺。她之所以如此压抑自己的感情，只因"从来不省寄书难，纵有珍珠密字几曾看"，言语中包含着对远方的亲人不理解自己寄书艰难的嗔怨，却又无可奈何的伤感。此词，实际是汪瑔反其意而写的，他终日在外跟随幕主坐馆，往家寄信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是深有体会才能将词中女子的形象和心理刻画得如此细致入微，感动人心的。

汪瑔的词中还有不少表达对朋友的思念之情的词作。如《翠楼吟》，该词前有小序："清明日，坐碧痕馆中，微雨如梦，薄寒中人，顾影微吟，不胜凄黯，赋此简仲容、兰台诸子。"清明的时候，词人独自在做幕的碧痕馆中，对昔日友人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而《水龙吟》则是因得杜季英的书信，顿生思念之情而作的，此前亦有小序："甲寅春，曲江旅次，得季英广州书，叙南武之旧游，述东吴之归思，坠欢可忆。客感顿生，渺渺兮予怀也，赋此寄之。"词中先回忆二人往日美好的友情，"芝兰湖上年年住"，用芝草和兰草的美好来借指友情的美好，但无奈却要分

---

① 汪瑔：《春日示内子》，《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1页。

别，数年不能相见，汪瑔在词的最后也表达了物是人非的悲凉之感，“琴囊酒碗，问城西路”，昔日相聚抚琴饮酒，如今也只能向一成不变的城西之路去追问，充满着对友人的思念和对往日友情的怀念。

二、羁旅之苦

与连绵不断的相思之愁相伴随的就是漂泊天涯的羁旅之苦的喟叹，在汪瑔的词集中有多处写到“天涯倦旅”的无奈和心酸。如《翠楼吟》：

> 雨不成丝，云还作暝，帘波微隔香雾。禁烟都过了，是谁把余寒留住。销凝几许。在酒乍醒时，梦曾游处。青袍误。有人似我，惯吟愁赋。欲与，俊赏清欢，向绿芜东郭，红桥西堍。靡吾憔悴矣，怎重趁踏青人去。天涯倦旅，算燕子应知，近来情绪。伤心路，一川烟草，二分尘土。

该词作于清明节时，汪瑔独自一人坐在碧痕馆中，对着自己的影子，不胜凄凉，因此思念昔日的友朋。词的上阕写词人在雾气笼罩的清明日，回忆着往日和友人共同畅游的美好，心中凄惶不止。“有人似我，惯吟愁赋”，用反问的语气表达哪里会有人像我一样，终日吟哦着满腹愁绪的诗词呢？既是对自己“惯吟愁赋”的生活现状的描写，又透露出自己的忧愁是世上的普通之人所不曾有的，以突出忧愁之深重。词的下阕主要表达词人之所以如此忧愁的原因，“天涯倦旅，算燕子应知，近来情绪”，写自己这种旅途漂泊的情怀无人能解，只有燕子才可能体会他的惆怅。这种羁旅的痛苦如此沉重，但在这尘世之中却无人能解，这也是让汪瑔更为痛苦的原因。羁旅途中原本就充满着离别的悲伤和孤独的煎熬，但无人能解则让本已憔悴的词人更痛苦不堪。“伤心路，一川烟草，二分尘土”，化用贺铸《青玉案》中“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①] 的句法，形象、真切地表现出词人迷茫、凄苦的内心世界。全词意境凄清，措辞婉转，生动地抒发了羁旅行役者独自在外的伤感。

另外，如《琵琶仙·春夜听小伎琵琶》中“愁未了，兵尘满耳，况

---

① 贺铸：《东山词》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词类，第 172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2 页。

天涯、人在羁旅”，则是汪瑔感慨在兵荒马乱之中，他却仍要只身一人漂泊在旅途之中。汪瑔词集中的“倦旅”之“倦”，既可作疲倦，亦可作厌倦解，都反映出他对羁旅的无奈之情。在汪瑔对旅途烦恼的苦闷心情背后，蕴涵着他无尽的孤独感。《眼儿媚》中写：

当年听雨小红楼，薄醉正扶头。分明记得，梦回角枕，香润衣篝。今宵重听天涯雨，凉馆一灯秋。轻衾小簟，不教人睡，却要人愁。

该词从不同时间听雨的感受，来表达此时的愁绪。上阕是为了构成与下阕的对比，词的主旨侧重在下阕“不教人睡，却要人愁”。词人的愁是因雨而生，但实际上，“凉馆一灯秋”才是词人忧愁的主要原因。秋夜如豆的灯光下，词人独自听雨难以入眠的身影，令人倍感孤寂和忧伤。

在汪瑔的词中，这种对其独自一人在馆阁内的描写还有不少，如《更漏子》：

枕屏欹，帘幕旧，生怕上灯时候。灯黯黯，雨沉沉，夜深愁渐深。罗帏内，凉如水，已自不教人睡。偏蟋蟀，更芭蕉，秋声又一宵。

该词写词人独自漂泊在外，最惧怕的就是“上灯时候”，更何况是秋雨绵绵的深夜，难以入眠的他，听着啁啾的蟋蟀声和雨打芭蕉的秋声，倍觉凄凉和孤寂。这也是作为幕客的痛苦之处，一年之中几乎都是在外度过的，饱受羁旅之苦。羁旅行役难免经常别离，《踏莎行》就是写离别之时的心情：

断岸西风，扁舟南浦。凄凉行色潮生处。从来樯燕解留人，今番偏不留伊住。摇落多时，低回无语，沉沉江上闻津鼓。纵然此处不留人，何须抵死催人去。

词写离别之时的无奈和感伤，连向来要留人的樯燕，今番也在催着要人离去。这是词人主观感觉的反映，觉得樯燕在催促着亲人的离去，甚至

连津鼓声都是如此。“纵然此处不留人，何须抵死催人去”，表达了不愿离去的心情。该词前写小序“王右丞有《观别者》诗，以长短句拟之”，王维的《观别者》，写的是陌上人家儿子惜别亲人的情景，“青青杨柳陌，陌上别离人。爱子游燕赵，高堂有老亲。不行无可养，行去百忧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邻。都门帐饮毕，从此谢亲宾。挥涕逐前侣，含悽动征轮。车徒望不见，时见起行尘。吾亦辞家久，看之泪满巾。”[①] 该诗写得真挚自然，将离别场面写得如临其境。唐汝询《汇编唐诗十集》中说王维的这首诗“浅浅说，曲尽别思，觉雕琢者徒苦。说他人，其切乃尔，己怀可知”。而汪瑔的词和王维的诗则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抓住了离别之人当时的心情，将一个饱受羁旅之苦的行者，不愿离别的心情多层次、多角度地刻画出来，这也是他自己每次面对离别时的心情缩影。

羁旅之中的孤独和别多聚少的忧愁，使得汪瑔对羁旅充满着疲倦之感，《琵琶仙》的下阕：“江湖犹是倦旅。只蛩初雁晚，欢意非故。短鬓将华，孤心易感，何况秋深如许。新来意绪，似半卷芭蕉，半枯桐树。试问红楼那人知也否?”通过深秋的景物来写他对寄身江湖的厌倦，将他这种羁旅之愁写得极为真切。“江湖犹是倦旅”，则更是直接点明他已深深厌倦这种辗转不定的日子。

对汪瑔表达羁旅之苦的词心进行深入探究，便知他感慨羁旅之苦的真正缘由皆因精神上的孤独感，他在《高阳台·秋夜过孟黍谷丈寓斋》中写道：“桐月窥帘，茶烟飏榻，天涯相见今宵。检点青衫，衫痕都似芭蕉。凉灯照出诗人影，到秋来，影也萧萧。只空阶，落叶寒蛩，肯伴无聊。”旧友的重逢，却是彼此相对如芭蕉般残破的青衫，检点生活的艰辛，让词人不得不感慨“凉灯照出诗人影”的辛酸，这便是汪瑔对自己人生处境的总结。这么清苦的身影足以让人觉得悲凉，更可叹的是“到秋来，影也萧萧”，满含着凄苦不堪的人生况味。

三、韶华渐衰之叹

孔子在《论语》中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②] 对于生命短暂、流年易逝的感叹是历代文人在诗词中表达的主题，汪瑔亦是如此，对于韶

① 杨文生：《王维诗集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27 页。

② 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92 页。

华匆匆逝去，他也有着深刻的感触。在《临江仙》中他慨然写道："三十年来如一梦，酒阑相对嘘唏。流光易改壮怀非，升平词客老，衰病故人稀。"由年老而友人飘零天涯写自己对韶华渐衰的悲吟。"流光易改壮怀非"，可谓他对自我人生历程的深刻感悟。类似这种主题的词在汪瑔的随山馆词中还有不少，如《台城路·甲寅七夕》：

年光不为相思住，等闲暗中偷换。旧事云销，新凉露下，弹指星期流转。西风别馆。只懒试单衣，悔抛团扇。酒醒无聊，画楼消息早时断。银河天上路远，算仙裙玉佩，无计重见。碧海量愁，红墙隔影，此夕最难消遣。情长梦短，便梦到年时，个人庭院。也恐今宵，玉屏秋色浅。

该词作于咸丰四年（1854），汪瑔二十七岁，是年六月十一日，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在佛山镇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世称红巾军。二十六日，天地会起义军十余万人，围攻广州。整个广州城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汪瑔的父亲汪鼎在该年死于广州，时值兵乱，归葬无期，只好埋葬在广州小北门外狮毬冈。这首词作于七夕节，当时汪瑔正只身一人客居韶州，因此当逢七夕的时候，无限感慨。词的首句化用苏轼在《洞仙歌》中的"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句，用来表达时光流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尤其是在团聚的节日里，则更显得孤凄。这里不仅写有思念之意和难以相见的痛苦，还有另一重含义，即壮志难酬的悲凉。"此夕最难消遣"，感叹时光流转得匆匆，又埋怨今夕难以排遣的矛盾，将词人内心对于光阴转瞬即逝，而自我的愿望却难以实现的双重矛盾心态融入词中。

在《琵琶仙》中汪瑔感慨"短鬓将华，孤心易感，何况秋深如许"，实际上，令他发出喟叹的并不是因为深秋的天气，而是对于"短鬓将华"的无奈。

汪瑔在感叹韶华渐衰时，还通过前后对比的手法来表现，如《朝中措》：

春风回首少年游。丝管不知愁。人影青帘小舫，歌声红烛高楼。而今老矣，烟花过眼，雪刺盈头。一样钿蝉金雁，可堪重听伊州。

该词的上阕写词人回忆少年时，春风得意，与友人于酒楼笙歌之中游赏的快意，这个时候的词人从来不曾领略音乐之中愁为何滋味。下阕则转入老年的嗟叹，“烟花过眼”，“烟花”可指青楼女子，而“烟花过眼”则可喻为身外之物，不加重视，也常用来比喻事物转瞬即逝，不留痕迹。结合词的整体意蕴，这里应该指的是后者。接下来写人到老年身体外貌上的变化，“雪刺盈头”，给人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一样钿蝉金雁，可堪重听伊州”，词人不得不感慨，即便是同样的音乐，现在又哪里能够敢去重听伊州这样的乐曲呢?“伊州”是商调大曲的曲调名，这里泛指乐曲。汪瑔在这里写其晚年不敢去重听年轻时听过的乐曲，原因应该是与其上阕所写的“丝管不知愁”相对比，老来易感愁怀，与年轻时形成鲜明的对比，将词人对时光易逝，青春不再的忧愁寄寓在对比之中。

另外，有些词则是将汪瑔这种对生命短暂、青春易逝的感叹融入词中的。如《声声慢》(无人看竹）表达的是物是人非的感伤，生命中与旧友的相聚只能存在于回忆中，短暂的快乐只能成为人生中的过往。《齐天乐》(红笺才写宜春字）是乡人在除夕夜送给汪瑔牡丹女儿红酒，他特为此所作的。词中有“词人鬓丝渐老”句，该词并不是表达感伤的主题，但是从他随意写出的语句可以见出他对于自己生命渐衰的体悟。

实际上，汪瑔虽然常有对生命渐衰的感叹，但他在晚年所作的一些词，却比较旷达。如《好事近》(六十有三年，庚寅初度)：

> 六十有三年，过眼光阴飘瞥。一笑客无能，也只白头骚屑。相看老柏立中庭，枝干劲如铁。虽复不堪梁陈，也饱经霜雪。

在这首词里，汪瑔首先感慨时光流逝匆匆如白驹过隙，继而写自己虽为年老之躯，但却并非意气消沉。他嘲笑“客”的无能，实际就在表明自己虽年老，但却心未衰。词的下阕以庭院中之老柏来相譬喻，表露其晚岁不失雄心壮志的情怀。该词作于汪瑔的六十三岁生日刚过之后，对生命的衰老看得比较淡然，并且有不愿服老的心态。这与其前面所作的词中表达的感情乍看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但却折射出词人内心深处暗藏的隐忧。这是人普遍的心理反应，人愈是到年老力衰之际，愈是不甘心衰老。这不仅是词人的心态，更是一般普通人的心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汪瑔的词作表达的是真性情，并且是人的普遍感情的流露，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第二节　《随山馆词》的艺术特色

汪瑔的词在当时岭南词坛上是颇有影响的，对晚清岭南词坛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随山馆词在整体风格上注重词人真情实感的表达，既有表达个人愁绪的婉约之词，亦不乏寄托深远的高古之语。汪瑔词作虽未能脱离浙西词派的樊篱，但他的词是词人自我感情的流露，表现飘零之苦、光阴之叹，自有一番风味。其随山馆词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婉约凄清与高古旷远并存

汪瑔作词主张词应以言情为要旨，在陈朗山为其词稿所作的序中，写到他曾与陈朗山共论当时词坛的写作现状，汪瑔认为："词者，诗之余也，诗缘情而绮靡，惟词亦然，必先有缠绵婉挚之情，而后有悱恻芬芳之作，情之所至，文自生焉。清空可也，涩亦可也，非然者，镂冰剪彩，真意不存，独区区求工于字句间，庸有当乎？"可见，汪瑔认为诗词同源而不同流，它们在创作上是有着相通之处的，他认为诗词应该以情为宗旨，有情然后文采油然而生。因此，在他的随山馆词中，对情的表达就极为鲜明，不仅有表达个人情怀的婉约之词，亦有抒发古今之慨、寄托遥深的高古之语。

首先，表达个人身世相关的凄清婉约之词在词集中尤多，如《四字令·赋杨花送小侬归吴中》：

> 春烟一汀，斜阳半城。东风吹过清明。正离人酒醒。长亭短亭，山程水程。误他应是多情。恁飘零半生。

该词是首送别词，题为赋杨花，实际则借杨花的漂泊不定来表达离别愁绪。杨花即为柳絮，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杨花总是与离别相思相关联的，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似花还是非花"，使杨花的"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的生动神态跃然纸上，而最末一

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1]，更成为千古名句。该词将杨花的精魂描写得淋漓尽致，而杨花就成了表达离思的代名词。而汪瑔的这篇词则是从杨花漫天飞舞的春天，友人却要离别为写作缘起，将整首词写得极为凄楚。名为赋杨花，实则是对词人自我形象的抒写。“长亭短亭，山程水程”，既是对友人即将离去的前途漫漫的担忧，亦是词人自我人生阅历的感慨。“恁飘零半生”则是将杨花的漂泊不定和词人浪迹天涯的异乡游子情怀融为一体，象征着词人随处飘零的生活状态，达到了物与情游的境界，情思自在词中。

汪瑔一生为人幕客，饱受羁旅漂泊之苦，他在词中有很多表达相思之苦的作品，此类作品都写得含蓄婉转，有不尽之情。如《行香子》：

> 柳絮池亭，燕子帘旌。恁匆匆，过了清明。楝花开后，风信无凭。只片时阴、片时雨、片时晴。抛却银筝，闲却瑶笙。掩窗纱，没甚心情。铜炉香减，绣枕钗横。正昼初长，人欲睡，酒微醒。

该词写一个女子在晚春时候独居时憔悴无主的心态，上阕是关于气候的描写，下阕写此女子在闺房内欲睡还醒的惆怅。整首词属于闺怨词的基调，似此类的情感表达在汪瑔的词集中仍有不少，如《唐多令》（家近赤栏桥）、《摸鱼儿·秋阴》、《虞美人》（春愁无计相回避）等。汪瑔的这些表达婉约的闺怨词，既表达出了他作为幕客常年在外漂泊的真实心态，其中所抒发的愁苦思念之情，皆是因情生词，是流浪异乡的文人的共通心理。在这些闺怨词中，汪瑔不仅仅表达的是对亲人的思念之意，同时还有无人理解、无人赏识的寂寞之感，这也是历代词人经常表达的寓意，使得词的蕴涵更深了一层。

其次，汪瑔的词并非只有婉约一类，也有一些寄托遥深的高古之词。这类词所占比例不是很多，但却是随山馆词中的经典之作，如《百字令·五月望夜，偕叶兰台、杜仲容、季英登粤秀山看月》：

> 空山今古，问月明如许，百年能几？夜半犹来凌绝顶，吾辈清狂如是。城郭千家，楼台一片，都化空濛水。扶胥何处？海天风露无

① 见龙沐勋《东坡乐府笺》卷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际。相与茗碗分曹，蕉衫袒右，顿忘人间世。好事肯同河朔饮，但诩浮瓜沉李。叠磴云生，荒台古地，忽忽生凉意。松阴鹤睡，试凭长笛吹起。

该词是汪瑔年轻时同友人登粤秀山看月所作，同行友人有杜季英，可知作词时汪瑔应是在三十岁之前。青年时期的汪瑔登高赏月，与友人共同赋词，词从一开篇“空山今古，问月明如许，百年能几”，便给人一种旷达豪放之气。“夜半犹来凌绝顶”，用杜甫《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的“凌绝顶”，与下句的“吾辈清狂如是”相应和。词为望月，真正写到月色的只有“城郭”三句，词主要侧重写词人登高望月的感受，与友人在山顶品茶饮酒“顿忘人间世”的快意，在暑天登上云岚缭绕之荒台古地“忽忽生凉意”的惬意，词境与词人的心境一样开阔旷远。结句“松阴鹤睡，试凭长笛吹起”，更是富有寓意。鹤在古典诗词中有着多重的象征意义，在历史记载中，鹤具有权贵之宠物的象征寓意，而在仙话传说中，鹤则是仙人的乘骑和学道成仙的标志。汪瑔此处的“松阴鹤睡”应是对《周易·中孚·九二》中“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①] 的爻辞的化用，通过鹤在松下眠的形象，营造悠然闲适的意境氛围。而“长笛吹起”则更有韵味，静谧的环境中长笛声显得空灵而有警醒的意蕴。

另外，汪瑔所作的两首《金缕曲》也充满着慷慨之志，在《金缕曲》（我亦瞢腾醉）中，汪瑔对着苍茫的天空“悲歌长啸”，感叹无人能识得落寞之情。“有剑光，三尺凝秋水。嗟此意，几人会?”以宝剑之无人能赏暗喻自己的才华无处展露，而“满天涯，何处容吾辈”则近于对自己郁愤的心情的直接呼号，可谓激愤之词。《金缕曲·陈朗山孝廉和余〈金缕曲〉，慨当以慷，情见乎词矣，辄广其意，赋此奉酬》也是一首愤慨之词，词中写词人自己的“年少飞扬快意”，以及其与陈朗山惺惺相惜的知己情谊。词的下阕则写得极为旷达，“悲歌作达终非计。算从今、名山事业，尚须料理。但使太元奇字在，终有桓谭后世。且射策、端门重试。十里长安花看遍，好从头，一吐才人气。寥落恨，莫提起。”词人期待着能够有机会一展鲲鹏之志，并不是一味对自己落魄的现状进行悲歌痛吟，对

① 黄寿棋、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98 页。

前途充满着无限的憧憬。

汪瑔的部分词作寄托遥深是得到了当时一些词人的肯定的，陈良玉在为汪瑔的随山馆词作序时称赞汪瑔的词“几于篇篇有意，情纡语缓，自极杼柚之工”，其中“情纡语缓”的确是对汪词整体风格的恰切概括，而“篇篇有意”则是过誉之词。不过在汪瑔的随山馆词中，颇具意味的词除了上述几首词之外，还有一些寄意深远的作品，如《齐天乐·秋蝉》、《萤》等。《齐天乐·秋蝉》是咏物之词，后来论词家对其评价颇高，该词极得浙派词人咏物之词的风神，将秋蝉与人相互契合，主客观达到了和谐统一和完美的结合，将咏物词的审美内涵推到了极高的境界，看似写秋蝉，实质是写人，全词未提到一个“蝉”字，分明在字里行间突出着秋蝉的特性，寓意极为深刻。

汪瑔在为陈朗山的《荔香词钞》作序中认为陈朗山的词“情真婉约，足以上追朱厉，欣赏不置，而君击节，余所为词亦不啻余之于君也”。汪瑔以“情真婉约”来称赞陈朗山的词，而他自己作词也是秉承着这一宗旨的，“情真”也是汪瑔词的特色之一。综合以上两点，可见汪瑔词以抒发性情为第一要义，不拘泥于一种风格，既有婉约含蓄之词，又不乏豪放旷达之作。

二、随山馆词的常用意象与其词境的关系

汪瑔的词常常借助景物来衬托感情，将个人感情的抒发与外在环境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词人的感情得以更恰切的表达。在创作这些情景交融的词时，汪词常使用与秋、雨、风等相关的意象，而此类意象的运用使得汪瑔的词境笼罩着凄清的愁绪，这是汪词的另一艺术特色。

意象，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范畴之一，是作家根据抒情言志的需要，由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对种种现实现象进行艺术概括，从而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的具体的审美图像。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一些常见的意象各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和情感内涵，如菊花象征着淡然隐逸与世无争，梅花代表着高洁不肯屈服的傲骨，杨柳寄寓离情别绪等。汪瑔所常用的秋、雨、风等意象是含着悲愁的意绪，这与其词的整体意境和风格有着极大的关联。

首先，是关于秋意象的运用，在汪词中直接写到秋的共有 26 处，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写秋，如秋阴、秋蝉、秋信、秋心、秋声、秋色、秋

气等。

自然界的秋天是有着多种景象的，既有万物收获的繁盛，也有草木凋零的萧瑟。但汪词中所描写的秋的意象，充满着凄清冷落的愁苦之意，他借秋天意象，来倾诉其漂泊在外的思念之苦，同时也抒发人生失意的感慨。如《琵琶仙·雨声送凉，灯影留梦，倚衾赋此，不自知其黯然也》：

> 一灯凉照青衫影，今宵待寻秋语。罢酒堂空，留香阁小，偏觉秋无寻处。愁多梦误。正欲度微云，又闻疏雨。十二屏山，梦魂不到此中去。江湖犹是倦旅。只蛩初雁晚，欢意非故。短鬓将华，孤心易感，何况秋深如许。新来意绪，似半卷芭蕉，半枯桐树。试问红楼那人知也否？

“江湖犹是倦旅”点明该词抒发的主旨是浪迹天涯的彷徨愁苦，“愁多梦误”，词人埋怨愁绪是因梦而起，更将词人的愁苦写得缠绵婉曲。整首词的抒情氛围是秋夜词人在孤灯之下落寞的身影，首句中“青衫影”指出词人生活清苦的处境，而独自一人在外，友人离去，与形单影只的词人相伴的唯有落寞与孤寂。词人感叹秋的踪迹无处可觅，不免顾影伤怀，由内心的寂寞而觉秋无处可寻，继而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之苦，常年流落异乡的愁怀。秋天万物凋零，似乎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古人常借秋悲叹英雄迟暮，人生苦短，在这里汪瑔也由秋引发对时光易逝的喟叹，再加上眼前又是满目荒凉的秋景，叫词人如何不愁？

《清平乐》也是从描写秋天悲凉的景色出发，来写词人凄苦的秋心，词曰：

> 冷萤无数，飞过楼西去。楼外几丝桐夜雨，作得新凉如许。丽谯虬水沈沈，更深不似愁深。何处四条弦子，替人弹出秋心。

该词描写了一幅秋夜冷雨图，用一系列秋天特有的意象来为词人的“秋心”作映衬，如冷萤、梧桐雨。类似这样的与秋相关的意象的运用在汪瑔的词中也有不少，如《高阳台》中“一样池台，偏他草树先荒”、“有萧萧，落叶如烟，伴取啼螀”、“衰柳残荷”，《更漏子》中

“偏蟋蟀，更芭蕉，秋声又一宵”，《满江红·江楼秋眺，寄金湝生于役梧州，约以杪秋东下逾期不至，而又无书赋此讯之》中“白菊年光花畹晚，苍梧古意客淹留”、“呼寒雁，唤沙鸥”、“霜日分明枫叶”、“问今宵，凉月照天涯，何处秋”等。在这些意象中，是饱含着凄凉的意蕴的，在汪瑔的词中，秋天的柳是“衰柳”，荷花是“残荷”，秋天的大雁是“寒雁”，甚至连秋天的月亮都是“凉月”。从他对这些秋天自然景物的感受来看，词人的内心是和这景物情态相融合的。

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①]，汪瑔频繁地写与秋相关的意象，这些意象都是凄冷的色调，反映出他内心的凄苦之情。本来，自然界的事物是没有思想感情的，但当词人把这些客观事物纳入其审美的认识和感受之中时，这些事物便被赋予独特的感情色彩，不再是孤立的景物，而与其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在汪瑔的眼中，秋天是一个萧条感伤的季节，天气转凉，秋风萧瑟，草木枯黄，万物肃杀，都给其悲凉的感觉，也形成了他的“悲秋情怀”。这也是中国古典诗词里延续了数千年的特殊情感，秋的意象总是与悲愁、悲戚、悲郁的情绪相组合，是充满着离愁悲怆的意象。汪瑔在词中就是运用传统的寄情于物的写法，通过有形可感的事物，把自己作为幕客漂泊天涯，远离亲友的孤寂落寞和人生失意之悲表达得含蓄婉转，真挚动人。

其次，关于雨的意象的使用，在汪瑔的词中共有31处，除了一首《初夏》中的“难得夜来溪上雨，真解作，十分凉”是写夏雨之外，其他的皆与春雨和秋雨相关，这与汪瑔喜好用秋的意象入词是有着相通之处的。

自然界的雨，点点滴滴，绵长细密，从物理形态来看，仿似人的眼泪和愁绪，因此，雨是文人言情造势常用之物。在汪词中常通过对雨的意象的描写，或直接寄托情思，或借雨烘托抒情氛围，或情景交融。

如《水龙吟》中“我亦清愁如许。数天涯，几番风雨”，这里的风雨既是词人生平所经历的风雨岁月，又饱含着他对自己人生际遇的直接感慨，有种对现实境遇颠沛流离的凄楚感。该词作于1854年的春天，汪瑔二十七岁，正处于人生的青年时期，但词中却蕴涵着深深的愁绪。此时汪瑔正客居曲江，而他在旅途之中得到友人杜季英的书信，在信中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7页。

杜季英写到往日二人游历的快意，而此时的汪瑔睹信思人，不免顿生作客他乡之愁。[1] 词的上阕中写“江山有意，莺花无赖，要人羁旅”，词人感慨如此绚烂的春景，而自己却困于羁旅，纵是再好的春光也无心留恋。此处从写春天的景色着眼，但“风雨”却不是实写，而是具有广泛意义上的虚指，主要是用来表达词人内心的感情。《摸鱼儿·秋阴》中的“似将晴、又还将雨，西风愁锁深院”，也是借对自然界将雨未雨的天气的描写，来表达词人在秋日里独自思念远在重山之外的亲人的无奈之情。

至于借对雨的意象描写来衬托抒情氛围，在汪词中更是随处可见。如《齐天乐·秋蝉》中“秋心似诉，正衰柳斜阳，古槐疏雨”，通过对秋天衰飒的景象的描写，烘托出凄凉的氛围，更好地寄托感情。《清平乐》中则是用“楼外几丝桐夜雨，作得新凉如许”，含有双关的意味，“丝”谐音“思”，“凉”既是气候的转凉，也是词人心中的凄凉，写出词人在秋夜里难以排遣的愁绪。而《如梦令》则整首词都是在写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同时又将对雨的描写融入其中，词曰：

> 旱雁晚蛩天气，病酒阻风情味。偏到倚阑时，只是雨濛濛地。知未？知未？黄叶和人憔悴。

“憔悴”点出词人所要抒发的感情，而其他对自然界的物候的描写都在起烘托作用，景中含情，情自生焉。此处用“濛濛”叠音词，读起来缠绵有余味，情思绵长。在写雨的意象时，汪瑔常用叠音词，诸如有“偏是黄昏，偏是雨潺潺”，“便随芳草到城东，却又春烟漠漠雨濛濛”，“天涯试觅春来处，柳外濛濛雨”，“灯黯黯，雨沉沉，夜深愁渐深”，“纱窗闲听雨潇潇”等，这不仅显示出汪瑔在作词时好用雨的意象，而且还有他的独到之处。

再次，在汪词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就是“风”的意象，共有50多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风这一意象也常常是思想情感的载体。陈植锷在《诗歌

---

[1] 该词前有小序：“甲寅春，曲江旅次，得季英广州书，叙南武之旧游，述东吴之归思，坠欢可忆。客感顿生，渺渺兮予怀也，赋此寄之。”

意象论》中把风这一意象归纳为和雨一样同属于取材于自然界的物象[①]，“古人进行意象营构的目的，在于抒写主体的情志；他们尽可能地采用思想与情感容量较大的具象性意象来表情达意，这些意象，主要的也就是我们所关注的母体性意象。其实，许多看似随机性的即景写实之语，因其每每因循惯常思路，也往往能唤起人对特定的意象及相关情思的联想。”[②]因此，风和雨属于同一来源的意象，在抒情达意上是有着相通之处的。结合汪词中与风相关的词作，可以看出他主要运用的是风意象的抒情性功能，具体体现为与乡愁和相思相关，常写东风，西风。

在汪词的50多处写风的词句中，直接写东风的共有18处，分别是：

怕等闲、过却烧灯，东风荏苒。（《宴清都》）

记得小蘋初见，柳花飞趁东风。（《西江月》）

奈何许，刚是几日东风，红楼燕飞去。（《祝英台近》）

茜袖低垂，肯轻摘、谁写东风小影，须分付、珊瑚吟笔。（《红情》）

春烟一汀，斜阳半城。东风吹过清明。（《四字令·赋杨花送小侬归吴中》）

来去。帆影侧，趁着东风，吹向春多处。（《喜迁莺》）

无奈客里销魂，东风正飞絮。（《琵琶仙·春夜听小伎琵琶》）

杨柳几多丝，东风应未知。（《菩萨蛮》）

力弱东风扶不起，只是一丝丝地。（《清平乐·柳》）

鸳鸯犹记卅六，何事东堂有恨，东风无力。（《绮罗香》）

东风吹湿护花幡，偏是花时添得几分寒。（《虞美人》）

红阑几弓，红帘几重？几番禁了东风，作深红浅红。（《四字令·微雨作寒重帘隔，梦见缸中桃花黯然，有作》）

---

① 陈植锷：《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我们还可以按照意象内涵的不同粗分为三大类：（一）自然的。这一类意象主要取材于自然界的物象，包括花、鸟、草、木、山、水、风、云、雨、雪、日、月、星辰等等。（二）人生的。这一类意象主要取材于人类的社会活动，如人物、用具、时间、地点、事件、典故等等。（三）神话的。这一类意象既不专属于自然，也不专属于人生，但它又切切实实是自然和人生的反映，只不过这种反映是借助了初民的幼稚想象而采取了非现实的或者说超现实的艺术手段。”

② 王立：《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人倚东风倦不禁，旧游如梦怕追寻。（《浣溪沙》）

取次鹅黄上柳条，东风不暖卖饧箫。（《浣溪沙》）

红笺才写宜春字，东风已催春到。（《齐天乐·己丑元旦作，乡人于除夕以牡丹女儿酒馈岁，故后段及之》）

偏又东风无气力，留住余寒。（《浪淘沙》）

春愁无计相回避，只是添憔悴，明知翠袖不胜寒。偏到东风多处倚阑干。（《虞美人》）

冰棱絮帽，缓索南枝笑。不为东风吹不到，只是巡檐太早。（《清平乐》）

直接写西风的共有9处，分别是：

似将晴、又还将雨，西风愁锁深院。（《摸鱼儿·秋阴》）

西风一夜来何易，寒声已传高树。（《齐天乐·秋蝉》）

一样伤心泪，问天涯，西风几日，作愁如此。（《金缕曲》）

莫卷西风帘额，正睡鸭偎凉，乱蛩吟夕。（《三姝媚·赋杜季英斋前木芙蓉，索季英、朗山和》）

西风别馆。只懒试单衣，悔抛团扇。酒醒无聊，画楼消息早时断。（《台城路·甲寅七夕》）

西风惯作莼鲈梦，奈贺家湖冷，秦望山遥。梅岭花田，几番分付吟瓢。寻常一卷江湖集，赚年年，旅鬓霜凋。问樽前，多少乡愁，越酒能消。（《高阳台·秋夜过孟黍谷文寓斋》）

帽影低檐，衫痕叠皱，西风吹到闲坊。（《高阳台》）

断岸西风，扁舟南浦。凄凉行色潮生处。从来樯燕解留人，今番偏不留伊住。（《踏莎行·王右丞有〈观别者诗〉，以长短句拟之》）

不信西风，才一霎，凉透了，藕丝裳。（《唐多令》）

在古代诗词中，“风”意象往往具有显示季节特征的作用。古人把四季与四方相配，《礼记·乡饮酒义》说：“东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①]，因此，描写不同方向的风可以暗示不同的季节，东

①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6页。

风一般暗指春天，西风则与秋天直接相关联。

不同季节的风给人不同的冷暖感受，能激起不同的情绪反应。“东风”易使人伤感，它的到来宣告着一年的逝去，顿生年华易逝的惆怅感，如汪词中的“怕等闲、过却烧灯，东风荏苒”，“奈何许，刚是几日东风，红楼燕飞去”，“红笺才写宜春字，东风已催春到”等。同时，东风易生伤春之哀怨，与相思有密切关联。汪词也常借东风来写相思之苦，如“杨柳几多丝，东风应未知”，通过写东风不解杨柳之“丝”，写其内心深处的相思无人能知的苦闷，“人倚东风倦不禁，旧游如梦怕追寻”，写百无聊赖的春阴时候，往日的亲友不在身边，即便是暖人心脾的东风，也无法解除词人的忧愁，而“春愁无计相回避，只是添憔悴，明知翠袖不胜寒。偏到东风多处倚阑干”则是通过东风吹透翠袖的寒意来突出相思却无奈的愁绪。

而西风则是秋季特有的产物，萧瑟凄凉，使人感到愁苦，易生思归之感。《世说新语·识鉴》记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①] 张翰因见秋风起而思故乡风味，顿起还乡之念。在后世诗词中，“秋风”常常是引发乡愁的重要媒介，秋风一起，天气转凉，此时远离故土、亲人的游子自然会倍加怀念家乡的温馨，叶落归根的自然现象，也会使游子触景生情。在《高阳台·秋夜过孟黍谷丈寓斋》中写道：“西风惯作莼鲈梦，奈贺家湖冷，秦望山遥。梅岭花田，几番分付吟瓢。寻常一卷江湖集，赚年年，旅鬓霜凋。问樽前，多少乡愁，越酒能消。”词以西风引起“莼鲈梦”，来写思乡之情，西风作为秋的象征，倍增愁怀。至于《高阳台》中写“帽影低檐，衫痕叠皱，西风吹到闲坊”，更是将词人在西风萧瑟时节的飘零之苦渲染到极深的境界。

综合起来看，汪词对秋、雨、风等自然景象的偏爱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这些自然现象具有必然入词的特征，而是词人对这些意象有着独特的审美心理倾向。陈植锷先生在《诗歌意象论》中对杜诗进行意象统计时说：“尤有兴味的是，‘雨’的意象比‘晴’多了六倍，假如由此得出诗人大

① （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刘强会评辑校：《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2 页。

部分作品都产生于雨天，可就要弄得笑话百出了。"[1] 因此，不同的意象，在不同的作品中，由于作者心境不同，表现出的意蕴也往往不尽相同。汪词之所以善用这几类意象，是与其词中所抒发的感情有着直接的联系的，也是其词风格特色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类意象的使用，不仅反映出汪瑔个人生命的状态，也是将自然界常见的景物融入词中，与词人内心的思想感情相融合，将词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造诣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意蕴更加丰富深厚。

① 陈植锷：《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6 页。

第五章

汪璟的散文创作

汪璟的文学创作除诗词外，还著有部分短小精悍的散文，收录在《随山馆丛稿》和《随山馆尺牍》中。在《随山馆丛稿》前的自序中，他回忆自己学文之经历："余年十四，从童润斋先生游，先生授之以《文选》，洎唐宋八家文，教以行文之法"，"既入有司幕，章奏、书檄之外，亦颇有文字之役，因而时时间作"①。虽然汪璟在自序中一直谦虚地说"吾文不足存也，骈体才力弱，又匙学殖，固已无取。散文初未致力，不知义法为何事，则尤下矣"，但他继而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况多出于道路奔走，官书填委之余，牵率酬应，有求工而不得者乎?"他有心致力于文的创作，然而为公务应酬牵绊，未能如愿。事实上，他对自己所作之文还是颇为满意的，"曩之所作，差可自信者，亦有三数篇，既失其本，难于追记"，昔日的得意之篇不复存在，只剩下疵累不足观者，但他仍同意甥侄门人辈为其付梓，说明他认为这些文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第一节　汪璟散文的类别和内容

汪璟现存之文，共计129篇。其中《随山馆丛稿》四卷共收录51篇，包括书信5篇，序22篇，碑志9篇，祭文2篇，传记1篇，论说文3篇，寓言4篇。《随山馆尺牍》上下两卷，共收尺牍80篇。从文体上来看，汪璟的散文体裁多样，而在表达方式上则兼有记叙、议论等，若只依照某一单独标准来分类都不够科学。谭家健在《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中针对如

---

① 汪璟：《随山馆丛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何对古代散文进行分类之时，认为“应该以内容为主，形式为辅”①，据此原则，谭先生主张把古代散文分为四类：记人记事类，写景状物类，抒情言志类，说理论道类。此划分颇具现代散文分类的特色，实际处理过程中对古代散文的文体分类上比较模糊。笔者参考谭先生的分类标准，以形式为主，内容为辅来将汪琬的散文进行分类。因古人对文体的辨别是非常明确的，不同的文体应有不同的形式特点，不辨体则乱。但若仅从形式划分，不考虑内容，又易陷入形式主义的极端，难以把握作家创作的整体性特色。苏联莫·卡冈《艺术形态学》中针对文章的体裁这样认为：“种类和体裁不是学究们臆想出来的，已经衰亡的，‘裸露的’，‘空洞的’形式结构，而是其中历史地发生着‘内容的凝固和稳定’的形式。”② 因此在对作家作品进行分类时，应同时考虑形式和内容，才能不失偏颇。据此，笔者把汪琬的散文划分为以下六类：书牍文、序文、碑志文、寓言、论辩文、祭文等其他文体。

一、书牍文

书牍文，古代书信的通称。古代以“书”名篇的文字，实际上包括两种文体：一是臣下向皇帝陈言进辞而写的公文，称为“上书”或“奏书”，届“奏议”类；一是亲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单称“书”，或称“书牍”、“书简”、“书札”等，属“书牍”类。③ 我国的书牍文产生于春秋时期，至汉代而完全脱离公文性质，成为个人交流感情的工具。本书所言汪琬的书牍文，主要指后者，即私人信件。在汪琬的散文集中共有87篇，除《随山馆尺牍》的80篇尺牍外，还有书4篇，奏谢文1篇。其中一篇奏谢文是属于“奏议类”，其他皆为“书牍类”。

谭家健先生把赠序列入书牍文的范畴，他曾指出：“赠序实际上也是书牍。它不同于序跋之为诗文而作，也不同于一般书信因事而发，而是一种对朋友送别赠言性质，起源于古代赠人以言的习俗。”④ 但本书不将赠序归入书牍文，首先是因其体例与一般的书牍文确实有所不同，赠序一般

---

① 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② ［苏］莫·卡冈：《艺术形态学》，凌继尧、金亚娜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0页。
③ 王育颐：《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第三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4页。
④ 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580页。

是单方面创作的，即送别者为远游者所做，这和书牍文的往复性有所不同。另外是因为在内容上，书牍文所言可变化不定，但赠序所表达的内容必然要与离别之人有所关联，有一定的局限范围，故未依据谭先生所言把赠序归为书牍文的范畴之中。

“书牍文的内容极为广泛，大至论政、讲道、谈文、评述人物，小至倾述个人遭遇，抒发个人感情，以至问寒暖，话家常，其内容包罗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① 汪瑔的书牍文也是内容比较丰富，在与友人书信往来之中，不仅以言达情，更不时闪耀出思想的光芒。其与友人书信中所谈内容广泛，既涉及军国大政，亦不乏为人处世之道。究其内容主要囊括以下五个方面：

1. 为政之策

汪瑔自幼随父游历，二十六岁便出任幕客，历佐官员七公，共在幕府三十余年，司文书、办夷务，献计谋策，“身为布衣，常存报国志”。在其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之中自然难免商讨为政之策，纵使文人不能有治国安邦之实权，亦应常怀报国之思，心存治国平天下之志。身为幕客，自与一般文人有所不同，幕客佐官，当若身居此官者，方能优游处置文告，韬略时政。久而久之，即未为官，亦有为官之智。汪瑔的书牍文中，所言为政之策甚多，既有治国之策，用兵之法，又有为官之道。

首先，在治国之策上，对国之富强与施政教应孰先孰后的观点上，汪瑔和黄玉舟展开讨论。黄玉舟认为“为国必先求富强，然后可施政教”，国富民强之后政教方能施行，是以国家应该先致力于经济上的富足，而后施行观念上的教化。汪瑔则认为黄玉舟“语殊有病，富强亦须以政教致之。即贫弱时，岂遂可无政教耶?”同时，汪瑔还认为国家富强不仅仅指“府库之充，兵甲之利也”。对于国家如何富强，他说“民必先富而后国可富，上能自强而后兵可强”②，富是由小及大，而强则是由上及下的。

由于汪瑔一生足迹未逾岭南，在治政方面，对如何治理岭南，更有他独到的见解。在《与某观察》中，由某观察问“治粤之道”，继而引出他对治粤的策略。“治粤者，必先以静”，这是根据“粤人气浮而志嚣”的

① 王育颐：《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第三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5页。

② 汪瑔：《与黄玉舟》，《随山馆尺牍》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习性，“制动必以静”，因以静克之。此策略乃汪瑔早年问学于师所得，师之所言，而当时他不甚明了，至于周游岭南各地之后，才恍然悟得“治粤之术，无逾此者”。而在具体的治粤过程中，如何实施，汪瑔详尽地告知某观察：“故其善治粤者，其初必以静持之，寂然不动，行所无事而于其间，阴察其势之所趋，患之所中，熟思深虑，度夫事之必当为，而吾之才又必能为者，力而为之，不傍挠，不中沮，期于如吾之所欲为，而后止。其始亦必有讥讪骇愕者，逮乎政成事举，则群喙咸止，众心悉孚矣。如是者，一二事之后，其余必皆迎刃而解。恩威并著，政令毕行，然后示以好恶，使士民知所趋舍，益之以文教，使士民知所效慕。粤地殷富，富而教其事，良易也。”[1] 教化民众，恩威并施，是乃文人治政之理想境界也。这也跟汪瑔“才性开济，识虑通远”的性格相契合。

其次，关于用兵之法，汪瑔在其书牍文中也有所涉及。在《又与某太守》[2] 中，某太守来信极力称赞胡文忠公用兵，“先择将安民，先察吏”，是所谓严以察吏，宽以驭民之略，以此用兵，则兵拥民爱，可谓用兵之至。由此汪瑔还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现状，“世何尝无择将察吏者，无明眼，无诚心，则择犹不择，察犹不察矣。”[3] 对为官者不能如胡公之能，表示嗟叹。在《与亿林》中，汪瑔就亿林所作《广东海防丛议》中关于治海防的措施进行评述，并提出自己对治海防的设想。亿林认为治海防应“练水勇”、“制小舟”、“沿海陆地，亦须分东西两路设游兵，以备应援”。此构想，前两条，与朱鉴成的想法约略相似。对第三条，汪瑔指出，“陆路设游兵，则布置较密，然亦有可商者。沿海几二千里，虽分两路，每路当顾者各千余里。敌舟轻漂，瞬息百里，陆师虽疾行，不能及也。若其倏东倏西，则我军疲于奔命。又或以舟师数队，分犯各海口，则我师备多力分矣。”[4] 此策乍看合理，深思之则行不通。对这种普遍布兵以防范敌人来攻的举措，汪瑔是极力反对的。在《与友人》中对如何守边，他认为“吾所必当守者，不必问敌人之攻否也”，因“设沿边地有七八千里，能遍守之乎？”因此对于海防，汪瑔提出可效仿胡林翼在湘北所

---

① 汪瑔：《与黄玉舟》，《随山馆尺牍》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采取的硐寨法，“当以硐寨辅之滨海乡村，或数村，或数十村，合筑一寨，寨外筑硐，使声势联络。敌至则入寨，敌攻则互援。”[1] 至于此法是否能行，姑且不论，只是能借鉴他人用兵之法，为我所用之思考途径，确属难能可贵。

再次，汪瑔虽为一介幕客，但却谙熟为官之道，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往往能言之成理。在《与胡大令》中，汪瑔对如何做一个体察民情的好官，对胡大令进行规劝。汪瑔此函的目的，并不是因为胡大令非好官而对他进行劝诫，主要是针对官员权位愈崇而愈不察民隐，难闻直言的社会现状的担忧。胡“今日作县令，异日所到不可量”，汪瑔劝其在以后升任之前，应自我审度是否能胜任此官，若自觉不足以任，应立即引退，当位高权重之时，即便是自己想要引退已无退路。况且，据汪瑔看来，官做得愈高，则建树愈小。此种冷眼静观官场之现状，又能借劝诫友人之书婉曲写出，也是汪瑔作为幕客作文的特点。在《与某太守》中，汪瑔写信告诉某太守，自己数十年来所见人心败坏之事，即以揭发别人的过失来赢得自己的声誉为荣，感叹不已。汪瑔所欲言，揭发别人的过失或阴私，此种风气不能开，一开则人心向坏，而那些揭发之人也未必就是正直之人。为官者，更不能为争取声誉，擅开揭发之门，要不即为败坏人心风俗之罪魁祸首。在汪瑔的观念中，为官之道即在有所建树，使四海清平，造福一方百姓。在《代与某太守》中某太守来书询问其宾客是否狭邪，而汪瑔劝诫其不应与近世俗吏为伍。“近世俗吏，往往于子姓之骄恣，戚党之凭陵，奴仆之作奸犯科，一无所问，而独于二三宾客日事关防”，他嘲笑此类官员为官不问民事，而独于此区区琐事劳神费力，昏聩不知为官之本，不知何谓体要，何谓枝末。此语可谓直揭晚清官场的垢弊，令人震惊，又有所思。

2. 人才之辩

汪瑔生活的时代，清朝处于行将就木，大厦将倾的末世，列强入侵，农民起义，时局动荡，正是用人之际，而昏聩颓败的时局，亦是人才被埋没的渊薮。因此，在与友人往来的书信中，对人才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得人才的辩论就时常有之。

首先，何谓人才以及人才究竟在处理事务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在

---

[1] 《随山馆尺牍》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汪瑔的尺牍文中有着明确的解释。在《致陈朗山》[①] 中，汪瑔认为“人才有纵有横，有数十年之才，有数百年数千年之才，此才之纵者也。有数百里之才，有数千里、数万里之才，此才之横者也。深厚者，宜于纵，博大者，宜于横，其量可及数百里，或者不能及数十年，则横者较易得也”。按汪瑔的理解，人才有深厚与博大之分，博大易取，深厚难得，二者若兼得者，可谓人才中之极致。而在《代致某观察》中，汪瑔直接肯定人才是处理一切事务的关键所在，“得人是第一要义”[②]。因为凡事不管难易，皆须有人处之，尤其是难事，更需人才方能解决。而在《又与贾虚谷》中友人时常以国家“财不足、器不精”，不能富强为担忧，汪瑔则认为“故是二者，皆富强之末事也，其本在于得人。枢廷得人，封疆得人，则其得理财制器之人，不难也。得其人，则财足器精矣”。国家富强的根源在于得人，若能得人，便可无忧。在《又与黄玉舟》中写道：“近日读曾文正、胡文忠两公遗集，皆以留意人才为务，卒成中兴之功。”[③] 曾、胡二公留意人才，而终成大业，可谓人才在现实社会中所展现出重要作用的最好明证。官得人才者成，国得人才者强，可谓汪瑔对人才的理解，切中肯綮。

其次，人才在为政和处事中担当如此重要之重任，那么对人才的多寡优劣与得之的难易的辩论就成为关注的焦点。

对人才的多寡、优劣，“人动谓今世人才不如古人”，而汪瑔则不这么看待，他认为“古之人庸庸者，皆已不传，传者皆非庸人也。世间庸人多，故觉今不如古耳。其实今世何尝无才，有之而不知。知之而不用，用之而不当，斯不能不让古人矣”[④]。其友人常抱怨人才不足，今世人才不如古，而从不去追问，为何人才不足，是真无人才，抑是别有原因。汪瑔在回信中给友人详细地解释了他的困惑，因今世之环境，阻碍人成才的因素太多，而有助于人成才的因素则没有，那也无怪乎能成才者较古之人少。关于阻碍人成才的因素，汪瑔总结为三点：“穷约湮晦，以境遇损其

---

① 《随山馆尺牍》卷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② 《代致某观察》，同上书，第57页。

③ 同上。

④ 《随山馆尺牍》卷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类，别集类，第15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神智，则人才之伤者一；意为指麾，大受小知，差互参错，使其疲顿，则人才之伤者二；又或妒嫉才贤，恶出己上，苕颖甫萌，亟加践踏，则人才之伤者三。”这是汪瑔由其阅历而得出的感受，也是对晚清时期社会弊病的指陈。

但是，对今世之人才，汪瑔并不赞同友人所言，他说：“我朝养士数百年，必有魁杰英隽之才，宏达英多之彦，出于今日，以副国家之用者，特吾辈未之见耳，足下其姑俟之。”从他的语气中，他自信今世人才并不匮乏，要与友人拭目以待优秀人才的涌现。

其实，人才的多寡优劣是很重要，但是否有人发掘现有人才则更为关键。若徒有人才而不被重用，使其无处发挥其才识，则人才亦不能称为人才，只能湮没无闻，同于庸人。因此对如何获得人才，人尽其用，汪瑔也和友人展开论辩。汪瑔的观点是：“不患夫理财制器之无其人，患夫有其人，而无善用之者也。”[①] 他担心有才而无善用才之人，“知人难，知非常之人尤难”[②]。这就牵涉到两种人：知人者和非常之人。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知人者，“己有才，乃能知人之才。己有倍人之才，乃能用人之才。至于成就人才，则非德业、器量包举一切者不能也。”这就对知人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不仅要有倍人之才，又要德业、器量兼备。而非常之人，“平日行事言语，未必大异于庸众。特其安身立命之处，自有不与俗同者。此须冷眼察其所忽以明，眼瞻其所蕴，乃能得之。”非常之人需要知人者用心地冷眼旁观，才能发现，若只察其表，未必能识之。因为“若平日嚣嚣然，标高揭异，自命豪杰者，即小有才智，亦不足以当大任。能当大任者，平时尽与常人同，临事自与常人异”。非用心观察，是无以辨别孰为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异于常人之处，必须在临事之时，得以区别，设若在平时，又该以何种方法鉴别呢？由于识别非常之人的方法，很难有固定的程式和途径可依据，使得知非常之人就愈困难。对居官者来说，且不论其是兼有知人者的才能，想要遴选有才能之人，本来就非易事。“大吏之求才，难于寒士之择交，位分尊，则壅蔽多有也。”[③] 非常之

---

① 《又与贾虚谷》，《随山馆尺牍》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② 同上书，第62页。

③ 同上书，第65页。

才本不易发现，而大吏位尊权高，难以下察，是以才人不得志者多矣。

3. 处世之道

汪瑔“才性开济，识虑通远”[①]，身为幕客与幕主相处极为融洽，而又交游广泛，在其书牍文中，时常以其通达之性情开导友人，以其隐忍无争之处世态度告诫友人。这既是汪瑔对处于困境之中的友人的劝导，亦是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领悟。虽然其中不乏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但在某种程度上，可窥见其为人处世之道，更深入理解汪瑔的人格魅力。

汪瑔为人宽容和善，他主张“知人论世，与其失之刻，不若失之宽耳”[②]。这是他与贾虚谷在书信往来中，由评价古人诗歌之时所悟出的道理。贾虚谷在评价赵子昂的诗歌之时，痛斥赵之仕元。汪瑔认为其评价太过苛刻，他认为赵之仕元，“失足自误而已，迹其生平，初无蠹国殃民种种害人之事”，而贾虚谷却对此行为苛刻地痛加诋毁。汪瑔的另一友人杜季英则恰恰相反，他在对牧斋、梅村进行评价之时，“皆多恕词”。虽然汪瑔并不赞同把牧斋和梅村、子昂一同归为“失足自误”的类别，但他更反对贾虚谷一味苛刻的观念。他认为“害人者必诛，自误者可悯，如子昂者，惜其才，哀其遇，悲其不幸可也”。而在《与湘士》中，汪瑔是要为一个被人谗谤的友人作公正之言。汪瑔知道此人“恃才而傲容”，但“别无大过失”，而其他人则苛刻地以流言诽谤他。汪瑔在信中为其辩解，是他宽以待人的处世哲学的体现。

汪瑔辗转幕府，他曾说自己“家徒壁立，归耕无田，不得已佐人幕事，资其岁脩以给朝夕”[③]。这份不得已而为之的职业，造就了他隐忍无争的处世态度。在《与哲老》[④] 中，他说：“故忍之又忍，如司空表圣所云：忍事敌灾星耳。一切名利之场，从来有退无进，盖不入仕途，又非商贾，本无可争也。”汪瑔认为入仕与作商贾需要与人相争，而如自己所做职业，则应无争也。在《与贾虚谷》中，汪瑔劝诫虚谷“一时之富贵，本不足言，千载之声名，亦难自信。惟当如司马子长云：随人俯仰，与世浮沉，即是素位”。此虽是安慰虚谷落魄不得志之言，但也是汪瑔对人生

① 陈宝箴：《清故敕封文林郎国子监生汪君墓志铭》。

② 《与贾虚谷》，《随山馆尺牍》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③ 《又与友人》，同上书，第78页。

④ 同上书，第73页。

处世之道的思考。同样，他在《与友人》中劝诫友人要“自敛锋芒，不争名誉”，这可以说是其为幕生涯的心得体验。人居幕府中，若锋芒太盛，难免遭人嫉，此韬晦之法，是其保全之计。

另外，在汪瑔的观念里，不时也流露虚无的天命观，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不止一次地将一些事情归结为天命所致。他在《与戚某》中写道：“人家盛衰，亦是运命循环必然之数。”[①] 在《又与门人》说：“足下此时，但当自励德行，至于勋业，则姑待之，待之而不得，则亦命也。”人生难免有不如意之事，而不如意之原因又难以追究，或不愿追究，汪瑔就用天命来解释。这也是他在无力改变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是用以排遣自我不得志之抑郁的一种方式。

4. 论学之言

汪瑔一生著述颇丰，诗词文皆通，时常与友人和诗赋词，因此在他与友人的书信中，自然免不了探讨与此相关的话题。他们不仅谈诗论文，也常探讨与学术思想相关的问题，不乏真知灼见。

首先，汪瑔在书信中时常与友人谈诗论文，互相切磋。他在《又与贾虚谷》中对贾虚谷为赵子昂的《青山白云图》题的诗评价，认为其“极似坡公”[②]。而在之前，汪瑔看到近人所写的一首诗：“徙薪曲突非无策，横草纡筹亦有人。白发野夫都不识，梅花深处著闲身”，他认为此诗“似南宋人诗”，因此“告之足下，搏一拊掌”[③]。汪瑔与友人在书信中，讨论较多的是古文方面，既有对古人散文高下的品评，又有与友人相互切磋指点。

在探讨古文方面，汪瑔与松人的书信中谈到的最多。他在一封给松人的信中写道：“文章传世，有久暂，亦有多寡。宋以来名家，有文集百数十卷者，后世或传数十篇，或仅传数篇，能传全集者寡矣。即传在显晦间，后人未必诵读效法之也。然则如欧苏者，岂易及哉。”[④] 对古文的流传颇有感慨，杰出如欧苏者，世间亦少有。松人曾有书信给汪瑔，谈到朱梅崖的文“志大而力不足，又短于情真识微”，对此，汪瑔是赞

---

① 《又与友人》，《随山馆尺牍》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 页。

② 《又与贾虚谷》，同上书，第 11 页。

③ 同上书，第 9 页。

④ 《随山馆尺牍》卷下，第 1 页。以下与松人的书信皆出自此。

同他的看法的，但汪瑔对朱之文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认为朱乃“好为大言耳”，似此种情况，没有继续深究的必要。另外，汪瑔还写信询问松人关于古文方面的迷惑：“宋之陆放翁，金之元遗山，其古文皆成家，近人选遗山而置放翁何也。放翁文气力不如遗山，而和平整洁胜之。足下深于古文者，能论定之否？”由此可见汪瑔是个虚心向学之人，有疑问善于向别人交流，不自我封闭，不以向别人请教为耻辱，于事理，于处事，皆通达自若。

汪瑔在书信中与友人论古人之文，继而论古人之为人。在《与方舟》中汪瑔与方舟论及“裴白优劣”时，二人持论相左，汪瑔认为方舟“读其遗文，微见端绪，因博考群籍，参互得之，是岂好作议论，妄疵古人者哉？”继而得出二人之所以在对古人评价时观点不同，原因是“足下论其事，鄙人诛其心”。不难看出，汪瑔不是只依据某些单一事件对古人妄加评论的，而是努力去看到表面现象背后的实质，这也是其见识高明之处。他在与松人的信中也说道：“凡欲知古人才力之厚薄，学问之浅深，必读其全集乃可。”品评古人之才力，切忌以偏赅全，也是的论。

另外，汪瑔也与友人在书信中辨别古人诗文集收录过程中存在的讹误问题。他发现“曾茶山，周草窗、仇山村三集，是闽中照英武殿聚珍板重锓，其中间有讹字，茶山集中有误收放翁诗”，便写信告诉松人，还在信中向松人请教“秦淮海集有吾乡徐青藤评语，似是湖北所刻，不知与四库本一同否”。而在给辛仲仁的一封信中则是讨论《道德指归论》是否是明末人的伪作问题，“此书曹氏学佺谓明末人伪作”，而汪瑔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明人伪书，如《天禄阁外史》之类，虽极意摹拟，迄不能掩其造作涂饰之迹，此书文气虽不甚深厚，然率意而出，无所矜持，亦无所雕饰，犹有两京朴茂之意，似非后世人所能为焉”。且不论汪瑔所辨是否完全正确，只是此种见疑便问，见讹便纠的态度，说明他在阅读过程中非常认真细致，进一步质疑并与友人探讨，也显出其治学的严谨性。

除了对古人之为文为人进行评价，在汪瑔的书牍文中，还有其对同时友人之文的见解。汪瑔在《复杨研庵》中对杨之《宋史余论》十篇进行评价，说其文“议论深透，笔意坚卓”，接下来又对其第三论“神宗时，契丹已衰弱，非不可图，特神宗、安石非其人”，十分赞叹，认为“此意

前人亦罕及之”[1]。而对另外一位友人的《守边策》则说其“反复数百言，不得要领”[2]，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策论的弊病所在。

其次，在汪瑔的书牍文中，他也与友人探讨学术思想方面的问题。他在与辛仲仁的书信中，附有自注：“仲仁游岭南，从余假书，多所辨证，间以鄙意答之，先后不下二三十通，今所存者不及十之二三也。”汪瑔和辛仲仁有不少书信是交流学术思想的，可惜很多都已丢失，收录在《随山馆尺牍》中的还有一些，如：“周末诸子，自荀杨外，大抵出于老子，申韩变之，庄列衍之。庄子所得较深，然涉猎于虚，今所传列子，盖赝书也。杨朱之言，惟见于列子，其义甚粗，惟墨子之说，流派最盛，后世之异端，无不出于墨者，而皆在西方，如释迦，如摩哈麦，如耶稣，皆是也。孟子不言老庄，而距杨墨，知墨之易以惑人也，赖孟子辟之。故不行于中国，而行于外裔耳。”此信就是谈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在今世的流变情况，述论结合，主要对今世学术思想现状的原因进行辨析。

5. 真挚之情

汪瑔的书牍文除少数篇章是代别人所作之外，其余几乎都是与友人所写，无法与友人见面畅谈，欲有言相吐只能诉诸笔端。

汪瑔是一个非常注重朋友之交的人，因此在他的书牍文中蕴含着真挚的感情。既有对朋友相知相惜的感激之情，亦有为朋友排忧解难的知己之意。

在《与徐白山》中，汪瑔写出他对知己的认识：“仆尝谓知己一也，而其人有二，其等有三。有知其性情行谊者，有知其文章学术者，所谓其人有二也。有知其所长而成之，知其所短而匡之者，有仅知其短者，亦有仅知其长者。所谓其人有三也。称其长而实非所长，讥其所短而实非所短，皆不足以言真知。真知者，其契合在性命之微，其真挚出妻孥之右，千百人中不过得一二人，又多得于贫贱之交，风尘之表者也。”汪瑔所理解的知己必是始于贫贱之交，可担性命之攸关的，他对今世“率求知己于达官显仕之间”的情形是否定的。鉴于这种择友标准，汪瑔相与较好的友人，多数同他一样，常有失意之苦。他在《与李树人》一信中写道：“仆涉世数十年，未尝无

① 《复杨研庵》，《随山馆尺牍》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② 同上书，第66页。

知我者。然皆非得意之人，知之愈深，则其人愈不得意。即如某某数公，其初甚落落，迨后相知渐深，则某公去官。……知己之感，终不能忘。”其实，如汪瑔在信中所言数公之不得意，并非就是因与他相知导致的，但是对这些知己的感激之情，汪瑔却是发自肺腑的。在《与幼恭》中，汪瑔在拜读幼恭的文章之后，对其文结语处所言“文章从古皆无用，况是烽尘四起时”感触极深，认为此句“沉痛苍凉，又不独为仆言之矣”。对朋友所写文章的理解，使他生出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触。若不是相知甚深，是无法体会如此贴切的。

除了表达与友人相知相惜之情外，在书牍文中，汪瑔还在不少信中劝慰友人，甚至在经济上资助困厄中的友人。汪瑔曾写信给贾虚谷，对其不得志进行劝慰，“以足下之才，使当乾隆、嘉庆间，遇毕秋帆、阮云台诸公，必能发其声名，有闻于世，今非其时矣。十数年来，当世所急者曰军务，曰洋务，文章之士，吾所用之。当途要人，视文士如古物，不适时用，足下之无所遇，又奚怪哉”，将贾不得志归结为外在客观的原因，也反映出汪瑔所生活的晚清，一派鱼烂腐败之景象的社会现实。在此信后附有汪瑔以梦中所见一老翁，相赠治肝气之方，即“勿认真，莫着急”六字告知贾虚谷，可谓煞费苦心地期望贾能释怀，走出精神的困境。而在另一封与友人的信中，汪瑔则首先对友人的能力进行分析，“足下识不胜我，而才过我，固可以仕。”这是对友人才识的肯定，下面则是对友人的劝诫：“然窃愿足下益勤学问，以扩其识，增其才。夫可仕而不仕，止于身，弗显荣而已。既仕而才识不足，其患匪仅弗显荣也，故愿足下自审之也。”对友人今后该何去何从，可谓不厌其烦。而在《复李秋丞》中他从李秋丞的实际处境来劝慰其应耐心等待：“足下无大力者推挽，杨公既知足下，则士为知己用，不当更论廪稍之厚薄。况异日尚有可望乎，幸耐心处之。”汪瑔在另一位游人远游数千里之外，却遭逢龃龉而归之时，“附去二十金，聊佐行李”①。汪瑔对处在困境之中的友人，倾囊相助，无怪乎其与友人感情深厚，相知甚深。

总而言之，汪瑔的书牍文涉及内容广泛，从中可深入理解其行为和思想。“明清两代书信更为流行，但一般应酬之作较多，自由发挥政治

---

① 《随山馆尺牍》卷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见解、干预现实的作品较少。"[①] 汪瑔的书牍文中时有反映现实之作，亦是其独特之处。其中还尝论及其对西学的态度等，更是当时较为前沿的问题。

二、序文

序，又称绪、叙、引，是写在著作或诗文前的说明性或评论性文章，用以说明写作缘由、内容、体例，或表达某种见解。此实际乃狭义之序，即书序。在古代，序的概念所囊括的文体更广泛，除书序之外，还有记序，赠序等。[②] 本书所论述的序文乃广义上的序文，即包括书序和赠序在内。汪瑔的《随山馆丛稿》中序文共22篇，包括书序18篇，赠序4篇。这些序文因文体不同，而在内容选择和结构安排上各有其特点。

1. 书序

汪瑔的18篇书序中，9篇诗序，1篇词序，1篇文序，1篇题词，1篇奏议序，5篇为其他文体作的序。汪瑔的这些书序多采用记叙文的形式，叙多议少，以介绍著述的缘起，及其与著述者交往为主，兼及对所序之作品进行评价。因此，他往往在书序中倾注着自己对著者的感情，情胜于评。但另一方面，汪瑔在写作书序时，非常注重其不同文体间的差异，合理地选择内容和安排结构。

首先，汪瑔的书序文能以情入序，叙述与著者的交往，兼评著者之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为友人所作的书序中。

汪瑔曾为他的好友杜季英的诗集写过两篇序文，饱蘸着汪瑔对杜真挚的感情。其中《杜季英小樊川馆诗集序》是写在诗集的前面，《小樊川诗集后序》是写在诗集后面的。前序作于杜季英生前，后序作于杜亡后。前序以叙述汪瑔与杜季英早年的交情，继而引出对诗坛现状的感慨，既叙述与友人往日的深挚感情，又兼谈诗学思想。后序主要叙述杜遭意外身亡之经过，又

---

① 王育颐：《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第三卷，第1175页。

② 谢新华、谢红军：《赠序文简论》，《天中学刊》2000年第6期。文中有对古代序体文的概括："序"作为文体，有三种样式：一为书序，即置于文籍（包括书、诗、赋）之前（也有置于书后的），叙文籍著述、出版意旨，及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二为记序，体同"记"、"志"，记一件器物，一处名胜，叙述一次活动。《尔雅》云："序，绪也。""序"字亦作"叙"。如王勃的《滕王阁序》、白居易《荔枝图序》。三为赠序，赠别之文。如柳宗元《送薛存义》。三者都以序的通义"叙"作为表达的基本手法，叙事记物畅述情怀故以序标题。

对杜的为人作总体的评价，表达自己的哀思之情。两序因创作时间的差异，在内容选择上自然侧重不同，因此而导致两序包含的感情基调完全不同：前序是鼓励杜要避当今诗坛存在的弊端，坚持以“气盛”为诗，侧重在切磋诗艺，体现的是汪瑔对杜寄予的厚望；后序是追忆亡友，睹诗思人，表达的是对杜英年早逝的沉痛的惋惜和哀悼之情。两序的共同特点是都体现出极强烈的感情，这也是汪瑔书序的一个特点，有感而发，以对著书者的感情和交谊为序的主要内容，而不局限于评价著述本身。通过前后两序的比较，可见出一般诗序的前后序在文体写作上的异同。

在《姚习庵遗诗序》中，他除了评述姚之诗歌、为人，还写到他在姚垂危之际的感受，虽然天各一方，但却“辄惊噩梦”，因此担心向来多病的姚。不想，再次归来之时，“一再见而君已奄然物化矣”。虽然该序并不是以叙述感情为主，但能在评诗论人之余融入细节，读来更有情味。

其次，书序文因所序之书的不同，而对具体书写也有不同的要求。汪瑔所写的书序，因文体的不同，也有明显的区别。

《骆文忠公奏议序》是奏议序，文风平实，由对历史人物的追溯，引出所序之人，交相对比，凸现所序奏议及著者的独特性。奏议序往往是奉命所作，多歌功颂德之颂词，汪瑔的该序文虽未能尽脱窠臼，但他能在序中抒发自己对著述的理解：“凡公之所以固圉圉，靖寇乱，勤民生，饬吏治者，举见于一编之中，而于人才之贤否，军事之得失，尤三致焉。”也可说是其想要摆脱一般奏议序窠臼的努力。

《前后守宝录序》是文书序，按文体应与奏议序大同小异。但汪瑔此文书序，除详细交代写作缘起之外，则是对作文书之人生平事迹大书特写，因其“心慕公之为人”，将魁公之生平经历与文书中所倡之论结合起来，兼评人与其文书。该序不仅能使人了解所序文书的内容特色，更能使读者深入体会作文书之人是如何写作和实践的，有极强的宣传作用，也表达出汪瑔对魁公的敬慕之情。

《癸酉正月五日游花埭诗序》是自序，是汪瑔为其诗歌《癸酉正月五日游花埭诗》所写的序。主要介绍与诗歌内容相关的背景，以及写作该诗的缘由，是用来帮助理解诗歌的内容和写作背景的。

《秋梦庵词稿题词》是题词。题词，也称题辞，是为给人、物或事留作纪念而题写的文字，一般表达的是对所题之物的积极肯定的态度。《文体明

辨序说·题名》中对题名的要求是“其叙事欲简而赡，其秉笔欲健而严”①，此处的题名就是题词。汪瑔的该题词完全按照题词的文体要求来写作，语言凝练地对所题词稿进行颂赞，充满溢美之词。

《书钞本续酌古论后》是书后序，类似今天的读后感。汪瑔读雁水老人的《续酌古论》，认为其中论及“赵宋之事”，将南宋之亡国归咎于“宋之儒者”的说法有失偏颇，因而对其进行驳斥。汪瑔认为“论事者必审理而度事”，而雁水老人不审理、不度事，“逞一己之偏滕，口说以快胸臆，以之论古人，失于偏止耳”。汪瑔作此后序，除要与著者争辩不同观点之外，还是告诫世人“慎勿以之论当世之事哉”。以期此后序能起到警醒的作用。

汪瑔的书序文中体现的文学思想，如诗词创作主张等，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2. 赠序

赠序，顾名思义，为人送别而作。最早见于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② 因古人有临别赠以言的习惯，故有赠别诗，而写在诗前面的序文成为赠序。后赠诗与赠序逐渐融合，至韩愈、柳宗元的赠序文擅名天下，此后，凡是临别赠言的文章，即使后面未附诗歌的亦冠名赠序。汪瑔的赠序有4篇，包括3篇送别序和1篇寿序。

汪瑔的三篇送别序分别是：《送钟云卿都转乞病归巴陵序》、《送冒哲斋归如皋序》和《送友人之吉安序》。其中，前两篇序中所送对象皆曾为官，第三篇中所送为一武将。三篇序文的送别背景也各不相同：前两篇都是官员归乡，但归乡之原因略有不同，钟云卿盐运使是因病辞官归乡，而冒哲斋是被劾失官，久寓广州数年之后归乡。第三篇中的友人则是受赣南道汪公的邀请而从赴军旅。汪瑔的这三篇送别序，因送别对象、送别背景的不同，而在内容和文风上也有所不同。

在内容上，前两序因送别对象皆有为官经历，后又弃官归乡。因此，在序中汪瑔主要从二人为官时的政绩进行颂赞，而对其人格的赞扬，则是从其弃官之后的心态来写的。这是两序的相同之处。两序的不同之处是在给辞官

---

① （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6页。

② （清）姚鼐辑：《古文辞类纂》序目，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页。

归乡养病的都转盐运使钟云卿写的赠序中，汪瑔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盛赞其为官之才。当钟晚年沉潜释老，决意乞病辞官，汪瑔对钟之举进行剖析，对其不慕名利的品格赞叹不已，序中写道："公超然高蹈，卓尔不群，视富贵如浮云，以道义为刍豢。"但接下来又说："兹风既扇，当世咸闻，使骛名者息躁竞之端，居位者知廉静之操，岂非流俗之针砭，而达人之矩臬乎？"既有对钟公高尚品格的推崇，又揭露当时流俗争名逐利的卑劣。该序的最后还表达出希望钟公能"为苍生计而再起"的愿望。而《送冒哲斋归如皋序》则主要是对冒公的为官人品进行叙述，写其不以穷达为意，被弹劾仍淡然处之的心态。在序中，汪瑔特意写冒公被弹劾失官之后，寓居广州，当时若有广州人至潮州，潮州市民"必询君安否"，可见冒公深受百姓爱戴之程度。如此廉政爱民的官员，却被罢弃，虽然冒公视之坦然，且"以退休故乡为乐者"，但汪瑔仍在临别之时劝慰他，"虽然以君之才，当今之时，而使之自放于山巅水涯也，是果适然之遭，系于天而无与于人也哉"，将其不被任用的原因归结为天，而与其无关，目的是希望冒公能安心归乡颐养天年。

第三序因是友人即将去吉安从军报国，故内容乃是为友人临别壮行之作。从友人"生秉异姿，少有奇气"写起，写其前次投谒军门，随右江道张公从军，但却壮志未酬，直到再次被重用，因此汪瑔在序中激励友人此番定当有所作为。

在文风上，《送钟云卿都转乞病归巴陵序》通篇采用骈赋文法，铺采辞藻，典硕有余而情感稍弱。《送冒哲斋归如皋序》叙议结合，不疾不徐，娓娓道来，与冒公恬淡释然的性格颇有相似之处。而《送友人之吉安序》则用历史典故开篇，继而引出友人之壮志，虽然该文也用骈赋手法，但不似《送钟云卿都转乞病归巴陵序》佶屈聱牙，晦涩难懂，而是慷慨豪壮，一气呵成，读来朗朗上口。以此观之，则汪瑔三篇送别序的文风，都与所送之人的性格特点有相似关系。

另外，在汪瑔的赠序文中还有一篇寿序文《刘恭人寿序》[①]。这是汪瑔

---

① 之所以将寿序归入赠序，是依据褚斌杰先生在《中国文体概论》中说："在赠序文中还有一种专为祝寿而写的序文，称为'寿序'。生日之礼，起于六朝，唐宋以前，只见寿诗未见寿序，清方苞说：'以文为寿，明之人始有之。'最初的寿序文，与早期的赠序文一样，是缘诗而作，后来则发展为无诗而序，成为一种独立的祝寿文。"

作品中唯一的一篇寿序文，在题目下有自注："代吴少村中丞作"。可见汪瑔自己比较肯定此文，虽是代作，但却也能从生活的细节去刻画人物，不仅仅是祝寿，更类似于为人物作传记。刘恭人乃是响亭太守，即汪瑔的第一任幕主五福的妻子。序中写到咸丰年间，寇贼围曲江城，当时刘恭人也在府中，与她亲近的人劝她应该暂时躲避，以免被寇贼所杀。她则说："令长守土，义不可去，妇人从夫，独可去乎？今寇警方逼，人心易摇，奈何纷纭以为民望也。"众人皆被其激昂陈词，大义无畏的气魄所震慑。刘恭人临危不惧的胆略，与五福守城安民、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相互辉映，因此，汪瑔对他们由衷地敬重和赞赏。

三、碑志文

汪瑔的《随山馆丛稿》中共收录碑志 10 篇，其中包括宫室庙宇碑文 3 篇，墓志铭 5 篇，碑传文 1 篇，写景铭文 1 篇。[①] 碑志文由于写作的特殊性，多为应邀而作，不免多颂赞之词，在内容上并非个人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对汪瑔的碑铭文只选取其有特色的碑志进行分析，对其程式化的篇章不作具体论述。

汪瑔的三篇宫室庙宇碑文分别是为广州的三元宫、三十六江楼和曲江县大塘乡义勇祠而作的。其中前两篇是汪瑔自己所作，都是从该建筑的兴建而至如何颓败，今又为何要重建来写的，章法结构相似，无甚特色。第三篇是代曲江令五福所作，虽名为《曲江县大塘乡义勇祠记》，但内容主要是对忠义志士的英勇事迹进行叙述，并进行讴歌，感情较前两篇更为强烈鲜明。

汪瑔的五篇墓志铭中，有两篇是代文，两篇是应别人之请而作的，还有一篇比较特殊的，是为其冢妇所做的圹铭。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代余君楚材墓志铭》和《冢妇廖氏圹铭》。

《代余君楚材墓志铭》虽是代别人所作的，但是由于对余君的生平较为熟悉，在该墓志铭中，汪瑔对余一生的经历进行叙述，并且突出余之义勇。其中写到庚戌年间的盗贼叛乱中，余君"犀甲被体，龙泉在腰，执殳前行，契箭招众"，而当贼人深入莲塘山中险绝之地时，"君攀梁丽而上，蹋渠笞而行，菁雾茅烟，孤军深入风毛雨血"，通过对余君在特别事件中的具体描述，使其形象更加突出，比空洞地哀悼颂赞更具真实性。

---

①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27 页。

《冢妇廖氏圹铭》是汪瑔为其冢妇，即嫡长子汪兆铨的妻子所作的墓志铭。这篇铭文通篇采用散文，语言通俗，但却饱含着对廖氏英年早逝的惋惜和痛悼之情。其中，对廖氏的性格和品格都以具体的日常事件来展现，事小情深。该铭主要介绍廖氏的不幸遭遇，幼年丧母，二十岁嫁给汪兆铨。天生体弱多病，后因父亲病重，恪守孝道，侍候床前数十天彻夜未眠。父亲亡后，悲戚过度，不进餐饭，病又加剧。后来请了十多个医生，都是治愈后不久又复发，如此一年多，年仅二十五岁就去世了。对这个柔弱得连见到杀鸡时血漉漉的情形都会生出恻隐之心，以后不吃鸡肉，甚至不吃一切有羽毛的动物的儿媳妇，汪瑔极为喜爱，因此在她去世后特别为她作墓志铭。汪瑔称赞她，“与诸嫂居和婉无间”，“事吾夫妇柔顺有礼”，由此也能看出汪瑔评价女子的价值观是非常正统的。该铭文语言平实，但感情却很真挚，是其碑志文中极有特色的一篇。

《钟烈女传》是汪瑔为祖籍山阴一个十五岁的女子所作的碑传文。记述了烈女深陷贼手，“恐卒不自全”，拔刀自刎死节的事迹。从汪瑔在这篇碑传中所用词语的感情色彩，可看出他对烈女死节之事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该女“生有至情，颇读诗书，诵论语毛诗，略皆上口”，至于烈女死节的全过程，也叙述极为详细。从烈女被贼人虏获写起，贼人要老妪告知烈女家人来以金钱赎回烈女，烈女则对老妪说：“吾兄无所得金，吾以一弱女子陷贼中，恐卒不能自全。”要求老妪以刀杀死自己，老妪则认为此举不可，烈女又焦急地对老妪说：“少缓为贼觉，不得死矣。”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引刀自刎。此烈女死节时年仅十五岁，贼人看到她如此贞节刚烈，非常惊骇，为其所感而将她埋葬山中，墓表上以“钟烈女之墓”名之。汪瑔在该墓表中自始至终未发表一句个人的评价，但其情感态度却隐含在字里行间。汪瑔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观念正统，尤其是对待女子，他更是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

四、寓言

“寓言是寄托了劝喻或讽刺意义的各种故事。”① 根据此定义，汪瑔《随山馆丛稿》中的四篇《杂谗》应属于此范畴。在这四篇寓言中，汪瑔用通俗简练的语言，讲述了四个意味深长的小故事。这四则寓言不仅意蕴丰富，

① 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含有发人深省的哲理，而且构思巧妙，善于使用人物语言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和刻画人物。它们与其他文体一同构成了汪瑔散文创作的多样性特征，其中也反映出汪瑔对现实的关怀。

第一，这四则寓言意蕴丰富，体现出寓言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性，富有现实意义。《杂谂一》通过讲述晋朝时的一个富人，妄听奴仆的建议，“不知人，不知言”，等到寇贼来犯的时候，才发现上当受骗，被奴仆蒙蔽的故事，既嘲讽了富人偏听偏信的无知，又揭露出其奴仆欺蒙狡黠的劣迹。该寓言还蕴涵着人生的哲理，无论做任何事，不知人察言，必将导致失败的下场。若上升到为官为政层面，则一国之君不加判断，偏听偏信，任用小人，那将会是怎样的后果。《杂谂二》通过富人治室的故事，揭示出应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的道理。《杂谂三》通过医者周生精诚为医，却处处遭人嫌怨，世人更不理解周生的苦闷而妄加评论的故事，寄托着汪瑔对现实社会中像周生一样被人误解的失意者的悲悯和同情，也是他对自我处境的变相映现。《杂谂四》则讲述了一达官因贪图药玉外表的华丽，而不识真玉，当他身败名裂，要去典当药玉时，却无人肯出价格购买的小故事，批判了达官有眼无珠，不辨真假的愚蠢行为。该寓言既嘲讽了社会上不辨真才与庸才的达官人物，又揭露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除了达官本人的昏庸之外，还有那些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小人的阿谀奉承。

通过对这四则寓言内容上的理解，可看出汪瑔旨在通过虚构的人物和事件来反映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既有人生的哲理，又具有批判社会黑暗的价值，富于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二，汪瑔在寓言中注意刻画人物形象，在寓言中所批判的主要对象都是达官富人。他之所以选取此类人作为嘲讽的对象，反映出他对现实生活中身宦显达之人的观点。他拿富人开涮，而不选择贫寒之士，也反映出他的悲悯情怀。

在具体的人物刻画中，汪瑔使用人物语言、前后对比等方法来塑造形象，同时，人物的语言又能推动情节的发展，使寓言故事和人物刻画融合在一起。在《杂谂一》中的纪纲甲在富人要试弓箭的时候，说：“勿遽试也，弓矢，兵器也，试于公之圃，乡人之不习见，是骇之也。且吾所有者，弓仅十，矢仅百耳，以御贼寇，犹有所不足，使盗侦之，益以轻我，非计也。不若扃于室而扬其言，吾所购弓百而矢数千，以是慑盗，使不敢犯，是不战而屈人之术也。”甲这番话可谓高明之至，他没有强硬地阻止富人试弓箭，而

是从如何战胜盗贼的角度劝说富人，不试弓箭贼人不敢来犯，若试弓箭则被贼人所窥，于富人不利。从甲的话语中能看出甲是个巧言善辩之人，更刻画出他的狡诈。富人听此言后，就要求把弓箭藏起来，故事的情节也发生了变化，这皆是人物语言的功效。

而在《杂谂四》中则通过前后的对比来刻画人物形象。达官在未败落前带药玉出去，有识玉的人说“此药玉耳”，旁边就有人责骂他说：“达官讵用药玉耶!”而当达官败落后，欲当掉其玉，却因是药玉价格太低贱，无人购买。这时，那个为达官的药玉辩护的人却又出来嘲笑达官不识玉。通过此人前后态度的对比，揭露出这种前恭后倨的世俗小人的丑态，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丰满。

第三，汪瑔在创作寓言时构思极为巧妙，或一波三折，或设置悬念，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具可读性。

《杂谂一》中的富人防盗就是设置悬念法，富人的纪纲甲要把弓箭藏起来，使人不禁生疑，弓箭藏起来如何防贼。结果是贼人根本没来侵犯。接下来的乙又要把弓箭藏起来，那这次贼人是否会来呢？结果贼人未至，乙却先离开富人。乙走没多久贼寇就来犯，而先前所藏弓箭，却“胶解角反，弦断而羽脱矣”，至此时富人才悟为何当初甲乙都要把所买弓箭藏起来的原因。读者也至此才茅塞顿开，明白甲乙的奸猾。

《杂谂二》和《杂谂三》用的是一波三折的构思，情节比较曲折。《杂谂二》中的富人治室，派童奴去学艺三年，归来之后一年也没盖成房舍。富人之友为其出谋划策，又派出童奴去学艺，这次富人期望着可以盖成大房子了，结果一年下来，房子还是没有盖成。直至富人之友亲自出马，三月之内就把房子盖成了。至于《杂谂三》中的周生为富人看病，更是好事多磨。富人病，周生去医治，病快好的时候，周生因富人对其礼节不周要离开富人，但是富人的病却又加剧，又请周生留下继续医治。如此往复，可谓一波三折，但这种波折却又是极富于戏剧性的，看似荒诞但却蕴含着令人深思的哲理。

五、其他文体

汪瑔的散文，除以上四种文体之外，还有论辩文、祭文等，由于此类文章篇目较少，且特色不甚明显，故只作简要的叙述，以了解其概貌。

论辩文，又称议论文、论说文，指论证事理，阐明主张，发表观点看法

的文章。汪瑔的《随山馆丛稿》中收有论辩文三篇：《法论》、《慎议》和《辨气》。这三篇论辩文条理清晰，论述逻辑严密，从中能见出汪瑔多年作幕客的文字功力，也表达出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法论》中说："治天下，有本有末，道德齐礼，本也，科条律令，末也，而繁而密，末之末也。"其实是儒家以礼教治天下的体现，也反映出汪瑔是个思想观念比较正统的人。

至于其文集中的两篇祭文，既是代别人所做的，又与一般的祭文无甚两样，故不再详细论述。

第二节 汪瑔散文的艺术特色

汪瑔的129篇散文不仅内容丰富，文体多样，而且艺术上也富有特色。汪瑔在创作诗词时，主张以性情为主，不拘定法，倡导清新自然之诗词，而在散文创作上，他也力避佶屈聱牙之作，以求叙事明理，通俗晓畅。汪瑔的散文以平淡质朴为其主导风格，不过于追求文字上的技巧，注重散文的实际功用。他的散文处在晚清散文向近代转变的过渡期，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和平整洁，简朴自然

和平整洁是汪瑔散文的整体特色，主要体现在其散文语言和表达方式的运用上。和平是指语言的平淡朴实，整洁是指文风的简洁自然，不过多使用繁复的修辞方式，无虚浮夸饰之辞。

汪瑔在给松人的信中写道："宋之陆放翁，金之元遗山，其古文皆成家，近人选遗山而置放翁何也。放翁文气力不如遗山，而和平整洁胜之。足下深于古文者，能论定之否?"陆游为文，追求简洁平淡，汪瑔对此文风颇为欣赏。在汪瑔的散文中，虽然也有引经据典之处，但整体上语言平淡朴实，较少华丽的绚烂篇章。

他在《与某郡丞》中由渔洋山人的《豫让桥诗》引出下面所言之事，此处是直接引用前人诗歌，以简单的话语评论，而不是浓墨重彩。即便是像这种简单的引用在汪瑔的散文中也只是少数，他的散文更多的是造语自然。因为他是不赞同学究气很重的写作风格的，在他给松人的另一封信中，汪瑔谈论到对明初几位文人的评价时，他称赞宋濂入明前的《浦阳人物志》"笔致卓荦可喜"、"精彩逼人"，而不欣赏其入明之后有"学究气"的作品。对于唐顺之的文，他认为"明代人罕与抗手者"，但是又不赞同其书牍文的

“烂漫”文风。唐顺之为文早年受七子派影响，坚持“文必秦汉，诗必盛唐”[1]的创作理念，后察觉七子流弊，转而师法唐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2]。而汪琬此处说的“烂漫”，是指唐之文过于随意轻浮，不够整洁。关于王世贞，他则评价其“天资学殖，一时无两，特客气太重，存文太多，使删去大半，存其精要者，后人何遽能掉磬耶”。他认为王世贞的文章虚夸浮泛，华而不实，若删去此类文章则后人便无从指弊。汪琬是欣赏文风朴实的文章，他自己创作的文章亦是如此。他写给友人的多封书信中，几乎都不运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方式，但是却将所言之事，所传之情表达得恰如其分。如他写给贾虚谷的信，通篇无修辞，但循循劝导，对友人的深情见诸字里行间。尤其是在信件的最后，汪琬还附有一段文字：“仆病时，梦至一处，见一老翁，顾仆言：‘治肝气，有神方，欲见之乎？’出之怀中，则‘勿认真，莫着急’六字也，霍然而醒。此梦是因是想，均不可知，此六字则治肝疾必效之方也，谨告足下请尝试之。”以此平淡之语，普通之事写给友人，足见其良苦用心。

虽然汪琬的一些序文和碑铭中用了不少骈赋笔法，但有些是由于应别人请求而作的，难免要考虑很多因素，并不全是由自己决定的，不能求全责备。

崇尚简短指的是汪琬散文的篇幅和内容，他力求言之有物，不该多言之处决不做作牵强，当言之处丝毫不吝笔墨。汪琬的散文中除少数几篇碑铭类的文章反复引经据典，铺排罗列之外，其他皆篇幅简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尤其是他的尺牍文，如他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弊在十年之后，患在千里之外，能知之者，识也。能治之者，才也。仆于识虽不能自信，犹可自勉，才则短矣。此所以不敢求仕也。足下识不胜我，而才过我，固可以仕。然窃愿足下益勤学问，扩其识，增其才，夫可仕而不仕，止于身，弗显荣而已。既仕而才识不足，其患匪仅弗显荣也。故愿足下自审之也。”此信短短一百三十五字，但是却将友人的优点与缺点说得非常清晰，还对友人进

---

①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 286，列传第 174，文苑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348 页。《明史·李梦阳传》：“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李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道者弗道。”

②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 287，列传第 175，文苑三，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375 页。

行勉励和提醒。文字虽少，但内容完整，情感真挚。

二、不求义法，注重实用

汪瑔所生活的晚清，正是桐城派声势日渐衰微的时代。桐城派主张义法说，坚持以“义理、考据、辞章”为文，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从康熙一直延续到清末，地域上也影响到全国。汪瑔虽然不反对作文应讲究义法，但也不支持桐城派完全依照义法来为一切文的程式化理念。不过汪瑔和桐城派一样，非常注重散文的实际功用，只是汪瑔所说的实际功用和桐城派的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又有所不同。

汪瑔在给辛仲仁的信中说：“近世桐城派古文，专言义法，义法固不可废，顾秦汉以来数千年之文，亦已夥矣。一以义法求之，殆亦未尽。前见大集中与质斋论古文书，于词采句法之间，已不免于徇末。篇中又云：文必奇博，使见者舌挢口呿，且不敢赞，况敢訾之乎？此言尤过矣。”汪瑔明确地表示不能一切以义法求之，以文害义，不免舍本逐末。

在具体的散文写作中，汪瑔也贯穿着不应因文害义的创作观念。他的散文几乎不采用固定的结构程式，篇篇随己意驱遣，或以叙述为主，或以议论为主，或叙议相间，更不一味追求义理、考据、辞章在形式上的完美，而是因义作文。如他的论辩文，通篇以议论为主，或由古及今，或正反对比，不刻意求之。《慎议》由议论开篇，论及古人成败虽非一人之为，但倡议却必然是由一人开始的，继而围绕论题层层分析，抽丝剥茧，逻辑清楚，使人信服。文章通篇是散体文的形式，语言朴实，不求骈偶。而他的一些序文如《送冒哲斋归如皋序》，《有真意斋诗序》等却是兼用叙议，时用骈赋的手法，《小樊川诗集后序》则是全部散体的形式，以对亡友真挚的悼念之情统领全序，《秋梦庵词稿题辞》则又全部采用骈赋的手法等，这是汪瑔根据实际写作的要求而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的表现。由于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形式来写作散文，汪瑔的散文才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不致千篇一律。

汪瑔的散文注重实际功用，即他赞同文以载道的观念，但他所认为的道和桐城派的道有所不同。桐城派的“载道”是为适应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而提出的“道”，这样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汪瑔所说的“载道”是相对于个人而言，不同的作者应根据自己身份和阅历的不同来写作散文，是所谓的“言之有物”，不做空疏之谈。他在给友人所写的书信中，几乎于篇篇有意义，针对具体的事件有感而发，而且不论大事小事，皆可入文。汪瑔的书信

中所包含的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和人生历程的诸多方面，具体在前面的书信文中已作分析。而他的序文、论辩文和寓言亦是如此。

三、以事缘理，通俗晓畅

汪瑔的散文，由于注重实际功用，往往能在简短的篇幅中，阐明事理，抒发观点，是因为他不是空洞地谈大道理，而是有所依据而言。他所依据的或者是具体的事件，或者是古人的历史，或者是众所周知的道理，这样使得其所言之事理自然而现，水到渠成。同时，汪瑔在讲述事理之时，能用通俗晓畅的笔法，拉近了散文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晚清时期散文创作变化发展中的端倪。

汪瑔在《与黄玉舟》中对黄的“人才是天生之，亦须天成之”的观点表示赞同时，就证以现实身边的例子，“朋辈中如杜季英，年甫弱冠，其才气已不可一世，使其扩充精进，必有所成，乃年甫二十五而遽摧折之，岂非天不欲成其才耶？又如某辈，天资不如季英，然其初皆力学深思，期以文章自见，乃或艰于科第，为制艺耗其精华，或困于衣食，以奔走损其神智，迄于今日，遂无意于千秋，使其早得科名，或家计粗足自给，亦何至颓废枯落，一至于是哉”，继而又以自身的经历，进一步来阐明此论点，“仆自成童以来，其所身历饥寒，戎马瘴疠波涛也，艰难危窘之中，如居围城时，炮矢飒飒，从头上过，亦未尝束书不观，乃今年近五十，迄无所成就，盖资禀太弱，志趣太卑，其无所成就自限之，非天限之也。”但对黄的“世固无才，无怪居上位者之不求”的观点，汪瑔又以曾文正、胡文忠两公遗集中记录两公留意人才，最终成就中兴之功的例子来进行批驳。前者是现实中的例子，后者是前人的例子，但都使其论述更具说服力。类似这样的以事实来说明道理的方法，在汪瑔的散文中有不少，如他在反驳贾虚谷“以中国财不足、器不精，不能富强为忧”时，以“国家道光以前，岁入四千八百余万，岁出四千四百余万。自咸丰以后，洋税厘金岁增逾二千万，每岁所入较盛时，几加十之五”的事实来举例论证，一目了然，道理昭然。汪瑔在与另一友人讨论关于人才的问题时，谈到为政者常提挈中等才能之人时说：“孙明复幸遭文正，遂得学官，习凿齿不遇桓公，终身从事，古之贤者然，况今世耶?”由古而例今，道理不辩而明。

在《复朱眉君》中，汪瑔以治水来类比治粤之道，“制水者，必以土，土静而水动，制动必以静，理也，亦势也。世之求急效者，乃以动制动，此

如奔流剽悍以风激之，小者为波，大者为澜，又甚则惊涛骇浪，泛溢四出。蛟龙乘势，鳞介随之，其变幻万状不可测矣。然而风力既倦，水势亦退，卒之嗒然。复其故而已。而堤岸之溃决，田畴之淹浸，庐舍之湮没，舟航之倾覆，其害已不可胜数。”以此来印证所谈“治粤必先以静”的论点，使抽象的议论更具现实的形象感。他在对友人的《守边策》论述“不能遍守”的观点进行评价时说“昔人谓长江数千里，如人七尺之身，护风寒者，不过数处”，以人之所共有之身来比长江数千里之地，通俗易懂，又说明了道理。

汪瑔散文使用通俗晓畅的笔法来叙事明理，但他又不完全反对作文须讲究义法的论断，使得他的散文呈现出由古文向新文体转变的中间状态，这对更全面地研究散文的发展变迁史有一定的价值。

四、措辞语气，因人而异

注意因人而异，使用合理的措辞，是汪瑔散文在语言表达上的一个重要特色，具体表现在其尺牍文的写作上。这不仅反映出他久为幕客无形中所培养成的习惯，同时也能反映出他对不同的人所表达的感情也有所不同。对待朋友，汪瑔直言不讳；对待相识的官员，他据理论事，毫无过激之词；对待晚辈，则谆谆教诲，如春风化雨。

首先，汪瑔以坦诚之心对待友人，他直言不讳地劝勉友人，这也体现出汪瑔坦荡磊落的胸怀和真诚待人的品质。他在对黄玉舟的《策略》二十篇进行评价时，说：“我辈作此等文字，固皆空言，然此文既在世间，安知无采其说者？立言何可不慎，况即文字论，亦是大罅漏乎？”直接指出黄的文章的问题所在，同时又对其进行规劝和诱导，尽到朋友应尽的道义。汪瑔在给杨研庵的信中说：“大作《政论》中兵刑财赋之事，语似有病，幸再思之。”此言更为直接明了地指出了友人的文章存在着问题，并且在信的后半部分还给杨提出了修改的意见：“窃以为，改法以除弊，不若去其弊之所中，以还其法之所本来。”汪瑔还对友人《守边策》中对“不能遍守”的论断进行详细地分析，因为友人文中“于此一事反复数百言，不得要领”。这些都是汪瑔在书信中对友人的文章进行直接评价的例子，实际上，他在其他方面也能对友人直言不讳。如他曾劝友人要“自敛锋芒，不争名誉”，而友人现在正被某公赏识，更应该“幸自韬晦，以永吉绥”，这些都可以说是发自肺腑的劝谕。其中对一位好骂人的朋友，汪瑔也曾写信规劝，“所骂之人

既在表、祖之下，足下骂之亦不足以称狂士。夫日日骂人，并狂名亦不可得，又何为乎？”① 可谓抓住朋友骂人的心理根源进行劝导，体现出汪瑔对友人的关切与期望之情。

其次，汪瑔对待官员的态度，不像对待朋友那样率直，而是较为含蓄。在他的《随山馆尺牍》中共有五封书信是写给官员的。其中，《与某观察》是为答复“治粤之道”而写，主要内容是关于治粤的建议。《与胡大令》和《与某郡丞》则是针对具体事情而谈的，其中也包含有汪瑔对两位官员的建议。《与胡大令》中汪瑔由以往官员官阶越高，而建树越小的现象告知大令，希望大令能“有味于鄙言”，其中包含着汪瑔对为官之道的理解和对大令的期望，但措辞含蓄而不失规劝之意。《与某郡丞》是汪瑔以自己所见所闻来给郡丞摆事实，预期达到让郡丞三思而后明理的效果。某公有宾客竹士，某公待之不若他客，因为他客皆有要人荐引。后来某公罢官，邀请竹士与他偕行，竹士没能应允。郡丞认为竹士此举太忘恩负义。而汪瑔却觉得竹士太冤枉，因此写信要为竹士正名，“竹士有高堂垂老，岂能以身许人？某公即有旧恩亦难同往。况平日待以众人者乎。足下知责竹士于今日，不知责某公于曩时？是仍重达官而轻寒畯，岂能令竹士心服乎？”汪瑔借为竹士辩解，实际是间接地说出自己的心声。而《与某太守》是讲汪瑔自己对所见揭发别人隐私的恶俗的感慨，《复张子罗太守》则是以某公为例，讲述他不是不能识别精明阴险之徒，只是不愿承认错误而已。这两封信的内容看似与收信人毫无关系，但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使得规劝的语气极其委婉含蓄。

再次，在写给晚辈的书信中，汪瑔又循循善诱，不厌其烦，体现出一种为人尊长的风范。他写给门人的一封书信中，仅有短短的一句话：“诗文案牍，只是一理，多看多做，便能神明于规矩之中。”他用简明扼要的话语，传授给门人写作的学习途径。而在另一封给门人的书信中，他则详细地讲述具体写作中的注意事项，诸如“称颂公卿，可誉之为皋夔，不可誉之为禹稷也”等，可谓于细致处仍悉心指点，对其门人不吝花费精力去认真教导。汪瑔写给其从子的信中更是极尽劝导之心，并且教给他学习识字的方法，还举出具体的学习参考对象，用心良苦。

另外，汪瑔在代人作文时也能很恰当地根据所代之人的身份，以其口吻

---

① 此处的“表、祖”指的是刘表和黄祖。因该信前有“足下同乡之林西冲，其学识，仆不谓然。然其论祢衡谓当骂曹操，不当骂刘表、黄祖，则所言良是。如表、祖者，讵足骂哉？”

来写作。在其尺牍文中，共有4篇代文，语气与汪瑔自己所写的文也有所不同。《代致某观察》里，没有特别的谦虚之词，对某观察欲办保甲的思路进行合理分析，态度显得温和而不失礼节："鄙意公甫到任，姑缓之，俟州县得人，再图此举何如?"而在《代与某太守》中讨论关于宾客狭邪之事，汪瑔则俨然使用代者的口吻，"此种举动，窃不愿明公效之"，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不像汪瑔自己写给一些官员的书信中那样婉曲，欲言此事而先言彼事。

第六章

汪瑔的文学地位与影响

汪瑔的作品，真实反映了近代岭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也记录了一个幕客诗人的心路历程。他的诗歌既显出岭南诗风的直爽之气，又蕴涵着江浙文人的婉约之风，在岭南晚清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词则与叶衍兰、沈世良并称为“粤东三家”，他们是岭南晚清词坛上成就最高的词人。他和叶衍兰、沈世良等人都是以晚清浙籍入粤的作家而活跃于岭南文坛的，故有必要从这一特殊的创作群体去考察汪瑔的地位和影响。

第一节　汪瑔与晚清浙籍入粤诗人创作之关系

一、晚清浙籍入粤作家创作概况

汪瑔是晚清时期由祖籍浙江，迁入广东后占籍番禺的诗人，在此前后还有一些和他一样由浙江进入广州的作家，现对他们的情况作大致的统计，列表如下：

作家	原籍	主要经历	著述
徐灏（1810—1879）	浙江钱塘	先世游幕居粤，遂入籍番禺。十岁而孤，年十八佐南海县幕。咸丰七年（1857），按察使周起滨以重礼聘入幕，奏请立案谷米永不抽捐，论者以为利国福民。以名幕参与粤桂政务，凡节府大致莫不资以策划。改官同知加知府衔，后署柳州府通判、陆川县知县、庆远府知府，皆有政声，继由知府擢任道员。平生致力于小学。	《说文部首考》、《象形文释》、《说文笺注》、《通介堂经说》、《律乐考》、《通介堂文集》、《灵洲山人诗录》、《名法指掌图》、《九数比例》、《算学提纲》、《蚕桑谱》、《洞渊余录》、《攓云阁词》

续表

作家	原籍	主要经历	著述
徐本义 嘉庆间人	浙江 仁和	初试不售，遂不复赴试，为某鹾商课子。	《申椒诗草》佚
范如松 嘉道间人	浙江 上虞	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十二年会试挑取誊录。	《书三味轩词稿》
陈其锟 嘉、道间人	浙江 山阴	道光六年（1826）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发贵州，改捐主事，签分礼部仪制司行走，充则例馆协修。父丧，归里，以母老，遂不复出仕，于广州主讲羊城书院垂三十年。筹军饷，办团练，建会馆，修赤冈、琶洲二塔，无不竭力筹划。	《陈礼部文集》、《循陔集》、《载酒集》、《月波楼琴言词》、《凡含香集》
叶英华约 嘉道间人	浙江 余姚	工诗词，善花卉、人物，与汉军、子璞、秀琨诸人结画社。	《花影吹笙词》、《斜月杏花屋诗钞》
俞洵庆 嘉道间人	浙江 海宁	善花鸟，工诗文。客粤抚幕二十余年，遂入籍番禺。	《荷廊笔记》
陶福祥 （1834 — 1896）	浙江 会稽	同治十一年（1872）选广州学海堂专课肄业生。从陈澧受经学，笃守师承。光绪二年（1876）举人。五年七月补学海堂学长。光绪十三年主讲广州禺山书院。张之洞督粤，设广雅书局，刊行书籍，聘之为总校。张移督两湖，设两湖书院，又聘之为书院商订规程，评校课卷，教士以“博观约取”为主。	《爱庐文集》、《汉学箴》、《宋学箴》、《东汉刊误》、《北堂书钞校字记》、《梦溪笔谈校字记》、《经说丛钞》
汪瑔 道咸间人	浙江 山阴	汪瑔从叔，汪兆镛父。咸丰十年（1860）居四会令张作彦幕，适陈金刚围城，瑔坚守百余日，粮尽以树皮草根为食，卒保孤城。	《省斋诗存》
沈世良 （1823—1860）	浙江 山阴	少时即刻苦攻读，研经究史，博闻强记。尝从张维屏问学。曾用心于八股制艺之文，但因为兵燹连年，乡试不第，仅以贡生终老。咸丰年间与友朋结山堂吟社、花田词社、河林词社。咸丰八年（1858）被举为学海堂学长。咸丰九年入赀为教官，选授韶州府学训导，未赴任即辞世。熟于南史和禅学，工骈体文、诗，尤以词名，	《屈介子事略》、《小祇陀盦诗钞》、《楞华室词》、《倪高士年谱》
叶衍兰 （1823—1897）	浙江 余姚	衍兰弱冠为县学生。咸丰六年（1856）进士，授主事，签分户部。以忤权贵，遂告归，主讲越华书院。	《秋梦庵词》、《海云阁诗》、《清代学者像传》
汪瑔 （1828—1891）	浙江 山阴	咸丰三年（1853）为曲江令五福幕客，随五福历阳山、东莞、番禺三县及廉、琼、潮、高、肇庆五府，凡十六年。同治八年（1869）再客潮州，十一年入藩使俊达幕。光绪元年（1875）刘坤一督粤，延主夷务，理中外交涉，继任裕宽、张树声、曾国荃皆倚重之，前后又十年。一生做幕，办事敏决干练，谋事多有成，所至皆有声。晚岁读书养疴，不复出。	《随山馆猥稿》十卷、《续稿》二卷，《随山馆丛稿》四卷，《随山馆尺牍》二卷，《随山馆词稿》一卷、《续稿》一卷，《松烟小录》六卷，《无闻子》一卷，《旅谭》五卷

续表

作家	原籍	主要经历	著述
俞守义	浙江绍兴	受业陈澧之门。光绪五年（1879）举人，充觉罗官学教习，纳粟为郎中，签分刑部贵州清吏司，调直隶清吏司。以生母马氏年高有疾，告归奉养于穗，于城南水母湾建崇本善堂。	未见著述。
范公诒 光宣朝人	浙江上虞	光绪十七年（1891）优贡生，朝考二等，以教职选用。奉委司安平、裕丰两仓董事，选授龙川县学训导，举学海堂学长，精于金石之学。平生博取西政、西艺而折衷中学。	《水经注书目、碑目存佚考》、《粤东金石录补正》、《宋元刻汉书考》、《洁庵文集》
沈泽棠 （1846—1928）	浙江山阴	世良子，工诗词，负时名，早卒。与兄石腥守贫读父书。性殊卓荦，骈文甚工，楷法逼欧。交多老宿，论事不随。下笔不俗，诗近梅村。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	
陶文鼎 咸丰间人约 （1851—1861）	浙江会稽	少孤，以孝友名。其读书必究心本原，以自得为主，未尝随俗趋向。尤洞察古今治乱，长于断事，深于议论而必躬体之。与汪瑔交最深。	《有真意斋诗钞》
朱启连 （1853—1899）	浙江萧山	朱执信之父。年十九，游汪瑔之门，瑔以女妻之。家贫，遂橐笔佐有司治文书。诗能传汪瑔之法。	《棣垞集》、《棣垞外集》、《琴说》、《琴谱》
汪兆铨 （1859—1929）	浙江山阴	汪瑔之子。年二十，与从弟兆镛读书于随山馆。光绪七年（1881）年，选学海堂专课生。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历任海阳县（今潮州）教谕、菊坡精舍学长、广雅书院总校、广东高等学堂教务长等。辛亥后任教忠师范学堂校长、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广东通志局总纂。幼承家学，所作诗词，颇有随山馆家法。	《苌楚轩诗集》、《惺默斋诗集》、《惺默斋词》
汪兆镛 （1861—1939）	浙江山阴	少时从汪瑔读书。尝肄业学海堂，受业于陈澧。光绪十五年举人，三赴礼部试不第。光绪三十年入岑春煊幕，颇得信用。辛亥革命后，屡被当局聘任而不就。后避居澳门从事著述。擅诗词，学问渊博，著作丰富，于历史文献之保存整理及研究贡献良多。	《微尚斋诗》、《澳门杂诗》、《微尚斋杂文》、《雨屋深灯词》、《碑传集三编》、《晋会要》、《元广东遗民录》、《番禺续志》、《岭南画征略》
徐绍桢 （1861—1936）	浙江钱塘	徐灏之子 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历任福建武备学堂总办，江西常备军统领，广东全省营务处总办，苏淞镇总兵、江北提督。二十八年赴日本考察军事，三十年任两江总督衙门兵备处总办，负责编练新军。三十一年任第九镇统制。倾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并率领新军占领南京，稳定汉口、汉阳，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以后一直追随孙中山。	《学寿堂文集》、《学寿堂诗集》

（此表格统计参考何品瑞编纂《番禺县书目志》、《番禺县续志》，《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东历史人物辞典》、《中国文学大辞典》）

据上述表格，不难看出这些作家除徐灏、陈其坤、叶衍兰、徐绍桢几人有为官的经历之外，其他都是布衣终身，这说明他们的地位都不是很高。同时，他们入粤的原因极其相似，皆为生计所迫，或随其祖，或随其父游粤，背井离乡，后来定居在广东地区。虽然是远离了浙江的故土，但实际上他们在广东地区仍然有着极强的乡土观念。他们与自己的同乡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乃至互通婚姻。上述作家中汪瑔与之有交往的就有多人。汪瑔曾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浙江萧山的朱启连。而与汪瑔最好的朋友之一的陶文鼎，也是祖籍会稽，陶文鼎的儿子陶邵学又与汪瑔之婿朱启连相交甚好。朱启连病逝后，陶邵学还为其撰《朱君家传》、《朱君启连传》，并为其出版诗文集。

晚清时期这些由浙入粤的作家，在岭南地区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在当时的岭南文坛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部分作家诗词文皆有创作。他们创作的整体特色是从自身境遇出发，密切联系着晚清的社会变迁，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如徐灏的《漫兴八首》其一："海水飞腾拥会城，越王台榭已全倾。故园花溅伤春泪，去国人怀隔世情。拔帜三军虚擐甲，折麾一夕罢谭兵。大渔日落风尘暗，壮士空援桴鼓鸣。"[①] 诗人有感于鸦片战争之后的广州，被外国侵略者肆虐而清政府一败涂地的惨败时局，痛心疾首地写下这组诗。整组诗中都蕴涵着诗人满腔的忧国忧民之心，反映出在战争年代有责任感的文人面对国家遭遇外敌入侵之时的悲愤和沉痛心情。咸丰七年（1857）冬，英法联军侵据广州，俘获叶名琛，叶英华曾作《丁巳冬腊感事》纪之，诗中有"虎门天设险，翻放犬羊来"[②]。他把侵略者的卑劣行径斥责为"犬羊来"，其对侵略者的痛恨之情可以想见。在诗中他还写到夷人来侵时，当时清政府的官员的逃避，"噩语传风鹤，空山草木兵。屋声颓万瓦，箭火掣连城。挟矢肥猪窜，闻雷闷鸭惊。三章歌缚鬼，苦作不平鸣。"在这段诗歌后有作者的自注："夷人攻省垣时，万炮轰天，彼仓皇奔窜，处不一处，逃匿无时，乃反示谕居民，无庸迁避。呜呼，彼当道者，是诚何物也！"结合诗人的自注来理解诗歌，这段诗歌的前四句写的是夷人来进犯的情景，"挟矢肥猪窜，闻雷闷鸭惊"，应是对当时广州那些临阵抱头鼠窜的官员的斥骂。诗的后面还写到夷人占据广州城后的扫荡掳掠恶行，"呜咽东

---

① 徐灏：《灵洲山人诗录》，同治三年（1864）刊。

② 叶英华：《斜月杏花屋诗钞》，番禺叶氏 1936 年铅印本。

流水，声吞饮恨长。盗铃徒掩耳，索挂已亡阳。冥漠天难问，浮沉气不扬。牛羊来日暮，蹴踢下平冈。”诗人在此自注：“夷人每于薄暮日落将罗时，辄结伴向各家搜括，竟有逐次翻检者。余家已经六次矣。”诗人从自己的亲身遭遇来写外敌入侵的罪行和当局官员的无耻，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当时战争的实情。这些反映战争，忧国忧民的诗歌在汪瑔的作品中也有很多，这在前面已经详细介绍，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又在创作中抒发自己的真实性情，是对岭南历代的雄直风格和江浙地区的婉约风格的交融，以质朴自然为主要特点，雄直而不失含蓄之致，隐约而无晦涩之词。

如陶文鼎的《始兴道中》：“昨过韶州换九篷，始与江水望濛濛。何人把钓坐矶上，尽日并鸥行雨中。旅思不禁三月浪，客程犹借一帆风。淡烟浓翠都如画，坐想元晖泼墨工。”[①] 写旅途中的所见所感，濛濛的江水，矶上的钓者，雨中同行的白鸥，都使羁旅在外的诗人顿生乡关之思，景物与诗人的感情相契合，真挚而自然。另外一首《舟行即目》亦是如此，诗云：“压浪双峰起，横江一鹭来。偶然停棹处，时有好花开。风雨青犁动，沧浪白发催。诗情与客思，一日几徘徊。”由舟中所见之景，继而写年华易逝与客愁之思，由情入景，水到渠成。

沈世良的《小祗陀庵诗钞》中也有不少以真性情创作的诗，如卷一中的《夜行平远道中书所见》：“江折路回环，孤舟苍莽间。星光思替月，水气欲沉山。渔火知村近，荒燐上树闲。平生事幽讨，未惜鬓毛斑。”“星光思替月，水气欲沉山”写得气势豪壮，而结句的“平生事幽讨，未惜鬓毛斑”却又含着凄凉和无奈之意，融雄健与悲凉为一体。卷二中的《秋感》八首其三则更是其自我心路历程的写照：“少年风力抗雕翎，中岁岩扉注鹤经。浮白爱吟枯树赋，骈红狂草瘗花铭。马卿多病称词客，臣朔长饥是岁星。值得歌堂秋拍碎，本来身世太飘零。”沈世良一生清癯多病，穷困潦倒，不幸的遭遇造成他精神上的忧愁善感，因此他的诗饱蘸着感情的血泪，诗思凄苦。沈世良三十八岁忧愁而逝，但在这首诗中他却分别写了“少年”、“中岁”和“浮白”三个人生不同的生命阶段，其中的“浮白”和他的年龄是不相称的，这也反映出他内心极度的抑郁愁苦。他以诗歌抒写现实人生中的痛苦和不幸，质朴中又有真情。

---

① 陶文鼎：《有真意斋诗钞》，光绪年间刻本。

汪瑔的抒情性诗歌更是如此，此处不再赘述。

二、汪瑔与其他浙籍入粤诗人的比较

晚清时期由浙入粤的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汪瑔在这些作家中也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他是由浙入粤作家的代表，也是在当时岭南文坛颇有影响力的作家。

汪瑔是晚清时期由浙入粤作家的典型代表，这与他在文学上的创作成就有关。汪瑔一生创作丰富，不仅创作诗歌、词、文、赋，还有笔记性的诗论、词论等。而和他同时入粤的其他作家，如叶衍兰、沈世良、徐灏等，虽然在当时也颇有影响，但因为他们的作品保留不够完整，或者是主要成就不在文学方面，故而不如汪瑔更具有代表性。叶衍兰，原籍浙江余姚，咸丰六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他能诗善词，工小篆行楷，擅丹青，可谓博学多才。著有《海云阁诗钞》一卷，《秋梦庵词钞》二卷、续一卷、再续一卷等，他在当时的岭南文坛影响颇大，但因其《海云阁诗钞》是后人辑录，并不是其生平著作的全部，若选取他的诗歌来作为研究对象，不足以睹其全貌。沈世良，和汪瑔一样，原籍浙江山阴。少时刻苦攻读，博闻强识，曾潜心科举，但因连年的战乱，乡试不第，仅以贡生终老。著有《小祇陀庵诗钞》四卷、《楞华室词钞》二卷等。沈世良自幼长期患病，抑郁寡欢，未及中年便溘然而逝，年仅三十八岁。他在当时岭南文坛的影响也颇大，但因其所经历的时期较为短暂，其代表性稍逊于汪瑔。徐灏，原籍钱塘，著有《灵洲山人诗录》，但在当时他较有影响的是治经学和小学的成就。徐世昌说："子远有经济才，历佐粤督幕府，著书百余卷，世多称其经小学，不知其诗有根柢。"[①] 徐灏的诗歌经常引经据典，经学气息较浓。这跟他长年治经学和小学有关联，诗歌过于典硕而性灵不足，在抒发性情方面不如汪瑔。

---

① 徐世昌：《清诗汇》卷148，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0页。

第二节　汪瑔在晚清岭南文坛上的地位与影响

一、近代名流对汪瑔的评价

1. 汪瑔在晚清岭南文坛上的地位，可以从近代的诗人学者对汪瑔的评论得到说明。近代名流对汪瑔人品和作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除了前已引述的张维屏、陈澧、林昌彝、谭献、文廷式等对汪瑔的赞赏之词外，金武祥在《粟香四笔》卷七中还收录了汪瑔去世后友人所写的挽联，他认为通过这些挽联，“亦可见其（汪瑔）生平焉”：

> 陶心雲孝廉云：“容甫毕生惟述学，钝翁垂老益工诗。”文芸阁太史云：“抗心古淡，处世元同，平生自署无闻子；谈艺十年，论交两世，后死应题有道碑。”吴孟棐明经云：“岭表来游与谁论唐宋诗心齐梁文体，南中流寓犹得见容斋随笔笠泽丛书。”叶兰台部郎云：“绮岁记联吟华岳浔阳同劲敌，骚坛难振乡词笺赋笔总伤神。”陶子正孝廉云：“遗集迈西泠，差喜及身能自定；豪情空北海，伤心先友已无多。”陈子厚太守云：“桃花潭水冷，丛桂小山空。”胡衡斋大令云：“太息闻人不登上寿，每怀良友辄诵遗文。”王子展刺史云：“记曾廿载周旋论治观人有元方康成之感，自有千秋盛业文格书品在圣徵元颖之间。”①

这些挽联虽不乏谀颂之词，但是也反映出友人对汪瑔的人品和文学造诣的肯定。同时，汪瑔的这些友人，如文廷式、叶衍兰等，都是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人物。金武祥也为汪瑔写有挽联：“有经世才，但将名士称君测君犹浅；抱知己痛，曾以循吏目我问我何堪。”金还对自己的这幅挽联特别说明：“上联之意君实不愧，诸人均未道及也。”他说汪瑔是无愧于“经世之才”的称赞，并且是别人都未曾提及的。

汪瑔的文学创作之所以得到近代学者的较高评价，最根本的原因是其爱

---

① 金武祥：《粟香四笔》卷七，《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11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国忧民的情怀。张维屏说汪诗“慨乱伤离，时露风骨”。孙福清[①]则说：“穀翁贻辛中仁诗云：布衣报国心，期汝终不变。观穀翁诗，当以此求之”。二人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汪瑔诗歌中所表达的爱国情怀。近代清诗研究的学者钱仲联先生也对汪瑔的爱国诗评价甚高。钱先生不仅赞叹汪瑔的诗歌“极有见解”[②]，而且还具体指出汪诗中的爱国诗，如《广州杂感八首》、《书事四首并序》等。钱先生在《清诗纪事》中特别选取了汪瑔的《葛将军妾歌》作为代表，可见钱先生十分赞赏汪诗中有爱国情怀的诗歌。而文廷式在给汪瑔的《随山馆猥稿》作序时说：“夫风雅道衰，輶轩不采，下情无以上达，而作诗者又不能原本学术，考察民情，淆然为无谓之辞，或仅仅雕镂虫鱼，极命草木，而诗学几为天下裂。顾安得如君者一二辈，起而振之，书至此，不仅三叹，亦愿后之读斯编者，推求至隐，以余之言为喤引焉。”文廷式以当时诗坛上的流弊为背景，指出汪瑔的诗歌关注现实，继承风雅传统的可贵。

当然汪瑔的创作在艺术上也确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达到较高的造诣。近代诗人学者关于这方面的评论前文已有引述，此不重复。

二、汪瑔对汪氏家族及门人的影响

汪瑔在岭南文坛的影响集中体现于对汪氏家族及其门人的影响。

1. 汪瑔对汪氏家族的创作的影响，主要有汪兆铨，汪兆镛，汪兆铭等。

汪兆铨（1859—1929）是汪瑔的儿子，著有《惺默斋诗》、《苌楚轩诗集》等。“少承家学，与梁鼎芬、于式枚、陈树镛、陶邵学、朱启连、简朝亮等，为莫逆交。师事陈东塾澧，为入室弟子”，“生平为学博涉群籍，于乙部尤为精邃；诗词古文，亦造诣卓跞。性风雅，和易近人，奖掖后进，无微不至，群仰为斗山，晚自号惺默，以诗酒自娱。”[③] 他的性格和汪瑔有着相似之处，都是和易近人，他的晚年也颇有乃父晚年生活的旨趣。他的词《水调歌头》（八月十五夜，时有海警）作于1894年的中秋节，在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并击伤济远等舰，中日甲

---

① 孙福清，字补璇，号稼亭，嘉善人。咸丰辛亥举人，历官大理寺评事。有《望云仙馆诗钞》、《海南纪游草》。

② 魏中林：《钱仲联讲论清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③ 廖景会：《汪兆铨传略》，转引自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6页。

午战争爆发。二十七日，日军攻牙山，清军败走。七月一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他有感于时事，作该词以寄托感慨。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软弱腐朽的清政府通过割地赔款来苟延残喘，台湾就是在这时割让给日本的，汪兆铨又作诗《书愤》（割台湾）来表达他对国土沦丧的悲愤之情。辛亥革命爆发当年，汪兆铨又作《买陂塘·落花，辛亥冬作》，借咏落花而谈论时政。这与汪瑔在诗词中关注国运民生之苦是有着相似之处的。另外，汪兆铨作的一些表达个人情怀的诗歌，也极得汪瑔诗风的真谛。如《秋怀》："三日积雨歇，一夜西风生；空庭走黄叶，满地皆秋声。秋声入耳不可听，直入愁肠与愁并；千回百结不自知，白发明朝上明镜。白发不可染，明镜不可磨；我非谢东山，中年哀乐何其多?" 由对自然界的景物的描写，继而写人生的感慨和辛酸，情景结合，使感情的表达自然而不做作，颇有随山馆家风。

汪兆镛（1861—1939），字伯序，一字憬吾，自号慵叟，晚号今吾。汪瑔之从子，曾受业陈澧门下，清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两应礼部试，不售，遂南归。光绪三十年入岑春煊幕，颇得信用。辛亥革命后，屡被当局聘任而不就。后避居澳门从事著述。擅诗词，学问渊博，著作丰富，于历史文献之保存整理及研究贡献良多。著有《微尚斋诗》、《澳门杂诗》、《微尚斋杂文》、《雨屋深灯词》、《碑传集三编》、《晋会要》、《元广东遗民录》、《番禺续志》、《岭南画征略》等。汪兆镛"少时读书于芙生十五叔父寓舍中"[①]，后来他给自己的寓所取名"微尚斋"，因为《南史·谢宏微传》里有："叔父混，风格高峻，名知人，尝为韵语，以勖宏微曰：'微子基微尚，无倦由慕兰。勿轻一篑少，进往必千仞。'"[②] 他以此为名表示不能忘记叔父汪瑔的教诲。汪兆镛在《微尚老人自订年谱》中还说："十五叔父以读书须在省会之地，乃能得师友观摩之益，在外独处孤陋寡闻非计也。"[③] 因此汪瑔写信给汪兆镛的父亲，要求让汪兆镛到省城来，和其子兆铨一同学习。对于叔父的教诲，汪兆镛又说："叔父饮食教诲，眷爱无微不至。每夜阑客散，命侍坐，或论学，或讲处世接物之道，娓娓不倦。兆镛一生得益，实基于此。"[④] 汪兆镛把自己一生的成就都归功于叔父汪瑔的教导，可见汪瑔对

---

① 汪兆镛：《微尚老人自订年谱》，文海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3 页。

② 同上。

③ 《微尚老人自订年谱》，文海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7 页。

④ 同上。

他的影响的确不小。

夏敬观在《忍古楼词话》中说："憬悟词致力姜、辛，自摘怀抱，其品概亦今日之邝湛若也。"可见汪兆镛作词和汪瑔所学习的对象都有姜、辛，"自摘怀抱"，谓其词是抒写自我性情之作，这也和汪瑔的词学创作观念有相似之处。在这里，还对汪兆镛的"品概"即人品进行评价，说他是"今日之邝湛若也"。邝湛若（1604—1650）是明末广东著名诗人，是一个秉性不羁，鄙视金钱，不慕科名，蔑视传统礼法的"奇人"。永历帝时出使广州，清兵入粤，他与诸将戮力死守城池达十个多月。后来城被攻陷，他拒绝进食，抱琴而死。夏敬观把汪兆镛比作今日之邝湛若，意在言他的忠君爱国的高尚品格。汪兆镛的词《柳梢青》："雨暗烟昏，故园何处？花落成茵。几日离愁，闲抛笛谱，懒拂筝尘。尽教燕去莺嗔，休忘却、东风旧因。梦里还寻，愁边独写，忍说残春？"叶恭绰在《光箧中词》中评此词"欲言不尽"。该词用春残花落，旧梦离愁等诗词中常用的意象，营造出无尽的意境，比汪瑔的词更胜一筹。

汪兆铭（1883—1944），即汪精卫，汪瑔之从子，是汪兆镛同父异母的弟弟，但二人在志趣上却大相径庭。兆镛是前清遗老，念念不忘其故主；兆铭则先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背叛革命与敌人合作，出卖国家民族。姑且不评价汪兆铭的政治生涯，但看其文学造诣。他长于诗文，著有《小休集》、《扫叶集》和《三十年以后作》，合为《双照楼诗词稿》，共四百多首。钱锺书先生在读其诗词集后，发出"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①] 的赞语。汪兆铭虽以政治生涯而显名，但在其诗词中则是以写景、咏物、纪游为主，并且他的诗词也能很好地融情于景，读来动人心魄。如他在 1914 年的《红叶》之一："不成绚烂只萧疏，携酒相看醉欲扶。得似武陵三月暮，桃花红到野人庐。"题为咏红叶，却处处在自抒怀抱。他在政治生涯颠沛流离之中所作的《秋夜》也极其感人，诗云："落叶空庭夜籁微，故人梦里两依依。风萧易水今犹昨，魂度枫林是也非。入地相逢虽不愧，擘山无路欲何归？记从共洒新亭泪，忍使啼痕又满衣。"陈衍曾赞誉该诗"工切绝伦"，此诗应该是他写给陈璧君的，由眼前秋夜之景，写对陈之思念，并且在诗中

---

① 钱锺书《题某氏集》："扫叶吞花足胜情，矩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讖易成。"见其诗集《槐聚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67 页。

还穿插着他对自己所亲历政坛风波的万端感慨。早年的汪兆铭是满怀着革命和报国的壮志的，1910 年，二十七岁的汪兆铭为挽回党人和民众对革命的信心，亲赴北京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败后被俘。在狱中，汪兆铭作《金缕曲》表达他的报国壮志和对陈璧君的真挚感情，词云："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该词写得至情至性，将国破家亡之恨和肝肠寸断之离愁结合起来，字字血泪，感人至深。

汪兆铭晚年的诗词常用两种主题：一哀山河、民生；一伤自身名节，感情基调都极为愁苦，他的此类作品常作为后人讥讽的对象，但其中蕴涵的感情却是真实的，这点和汪瑔也是有相通之处的。汪兆铭自幼跟随叔父汪瑔在其随山馆读书，一直到汪瑔逝世后，他仍跟随堂兄兆铨和同父兄兆镛学习，他早年激于救国大义，投身革命，与父兄辈的爱国忧民思想不无传承关系，而他的传统诗词素养也可谓得之于随山馆的培植，终日的耳濡目染，对其为诗为文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2. 对其门生的影响。当时跟随汪瑔学诗的人主要有朱启连、陶邵学、胡衔等。

朱启连，是汪瑔的门生，也是汪瑔的女婿，近代著名革命家朱执信的父亲。著有《棣垞集》四卷、《棣垞外集》三卷等。陶邵学在《朱君家传》中说其"游汪穀庵先生之门，深植厚溉，毓实玩华，于书无不窥"，"与番禺陶邵学交至善，邵学尝评君性行似元结，文学似陈师道，艺术似姜夔，非今之士所有也"。从他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汪瑔对他的影响很大。汪瑔的女儿"汪若昭自幼承家学，能诗能文，与朱启连有唱和之雅"①。他们志趣相投，在诗歌创作上相互欣赏，二人同时受汪瑔的直接影响。因此，汪瑔在其门生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朱启连。在《棣垞集》卷首绵竹杨锐评其诗曰："无一语不经酝酿而成，一洗近时浅易粗犷之习"。

---

① 林家有、张金超《文武兼备的革命家》："汪若昭幼承家学，能诗善词，尤其熟悉文天祥、史可法、陈子壮等人的英雄事迹，常常向儿女们讲述这些历史人物故事，以教育子女。"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 页。

义宁陈宝箴则评曰："峻洁幽峭，抑复宕放自喜，朱霞天半，文如其人，并世得此盖寡矣。"二人都认为其诗文创作清新而不同流俗，自有其独特的性情。这也正符合汪瑔的诗文创作观念。

朱启连也常以诗歌写到羁旅途中的所思所感，如《戊寅八月二十一日发廉州二首》之一："挂席叶纷纷，离程雁叫群。摇晴双桨日，铺热一川云。有客劳相劝，他乡惜暂分。临江官舍晚，清话展殷勤。"写离别之时的场景，依依不舍的留恋，情自在景中，写出"无人知别恨，枉用尺书传"的愁怀。而《舟中柬俞星垣》则更得汪瑔写怀人诗的风神，诗曰："真成漂泊水为家，十日推篷厌浪花。阻浅舟如行地上，共归人似隔天涯。鸥心远去风偏弱，鸦背飞回日又斜。知中薄寒犹未愈，可能句漏访丹砂。"诗题为寄友人，实际是在对友人表述自己的遭遇，舟行浅水，偏又风弱，欲行不得，欲止不能，更让诗人伤感的是即将临近句漏山，自己却因中风寒未曾痊愈，也不知能否去造访。旅途中的无奈，焦虑都在诗中。他在《江村桃花》中写道："流水无言虽自媚，旧游如梦只增惋。绝怜岁月去飘忽，坐对繁华减豪翰。春风颜色如可留，那惜青钱三万贯。"借写桃花之凋零，写岁月之流逝，虽然是伤时之词，却也写得古朴率真，极得汪瑔的真传。

陶邵学，是汪瑔的挚友陶文鼎之子，跟随汪瑔学作诗，与朱启连关系至善，著有《颐巢类稿》。梁赞燊在《颐巢类稿跋》中云："其诗撷六朝、唐、宋诸家之腴，而归于性情之正。幽深婉远，磅礴郁积，充乎其中而发乎其外。"徐世昌在《清诗汇》中说："颐巢雄于文词，少与陈庆生、朱启惠友，互相切劘。世谓朱为文廉峭，而陶意度冲远，从容赴节，起粤东近代文学之衰者，自二人始。颐巢尤工七言，诗多促狭危厉之音。尝作《妖鸟篇》，刺世言更法者。"① 虽然陶邵学诗歌在内容上稍显狭隘，但其某些诗歌笔力不凡，从中可见出汪瑔对其影响。如《水亭望夜》："野气日沉夕，清光照独游。萤专草阁夜，蛙王野塘秋。残月犹明水，疏星欲倚楼。苍茫云壑外，何处隐灵虬？"该诗作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当时他正在肇庆，诗中通篇写岭南秋夜的景物，却又暗含着诗人对于时局的隐忧，颔联以"萤"的"专"和"蛙"的"王"来暗寓小人大行其道，与尾联诗人以"灵虬"来隐喻自己的退隐相呼应，表达含蓄而深婉。写旅

① 徐世昌：《清诗汇》卷一八〇，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0页。

途之中所见所感的《北行舟中》："白板重经宿，黄泥几度湾。坐延洲畔月，梦绕客中山。即物成宾侣，虚州自往还。水云长在眼，意与白鸥闲。"此诗写其乘舟经过黄泥湾之时的感慨，与汪瑔的羁旅之作相似，用词淡然质朴，但该诗却无凄苦之意，表达的情感与汪瑔有所不同。但他的怀人诗却与汪瑔的怀人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怀省中诸子》："相见人频异，幽栖地暂分。潮田多渐水，海雨不关云。蚊蚋经冬集，松篁入夜闻。眼前无乐意，书卷自缤纷。"

胡衔，著有《经义堂诗钞》。汪兆铨在为其诗集作的序中说，"兆铨与君夙有渊源，喜同沆瀣，聊松龄唱和之集，正兰成射策之年，斗险韵于尖叉，答同音于笙磬"，可见他同汪瑔的儿子常有诗歌唱和。在该序中，汪兆铨还对胡衔的诗歌作出了评价："由是感怀身世，一寓于诗，陶铸百家牢笼万象，蜂酿甘蜜不问谁氏之花，麝和众香独蕴灵芬之气。其音之清也，如唳空之苍松；其思之沉曲也，如抽寡女之丝；其采之斑连也，如濯鲛人之锦千里于……至于睹沧海之横流，念斗牛之宿命，慨阳九之将届，哀民生之多艰，词婉而意深，言近而旨远，则又似元结舂陵之作，感慨系之，拟香山乐府之篇，波澜莫二者矣。"汪兆铨此言不免有吹捧的成分，但也反映出他本人对胡衔诗歌的看法，"词婉而意深，言近而旨远"则颇为中肯。朱启连在为之序时云："若汪氏之门之为诗者，粹然一出于正，以风雅言诗，非以考博言诗者也。"这是针对胡衔诗歌是以情为主，而不过分注重文辞而言的，可谓汪氏门人创作诗歌的传统观念。其诗如《江行杂诗》五首其一："落魄他乡更远游，此身无定是扁舟。春江千尺桃花水，争教离人一段愁。"诗造语自然，直抒胸臆，写对身世的感叹和羁旅途中的惆怅，极具汪氏门风。《秋感》三首其二："又听惊鸿海上来，蛮夷旧长有朝台。大风客讽前王句，落日人思杂霸才。投笔班生千载往，乘槎博望几时回。料应学剑都无用，潦倒天涯酒一杯。"胡衔面对蛮夷侵略的时局，忧虑万端却又无可奈何的愁怀，凝聚在诗中，这也和汪瑔诗关注国运民生之苦有相似之处。

结　　语

“文章自古皆无用，况是烽烟四起时。”这是一位友人读了汪瑔诗文后发出的感叹，汪瑔对此评曰：“沉痛苍凉，又不独为仆言之矣！”[①] 中国历代文人都要在诗文中抒写自己的身世情怀，家国的荣辱盛衰，然而这无论是对作者个人还是对社会，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尤其是在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一介书生颠沛流离，羁旅谋食，却还时时不废吟咏，真使人有于事无补之叹。但是，“文章关至性，忠孝副诗人。”[②] 他们仍然执守着传统的理念，于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许多像汪瑔这样的普通文人留下来的诗文集，它们向后人呈现着作者的生活和情感心态，释放出对特定时代社会的记忆，也勾起了后人与前人的一种文化丝牵。对于实存的物质世界来说，这些线装书依然无用，惟愿在精神的世界里它还能化“无用”为有所用。

---

① 《随山馆尺牍》卷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71 页。

② 《随山馆猥稿》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1 页。

附录一

汪瑔年谱简编

道光八年戊子（1828）一岁

张维屏四十九岁。林昌彝二十五岁。陈澧十九岁。郑献甫二十八岁。徐灏十九岁。陈良玉十五岁。曾国荃五岁。

道光九年己丑（1829）二岁

杜友韦生（—1860）江苏无锡人。字仲容，别署小樊川（有《小樊川诗稿》）。咸丰元年（1851）举人。官广东阳江知县，有惠政。工诗，学玉溪生（李义山）。

道光十年庚寅（1830）三岁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四岁

陈宝箴生。瑔卒后，陈为作墓志铭。

刘坤一生（—1902）。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五岁

杜季英生（—1857）。

陈澧中举。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六岁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七岁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八岁

幼时性极好弄，然喜听人诵诗，长姊取唐诗授之，八九岁即初辨四声（《旅谭》卷五）。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九岁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十岁

陈良玉中举。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十一岁

鸿胪寺卿黄爵滋疏陈鸦片为害之烈，力主严禁。申严烟禁，藏鸦片、

烟具者处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东查办鸦片。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十二岁

周济卒（1781—）。

林则徐至广州，查缴鸦片二万余箱，公开于虎门海滩销烟。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兵侵华。

英国兵船于穿鼻洋、官涌一带多次武装挑衅，皆被击败。

中英贸易停止。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十三岁

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

英舰封锁广州江面与海口，主力北上，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十四岁

清政府对英宣战。

英军攻陷虎门，广东水师关天培战死。

广州三元里人民奋起抗英，严惩侵略者。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十五岁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春，清远，舟次夜雨同秋坪联句《春夜雨中秋坪述壬寅春清远舟次夜雨联句事忽忽十载矣》（《随山馆猥稿》，第585页[①]）。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十六岁

洪秀全于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会。

中英《虎门条约》签订。

是年，广州、厦门、上海开埠。

二月，许玉斌、黄玉阶邀陈澧、谭莹、桂文耀、叶英华、沈世良、徐灏等为越台词社于学海堂。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十七岁

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十八岁

十二月，广州人民捣毁广州府署，反对准许英人进入广州城。

---

① 以下所引汪瑔的诗歌皆出自《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省略书名和出版项，仅标页码。

作诗和王樾。诗中有“相思丁卯桥边路，料得吟诗似许浑”句（《次韵寄王少香樾》，第 561 页）。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十九岁

樊增祥生（—1931）

秋，同卢秋坪在夜晚下棋，并作诗（《与卢秋坪洲夜弈》、《夜雨同秋坪》，第 562 页）。

七月七日，作诗与俞浦臣（《七夕寄俞浦臣洵庆》，第 562 页）。

作诗和卢秋坪（《白菊和秋坪》，第 562 页）。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二十岁

在广州应学海堂课业，蒙张维屏、谭莹、陈澧赏识（《旅谭》卷五）。

作诗和姚德传（《次韵畲姚习庵德传》，第 563 页）。

观盂兰盆会（《观盂兰盆会》，第 563 页）。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二十一岁

王鹏运生（—1904）。

黄遵宪生（—1905）。

由陆丰去海丰（《陆丰至海丰道中三首》，第 563 页）。

从平山坐船去惠州（《自平山买舟至惠州二首》，第 563 页）。

九月九日，与俞浦臣、李叔铭、李秋丞、马芍舲、孙勤庵同去粤秀山登高。登高归来，同聚俞浦臣之衡华阁（《重九日偕浦臣、李叔铭、秋丞昆季、马芍舲、孙勤庵粤秀山登高，归集浦臣衡华阁》，第 565 页）。

送十三兄归信宜（《送十三兄之信宜》，第 565 页）。

十二月，浦臣到访（《十二月望夜浦臣见过》，第 566 页）。

有感于客之言葛将军妾之事，为其妾作诗纪之。《葛将军妾歌并序》：“客有言，葛将军妾者，故越人，不详其姓氏。道光辛丑，葛公为定海总兵，英吉利犯定海，力战六昼夜，援师不至，殁于阵。妾遽集婢仆及賸卒，得数百人，夺公尸，归葬于山阴，盖奇女子也。震泽赵艮甫作《十哀诗》，纪公死事甚详，而不及其妾。余作此诗补之。”

冬，经过净慧寺（《冬日过净慧寺》，第 566 页）。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二十二岁

广州社学、团勇十余万人守卫珠江两岸，拒英人进入广州。

与王少香和诗（《戏和少香效疑雨集之作》，第 567 页）。

在杜仲容的尺五斋与杜仲容、杜季英兄弟夜话（《尺五斋与杜仲容友

韦季英隽昆季夜话》，第 569 页）。

秋夜，与友人相聚与眠鸥馆（《秋夜小集眠鸥馆有感二首》，第 569 页）。

作诗怀念卢秋坪，时秋坪在新兴（《寄秋坪新兴》，第 569 页）。

秋夜，和杜季英一起，作诗为纪（《秋夜同季英》，第 569 页）。

是秋，在陆氏园中小住（《秋日小住陆氏园杂诗四首》，第 569 页）。

初冬，游郭外诸山（《冬晓游郭外诸山作》，第 570 页）。

冬，作词《红情》，序云："己酉冬颐园席次，见女伶寿香婉秀可念，询其姓，梅氏也。时槛外红梅盛开，因属杜叔莼绘横幅赠之，用白石老仙韵赋此书帧端，并邀朗山、季英同作。"（《随山馆词稿》）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二十三岁

沈曾植生（—1922）。

林则徐卒（1785—）。

正月，道光帝卒。皇四子奕詝即位，是为文宗显皇帝，以明年为咸丰元年。

十二月，洪秀全于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正月五日，与卢竹楼、李秋丞、葵生游郭北离明观（《正月五日偕卢竹楼、秋丞、葵生昆季游郭北离明观》，第 570 页）。

俞浦臣寄仿南田画册，作诗酬谢（《谢浦臣寄〈仿南田画册〉，用山谷集中〈谢斌老送墨竹〉韵》，第 571 页）。

春夜，与杜季英小饮（《春夜偕季英小饮》，第 571 页）。

经过杜仲容的尺五斋，与其相约游黄木湾（《过仲容尺五斋时，方约游黄木湾》，第 571 页）。

为杜季英诗卷作长歌并赠之（《长歌赠杜季英即书其诗卷后》，第 571 页）。

途经羚羊峡（《入羚羊峡》，第 573 页）。

途经新兴，时十三兄在新兴，来访舟中（《道出新兴十三兄来舟次夜话》，第 573 页）。

在电白住宿（《夜宿电白旅邸》，第 573 页）。

从大路坡出发，途径高州、经冼夫人庙（《晓发大路坡》、《高州道中杂诗三首》、《冼夫人庙》，第 573—574 页）。

读王衍梅《绿雪堂集》（《读王笠舫大令衍梅〈绿雪堂集〉二首》，

第574页）。

作诗给叶衍兰（《寄叶兰台衍兰》，第574页）。

晚秋，拜访李清芬（《晚秋过李氏清芬草堂》，第575页）。

冬，在高州作诗寄叶衍兰、李秋丞、马芍舲、杜仲容、杜季英表达思念之情（《冬日高州寄兰台、秋丞、芍舲、仲容、季英广州》，第575页）。

咸丰元年辛亥（1851）二十四岁

春，俞浦臣、杜季英来访（《早春多寒喜浦臣季英见过》，第577页）。

赵念游罗浮，写诗寄怀（《寄赵山人念时山人方游罗浮》，第578页）。

与杜季英论文章（《论文一章赠季英》，第578页）。

与王樾唱和，同作咏物诗（《和少香咏物二首》，第579页）。

是年二月，杜仲容北游京师，五月三日，仲容于江西道中作《见怀诗》并有书信给汪瑔，瑔有感怀作诗寄杜仲容（《寄仲容京师有序》，第579页）。

五月二十四日，偕竹楼、浦臣游唐荔园（《五月二十四日偕竹楼、浦臣游唐荔园》，第580页）。

六月二十八日夜，坐碧仙霞馆中闻茉莉花香，倚栏杆感怀（《六月二十八夜碧仙霞馆即事二首》，第580页）。

七月七日，过旧游处（《七夕过旧游处二首》，第580页）。

秋，作诗怀浦臣（《秋日柬浦臣》，第581页）。

与杜季英作同题诗《古意》（《古意同杜季英作》，第581页）。

秋，得十二兄潮州书信，有感而作（《得十二兄潮州书》，第581页）。

是秋，卧病旬日。《病起杂诗三首》中有“卧疴阅旬日，足不出户庭。抚枕感流光，闻此寒蛩鸣”（《病起杂诗三首》，第581页）。

九月九日登越秀山，作诗寄杜仲容（《九日越秀山登高寄仲容》，第582页）。

观菉君无题诗，后有感而作（《戏书菉君无题诗后》，第582页）。

九月十一日夜，偕浦臣过张竹林楠六息轩，剧谈竟夕（《九月十一日夜偕浦臣过张竹林六息轩，剧谈竟夕》，第582页）。

秋，俞浦臣去肇庆，作诗送之（《送浦臣之肇庆》，第583页）。

黎近夫汝恕来广州，相见于张松谷权寓斋，纵饮极醉，并作有诗。《黎近夫汝恕来广州，相见于张松谷寓斋，纵饮极醉，赋此赠之，并示松谷、浦臣四首》诗中自注：近夫爨客乐昌，见余诗遂以书来订交。同时还作有诗《同松谷饮酒作》（第583页）。

小除夕，与松谷纵饮极醉并赋诗（《小除夕与松谷纵饮极醉作歌》，第584页）。

咸丰二年壬子（1852）二十五岁

与叶衍兰等举文会于粤中。“咸丰初，余与沈子伯眉、杜子仲容、季英、冒子哲斋、文川、汪子芙生举文会于粤中。”（叶衍兰《小三吾亭词序》）

人日，与许霞桥、松谷、浦臣、云臞、陈朗山良玉、潘谦谷受益、花埭看牡丹，并分韵作诗（《人日许霞桥招同松谷、浦臣、云臞、陈朗山、潘谦谷花埭看牡丹，分韵得早字》，第584页）。

春，登越秀山学海堂后山亭（《至山亭在越秀山学海堂后》，第585页）。

春，与秋坪同忆壬寅春于清远夜雨联句事（《春夜雨中，秋坪述壬寅春，清远舟次，夜雨联句事，忽忽十载矣》，第585页）。

春，丹卿将之高要，余浦臣招松谷、黎丹卿同集衡华阁并作诗（《浦臣招同松谷、黎丹卿汝忠，衡华阁小集，时丹卿将之高要》，第585页）。

夏，作《喜晴》诗，季英和之。后得季英所和之诗，有感怀，复作诗，用前韵为答（《季英和余〈喜晴〉诗，慰藉良厚，时夏雨复作，浃旬不止，意甚苦之，得季英诗，乃然而笑，更用前韵奉畣》，第585页）。

观沈松年《忆翠图》后作诗（《戏题沈鹤笙松年〈忆翠图〉》，第586页）。

是夏，病中作诗忆眠鸥馆旧游，作《夏日病中杂诗五首》，怀念李季膺、俞浦臣、杜仲容、杜季英。

九兄从吴中来岭南（《九兄至自吴中》，第586页）。

是年，陈朗山将至长安，作诗送之（《送朗山北上》，第587页）。

竹邻将至惠州，俞浦臣绘罗浮探梅图送之，瑔题诗送之（《竹邻有惠州之行，浦臣绘〈罗浮探梅图〉送之，余题此诗》，第587页）。

咸丰三年癸丑（1853）二十六岁

为曲江令五福幕客，此后随五福历阳山、东莞、番禺三县及廉、琼、

潮、高、肇庆五府，凡十六年。

朱启连生。

早春，自携酒出城东，恰遇竹邻，时竹邻自惠州回广州（《出郭遇竹邻》，第588页）。

春，竹邻去河源，作诗送之（《送竹邻之河源》，第589页）。

春，作诗怀季英（《春夜怀季英》，第589页）。

春晚，过让卿上人居所（《春晚过让卿上人精舍》，第589页）。

与季英饮酒，同作诗遣怀（《放言四首同季英作》，第589页）。

过白云庵（《过白云庵有序》，第589页）。

为王静山长龄题江南春卷子，时静山将还吴中（《为王静山长龄题江南春卷子，时静山将还吴中矣二首》，第590页）。

静山还苏州，作诗送之（《送静山还苏州二首》，第590页）。

作诗吊谢灵运（《广州吊谢灵运》，第590页）。

病旬月，病起后作诗（《病起》，第590页）。

仲冬，由广州将至韶州（《发广州》，第590页）。

途经三峡、飞来峡、弹子矶，作诗纪之（《三峡》，第590页，《舟中望霞山寺即飞来寺》、《弹子矶舟人曳纤而上》，第591页）。

咸丰四年甲寅（1854）二十七岁

是年六月十一日，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在佛山镇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世称红巾军。二十六日，天地会起义军十余万人，围攻广州。

五月初三日，父汪鼎（1791—）死于广州，时值兵乱，归葬无期，只好埋葬在广州小北门外狮毬冈。

春初雨中忆广州旧游，时居韶州，作诗（《春初雨中忆广州旧游》，第591页）。

春，于韶州得季英书，有所感怀，作诗（《得季英书即寄》，第591页）。

春，蕴兰谷蕴玢玉仲蕴璘昆季招集秋圃（《蕴兰谷蕴玢玉仲蕴璘昆季招集秋圃》，第592页）。

清明，夜集沁香榭有怀作（《夜集沁香榭是日清明》，第592页）。

春日寻薛道衡逍遥台故址（《春日寻薛道衡逍遥台故址》，第592页）。

读樊榭山房诗集，有感而作（《读樊榭山房诗集四首》，第592页）。

深秋，晚登九成台（《晚登九成台台在韶州城西北隅》，第593页）。

咸丰五年乙卯（1855）二十八岁

三月，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转入广西。

徐荣统兵与太平军作战，阵亡于安徽祁门。

兵患暂停，《失喜》中有"失喜兵戈解，兼闻道路通"（第594页）。

咸丰六年丙辰（1856）二十九岁

文廷式生（—1904）。

叶衍兰进士及第。

英舰进犯广州，相继占据沿江炮台，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七年丁巳（1857）三十岁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

杜雋为飞弹所中，二十五岁即折首而殒。

是年作诗24首。

秋，仇敦父将之扬州，作诗饯别（《送仇敦父树本之扬州二首》，第594页）。

怀念任又村，作诗赠之（《赠任又村经历光煦》，第595页）。

秋，宋子容病愈，弃家入滇寻亲，汪瑔作诗寄之（《寄宋子容寿昌，时方寻亲云南》，第595页）。

游南华寺（《游南华寺二首》，第596页）。

仲冬，之韶州，行江上，忆辛丑（1841）以来十几年间事，颇多感慨。英德县，在广东。咸丰六年（1856）年英军再度进犯广州，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开炮轰击广州，次日广州沦陷。二十一日，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军所俘。二十五日，巴夏礼等开始统治广州（《江行感怀英德道中作》，第596页）。

乘舟往韶州，舟中同俞浦臣作诗唱和（《舟中同浦臣作》，第597页）。

三十岁生日，时在英德道中（《英德道中三十初度》，第597页）。

冬末春初，乘舟由韶州至平石（《韶州至平石舟次杂诗八首》，第597页）。

岁末，在平石同蔡光斗、冒哲斋同度（《平石度岁同蔡光斗荣奎冒哲

斋澄》，第597页）。

咸丰八年戊午（1858）三十一岁

英法联军舰队北上，四月，攻陷大沽口，五月，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订立。

康有为生（—1927）。

是年作诗23首。

途经宜章、黄沙堡（《宜章道中四首》第597页、《宿黄沙堡》，第598页）。

三月八日，将出韶州，金镜塘招集河舫为饯行（《三月八日，道出韶州金镜塘奉礼招集河舫，即事有作》，第598页）。

三月，作《扬州慢、戊午三月佛山遇倪云臞，因过市楼小饮。时与云臞别五年矣》（《随山馆词稿》）。

佛山旅次，遇吴佩之自广州来（《佛山旅次，遇吴佩之荪自广州来》，第598页）。

读吴星侪《华谿集》后有感，即作诗题吴诗集后，并赠之（《赠吴星侪孝廉炳南，即题其〈华谿集〉后四首》，第598页）。

佛山旅次，遇十七弟，时弟将试吏广州（《佛山遇十七弟，时弟将试吏广州》，第598页）。

食荔枝后有感，并忆阮文达公。《食荔枝有感》（第599页）中有“闻说唐园芜废尽，南中长忆阮公贤谓文达公”。

秋，作诗寄秋丞，时秋丞游居岭南。《寄秋丞二首》（第599页）有“秋风动岭海，千里烟尘昏。异乡戎马间，离合难可论。君今游大庾，慷慨望中原”。

作诗赠秀琨，诗中自注：君为阮文达公著录，弟子尝种梅于越秀山学海堂，比年重游广州，又补种数十株，有诗纪事（《赠秀子璞郡丞秀琨》，第599页）。

秋，同松谷饮酒，感怀友朋各自奔走天涯，聚散无常，同时也对杜季英的去世表示感叹（《感旧行同松谷饮酒作》，第599页）。

夜宿广州城西，作诗感怀寄松谷（《广州城西旅夜寄松谷》，第599页）。

读杜季英及其师丁采遗诗，感慨颇深（《读亡友杜季英及其师丁采之遗诗，慨然有作三首》，第600页）。

陈朗山寄诗来述其在江南经历战火，幸免逃身，并述及杜季英的亡故，汪瑔作诗答之（《畣朗山》，第600页）。

秋，东莞遇仲容，时仲容将去广州试官（《东莞遇仲容，即送其试官广州》，第600页）。

咸丰九年己未（1859）三十二岁

汪兆铨生（—1929）。

梁鼎芬生（—1919）。

张维屏卒（1780—），年八十。

是年作诗45首。

春日，妻小病，有感作诗示之。《春日示内子》（第601页）自注：时内子方小疾。

正月十三日，得沈世良书，作诗四首寄之（《正月十三日得沈伯眉学博世良书，却寄四首》，第601页）。

读居梅生巢《昔邪室诗集》，并作诗题其诗集后（《四言书居梅生巢〈昔邪室诗集〉后》，第602页）。

寒食前三日，怀旧日师友，感慨友朋天涯飘零，其中所怀师友有谭力臣明经大勋，缪荫庐师，陈企堂师，梁福草比部九图，戴云墀上舍尧恩时客乐昌，俞浦臣，吴星侪，叶衍兰，叶衍桂，杜仲容，张竹邻，张松谷，沈世良，陈奎垣起荣，陈朗山，马云雏，卢秋坪等（《春日怀人诗十八首并序》，第603页）。

春，朗山将从军，作诗送之（《送朗山从军》，第604页）。

五月二十六日，与郑小谷游金绳寺，与其同作诗（《五月二十六日，偕同人游金绳寺》，第604页）。

为郑小谷《补学轩集》题诗并赠之。郑献甫，字小谷，象州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官至刑部主事（《赠郑小谷比部献甫，即题其〈补学轩集〉后四首》，第604页）。

为咸丰四年六月东莞一女子顽拒贼手，保全贞洁而亡的烈女作诗（《黎烈女行并序》，第605页）。

游袁督师祠（《袁督师祠二首》，第605页）。

居东莞，游资福寺，虎门炮台等处（《东官杂诗四首》，第605页）。其二："古刹萧然午磬迟，莓苔石径自逶迤。我来阅遍夕阳影，更为残碑立少时资福寺有坡公书，所作罗汉阁铭残刻数十字。"其三："虎头山下

有高台，曾见筹边节使来。九尺穹碑今在否？怒涛如雪海门开阮文达公督两广时，曾增建炮台于虎门，自为文纪之，刻石台上。”

咸丰十年庚申（1860）三十三岁

是年作诗 18 首。

四月初六日，太平军陷常州府，汪璘（1819—）殉难，时客武进县幕。

七月初，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七月七日，英军占领天津。

八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咸丰帝出奔热河。

九月，恭亲王奕䜣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

太平军犯绍兴，城陷，太平军入里，汪瑔堂兄汪士林骂之，军士举刃斫其额，流血沾被衣履，仆地骂不绝口。军士诧曰此秀才未见过，径去。公自投于河，乡人援之苏，因间关逾岭而南。[①]

正月初一日，沈世良卒，年三十八。

杜仲荣卒（1829—）。

为朱眉君烟波如意图题诗（《题朱眉君署正鉴成烟波如意图》，第 606 页）。

为郑小谷识字耕田图题诗（《题小谷比部识字耕田图四首》，第 606 页）。

积雨，作诗寄仲容（《积雨寄仲容》，第 606 页）。

夏夜，坐池亭，作诗怀蕴璘（《池亭夜坐柬玉仲》，第 606 页）。

八月，作《水龙吟、题朱嵋君〈焦山酣睡图〉，时庚申八月》（第 606 页）。

秋，旅次韶州，得马云雏诗，作诗答之（《韶州旅次畣云雏》，第 606 页）。

秋，作诗寄仲容（《秋日柬仲容》，第 606 页）。

十一月初九夜，居韶州，夜寒动客愁，感怀旅途，作诗纪之（《十一月初九夜作》，第 607 页）。

得沈世良亡讯，作诗为其悼亡，并题其《祇陀盦诗集》（《哭伯眉，即书其〈祇陀盦诗集〉后四首》，第 607 页）。

---

① 汪兆镛：《微尚斋杂文》卷五，第 13 页。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三十四岁

七月，咸丰帝病卒于热河。九月，慈禧发动北京政变，逮捕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大臣。载淳即皇帝位，改元同治。慈安、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史称辛酉政变。

郑献甫受聘越华书院讲席。

汪兆镛生（—1939）。

陈其锟（1792—）卒，年七十。字吾山，号棠溪。先世浙江山阴人，祖世熙游幕粤东，遂家番禺。

是年作诗 16 首。

春，在村肆小饮（《春日过村肆小饮》，第 607 页）。

时客番禺县庙（《无题四首时客番禺县庙》，第 607 页）。

为朱鉴成诗集题诗，并赠之（《赠眉君，即书其诗集后眉君为何东洲编修绍基著录弟子》，第 608 页）。

秋，得友人书，感怀“布衣忧国心，隐然见文字”（《秋日得友人书感赋》，第 608 页）。

同治元年壬戌（1862）三十五岁

是年作诗 9 首。

九月，郑献甫离粤返广西。

为小梅画梅题诗（《戏题诸小梅文标画梅》，第 609 页）。

摹拟唐人闺怨诗作诗二首（《戏拟唐人春闺怨二首》，第 609 页）。

同治二年癸亥（1863）三十六岁

是年作诗 11 首。

同治三年甲子（1864）三十七岁

陶邵学生。

同治四年乙丑（1865）三十八岁

十二月，清军攻陷广东嘉应州。至此，长江以南太平军余部全部失败。

居巢卒。

同治五年丙寅（1866）三十九岁

是年作诗 24 首。

读徐荣《怀古田舍诗集》（《读徐兵备荣〈怀古田舍诗集〉二首》，第 611 页）。

春，王玉仲相招，同饮酒（《玉仲招饮，酒半作两生行赋畣》，第 611

页）。

春游，与王玉仲有绝句互相唱和（《和玉仲春游绝句四首》，第612页）。

作客琼州，作《琼州杂诗四首》写其淹留琼州之见闻及感受。

秋，在海口遇风受阻（《海口阻风戏成长句》，第612页）。

秋，过雷州，拟谒寇莱公祠，不果（《过雷州，拟谒寇莱公祠，不果》，第612页）。

途经遂溪、电白、黄泥湾等地，作有诗《遂溪》、《行十许日，不见一山，去水东数里，遥见浮岚隐然，舆人曰：此阳春境内山也》、《电白道中》、《登舟戏作》、《舟中晓起》、《夜泊黄泥湾》《江楼写望》（第613页）。

秋，归广州月余，复有潮州之行（《还广州月余，复有潮州之行，舟中感怀得二百字》，第613页）。

十七弟被劾，将去官，作诗赠之（《十七弟被劾，去官，作此示之》，第614页）。

同治六年丁卯（1867）四十岁

是年作诗18首。

为陈冶岩画竹题诗（《题陈冶岩庆洪画竹二首》，第614页）。

夏，玉仲将入都，作诗送之（《送玉仲入都》，第614页）。

为黄定公祠作诗，并有序。《黄老相公祠四首并序》（第614页）。序曰："黄定公，上元诸生，明崇祯末，客潮阳。甲申之变，赴县庙井中。死后，人于井傍立庙，祀之曰：黄老相公祠。"

秋，十七弟将之汀州，送之于大埔道中（《大埔道中与十七弟别时弟之汀州》，第615页）。

十二月十三夜，于高州郡庙中作诗示邓仁山（《十二月十三夜，高州郡庙作，示邓仁山肇元》，第615页）。

同治七年戊辰（1868）四十一岁

是年作诗5首。

五福卒。

汪瑔母卢宜人卒。

春，乘舟过黄泥湾，之肇庆。作有诗《阳春舟次》、《黄泥湾》（第615页）。

模拟李长吉咏马诗（《拟李长吉咏马诗十首》，第615页）。

肇庆诸公招集饮酒，同作诗唱和（《自来肇庆，李恢垣吏部光廷、林子鱼太守直、邱拱庭大令鸿星、卞石卿别驾心培、鲁小庭经历肇乾、孙福田公子明庆排日置酒见招，率成长歌，呈同诸公集》，第615页）。

秋，朗山以丁内艰，还岭南，遂来肇庆，汪瑔欣喜作诗。（《喜朗山至并序》，第616页）："朗山为通州学官，凡五年。通州距京师及天津皆不远，朗山数岁往来，以海运事议叙得知县。今年丁内艰，还岭南，遂来肇庆，久别相见，不可无诗。"

为恢垣所藏倪文贞公的草书千字文题诗（《题恢垣所藏倪文贞公草书千字文册后》，第616页）。

十月，陈良玉序汪瑔《随山馆词稿》。

同治八年己巳（1869）四十二岁

再客潮州

是年作诗2首。

为彭南屏刺史翰孙所藏圆圆小象题诗（《题彭南屏刺史翰孙所藏圆圆小象》，第616页）。

冬，得陈朗山所作近诗，慨然有感作诗以寄之（《冬日得朗山所作近诗，慨然有作，即以寄畣》，第617页）。

同治九年庚午（1870）四十三岁

是年作诗2首。

冬，吴绣谷来广州，言其将谋归计，作诗赠之（《赠吴绣谷文虎有序》，第617页）。序曰："绣谷，江宁人，读书通医术。咸丰初，避寇来岭南，与余交十余年。余尝两得剧疾，药之而愈。今冬来潮州，云将谋归计，因赋此诗贻之。"

同治十年辛未（1871）四十四岁

是年作诗16首。

与史莲征雨夜畅谈（《雨中与史莲征溶夜话感赋》，第617页）。

春，久旱。六月，潮州大水。作有诗《旱》、《六月杪潮州大水感事有作》（第617页）。

秋，连阴，有感而作《秋日连阴慨然有作》，（第618页）。

拜谒韩文公祠（《谒韩文公祠》，第619页）。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四十五岁

入藩使俊达幕。

十月，郑献甫卒。

是年作诗 34 首。

二月三日，发潮州至蔡家围，与朱颖白郡丞用孚、姚生文骏别（《二月三日发潮州至蔡家围，与朱颖白郡丞用孚、姚生文骏别》，第 620 页）。

途经嘉应、长乐、龙川等地，作有诗《嘉应道中》、《长乐道中六言四首》、《龙川怀古》（第 620 页）。

为小梅画梅册题诗（《戏题小梅画梅册六言四首》，第 620 页）。

友人归镇江，送之（《送友人归镇江》，第 621 页）。

夏，从潮州归广州，居城南，闭关逃暑，感慨往昔漂泊之旅，慨然有作《城南消夏杂咏十首有序》。序曰："余生长广州，习其风土，比年旅泊他郡，却望侨寓，有如故乡。今夏自潮州归，僦居城南，闭关逃暑，意有所触，辄成小诗，汇而录之，凡十截句。"（第 621 页）

七月十五夜，偕陈澧、林直、何懋曾南园看月，相互作诗唱和（《七月十五夜，偕陈兰甫学录澧、林子隅太守直、何乃嘉上舍懋曾南园看月二首》，第 622 页）。

秋，客自甘肃军中归，和瑔《秋阴》诗，诗中多写边塞间事物，瑔有感怀，复作诗二首和之。《客自甘肃军中归，和余〈秋阴〉诗，多道边塞间景物，复和二首》（第 622 页）按：是年秋，瑔作《秋阴四首》。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四十六岁

何绍基卒（1799—）。

是年作诗 17 首。

正月五日，与彭南屏、林子隅、胡敬甫、蕴玉仲、冯云伯、戴云墀、俞浦臣、陶卿田、卢海楼同游花埭，并作诗呈诸君子。《正月五日，游花埭，呈同游诸君子并序》（第 623 页）："是日，同游者彭南屏、林子隅两太守，胡敬甫、蕴玉仲两郡丞，冯云伯大令、戴云墀、俞浦臣、陶卿田三上舍，卢海楼都尉也。"

为林昌彝《母夫人一灯课读图》题诗。《为林香溪学录昌彝题其〈母夫人一灯课读图〉》按：同治八年己巳（1869）昌彝六十七岁。五月，丁杰于广州海天琴舫与林昌彝相见，为昌彝《一灯课读图》命题（据《林昌彝诗文集》附录 399 页）。

初秋，与严兰史、彭南屏、林子隅、冯云伯同集学海堂，相互赋诗

（《初秋，严兰史家畴、彭南屏、林子隅三太守，冯云伯大令招集学海堂》，第625页）。

秋，玉仲北归，葬其先人于西山，别后久无音书，作诗寄之（《玉仲于今秋北归，葬其先人副使公于西山，别后久不得书，赋此寄之二首》，第625页）。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四十七岁

十二月，同治帝载淳卒，立醇亲王奕谖之子载湉继位，是为德宗景皇帝。慈禧、慈安再度垂帘听政。

朱鉴成（1820—）卒，字眉君，四川富顺县人，清代著名爱国诗人。

是年作诗16首。

春，登越秀山，寻朝汉台故址（《春日登越秀山，寻朝汉台故址用前年〈龙川怀古〉诗韵》，第625页）。

春，朱颖白郡丞将入都，为之送行（《送颖白入都四首》，第626页）。

秋夜，梦竹邻（《梦竹邻效东野体》，第626页）。

竹邻自南海归，瑔欣喜有诗（《喜竹邻归自南海》，第626页）。

五月三日，斋中独坐，闻江上竞渡鼓声，慨然有作（《五月三日，斋中独坐，闻江上竞渡鼓声，慨然有作》，第626页）。

六月二十八日，避暑于学海堂（《六月二十八日，学海堂避暑，简行省诸君子》，第627页）。

秋，登净慧寺千佛塔（《登净慧寺千佛塔，土人谓之花塔》，第627页）。

秋，送辛中仁航海之天津。《送辛大中仁航海之天津有序》："中仁，字中仁，余姚人，通兵家言，兼精历算之学，闲为诗文，奡兀自喜。客广州岁余，不得志，去为畿甸之游，天寒气阴，置酒为别，酒半赋此，即以送之。诗效晚唐人体者，从中仁所好也。"（第628页）

光绪元年乙亥（1875）四十八岁

清政府决定建立南洋、北洋和粤洋水师。

刘坤一督粤，延汪瑔主夷务，理中外交涉，继任裕宽、张树声、曾国荃皆倚重之，前后又十年。

入籍番禺捕属司。

是年作诗24首。

为梁福草九图十二石山斋题诗，并赠之（《寄题梁福草比部九图十二石山斋比部蓄蜡石十二，以名其斋》，第628页）。

春，越秀山看木棉，归后，检故友李竹香凤池、王少香樾集中皆有木棉花诗，因作诗相和（《越秀山看木棉，归检故友李竹香凤池、王少香樾集中皆有木棉花诗，戏次其韵三首》第628页），越秀山，在广州北，一称观音山。汉初，南越王赵佗曾建越王台于山上。

春杪夏初日，与云墀、浦臣诸子，小集卿田寓斋（《春杪夏初日，与云墀、浦臣诸子，小集卿田寓斋，率成长句》，第629页）。

秋，作诗寄玉仲（《秋江曲戏简玉仲》，第629页）。

中秋夜，张石邻大令琮招集野水闲鸥馆，酒罢登越秀山看月（《中秋夜，张石邻大令招集野水闲鸥馆，酒罢登越秀山看月，得诗四首》，第629页）。

林香溪将归闽中，作诗送之（《送林香溪学录泛海归闽中》，第630页）。

十二月十二日，过陆氏废园，见梨花盛开，慨然有作（《十二月十二日，过陆氏废园，见梨花盛开，慨然有作二首》，第630页）。

冬，咏帆将归肇庆，作诗送之。《送咏帆之肇庆并序》："咏帆与余交二十年矣，聚散不恒，而情好无间。今年冬，君来广州，旬日之聚，晨夕甚欢，而钟子之琴未希，文通之赋已作，辄为长句，以写鄙怀。风格不高，辞意凡下，聊述生平久要之意，冀为别后相思之资云尔。"（第630页）

是年，汪瑔序徐灏《攓云阁词》，略云："（徐）于词之源之流溯沿探讨者久矣，宜其词之工也。"

光绪二年丙子（1876）四十九岁

是年作诗32首。

林昌彝卒（1803—），年七十四岁（据林庆铨《楹联述录》卷八第5页）。

春，作诗赠贾虚谷，时虚谷寄家京师。《赠贾虚谷有序》："虚谷，吾乡人，寄家京师，南北往来，几三十年。"（第632页）

作诗和虚谷《感事》、《效元遗山杂著》（《次韵虚谷感事之作》、《虚谷效元遗山杂著，和之四首》，第632页）。

夏，过杏林庄，见咸丰壬子（1852）间壁上题诗，追忆旧游，感慨

“人事已非宾客老”（《杏林庄在珠江之南，咸丰壬子，许桥孝廉光尝结吟社于是，忽忽廿余载矣。丙子夏日重过是庄，见壁上诗笺尚存，追忆旧游，慨然有作》，第632页）。

秋，与玉仲夜坐，用前作《夜雨》诗韵作诗两首示玉仲（《与玉仲夜坐用前韵》、《再叠前韵示玉仲》，第633页）。

初冬，得雨，后立春日又雨，作有诗《初冬骤热已而得雨》、《十二月二十二日雨中戏成，是日立春》、《初冬雨中作》（第633页）。

光绪三年丁丑（1877）五十岁

是年作诗56首。

春，阴雨不定，作有诗《元日坐雨用壬申韵》、《积阴作寒赋此自遣》、《夜雨寒甚枕上作》、《喜晴》。（第635页）

春，瑞南星太守将入都，作诗送之。有《送瑞南星太守瑞昌膺荐入都四首》“好作朝天集，江山一路看。春风过大庾，晓日认长安”句，得知是春日将入都（第635页）。

为姚烈妇、邱孝女作诗纪之。（《姚烈妇行》，第635页、《邱孝女行有序》，第636页）。

刘逋见过（《刘翁逋见过并序》，第636页）。

读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即效其体作诗二首。《弇州山人四部稿》是明代王世贞撰的诗文别集，世贞号弇州山人，故名。凡174卷，包括赋部2卷，风雅类1卷，诗部51卷，文部84卷，说部36卷（《读〈弇州山人四部稿〉，即效其体二首》，第636页）。

秋，夜雨有诗感旅怀（《立秋后一夕雨》，第636页）。

秋，登镇海楼（《秋日登镇海楼》，第636页）。

为贾虚谷诗集题诗（《题虚谷诗集后，即效其体》，第636页）。

拟唐人《小游仙》诗作诗四首。《戏拟唐人小游仙四首》（第637页）按：咸丰二年壬子（1852）二十五岁时，作有《小游仙六首》（第587页）。

秋，客使院，见鹤（《使院见鹤戏成四首》，第637页）。

冬，天气反常（《初冬暄热如盛夏时，比年所罕见也》，《次日骤寒》，第637页）。

友人北上（《送人北上》，第637页）。

客使院，有感怀（《广州杂感八首客使院作》，第637页）。

送客江楼（《江楼送客因写望》，第638页）。

五十岁生日，为避客入使院（《嘉平六日，五十初度，晨入使院为避客计，戏成小诗，即以自寿》，第638页，《使院感事二十韵》，第639页）。

贾景芳将归里，作诗《归里留别》，瑔作诗和之（《次韵虚谷归里留别之作》，第639页）。

冬，徐伯熙将之并州，时，伯熙初病起。《送徐伯熙之山右，时伯熙初病起》："并州万里路漫漫，饯汝旗亭酒易干。"（第639页）。

光绪四年戊寅（1878）五十一岁

汪士林（1811—）卒，六十八岁。

是年作诗28首。

正月九日，镜塘招集烟浒楼（《正月九日雨中，镜塘招集烟浒楼。楼临珠江，至暮移樽河舫二首》，第640页）。

早春，广韶两郡属邑方以灾歉，议蠲振，时有感怀（《早春感兴时阴寒连月，广韶两郡属邑方以灾歉议蠲振》，第640页）。

重过古楼，忆咸丰间与朋辈聚于此，而今同饮之人，眉君、仲容、季英、伯眉皆旧殁矣，感慨"此日倚栏如梦寐"（《古楼题壁咸丰间，尝与朋辈剧饮于此》，第640页）。

春，多雨（《二月七日夜雨枕上口占》，第640页；《久雨》，第641页）。

春，久雨后晴，过东园、篆园（《初晴过东园》、《新晴过篆园》，第641页）。

六月十一日，同人招集粤秀山道院（《六月十一日，同人招集粤秀山道院》，第642页）。

九月六日，偕郑玉山茂才权过学海堂（《九月六日，偕郑玉山茂才权过学海堂》，第642页）。

虚谷有书来，以山居相勖，箴言可佩，事力未充，惟有愧叹而已（《虚谷书来，以山居相勖，箴言可佩，事力未充，惟有愧叹而已，赋寄二首》，第642页）。

胡衡斋大令于役潮州，作诗寄之（《寄胡衡斋大令，鉴时大令于役潮州》，第642页）。

冬，夜作书斋，感慨生来所历之事。《述怀十二韵并序》："鄙人生于

道光之初，于时岭表无事，先君子挈家客游。瑔以童稚侍左右，岁时宴嬰，初不知饥寒，兵戈为何事也。瑔年十三，禁烟之事起，未几而烽尘澒洞世事益以敝，生计日以艰，辞家远游，衣食奔走，其间居围城，历军垒、涉风涛、犯瘴疠、如此者二十余年。至同治间，大乱削平，幸睹中兴之盛，而忧劳摧抑之余，体弱多病，无复功名之志矣。比年以来，颇思闭户读书，措心纂述，顾山资不足，家食未能，虚愿之偿，不知何日。寒宵独坐，偶忆数十年来所阅之境，率成长律一章，亦劳者之歌云尔。"（第642页）

夜梦道光庚戌冬，夜宿电白旅馆事（《述梦有序》，第643页）。

为余寿宏《抱香词》题诗（《赠余药田寿宏即书其所作〈抱香词〉后》，第643页）。

光绪五年己卯（1879）五十二岁

徐灏（1810—）卒，年七十。

是年作诗41首。

观剧（《观剧戏成》，第644页）。

为钓渭图题诗（《题钓渭图》，第644页）。

作诗和虚谷（《和虚谷杂诗六首》，第644页）。

咏帆自肇庆归，相偕至酒家小饮（《咏帆自肇庆归，偕至酒家小饮》，第645页）。

余浦臣和瑔《观剧诗》，因感慨道光中旧友观剧之事《浦臣和余观剧诗，有今昔之感，率意次韵，复得四首》（第645页）。

其一中有"依旧句栏柳色新，春风如梦雨如尘。鸾笙象管都零落，丁卯桥边不见人"。该诗后有自注："道光中，广州多戏园，许霞桥孝廉尝结诗社赋观剧词，复置酒怡园，邀同社诸君宴集，倪云癯载之《桐阴清话》，以为美谈。卅年来，风流云散，而怡园亦久废矣。"丁卯，若实写应指同治六年（1867），距作该组诗有十二年。

倪鸿离开岭南，已经到达闽中。该组诗其二后有自注："云癯近以事去粤，比闻已至闽中。"

用杜季英诗中之意人诗，时季英已亡逝二十二年矣。组诗其三："记唱洪郎一曲新，凌波罗袜不生尘。公孙剑器歌行在，无复当宴点笔人。"后自注："杜蓂君有《洪郎曲》，为小伶信儿作也。凌波一语，即用蓂君诗意。"

其四后自注："道光中，小伶如信儿辈不下十许人，色艺皆有可观，近皆不知流落何许。"

奉赵庚生之请，为赵谷林《三十六鸥草堂图》题诗三首（《赵叔田庚生以先世谷林先生〈三十六鸥草堂图〉见示奉题三首》，第 645 页）。

六月二十七日，客居使院西斋（《六月二十七日使院西斋偶书》，第 645 页）。

秋夜，于山响楼听章汝南弹琴（《秋夜山响楼听章生汝南琴》，第 645 页）。

秋初，居使院西斋（《秋初使院西斋作四首》，第 645 页）。

光绪六年庚辰（1880）五十三岁

梁鼎芬中进士。

是年作诗 41 首。

魏升如将之新疆，与玉仲作诗送之。《送魏升如游击拔之新疆二首有序》："升如于咸丰初出塞，不得音问者，垂二十年，客秋从乌里雅苏台军中请急归省，居数月，复治装西行。余与玉仲皆卅年前旧交也，各赋诗送之。"（《再送升如二首》，第 648 页）

清明后十日，夜雨，作诗二首示玉仲（《雨夜示玉仲二首》，第 648 页）。

和张端卿《观弈》诗（《次韵张端卿楷观弈四首》，第 649 页）。

冬，云墀归山阴，作诗送之（《送云墀归山阴二首》，第 650 页）。

秋晚，与玉仲同过学海堂（《秋晚偕玉仲过学海堂》，第 650 页）。

读唐人诗，感怀赋绝句四首（《读唐人诗率成绝句四首》，第 651 页）。

光绪七年辛巳（1881）五十四岁

客张树声幕。《旅谭》卷二中有"无锡秦瑶田茂材嗜学能文，光绪辛巳与余同客广督张公（树声）幕中"。

陈良玉（1814—）卒，年六十八。字朗山，一字铁禅，隶汉军镶白旗，铁岭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选通州学正，保升知县直隶州，丁艰归。为学海堂学长及同文馆总教习。又修《八旗制》，居处种梅，因名梅窝。候选教谕，广州驻防。著有《梅窝诗钞》三卷、《词钞》、《遗稿》各一卷，《虞苑东斋词钞》。

是年作诗 48 首。

春，入使院西斋（《晨入使院西斋，即事成咏，用壬申元日韵》，第652页）。

效长吉体作《蝴蝶舞》，以示端卿（《蝴蝶舞戏效长吉体示端卿》，第652页）。

潘贞敏将来广州，作诗赠之（《赠潘伯时大令贞敏时君以试吏复来广州》，第653页）。

三月五日，雨窗独坐，闻雨声感慨年来漂泊旅怀。《听雨有感四首有序》："鄙人少壮，旅游馀三十年，山陲水驿中，数为风雨所苦，舟行则荒江野岸，黄庐苦竹之与为周旋也。陆行则空郊绝壑、青林密菁之莫知止宿也。忧劳警悸，殆不可一二数。然尔时意气方壮，不之悔也。至同治戊辰，一病之后，体气顿弱，始渐以跋涉为苦，比年客广州使院，因卜一廛于越秀山之麓，稍息舟舆登顿之劳，而精力则已衰矣。今日雨窗独坐，竹树萧飒，闻声感触，率成小诗。嗟夫！持此诗以示细旃广厦之人，彼亦安知世有此境哉？光绪辛巳三月五日。"（第653页）

暮春，出北郭至下塘村肆小饮（《暮春出北郭至下塘村肆小饮》，第653页）。

和叶衍兰《游丝》诗（《和兰台户部〈游丝〉四首》，第654页）。

夏，过陆氏故园，有感示玉仲、秋丞。《过陆氏故园有感示玉仲秋丞并序》："玉仲近移居城西，其地故驻防官廨也。道光中，余媚陆香岩大使云以数百千赁得之，辟廨西隙地为园，池榭花竹颇有疏埜之致。余与朋辈，往往觞咏其中。迨今，甫逾卅年，陆既卒官，园已废为蔬圃，杂花老树剪伐殆尽，所仅存者，林篍数百竿，菡萏一二亩而已。辛巳夏日，偶访玉仲，于是追忆畴昔，友朋文酒之乐，为慨然者久之，辄成此诗，用述所感。玉仲今居此，而秋丞昔之同游者也，诗成因以示之。"（第654页）

雨，小疾刚愈，坐随山馆中（《随山馆坐雨时小极甫瘉》，第654页）。

六月十二日，玉仲招同陈兰甫学录，盍特摩花池馆小集。迟朗山学博不至（《六月十二日，玉仲招同陈兰甫学录，盍特摩花池馆小集。迟朗山学博不至》，第654页）。

早秋，玉仲于役琼管月余，未尝得闻音讯，因作诗怀之（《怀玉仲于役琼管月余不得书》，第655页）。

读徐青藤集（《读徐青藤集二首》，第655页）。

九月九日，与玉仲、介香登越秀山（《重九日偕玉仲、介香晚登越秀山并序》，第656页）。

冬，潘时伯于役海上，作诗寄之（《冬日寄潘时伯大令时方于役海上》，第657页）。

叶衍兰寄研光笺，作诗谢之（《兰台惠寄研光笺，云是乾隆间藩邸所制也。赋诗为谢》，第657页）。

作诗赠周凤山（《赠周副将凤山》，第657页）。

岁除日，游广州花市（《岁除日阅花市》，第658页）。

光绪八年壬午（1882）五十五岁

客曾国荃幕中。

陈澧卒（1810—），年七十三。

是年作诗30首。

玉仲将之陵水，作诗赠之（《送玉仲宰陵水》，第658页）。

二月二日，过篆园（《二月二日过篆园》，第658页）。

春，雨多，感农事喜而有作（《南中春耕忌夜雨，以气寒损禾也。今春雨多，以夜而气候甚暄，老农谓为年丰之兆，喜而赋诗》，第658页）。

初夏，病（《初夏病起榖庵坐雨》，第658页）。

仲仁作《感怀》，有诗和之（《次韵仲仁感怀之作》，第658页）。

七月十三夜，与秋丞庭次看月（《七月十三夜与秋丞庭次看月怃然有作》，第659页）。

与王子展郡丞存善作《古意》诗（《古意与王子展郡丞存善》，第659页）。

玉仲由陵水寄书，得之后作诗寄之（《得玉仲陵水书却寄》，第660页）。

光绪九年癸未（1883）五十六岁

是年作诗26首。

春，作诗寄伯时（《简伯时》，第662页）。

四月十八夜，与客集江楼，客去后，独眠不成寐，起看窗月，感慨今昔（《江楼夜起并序》，第662页）。

贾景方作《咏怀》诗，和之（《次韵虚谷咏怀之作》，第663页）。

晚春，相集于镜塘园亭（《晚春集镜塘园亭戏成短歌》，第663页）。

暮秋寄玉仲，时玉仲在陵水（《暮秋寄玉仲陵水》，第663页）。

冬，登镇海楼（《冬日登镇海楼短歌》，第664页）。

冬夜，忆菊坡精舍梅花（《冬夜忆菊坡精舍梅花》，第664页）。

冬，伯熙将之桂林，买舟送之，时夜雨作，夜不成寐（《舟夜寄伯熙伯熙自山右归，复有桂林之行，买舟送之，既别而雨作，夜不成寐，因寄此诗》，第664页）。

汪瑔为金武祥姑母的贞孝事迹作诗五首（见金武祥《粟香随笔》卷三，第19页）。

光绪十年甲申（1884）五十七岁

七月，清廷下诏对法宣战。

是年作诗33首。

人日，作诗寄伯熙，伯熙有《端州客次，得穀翁人日见寄诗，次韵奉酬》诗，知伯熙时在端州（《人日作诗寄伯熙》，第665页）。

春，作诗示徐昶（《放歌示伯熙》，第666页）。

夏，移寓城西（《移寓城西遣怀四首》，第667页）。

九月十二日，复还故居（《九月十二日复还故居即事成咏是日立冬》，第667页）。

十三兄将之永安，阻之不可，诗以送之（《十三兄有永安之行，阻之不可，诗以送之》，第667页）。

读《自然好学斋诗集》，题诗其后（《读〈自然好学斋诗集〉书后》，第667页）。

文廷式将泛海入都，送之（《送文芸阁廷式泛海入都》，第667页）。

立春后，阴雨连日，赋诗寄金粟香运同武祥（《立春后，阴雨连日，赋此简金粟香运同武祥》，第668页）。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五十八岁

瑔之子汪兆铨以番禺县附学生员援例入籍应试中举人。

汪兆镛优贡生。

八月十二日，梁鼎芬以疏劾李鸿章反被降五级调用。

是年作诗27首。

二月十三日，官军有谅山之捷。谅山，在广西镇南关外。法军于光绪十年冬进攻滇、桂边境，十二月三十日，攻占谅山。十一年一月九日，攻占镇南关。时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奏请起用宿将冯子材，总前敌师捍卫粤、桂。朝命冯子材佐广西边外军事。子材闻谅山警，亟赴镇南关，而法

军已焚关退，龙州危急。子材率所部扼守关前险隘，遣王孝祺为犄角。二月八日，法军三路攻关，子材指挥诸将陷阵大破之，追杀至关外二十里。二月十三日，子材率军攻克谅山。乘胜悉复法军入侵之地（《喜闻官军二月十三日谅山之捷》，第 668 页）。

春，作诗寄徐绍植（《简徐伯生上舍绍植》，第 668 页）。

是年二月十九日，中法签订《停战条件》。二十二日，清政府诏令前线停战。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法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越南条款》，中法战争结束。五月，法兰西屡败乞和，朝廷与之达成款议，诏至广州。《书事四首并序》："法兰西屡败乞和，朝廷许之款议，既定，诏至广州，海防解严，时光绪十一年夏五月也。"（第 669 页）

金武祥以宜兴茗壶，媵以饼茶款待，作诗表谢意（《粟香饷宜兴茗壶，媵以饼茶，赋诗为谢》，第 669 页）。

作《鸣鹤篇》赠梁鼎芬（《鸣鹤篇赠梁节盦编修鼎芬》，第 670 页）。

为山阴钟烈女作诗为纪（《钟烈女诗并序》，第 670 页）。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五十九岁

是年作诗 16 首。

《重五日有感有序》："广州往岁，竞渡珠江，颇极游观之盛，比者乡三老以时事有殊自为禁约江上遂无一艘客以告余，慨然赋此。"

约在此年，叶衍兰与汪瑔重聚，作《长亭怨慢》，序云："余与芙生，别三十年，旧雨再联，春风重唱，以词稿属为点定，即书其后。"（《秋梦庵词钞》）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六十岁

是年作诗 25 首。

邻人治室，削共用之墙，而不得已移笔砚于室东小屋，湫隘湿暗，日长郁蒸，意颇苦之。五月八日，衡斋见过，叹此为清凉国界，后瑔闻言瞿然，感怀年来奔走羁旅，作诗自慰，亦自警（《五月八日即事有作有序》，第 674 页）。

徐昶过访穀庵，读瑔诗，并作诗奉呈（《伯熙过穀庵读余前诗次韵见赠畣之》，第 675 页）。

为蒋以诚先世心馀（士铨）先生《携二子游庐山图》题诗（《为蒋子明以诚题其先世心馀先生携二子游庐山图》，第 675 页）。

读吴梅村杂剧二种并题诗三首于卷后（《读吴梅村杂剧二种漫题卷后

三首》，第676页）。

读唐六如诗集，并题诗二首其后（《书唐六如诗集后二首有序》，第676页）。

重九，作《金缕曲．丁亥九日寄徐伯熙桂林》。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六十一岁

是年作诗18首。

赋短歌寄徐昶（《伯熙于役广西近闻其讫事东还，计程当至浔梧间矣，赋短歌寄之》，第677页）。

秋日雨中，得舒棠陔佐尧韶州书并《见怀诗》，因作诗四首赋畣（《秋日雨中得舒棠陔韶州书并见怀诗赋畣四首》，第678页）。

符琦士士恭汝阳省视至郑州，伯熙作诗送之，瑔作诗和伯熙诗（《次韵伯熙〈送符琦士士恭汝阳省视却至郑州〉工次》，第678页）。

冬，文廷式在杭州，作诗寄之（《冬夜寄怀芸阁杭州》，第679页）。

为《秦淮泛春图》题诗（《为人题秦淮泛春图》，第679页）。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六十二岁

是年作诗51首。

舒棠陔应潮州守之招，作诗送之（《棠陔应潮州守之招赋此送之》，第680页）。

作六言诗六首寄衡斋（《六言简衡斋六首》，第681页）。

从子兆镛中举，作诗示二子并寄十三从兄（《占籍番禺岁逾十稔，光绪乙酉铨儿举于乡，从子兆镛复于今秋获隽，儒门之喜气，先世之余庆也，赋此以示二子，并寄十三从兄》，第682页）。

为伯熙所藏《虞山自书诗册》题诗二首（《题伯熙所藏虞山自书诗册二首》，第683页）。

作诗赠羽士陆道修（《赠羽士陆鹤修道修》，第683页）。

与鹤修夜谈琴事（《与鹤修夜谈琴事漫成四首》，第683页）。

读《明史神宗纪》、《晋书》并作诗纪之（《读明史神宗纪》、《读晋书》，第683页）。

作诗和友人《早春看花词》（《戏和友人早春看花词》，第684页）。

贾虚谷寓家都门，近始归里，今年七十矣，作诗寄之，贾虚谷并有诗畣之（《寄虚谷》，第684页）。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六十三岁

是年作诗 39 首。

庭际白山茶盛开，莹澈可爱，戏号之曰洁客，纪以小诗，并有舒棠陔作诗相和（《庭际白山茶盛开，莹澈可爱，戏号之曰“洁客”，纪以小诗》，第 685 页）。

作诗与舒棠陔（《棠陔以〈江左十五子诗选〉见贻，康熙中宋牧仲尚书所纂也，读毕书后即视棠陔》，第 686 页）。

作诗和文廷式（《次韵答文芸阁编修》，第 688 页）。

金武祥父亲八十大寿，汪瑔作五律十首为之祝寿。[①]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六十四岁

是年作诗一首。

二月初三日卒，年六十四。

① 金武祥：“家君……及庚寅年八十，汪君芙生亦赠五律十首。”《粟香三笔》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 118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附录二

汪琭集外诗文辑录

一、诗

春游绝句

酒旗风里暖犹轻，桐帽棱鞋自在行。今日斜阳前日雨，木棉红出越王城。（金武祥《粟香二笔》卷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11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春词

轻寒如水逼熏笼，破晓犹吹料峭风。觉道夜来微有雨，桃花红入小楼中。（金武祥《粟香二笔》卷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11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香奁杂咏六首

咏庄

好检风诗咏硕人，丰客盛服自停匀。礼成柘馆三缫日，相好莲台九品身。不事矜持花解语，自然温丽玉生春。由来心薄惊鸿态，未要陈思赋洛神。

咏懒

半启窗前玉镜台，梳头偏待小鬟催。熏笼夜久还重倚，线帖春深未尽开。宋院画宜摹倦绣，汉宫妆本号慵来。东风昨夜浑无赖，应是新含豆蔻胎。

咏憨

游仙梦好待重寻，拈得花枝不肯簪。窥客画帘藏半面，背人小袜绣双心。相逢下九春犹浅，罢戏秋千笑不禁。记得将离还并坐，似无情处最

情深。

咏痴

默默相看意未传，殢人深处泥人怜。惯依抱日娇郎侧（李义山诗：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私誓慈云古佛前。一半性情分慧黠，十分心事共缠绵。愁深梦浅知何事，只是花时更惘然。

咏愁

春留影事梦留痕，黯黯能销一段魂。更不分明疑白醉，最难排遣是黄昏。百年风月来无迹，万劫人天种有根。争信石头城畔住，个侬名字自温存。

咏病

瑶情玉思总恹恹，待把脂奁换药奁。山写眉痕还似旧，风多花气转微嫌。尽抛春色三分去，斗觉宵寒一倍添。犹自防他同伴笑，晓来妆束更矜严。

（按：金武祥《粟香三笔》卷一："汪芙生近刊《随山馆诗稿》删去旧作香奁杂咏六首，余见其典雅而不流于亵狎，为录存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11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五律十首（为金粟香尊人八十寿辰作）

其一

任屿唐循吏，仁山宋钜儒。名宗绵世泽，耆宿叶元符。介椵三辰酒，随身五岳图。长赢曦景永，嘉月纪悬孤。

其二

养志当觴□，承欢有彩衣。春秋趋学舍，晨夕侍重闱。经既传桓郁，诗能补广微。天伦多乐事，更喜礼无违。

其三

和乐觇同气，温肫见此心。不闻虀齑釜，长护女嫛碪。晚近风非古，平生意独深。友于关至性，端弗愧儒林。

其四

师古耽文史，因时托啸歌。心原如月淡，气总得春多。冰雪身松柏，云山志薜萝。湘中还岭右，蜡屐恣经过。

其五

几历须陀劫，长存不坏身。冲和消沴厉，平等视冤亲。恚恨原无着，扶持合有神。由来忘我相，一任转风轮。

其六

言就南陔养，因为北户游。丹砂探句漏，翠壁俯灵洲。静遣尘中累，间寻物外幽。高年能济胜，佳处每迟留。

其七

惠解千金橐，炊生万户烟。乌头邀宠锡，鹄面荷安全。荣从延年杖，功高续命田。兰陵称美意，茀禄自蝉嫣。

其八

务本仁为质，储休理可征。因心原孝友，绕膝见孙曾。泰宇端能定，谦衷不自矜。从知比干策，余庆衍云礽。

其九

早岁干戈后，长春杖履中。椿萱延爱日，杞菊见高风。名父苏胡允，诗人陆放翁。试翻耆旧传，真与昔人同。

其十

籛笮千龄始，尧蓂四照时。三升河朔酒，八弟乐天诗。鹤纪知难老，鲰生愧早衰。愿言随福履，更得视期颐（贱子今年六十有三异日翁举百岁之觞献寿者亦八十余矣）。

（按，《粟香四笔》卷四："家君就养至梧州，于丁亥年七十有七寿辰，凌君仲瓛赠五律十首已载三笔卷八。及庚寅年八十，汪君芙生亦赠五律十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 118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羊城七夕竹枝词》十首

越王台畔雨初停，几处秋光到画屏。好是罗云弦月夜，家家儿女说双星。

绣闼瑶扉取次开，花为屏障玉为台。青溪小妹蓝桥姊，有约今宵乞巧来。

十丈长筵五色光，香奁金翠竞铺张。可应天上神仙侣，也学人间时世妆。（乞巧设长筵，用方几数十，其所陈设自瓜果灯烛而外，香奁缕箱中器具几于无一不备。又有织女梳妆盘圆经数尺，中盛镜匣衣扇之属，皆用杂彩及研金五色等笺制成，或出自闺中或购诸市上，虽巨费不吝也。广州诸邑皆有此风而会城为最。）

稻苗豆荚绿成丛，费尽滋培一月功。嫩绿几层红一点，羊镫光在翠秧中。（一月前以水浸榖豆之属，俟其发芽约高数寸，即移置磁盎，至七夕

陈于筵际中，燃玻璃镫空明四照，宋人词所谓翠色冷光相射者庶几近。）

小品华薿制最精，胡麻胶液巧经营。不知翠袖红窗下，几许工夫作（去声）得成。（用胡麻小粒及碎剪镫心草粘砌盘盏镫檠之属。又或作小队仪仗如旗伞牌扇之类，大仅数寸，精巧绝伦。曩皆制自闺中，近年市肆亦有制就出售者矣。）

排当真成锦一窝，妙偷鸳杼胜鸾梭。何须更向天孙乞，只觉闺中巧更多。

约伴烧香历五更，褰裙几度下阶行。相看莫讶腰支倦，街鼓遥传第四声。

姊妹追随上下肩，个依新试嫁衣鲜。娇痴小妹工嘲谑，明岁何人又谢仙。（乞巧皆女郎，其所新嫁者预于会则谓之谢仙。）

几盏清泉汲夜深，铜盘承取寘庭心。今年得巧知多少，水影明朝验绣绒。（是夜以盘水寘庭中，俾受风露，次日浮小花针或豆叶于水面，观水中影所成物象为得巧之验。）

升平旧事记从前，动费豪家百万钱。昔日繁华今日梦，有人闲说道光年。（道光中乞巧之风最盛，豪门盛族一夕之费或数百金，往往重门洞开，外人入而纵观无呵止者。咸丰甲寅以后此风顿衰，近十余年乃渐复旧观，然多闭门以拒游人，非相识者无由阑入矣。）

（按，《粟香四笔》卷七："《广东新语》纪广州时序云：'七月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广东通志》《广州府志》皆引之。而闺阁中乞巧之盛，皆未之及。老友汪君芙生曾作《羊城七夕竹枝词》十首，以游戏之作未编入稿中，余谓可备风俗之采，为录于此。"《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11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道情歌

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江湖满地一渔翁（杜甫）。请君休说长安事（白居易），乍可狂歌草泽中（高适）。自家山阴道人，半世蹉跎百般潦倒，三十丈平生豪气，消磨在瘴雨蛮烟；四十年逆旅羁愁，生受些晓风残月。一肩行李，已饱经世路崎岖；两眼昏花，早觑透人情冷暖。身历的朱门蓬户，见更番花落花开。眼看他沧海桑田凡几度潮来潮去。日来老身闲暇，信口胡诌作成几首道情，大抵一时游戏，且请诸公安坐试听贫道唱来：

走江湖数十年，看浮云过眼前，凡人不读神仙传，蒙庄坐阅人间世，邹衍高谈海外天。把塞翁得失思量徧，诌几句山讴野曲，不劳他铁板铜弦。

看东风柳絮狂到，西风槲叶黄树枝儿，也有衰和旺，丰台芍药朝承露，湘水芙蓉夜拒霜，孤芳冷艳谁能赏，算只有孤山诗句，好陪他彭泽壶觞。

得时人莫自夸，失时人莫浪嗟。看阎浮世界般般假，百年隙驷无多日。七世华貂有几家，把向来妄念丢开罢。论富贵草头着露，说功名镜里看花。

算聪明最误人，好文章不救贫。被圣经贤传相勾引，十年黄卷成何事。一领青衫负此身，便雕龙倚马无人问。一任您文心似锦，只博得衰鬓如银。

建奇谋立大功，到头来也是空名，垂青史知何用。三山门外夸擒虎，五丈原头说卧龙，时移世换都如梦。试看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英雄。

溯周秦说汉唐，论人才较短长，二千年不少卿和相。风来桐树多吹倒，月落梅花欠主张。镴枪头惯做乔模样，道有甚神通法术，总无非鬼混排场。

赋秦楼，恋楚娥，斗铅华，艳绮罗，销魂呰小偏难破。称心春日红妆好，转眼秋风白发多。算莺花岁月匆匆过，投至得美人黄土，可能留明镜青蛾。

对花枝把酒杯且高歌，且放怀问古来豪杰谁还在。旌旗五色单于塞，节钺三登上将台。终须抛却黄金带，麒麟冢悲风松柏，翡翠楼落日蒿莱。

世间万般都是假，只合说渔樵谙高歌茗椀旁团坐。茅檐下俺呵若不遇有缘人，也不将渔鼓打。

板桥道人所作道情不标宫调，其实过曲为正宫之耍孩儿，煞尾为双调之清江引，其句调可覆按也。作道情固与谱曲不同，而句之短长字之平仄要亦未可背驰。板桥之作尚不离宗，后来不无偭错矣。鄙人于九宫诸曲素未究心，此又游戏之作，其中舛谬不问可知，所冀深于音律者有以正之尔。山阴道人自识。

（按，金武祥《粟香四笔》卷七：“芙生又有《道情歌》亦游戏之作，然板桥道人所谓唤醒痴聋，销除烦恼者正不必弃去也，并录于此。”《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11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赠金粟香

积岁应官鬓未皤，诗名久矣敌阴何。成书芦浦三年住，得句梅花五岭多。寓与江山双蜡屐，论交湖海一渔蓑。浣花溪上茆茨在，惭愧高轩几度过（君官于岭表，五羊八桂沿牒往来，炎方奥区游历几遍。尝得南汉石刻五种于容县都峤山，为向来金石所未见。比年榷盐梧州，成书甚富，余尝为之序，皆诗中本事也。）

（按，金武祥《粟香四笔》卷七："芙生见赠诗云：……其他往来唱和之作，以一时寄兴，两家俱未入稿，兹者故人长往，遗墨犹新。寸简小诗都堪珍惜，偶留数纸悉付装池，并录数首于后。"）

和金粟香

陋巷来停长者车，相从何似水云涯。消寒夜卜深杯酒，劝客春催老树花。五岭乡愁怀腊雪（广州无雪），一瓻村酿愧流霞。新来剩可瞢腾醉，莫问高城急暮笳。

碾冰为柱为车，才思知君未有涯。半世程功深楮叶，一时蜚誉并棠花（谓喆昆逸亭廉访）。文心妙散千重锦，仙骨疑餐六气霞。更有清豪诗境在，山城长笛塞垣笳。

自笑生平下泽车，闲从诗酒托生涯。论交兰有同心契，耐冷梅无仰面花。我辈自思元度月，世人方诧曼都霞。封侯客帐今无梦，掩耳南闾卤簿笳。

骎骎岁月转飙车，又见春来瘴水涯。我愧仙人餐柏叶，君宜宫阁咏梅花。晴光刚歇连江雨，物同惊出海霞。满耳迎年箫鼓盛，好将和气压旁笳。

觭梦浑忘鼠穴车，安知世事浩无涯。且沽野店雪梨酒（雪梨，广州酒名），闲赏小庭山茗花。闭户种松赊岁月，入山属药愧烟霞。朝来差幸酣眠足，高枕不闻吹晓笳。

（按，金武祥《粟香四笔》卷七："甲申十二月，芙生招饮，余口占律句云……芙生和云……嗣复四叠前韵见赠。"《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11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故乡

休疑建德非吾土，且认并州作故乡。珠海花田好风景，不愁无地着诗囊。

（按，倪鸿《桐阴清话》卷一“予久客广州”条：“余先世浙江之会稽，高祖栖园公游广西，遂占籍桂林。予待家大人游广东最久，不惟未还会稽，即桂林亦不常至。计三十岁以来，居广州时为最多，有视同故乡之意。余友山阴汪芙生瑔尝游惠州一日，将还省门，语人曰：‘吾将归。’或曰：‘广州非君故乡，何云归也？芙生因成绝句云……盖芙生亦久客广州者，故有此语。读之先得吾心。”《桐阴清话》，咸丰刻本）

花会谣

真珠小字群芳谱，浪蝶狂峰作花主。日日名园开一枝，批红判白无人知。重房密坞藏春巧，买花人多得花少。看朱成碧动经时，转绿回黄无定期。一样鸳鸯三十六，东风消息令人疑。

（按，倪鸿《桐阴清话》卷七“花会谣”条：“花会赌博之一端也。以三十六人名为标，每日开一名，射中者以三十倍上偿之。一日之间输赢无算。汪芙生《花会谣》云……恶薄之俗，主持风化者宜知所转移也。”《桐阴清话》，咸丰刻本）

咏七夕乞巧

金迷纸醉影交加，伯玉盘中许并夸。儿女从来工想象，神仙何处着铅华。一轮样皆姮娥月，四照光分帝子花。料得黄姑才调好，催妆诗就倚灵槎。

（按，倪鸿《桐阴清话》卷八“汪芙生咏七夕乞巧”条：“广州七夕乞巧，皆陈织女梳妆盘，剪纸为之，凡香奁所需之物，无不悉备。银烛画屏之侧，无此不豪也。汪芙生有诗咏之云……”《桐阴清话》，咸丰刻本）

赠倪云癯

汗青无力付镌刊，泊宅编成只自看。不是玉台知己在，著书容易刻书难。

典到金泥簇蝶裙，衣香新换墨香熏。刻成一卷珍珠字，好向深闺拜细君。

（按，倪鸿《桐阴清话》卷八“内子不愿吾再著书”条：“余撰此书成日，内子典嫁衣数袭以资刻费。汪芙生有诗赠余云……内子见之谓余曰：‘雅谑也。然窃不愿卿再著书。’余问其故，微笑曰：‘恐女儿箱无多长物耳。’余不觉失笑。”《桐阴清话》，咸丰刻本）

二、词

买陂塘

趁春风、片飒千里，绿波刚皱南浦。篷窗安稳邮籤缓，不比匆匆行旅。吟旧句，认历历江山，都是曾经处。新诗漫与，看羚峡峰青，牂牁水绿，重到岭西路。

离筵畔，休读文通小赋，浮踪容易萍聚。如闻曹务优闲甚，一任轻装来去。君记取，好点笔新亭，且作逋翁语（顾况知新亭盐监曰：吾欲貌海山中也）。未妨小住，待荔熟绡红，蒲分酿碧，东下作重午。

（按，《粟香三笔》卷七："乙酉季春监盐梧州，盖四度西行矣。陈象九大令为绘鸳江鸿雪图，汪君芙生填《买陂塘》词赠行云……。"《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11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三、文

《海云阁诗钞》序

诗之所以为诗，性情、风格、才力、词藻也。感人于此四者，或有偏胜，必无偏废。而后世颇不尽然，此所以多所流失也。今读海云阁诗，清而实腴，丽而有则，富于藻采而性灵不为所掩；严于格律而才气不为所拘。兼四者之长无四者之失，可谓独暘襟灵，自成馨逸者矣。集中佳句既以朱围识之，并撷其尤者入拙著《旅谭》中，虽标举有所未尽，而大略彬彬可觏矣。毁誉一时，文章千古，世不乏识曲听真者，敢请以鄙言质之。光绪戊子三月，越人汪瑔识。

（叶衍兰《海云阁诗钞》卷首，民国十七年刊本）

《粟香二笔》跋

光绪甲申冬，江阴金湝生运同以所撰粟香随笔八卷、二笔八卷视瑔，属为之跋。瑔惟杂家说家之书自来皆隶丙部，国朝阳湖赵氏翼，则谓近世说部书日多，宜于四部之外别立一部。盖其为书，自经史典章诗文艺术以泉铁文璅事之属，皆可羼入之。书既易成，故作者日众，然其峣然杰出足以自传者，卒不多见，而鄙浅糅杂无闻于后者乃不可胜计，岂非成之易而

传之难欤？湝翁此书体裁明洁，叙述雅令，举凡浅鄙糅杂之弊不啻扫而空之，随举一条皆足以资艺谭助闻见，其有传于后固无疑也。瑔数十年来涉猎所得，听覩所及，亦尝有所记录，顾素性惰窳，又人事溷之，楮墨丛残，迄无洁本，以视作者其为愧也多矣。循览终篇，勉附数语，非惟着服膺之实，副放诿诿之勤，亦因以志其私恧焉尔。长至日越人汪瑔识

（《粟香二笔》，《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杂家类，第11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桐阴清话》序

戊午之夏，云臞避乱佛山，成《桐阴清话》八卷。松枝麈尾，招天末之友朋；�管龙宾，作客中之俦侣。方勺羁栖，而后泊宅成编；骈宾退之，余剧谭著录时也。隔江烽火，正少年投笔之时；歧路尘埃，岂我辈著书之日。颇疑孤感，少损冲襟而遒。借隙地之数弓，坐凉阴之半亩。茶瓜留客，竹素随身。不忘一日之清欢，小纪百年之轶事。以性耽文藻，喜述篇章；以身在衡茅，不谈朝市。大抵言鲭笑牒，安石之聚碎金；亦或史隽经腴，稚川之夸积玉。是则论其标格，可呼南郡之新书；较以体裁，似胜东轩之杂录矣。瑔顷同旅泊，聊共刊雠。自惭旧制之丛残，误被故人之采掇。沟犹笑我，佢能为猥橐之文；著述期君，定不愧带经之裔。山阴汪瑔。

（倪鸿《桐阴清话》卷首，《桐阴清话》，咸丰刻本）

《题珠海夜游图》序

江山无恙，如识吾曹；风月有情，几逢清夜。遒有吹铁道人之笛，惊起鱼龙；弹石学士之筝，飞来鸾鹤。此宵如水，有客疑仙；烟墨传之，风华逌尔。吾友倪子云臞，羊车绮岁，鹤氅丰神。幺凤同乡，记故居于癸水；文鹓性情，寻香梦于丁簾。袁渚吟诗，每忘申旦；襄城拥枻，雅爱清游。以为昔日南壕，已如铜陌；今时北里，即是珠江。遂乃啸侣命俦，撷芳选胜，效石头之打桨，如渡口之闻歌。处金迷纸醉之场，买春有术；当酒酽灯浓之际，卜夜无辞。具足胜情，因传妙绘。此夜游一图之所由作也。观其波如镜展，月共人圆，三更玳瑁之天，一色玻璃之水。漱珠桥外，红出一灯；得月台前，白摇双桨。今夕何夕，伊人美人。乐府歌辞，子夜四弦之曲；真灵佐业，楞严十种之仙。惨绿衣凉，是何年少；闹红舸在，合住佳人。挟倾城名士以俱来，作月地花天之小集。以视两番赤壁，羽客吹箫；十里虹桥，雏鬟度曲。古今虽异，游赏匪殊。然而湘瑟曲终，

秦筝人远。前身明月，虽尝与我周旋；春水绿波，毕竟干卿底事。不无感慨，别具情禅。则兹图之身现阿难，缘生法喜。歌板酒旗之地，中有人焉；香城色盼之中，吾无隐尔。固云騴萎华之妙悟，而慧业之证明也乎？瑔花不著身，久忘结习；月能照影，时与徘徊。惜握臂之已迟，悔遨头之未共。游春选梦，惭白傅之才；买夏论园，读画在红云之隝。丹青一例，粉墨千秋，请呼南海之仙人，更写西园之雅集。此日颒珠三百，从君荔子邨中；他时渌酒十千，寻我桃花潭上时君方招游唐荔园。

（按，倪鸿《桐阴清话》卷八："珠江为冶游之地，灯火笙歌，最为繁盛，道光戊申己酉间，余尝载酒听歌，藉以陶写。因绘《珠海夜游图》，一时题咏林立。汪芙生为之序……"《桐阴清话》，咸丰刻本）

参考书目

（一）古代和近代著作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汉）郑玄注：《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魏）魏文帝撰：《典论·论文》，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刘强会评辑校：《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

（唐）王维撰，杨文生编著：《王维诗集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唐）李商隐著，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唐）温庭筠著，刘学锴校注：《温庭筠全集校注》，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宋）魏泰：《东轩笔录》，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宋）贺铸：《东山词》，《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词类，第 172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中国书店 1986 年版。

（宋）苏轼著，（清）朱孝藏编年，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东坡乐府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清）沈世良：《楞华室词钞》，咸丰四年（1854）刻本。

（清）沈世良：《小祗陀盦诗钞》，同治二年（1863）刻本。

（清）林昌彝：《海天琴思录》，1864 年刻本。

（清）徐灏：《灵洲山人诗录》，同治三年（1864）刊。

（清）汪瑔：《随山馆全集》，光绪间刻本。

（清）汪瑔：《松烟小录》，光绪间刻本。

（清）汪瑔：《旅谭》，光绪间刻本。

（清）叶英华：《花影吹笙词钞》，光绪三年（1877）刻本。

（清）谭献：《箧中词》，光绪八年（1882）刻本。

（清）陶卿田：《有真意斋诗钞》，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

（清）叶衍兰：《秋梦盦词钞》，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清）朱启连：《棣垞集》，光绪年间刻本。

（清）钱仪吉：《碑传集》，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

（清）缪荃孙：《续碑传集》，江楚编译书局1910年版。

（清）汪兆镛：《碑传集三编》，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清）陶邵学：《颐巢类稿》，1911年刻本。

（清）汪兆铨：《惺默斋集》，1919年刻本。

（清）汪兆铨：《苌楚轩诗集》，1923年刻本。

（清）厉鹗：《樊榭山房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清）叶英华：《斜月杏花屋诗钞》，1936年番禺叶氏铅印本

（清）汪兆镛：《椶窗杂记》，1943年刻本。

（清）汪兆镛：《山阴汪氏谱》，汪敬德堂1947年印本。

（清）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中华书局1955年版。

（清）刘坤一：《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清）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清）梁鼎芬修：《番禺县续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中华书局出版1971年版。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清）文廷式著，赵铁寒编：《文芸阁（廷式）先生全集》，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清）张维屏：《续刊补学轩诗集》序，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清）蕴璘：《补学轩诗集》前集较刊前记，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清）郑献甫：《补学轩诗集》，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清）金武祥：《芙蓉江上草堂诗草》，《续修四库全书》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清）汪兆镛：《碑传集三编》，文海出版社 1980 年版。

（清）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清）汪兆镛：《微尚斋杂文》，文海出版社 1981 年版。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 1983 年版。

（清）汪辉祖纂：《佐治药言》，中华书局 19 同，85 年版。

（清）叶衍兰、叶恭绰编：《清代学者象传》，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

（清）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文海出版社 1991 年版。

（清）叶衍兰：《海云阁诗钞》，中国书店 1991 年版。

（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

（清）陈衍：《石遗室诗话》钱仲联、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清）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清）汪瑔：《随山馆猥稿》，《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 155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清）汪瑔：《随山馆丛稿》，《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 155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清）汪瑔：《随山馆尺牍》，《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 155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清）陈衍：《石遗室文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 157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清）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 170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清）金武祥：《粟香随笔》、《粟香二笔》、《粟香三笔》、《粟香四笔》、《粟香五笔》、《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 1183—118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清）朱彝尊：《词综补遗》，《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词类，第 173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清）文廷式著，曾文斌选注：《文道希遗诗选注》，岳麓书社 2006 年版。

（清）曾国荃撰：《曾国荃集》，岳麓书社 2008 年版。

（清）陈澧：《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二）现代著作

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印书馆 1928 年版。

丁福保编：《清诗话》，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编：《广东文徵》，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印，1976 年版。

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 1983 年版。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戴逸、林言椒主编：《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 1986 年版。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何龄修、张捷夫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王思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苑书义、潘振平：《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店 1988 年版。

汪国垣：《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杨钟羲：《雪桥诗话》，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钱仲联：《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陈植锷：《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王玉棠：《刘坤一评传》，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陈永正选注：《岭南历代词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曾德珪编：《粤西词载》，漓江出版社 1993 年版。
钱仲联：《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缪越、叶嘉莹：《词学古今谈》，岳麓书社 1993 年版。
陈永正：《岭南历代词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李锦全等编著：《岭南思想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钟贤培、汪松涛主编：《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 1998 年版。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钱仲联：《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王立：《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叶嘉莹：《清词丛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魏中林：《清代诗学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 2000 年版。
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马卫中：《光宣诗坛流派发展史论》，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季羡林、裴效维：《近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
夏晓虹：《晚清的魅力》，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管林主编：《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李春光：《清代学人录》，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叶春生主编：《岭南民俗事典》，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管林、陈永标等著：《岭南晚清文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版。

李春光编纂：《清代名人轶事辑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钱仲联：《清诗纪事》道光朝卷，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魏中林：《钱仲联讲论清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尚小明编著：《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版。

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中华书局2006年版。

左鹏军：《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谢永芳：《广东近世词坛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陈永正：《岭南诗歌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林家有、张金超著：《文武兼备的革命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后　记

来暨南大学工作后，对岭南文学逐渐产生了兴趣，比较关注清和近代的岭南小说和诗文创作，除了自己作研究外，当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时也常提出一些关于岭南文学的选题，几年下来由我指导的有关岭南文学的学位论文已有七八篇。本书的选题也是由我提出，王永青同学用作毕业论文题目，在我指导下写出的学位论文。之后我对论文作了修改，重写了部分章节，补充了材料，以书稿形式向广州市社科联申请出版资助项目，获得了立项，同时得到了暨南大学“211”工程三期“比较文艺学与海外华人文学”项目的资助。在此特向广州市社科联和项目评审专家、文学院“211”工程项目领导小组王列耀教授和史小军教授，还有推荐本书申报出版资助的广州市语言文学学会吴晟教授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在学位论文阶段先后得到魏中林教授、程国赋教授、史小军教授、彭玉平教授、左鹏军教授的指导和评议，他们的宝贵意见对书稿的修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魏中林教授还在百忙之中拨冗赐序，使我深为感动。在此书出版之际，谨向上述各位先生致以谢忱！

王进驹

2011 年 8 月

岭南幕客诗人
汪瑔研究




ISBN 978-7-5161-1066-9

定价：39.00元